兴隆文史资料第五辑

《千里无人区》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隆县委员会

兴隆文史资料第五辑

《千里无人区》史料专辑

主　编：王庆生

二00五年六月

兴隆文史资料

政协兴隆县委员会　编

850×1168 毫米　32 开　内文 10 印张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豫内资新出发通字〔2005〕26 号

内部交流　免费赠阅

前輩甘洒熱血創基業
後人鑄就輝煌著新篇

吳海滙

二〇〇五年月二十日

不能忘记的历史
激人奋进的篇章

丁伟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日

序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兴隆文史资料第五辑》(千里无人区史料专辑)即将成书出版。在此，我代表政协兴隆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各位特邀文史研究员和在本辑文史编纂过程中给予各方面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是各级政协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兴隆县第七届政协以来，全员上下高度重视本辑文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工作。专门组建了特邀文史研究员队伍，拟定重点征集提纲，明确具体撰稿人，并先后四次召开文史研究员会议，掌握撰稿进度，提高撰稿质量，帮助解决撰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经过全体编修人员的共同努力，《兴隆文史资料第五辑》历经三年时间，辑印成书，即将出版，奉献给关心支持兴隆发展的各界仁人志士。

《兴隆文史资料第五辑》共30余篇，25万字。全书再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隆人民奋起抗击日军的英雄史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我中华大地犯下的泯灭人性的罪孽，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宽泛、语言通俗，可读性很强的又一册文史资料，是留给后世子孙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史为鉴，教育后人。我们将团结、依靠、带领广大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工作大局，发扬兴隆革命老区光荣传统，认真而富有成效地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政协职能，为促进兴隆的全面发展不断做出新贡献。



2005年6月　　政协兴隆县第七届委员会主席　刘丽珍

目　　录

一　**千里“无人区”概述** ………………………………… 佟靖功（1）
二　**迸发光辉的历程** ………………………………………………（39）
　开辟迁遵兴联合县关外山区 ……………………… 田　赛（39）
　山里的烽火岁月 ………………………………… 李　文（43）
　我永远怀念的老区人民 ………………………… 李　东（49）
　战火深处有课堂 ………………………………… 高敬波（53）
　两度黄花滦水滨 ………………………………… 卫　民（68）
　从黑河到车河、柳河的搏斗 ……………………… 李　清（74）
　战斗在“无人区” ……………………………… 丁春生（94）
　回忆承兴密联合县抗日工作 ……………………… 李守善（107）
　关于承滦兴联合县办事处和敌后武装工作队的回忆
　　…………………………………………………… 王泽民（119）
　巍巍黄岩志成城 ………………………………… 鲁　克（124）
　长城烽火中的文艺轻骑兵 ……………………… 王雪松（137）
三　**旷日持久的大屠杀、大检举** ……………………………（148）
　（一）日伪军对无辜百姓的大屠杀…………………… 佟靖功（148）
　（二）日伪统治时期兴隆县大检举……… 王庆生　栾福忠（178）
　（三）兴隆县部落瘟疫危害调查表 ……………………………（181）
四　**部落——摧毁人生的统治** ………………………………（184）
　滦河的长恨 ……………………………………… 佟靖功（184）
　转角楼的冻金花 ………………………………… 佟靖功（196）
　我的童年 ………………………………………… 郑福堂（202）
　日伪统治下的茅山 ……………………………… 郑福堂（208）

惨无人道的部落生活 …………………………… 王久侠（211）
五 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
…………………… 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215）
六 永远不要忘记人民…………………………………………（257）
西沟轶事 …………………………………… 佟靖功（257）
冰儿诞生记 ………………………………… 佟靖功（268）
四嫂子 ……………………………………… 朱呈云（282）
一个“金蛋” ………………………………… 栾福忠（287）
敌人营垒中的“万警尉” ……………………… 刘 玉（291）
编后记 ……………………………………………………（303）

一　千里“无人区”概述

佟靖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的一个伟大壮举，它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的经验是中华民族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鉴往而知今，对抗日战争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和总结，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无人区”化策略，是侵华日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优势而实施的一个最毒辣的战略。经过60年来的沉淀，我们今天再来探讨它，就像云开雾散那样，有助于对某些国际大势的透析，也有助于对执政已经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警示。

在现代化战争中，强国侵占、割据、统治某些弱国的霸道现象已经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招魂并且向世界再次伸出一鳌的势态下，若干年后，类似他们当年制造“无人区”的那一套统治手段，会不会直接间接的再被利用或效仿？因而，总结抗日时期12年的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经验，仍然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卫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使命。

我们今天探讨“无人区”课题，在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这样，历史研究就必须与时俱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忠于史实，忠于科学，既要表述我们在“无人区”斗争中的丰功伟绩，也要展现“无人区”斗争曲折起伏发展过程及失误的教训。当时，日伪制造“无人区”，我们坚持“无人区”斗争，都有由此及彼的内在联系和时

空发展的传承关系。因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基层单位从事征研，就必须从客观上把握，切忌只囿本域，忽视大端。注意整体的总结，才能科学的鉴别、比较，知发展，识规律，获得继往开来的文明成果和精神动力。因为，侵华日军在我国先后制造三处千里“无人区”，都有其纵贯脉络。所以，必须系统的陈叙，才能构成千里“无人区”的总体概述。

一、伪哈东至三江省千里“无人区”概况

这个地区位于哈尔滨以东、松花江下游至黑龙江的边境地区，是伪满洲国行政统治最为薄弱的地区。因而，恰恰是赵尚志军长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延录军长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周保中军长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等抗日部队日益活跃而形成的北满最大的抗日游击区。在这民族危亡的非常时刻，1.4万名抗日战士们昂扬着永不屈服的民族气节，给飞扬跋扈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赵尚志将军率部在海伦县冰趟子，利用一面冰坡设伏，一次奇袭毙伤800多名日伪军。周保中将军率部，攻占官街和北国防所，毙俘日伪军200人。抗日部队屡屡成建制的歼灭敌人，使日伪当局惶惶不安，称“共匪统治区域，甚为广阔”[①] 为北满“第一赤色地区”。[②]

日军从1936年开始“大讨伐”，关东军将第四师团调入三江，同时，将围剿抗日武装的老手于深澄一调任伪军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兼任伪三江省省长。然而，抗日部队仍然机智灵活，陷敌于被动。相继，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部署，1937年7月开始在三江“特别大讨伐”。随即这一地区同时展开大规模集家并屯，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

---

① 《东北“大讨伐”》第367页。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1991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

② 《东北历次大惨案》第179页。

这一次，伪三江省推行集团部落建设，接受了以前多年集家并屯失败的教训，搞了一系列的伪善和应变。为了展现其应对，略追溯些日伪有关史料。

伪满洲国的集家并屯，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始于1933年。1932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训令第969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文件》向各省通告，其诡辩辞令是：由于集团部落的建设，促进治安的肃正，从匪害中拯救偏僻地区村民，使其脱离匪徒压迫之痛苦，不受胁迫与匪徒一同行动。“欲救此弊，莫如将此星散住户量为整理，使之结成互相连结之集团部落，而完全归于县政统治之下。”伪满各省相继制定了集团部落建设要纲或治安肃正法工作实施纲要，或称为《集家法》。而日军的文件中，对建设集团部落的目的则一言以蔽之：“为确立治安，分离匪民最为要紧。”① 1934年、1935年、1936年首先在伪间岛省、东边道和吉林省的一些地区实施。哈东5县（赵尚志将军的抗日根据地）和伪三江省（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游击根据地）建立集团部落始于1936年5月10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长涩谷三郎的命令下，建立了哈东5县（珠河、滨县、阿城、双城、五常）治安肃正办事处，组织日伪军警大肆放火，仅在蜜峰地区就烧毁56个屯庄，焚烬房屋6500多间，强迫1000多户居民搬进集团部落，其余2000多户居民向四处逃亡。1936年在三江省13个县大肆推行集家并屯，以汤原、饶河、依兰、桦川、勃利、方正等县为重点，“坚定地采取除重要街镇外所有农户都收容到集团部落的方针。”② 三江省特别治安肃正的基本策略是，“适应扩大治安圈，靠军队的威力在圈内建设集团部落”，“如果稳定的平原地

---

① 《东北“大讨伐”》第183页。

② 《东北“大讨伐”》第428页。

带逐渐扩大治安圈，匪贼被逼入无人区则只有自灭。"[1]

日伪的阴谋是毒辣的，抗日联军虽然进行了上百次的英勇战斗，还是一步步地撤退。那时，这里的抗日联军已经很久得不到党中央直接的指示，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还没有发表，建设抗日根据地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没能建立县、区、村的政权机关和民兵组织有效的巩固根据地。因为没有相应的地方政权机关，缺少符合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没有按时征粮征税，抗联需要的钱粮几乎完全靠"打土豪"与"吃大户"。因而，退进冰天雪地的"无人区"便面临着断绝一切生活来源的严重困难。

抗联第三军主力向东远征，留下第二团、第三团牵制日军。中共道北区委书记、第二团政委、著名的赵一曼烈士，就是在严寒而饥饿的"无人区"里苦战中受了重伤，被捕后大节巍巍，凛然斥敌，1936年8月2日壮烈牺牲。

从1937年到1939年，日伪军警在三江省桦川、富锦、宝清、勃利、依兰、方正、通河、凤山、汤原、萝北、绥滨、同江、抚远、饶河等14个县建立了500多个集团部落，监禁30多万人口，占该省农业人口40%。[2] 烧毁房屋5万多间，杀死4万多人，制造了千里"无人区"。[3] 由于大规模集家并屯和阴谋劝降，谢文东（原抗联第八军军长）、李华堂（原抗联第九军军长）、柴世荣（原抗联第五军军长）相继背叛投敌。最坚强的抗联第三军在赵尚志将军运筹下，突破敌人重重围困，西进嫩江北安省东南部南北河套一带开辟新区。

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地方活动缺乏深入的隐蔽，1938年3月15日

① 《东北"大讨伐"》第428页。
② 《东北"大讨伐"》第427页。
③ 《东北"大讨伐"》第386页。

以后，日本宪兵“一齐逮捕”了桦川县委、北满临时省委机关及汤原县委、依兰县委等组织的中共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会员250名。[①]

为了恢复佛山、萝北、汤原抗日根据地，1941年11月，赵尚志将军率100多名精干战士隐蔽返回萝北、鹤立地区，计划继续发动群众，重建汤东游击队。同时，注意了解敌情，准备于适当时机将正在培训的一批骨干调回三江，进一步恢复抗日根据地。因为，在冰雪弥漫的“无人区”里活动，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将队伍分散。1942年1月，赵尚志将军与其参谋长姜立新及两名战士进入鹤立县交界的“无人区”时，被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收买的化装为森林猎人的特务侦知，便利用与姜立新的故旧关系和提供某些情报，被委为游击队员随行。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夜3时，赵尚志将军一行去袭击伪梧桐河警备队时，特务刘德山突然在背后开枪，击中赵尚志将军与其部下王永孝，赵将军倒地回击一枪，将刘德山打死。趁另一特务急去伪警备队报信之机，赵将军将文件、经费和武器交付姜立新和战士张凤岐，托付任务后令他们离去。敌人将已经不能行动的赵将军和战士王永孝载回警备队。赵将军对自己的巨痛一声不响，对逼讯的敌人一律怒视不语，表现了一位生死不惊、魔窟不惧的大帅气概。8小时后，从容牺牲。

二、伪东南地区千里“无人区”概况

日军的《昭和十四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1939年4月7日，关作命第1483号附件）中确定的方针，就是统一集中日、满军警各机关力量，彻底消灭在三江省、通化省和热河省一部地区的残存匪患。伪治安部1939年度治安肃正要纲（1939年4月14日，满作命第13号附件）中规定：“治安肃正的重点仍然是三江省、通化省

① 《东北历史大惨案》第193页

和热河省，在加强治标工作的同时，进行治本工作，特别是要利用集团部落，彻底分离匪民”。

伪东南地区，就是所谓东边道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伪通化省的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伪吉林省的磐石、桦甸；伪奉天省的蒙江、辉南、金川、柳河和伪间岛省的安图等14个县。这里是抗日部队最活跃的地区，即日伪当局所称的治安“癌症”地区。

这一具有特别战略意义的辽阔山区，是杨靖宇将军等从1932年冬季开始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他率领不足百人的小队，发展成几千人的铁军，在万千炮弹倾泄的硝烟里，高度机智地周旋歼敌，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智大勇的英雄气魄和奇战奇谋的非凡才能。1934年11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1935年在《八一宣言》的鼓舞下，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会师，1936年合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当选为总司令。这年杨靖宇粉碎了伪东边道“剿匪司令”少将邵本良部1万多人的围攻，并在反攻中奇袭，致邵本良受伤，其日本顾问英俊克雄大佐被击毙。

针对这样的形势，关东军制订了《关于昭和十一年至昭和十四年三月施行之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要求三年内“彻底肃清、镇压在满共产党”、“为使匪贼无存在之余地，通过捣毁匪贼山寨、组成集团部落、划定无人区、分离匪民等工作，使其孤立，然后进行讨伐，加以歼灭。”[①] 1936年10月，由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少将佐佐木到一指挥2.7万多伪满军向东边道进行“大讨伐”。作为军事家和游击战专家的杨靖宇，在不断地反“围剿”中，逐步地把根据地南移，继磐石、河里基地之后在桓仁、兴京一带营造了第三块游击根据地，相继开辟南满，在凤城、本溪又建立了基地。这时已知党中央

① 《东北“大讨伐”》第218页。

率红军北上抗日，渡河东征，一部已抵热河前线，为跳出日军战略上的包围，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杨靖宇发动了第二次西征。这一次接受了上次西征受阻的教训，1936年11月，组织400多人的精锐骑兵快速越过南满铁路，想趁河水封冻之时越过辽河，避开辽南和奉天地区，直入内蒙科尔沁草原，再向热河挺进。经过一个月的奔驰，已经突破沽源、铁岭敌军防线，抵达辽河东岸。然而，这年气候反常，一带碧波仍然滚滚南去。天不作美，英才奈何！铁流万里，功断寒漠，只得望断燕云血染回程。经过两次西征，一军精锐耗损，元气大伤。

敌我对峙，势力总是在反复消长。乘第一军主力南移之际，日伪在东边道北部大搞集家并屯。至1939年秋，在辉南、金川、柳河、通化、蒙江、辑安、抚松、临江、长白及其周边的磐石、桦甸、蛟河、敦化、舒兰及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等19个县强制民众修筑集团部落累计达1800多个，[①] 监禁72万人，形成千里“无人区”。敌人坚持驻守在部落门口，等候为获取生存物资的抗日联军送上门来挨打。

1939年10月，由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指挥2万多日伪军警（其中日军4400名）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展开“三省联合大讨伐”。由于程斌（原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等叛徒的出卖，日军在抗日联军根据地捣毁密营山寨2085处，抢去粮食3168石。[②] 敌人以重兵将杨靖宇将军率领的800多名战士逼进通化、蒙江、临江、金川交界的方圆百余里的一片大“无人区”内。强迫周边集团部落的群众，将未熟的庄稼全部收回并集中在村旁由警察看守，每次只配给居民3天食粮。再令日伪军进“无人区”内围剿搜

① 《东北“大讨伐”》第428页。

② 《东北“大讨伐”》第428页。

索。1940年1月下旬，在桦甸、蒙江交界，杨靖宇将军与伪军八军管区混成第一旅遭遇，交战22小时。伪第二混成旅来援，抗联撤退。为了解决食粮问题，部队进一步分散，杨将军率警卫队和少年铁血队200多人，向蒙江以东的森林区转移。1月28日，又同大股敌军相遇，突围后杨将军与其他部队失去联系，只有60多人的特卫排护在身边。2月1日，特卫排长张秀夙携现金1万元、手枪4支及机密文件投敌。[①] 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根据张秀夙口供，派由叛徒组成的“程斌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崔胄峰挺进队”700多人，采取“壁虱战术”疯狂追剿。2月15日，特卫排反击，毙敌10余人，杨将军一枪击倒日军伊藤，又一枪将叛徒崔胄峰的大腿打断。由于在零下40℃严寒的雪山中连续战斗，2月17日，将军身边只剩6人，其中4人负伤。将军此刻仍然对同志们无限地关照，令黄生发、刘福太等4名战士从另一路去找部队，他只和战士朱文范、聂东华踏着三尺（约1米）深的积雪艰难地前进。18日，朱文范、聂东华接近蒙江县大东沟集团部落准备与群众联系购买食物和棉鞋时，被监守部落的敌人发现，交战30分钟后捐躯。23日，于蒙江县城西南6公里的山上，极其顽强的杨将军发现4名打柴人，仍然严守军纪向他们购买食品和棉鞋，请他们尽快送来。打柴人是蒙江县第一区保安村集团部落居民赵廷喜、孙长春、辛顺礼和迟德顺。他们丧失了民族气节，沦为民贼，回村即向警察报告了情况。赵廷喜给警察队当向导，即刻进山搜捕。将军已负伤，仍然双手使枪与几十个敌人激战20多分钟，终于豪壮牺牲。敌人解剖了将军的胃腹，其中没有一粒粮食，满是草根、树皮……，日军极为震惊。

此时，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将军早已牺牲，第

① 《杨靖宇的故事》第161页。刘虔、刘治平著，1996年12月，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将军接过了杨将军的旗帜，率部继续苦战。俟至魏拯民病逝后，一路军余部退至苏联境内休整……

彭真同志曾总结：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三、伪西南千里“无人区”概况

所谓伪西南千里“无人区”，是1938年6月至9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雾灵山并在冀（东）热（河）边区和冀热边特委配合发动了10万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之后，日伪当局为阻止八路军挺进东北而制造的。

随着抗日游击区的开辟，日伪于1939、1940年制造部分小“无人区”。鉴于抗日游击区日益扩大，1941年9月，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订《西南地区肃正工作要纲》，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拟定《国境地带无人区化》实施方案，决心在其所谓“大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即从山海关到独石口近2000里的长城沿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形成“确保满洲”的战略封锁线。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的论述上较前也有所透彻和发展。承德宪兵本部在方案和另一文件中称：“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工作。”“鉴于冀热察国境地区当前的情势，其根本第一要谛，无论怎么说，也在于匪民分离，这也几乎是担负保安重责之吾人，在灭共对策上最应建立功绩之处。”“民众的支持，乃是彼等的依靠，这样就能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乃致命的打击”。

1941年冬和1942年春，日军在滦平、兴隆、青龙等县搞大规模建设“集团部落”的“实验区”。1943年初，日伪长春当局惊呼：

"冀东中共军大举入侵，西南国境地区之治安亦趋尖锐。"[①] 于是先后集中10万兵力，从3月至6月，展开全"国境"范围的大集家。风火连四月，黑烟漫千里，八荒闹黄蚁，万村遭血洗。日伪制造的大"无人区"，东起山海关以北的绥中、建昌、喀左、凌源县境，沿长城与锦热铁路之间向西延伸，包括宁城、承德、抚宁、卢龙、迁安、平泉、青龙、兴隆、遵化、蓟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滦平、隆化、丰宁、围场、赤城、延庆等25个县的全部或大部或少部分地区。由古北口越过铁路至四海，再北折沿外长城至独石口的骆驼磋，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20—130公里，总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日伪在这个范围烧毁1.7万个深山村，强迫群众在部落带修筑2506座集团部落（群众叫它"人圈"），在其中划地为牢地监禁了140多万人，围绕伪国境形成了一条以长城为轴线的绝缘隔离带。制造如此大的"无人区"，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特大罪行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罪行中也属第一列。

伪西南千里"无人区"形成后，出现了三种举世罕见的现象：

（一）疯狂地攻伐部落民众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防御状态，显现出强弩之末的回光。为了"确保满洲"，使千里"无人区"真正成为隔离带，日军对140万部落居民实施了疯狂地攻伐。狡诈的日军竟移用中国《孙子兵法》的某句原意来作为大规模摧毁居民生息的战略依据。1942年，承德日本宪兵本部在《热警情发第324号灭共对策资料》中称："孙子兵法云：伐人之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所谓伐交，即攻伐支援敌人的第三者。在这里来说，即对民众予以讨伐，把支援敌人的民众从敌人手中争取过来，而归顺我方……集家工作最大意义即

① 《东北"大讨伐"》第604页。

在于此，亦是吾人的着眼点……”。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孙子的原意是：战争的上策是打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打败敌人的外交。在这里，日军把八路军的外交移引于民众，对民众像牲畜那样摧残，可见其暴戾恣睢。

（1）以泛滥的警察部队为主，畸型的军事封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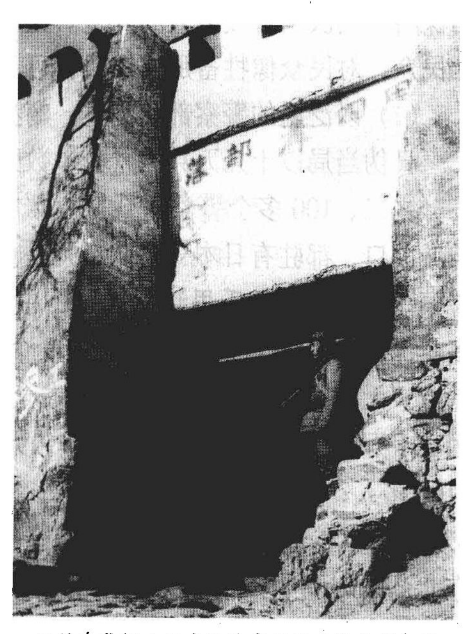
日伪当局以十几万兵力（其中数万日军，伪军占伪满洲国兵力的三分之二、100多个警察讨伐队）严密封锁着千里“无人区”。凡是长城关口，都驻有日本守备队，凡是重要据点要隘，都驻有伪满军或警察讨伐队。例如千里“无人区”中的重点区兴隆县，被烧毁2000多个深山村，将111825人赶进199个部落（占全县总人口的81%），制造“无人区”119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3%。日伪当局动用2.1万兵力封锁199个部落和“无人区”。其中调遣日本守备队1100多人；伪满军5个团7000人；隶属兴隆县的警察讨伐队15个3750人；（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调任伪热河省副省长）又从东北调来“围剿”杨靖宇将军的极凶残的省属讨伐大队10个4000人；再加上地方警察（包括警察局、分驻所、派出所、警防所和部落警）5000多人。日伪持枪人员与兴隆县被统治民众，形成1比7的惊人数字。

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在2.1万人的兵力中，警察占1.3万人。日本当局运用“以华治华”策略时，畸型地发挥警察组织统治部落和封锁“无人区”的作用。1940年以前，伪满警察的最高领导机构为伪治安部警务司。1941年后，升格为警察总局，直属于国务总理大臣调遣。伪满警察每年定例开支由地方支出，而“大讨伐”、“大围剿”、“大检举”等行动均由其上属专拨大量的“行动费”，由伪满国务院实报实支。1943年，伪兴隆县全年财税总收入为9万余元（伪币），而该年警察行动费特别支出竟高达350多万元（伪币）。可

见，在日军的操纵下，极力扩张警察组织是其施暴的一个特征。

(2) 对部落极端的统治

部落，都是日伪军警逼着集来的群众日夜突击修起来的，最小的部落也得集居百户，一个部落为一甲。一般的、较大的、临近抗日根据地的因为赶来的人太多，有1000户一个部落的（高杖子），有800户一个部落的（蘑菇峪）。每个部落都是被一圈石墙或土墙或半石半土的墙围着，墙高都在一丈二（约4米）以上，墙头还布满铁刺网或荆棘丛。围墙通常留两个大门，大门顶上和围墙四角都耸立着炮楼，十字街处还有个中心炮楼。出入大门都有部落警检查有无“居住证明书”。部落里有正街一条，大的部落里有十字街，两侧排着一系列8尺（2.4米）宽的纵横交错的小胡同。每户居民的小房或窝铺的宽不准超过15尺（5米），院子不准超过8尺（2.4米），家家都是厕所紧挨着没有纸的窗棂。根本没有空隙，猪羊夜间挤进屋里，早晨再撵出去。许多远来的住户没有木料，就是靠人家的房山墙搭个一面坡的小窝铺，锅台连着炕，猫着腰钻进钻出的。佟家沟部落的马永兴、闫万德两家合着在人家房边搭一个小窝铺，东西宽4.5米，南北长2.6米，共计11.7平方米，斗大个地方还得一分为二，东边闫万德家挤6口人，西边马永



日伪在热河山区实行集家并村后修筑的部落

兴家挤6口人，平均每人不足一平方米，人们气愤地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各主要部落均有日军、伪满军、警察讨伐队常驻，各村公所驻地的部落设有警察分驻所。另外在50多个周边的大部落设保卫所，每个保卫所都有10名左右部落警察驻在，由保卫所长统治部落的一切。各保卫所长都是地方有实力的地主豪绅，由县警务科授予警佐警尉衔充任，没有保卫所的部落，由甲长、自卫团长、部落长共同操办。

部落内居民，普遍实行联防组织，将18岁至30岁的男性青壮年编成"自卫团"，每人发一根木棒，群众称为"棍儿团"，负责站岗，放哨送情报。将其中19岁至21岁的男青年、国兵漏编为"义勇奉公队"，进行军事训练。把一些重要的部落建成"武装部落"，给自卫团发真枪实弹。原伪通化省协和会本部副会长户仓胜人（日本高级特务）调任协和会热河省本部副会长后，将他培养的得力特务、东北扶余县协和会本部事务长梁济霖于1943年春调任兴隆县协和会本部副会长，将县、村两级协和会秘密特务化。从而，把协和会的"宣德达情"的奴化工作普遍渗透到各个部落里去。将部落里10岁至15岁的男女儿童组成"协和少年团"，将16岁至18岁的男女组成"协和青年团"，将20岁以上的妇女编为"妇女队"，将50岁以上的男子编为"老头队"。同时，还实行"保甲联座制"，每10户至15户居民编为一个排，如有一户犯法，全排各户同罪。

部落居民的行动，没有一点自由，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距部落10华里以内的范围做农活。白天不准远出，夜间不准关门。每夜特务、警察都查户口，见着财物任意掠夺，见着年轻妇女设法污辱。日伪千方百计地监视居民，随便罗织罪名，任意抓人入狱。几个老百姓一起闲谈或私语、家中存有中国书籍、书写古文或古典楹联皆被列为"思想犯"。家中有灰色或草绿色衣服、衣服超过5个扣子、有几双存鞋、

有搪瓷茶缸、小锅、八路军粮票或日落后归部落的，都是“通匪、资匪犯”或“政治犯”。如在家中发现大米、白面、纸烟、手电、布匹、多量的食盐，都是“经济犯”、“密输犯”。百姓家中如有枪支弹药或住着无证明的人，即被直指为“匪”。

部落的牢房里什么刑具都有，折腾死人的花样就有十几种：

“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日军看到受刑人露在外边的双脚乱蹬乱踹，竟拍手大笑；

“军犬舞蹈”，令一群军犬一纵一立地反复扑上去，将人活活咬死；

“滚绣球”，把人衣服扒光塞进一个钉满大钉子的木笼里，循环滚动，把人扎死；

“电磨粉身”，用特制的一种电磨把人磨成肉泥血酱；

“枪戳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令新兵用刺刀劈刺，练胆；

“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绑在一起蜷曲着，投到河里或池里淹死；

“钢针绣骨”，用大铁钉子或大钢丝往人头顶或手指头上钉进5寸至1尺；

“三绞废命”，在人的脖颈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挤出，第三绞七窍流血断气身亡；

“开膛取心”，据王佐民主任控诉，双庙据点的日军吃了50多颗人心。

此外，还有“吃铁烙”、“背火梯”、“皮鞭抽骨”、“辣水涨肚”、“熏烧活人”等酷刑。

面对如此野蛮的迫害，部落居民一旦流露出某种反抗情绪，日军便亲自动手先后在境内进行了四次“大检举”。

第一次，1942年1月下旬，即农历腊月二十五以后的几天内，日伪当局在各大川“一齐逮捕”2000多居民。其中就地屠杀200多人，在兴隆县街南土门山沟集体屠杀200多人，其余均运往东北各地充当劳工，生存者极少。

第二次，1943年2月初，农历腊月二十八至正月初五的春节期间，日伪当局在各大川的部落里“一齐逮捕”5000多人。在境内屠杀数百人，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各地充当劳工，幸存者甚少。

第三次，1944年2月，仍是在春节期间，日伪当局在全境部落里又“一齐逮捕”2000多人。在县内各地屠杀数百人，其余又全部送往东北各地充当劳工。

第四次，1944年6月，日伪当局进行所谓“投匪家族大检举”，即是将所有部落里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干部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逮捕，计500多人。经过野蛮拷打、折磨后，又全部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3）对部落居民极尽的压榨

人们暗暗地从心底发出这样激愤的呼号：部落里穷人没法熬，暗算重，租税高，苛捐赛牛毛，逼死居民的三把刀！

首先是粮食租税，全年6项，每亩78斤：

1. 粮谷出荷粮，每亩上（等）地缴30斤，每亩下（等）地缴21斤；

2. 民生集谷粮，每亩缴36斤；

3. 义仓粮，每亩缴3斤；

4. 米谷株式会社粮，每亩缴6斤；

5. 地亩捐粮，每亩缴2斤；

6. 地亩附加税，每亩缴1斤。

贫苦民众生活无着，耕作粗放，又遭自然灾害，平均每亩产粮不

过120斤，交了租税只能维持一冬，过了春节便无隔夜粮了。为了求生只得向地主、财主借债。

其次，纳正项税，26项：

1. 民生税，每亩地2角4分；

2. 地亩税，每亩地5角；

3. 地亩附加税，每亩地2角5分；

4. 门牌税，每户1元；

5. 协和会税，每个成年人2元；

6. 牲口费，每头驴4元，每只羊7角5分，牛骡马每头5元；

7. 出生费和死亡费各2角；

8. 宰杀费，每口猪4元，每只羊2元；

9. 材料费，每亩地2角；

10. 兴农合作社股金每户1元；

11. 义款每户6角。

再次，杂项税：（主要是“慰劳”日伪军警和伪官吏费用）

1. 送菜，每甲3天一次，每次50斤至100斤；

2. 送柴，每甲3天一次，每次500斤；

3. 送猪，每甲每月3—10口，每口至少杀肉80斤；

4. 送鸡，每甲每月至少20只；

5. 送礼，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70元；警察讨伐队中队长以上官员结婚、寿辰，每甲30元；

6. 团员费，每甲经常派2名“自卫团”员到村公所听差，每月需150元—200元；

7. 棍团费，每甲抽10人专门受训，每月需100元；

8. 劳工费，每甲每月抽10人—30人，需200元；

9. 村甲职员费，给每人每月100—150元。

此外，还有居民所说的“暗算重”，就是伪兴隆县的200多个甲，每个甲都有一本自制的不公开的黑账。这账上记载的都是警察、特务、宪兵、官吏们到甲公所吃饭、烟、酒、菜、点心、鸦片等的招待款；给警察家属送米送菜送柴和出的杂工；还有伪军警宪政协各机关职员到村、甲办公的一切支应花销等等。一年汇总，秋后按全甲土地暗中摊派。1943年，仅此黑帐，每亩地摊派20元—30元。而地主、富农往外租地时便已立契在先，这笔花销都已转嫁到佃户们身上。所以，本已满目疮痍的部落贫民还要被敲骨吸髓。

(4) 对部落居民极限的折磨

日伪对部落居民的折磨是多方面的，然而，最主要的表现在物资的奇窘上。日军当局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在物资上对东四省实施了狠毒的严控政策，至于在千里“无人区”一带，已经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空绝状态。因为搞“无人区”，兴隆县荒芜了16万亩耕地，大量的梨、栗、桃、杏、李、柰等果品废弃遍野。在集家区，日伪当局严禁个人工商业，整个的商业活动完全由伪“兴隆县兴农合作社”一家官对官的活动。部落居民家里所有的铁铜器皿和皮张、肉、蛋、丝、麻、核桃、杏仁、梨、栗、蜂蜜、蘑菇、木耳等土特产品，通过为“圣战”、“纳献”的形式由兴农合作社全部收上去。而部落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美其名曰由兴农合作社实行“配给制”。他们表面上规定：每人每年洋布7尺半、面粉1.8斤、豆油4两，每户每月火柴1盒，还有些必需的盐、碱、糖等。然而，从1943年开始，洋布只在伪机关内星点一现，至于对部落居民这些东西完全不见了。兴农合作社变成坑人合作社，什么他们都拿去，什么他们也不给。多少年了，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棉布棉花，孩子光腚，姑娘围麻片，主妇遮着臀露着乳，只有一条裤子给当家的男人穿出去下地。而男人则把裤子脱在地头，像原始人那样在庄稼里苦撑。到了冬天就更难过，捞来河粘晾干

了，往破衣裳里衬托，家家屋地的炕沿下放着一个泥制的大火盆，日夜不停地弄着大火，孩子们围着火盆过冬，胸前都烤成吉吉花样的大疤瘌。来了陌生人，没有裤子的女人慌忙上炕扯过破被子围上或抓过屋角的破席头遮羞。家家都没有灯油火柴，只得用艾绒取火，松柴照明，半宿过去，鼻子、眼睛、耳朵都被熏成了黑窟窿。夜间是黑暗的世界，白天是花子的社会。一个亲历石庙子部落多方面情况的人回忆："1944 年，石庙子村约有 150 多户，内有富农三四户，其余都是贫农、中农。在春种秋收时，每天能吃上一顿干的（掺着野菜）两顿稀的不足 10 户，能吃上一顿干的（掺着野菜）一顿稀的约有 30 户，其余 110 户就是用山菜掺点玉米面熬稀粥吃了。早晨剩下的，中午、晚上再吃，对付半饱而已。这个村只有二三户有几只山羊，挨到 1945 年都被警察讨伐队吃光了，你到哪一家都没有穿整齐衣服的，小孩们都不穿衣服，其困难情况难以尽述。兴隆县还有很多村不如石庙子村的呢。这时，火柴、煤油、油类、盐、针、线、布匹全部断绝了，农村经济陷于总崩溃状态。就是在兴隆街，除去伪官吏职员、警察、富商、地主之外，满街走路的人也都穿的是破衣服。1944 年及 1945 年上半年，兴隆县人民困难程度到了极点。这种情况就是在伪满统治东北四省的 300 多个县旗中，也是比较少的，是突出的。"①兴隆县公安局 1954 年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兴隆 1943 年—1945 年，冻死饿死计 11140 人。②

驻兴隆的日军不仅在衣、食、住上极限地折磨部落居民，同时还与"七三一"部队秘密勾结，在兴隆县二道河、五道河、六道河部落进行"流行性出血热"细菌实验，在双庙、白马川、大水泉等部落阴

① 见日伪特务郝席庵供词。

② 《东北"大讨伐"》第 709 页。

谋进行了炭疽、伤寒和霍乱等细菌的传播实验。[①] 由于非人的生存环境和日军某些极秘密的细菌实验，1943年—1945年，境内部落里大肆流行了伤寒、霍乱、痢疾、败血症和流行性出血热等瘟疫，3年猝死1万多人。蘑菇峪部落一天就埋葬53人，3年死亡2000多人，占该部落总人数的一半。

“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部落活灵活现了城隍庙壁画里的酆都城，是血淋淋的人间地狱。

（二）5万民众战斗在“无人区”

据承（德）兴（隆）密（云）抗日联合县武装部统计，1943、1944年，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围剿”538次，平均1.5天“围剿”一次。然而，日军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无人区”虽然给我军造成重重困难，但我军主力还是能够潜流般地在“无人区”里穿插、落脚、回旋、挺进。其原因是千里“无人区”里还有5万多民众，用永不屈服的脊梁挺起12片抗日根据地的蓝天。创造了小根据地，摧不垮、打不烂、烧不尽、杀不绝，刚柔屹立，日益韧强并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奇迹。以弱胜强，以民众胜日军，以游击战胜“大围剿”，在军事上具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总结、认识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史无前例的范例。

通过历史长期的检验，我们顿悟，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大义凛然的开辟时期。毛主席著作拨乱反正，积小胜为大胜，渐臻体系的大成时期。因而，反对伪西南千里“无人区”的斗争，不同于反对伪三江省、伪东南（东边道）千里“无人区”的斗争。在这里具有了东北先烈们所不具备的条件，这里有冀东、平北抗日根据地的

① 《长城线上的大屠杀》第166页。（日）仁木富美子著。2000年8月，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依托，因而置伪西南的抗日斗争于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晋察冀中央分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冀东党委和平北党委从以下几方面模范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杰出思想。

（1）在伪满统治区隐蔽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①]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②]

从1938年、1939年开始冀热边地区建立小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夏季，日本华北驻屯军、伪满军联同治安军集4万余兵力的一次“大扫荡”，因为冀东基本区回旋范围不足，致使八路军分区主力部队遭受一次最严重的损失。实践证明，冀东平原必须与热（河）南（部）山区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发挥冀热边地区千余里大山脉的优势。日伪暂时得势便冲昏了头脑，竟在伪报刊上宣扬什么“八路军都没了，就剩下18个人在长城上哭呢！”

就在敌人手舞足蹈举杯欢庆之际，1941年9月下旬，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等领导人率领十二团、十三团各两个营及地方干部计3000多人，分数路出关，在青平工作团和长城工作团的配合下，开辟都山以西、雾灵山以东700里的大山区。因为伪满在这里已经统治8年之久，山村小庙的对联都改为“服满洲风调雨顺”、“拥皇军国泰民安”。所以，这次开辟一个最重要的策略就是绝对的“隐蔽”。干部、战士全部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秘密深入日伪力量薄弱的偏远山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8页。

村，并带着群众奇缺的粮食、食盐、碱、火柴、煤油、棉花、布匹、针线、中草药等生活必需品。具体工作方法是：第一，指战员和工作团人员一起分散驻村，慰问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先站住脚根；第二，首先努力解决群众生活中应迫切解决的问题，秘密与关里（长城以南）联系，鼓励自由通商并武装保护“走私”；第三，在部队和干部中开展节衣缩食活动，救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很多的干部战士当场脱下衣服给老人、病人和孩子们穿上；第四，严守纪律，在老百姓家吃饭开欠款的条子，由后勤人员及时付现款；第五，不惊动敌人，不打敌伪据点，偶尔遭遇伪职员，则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为号召，积极争取他们，对极个别真心效敌分子，则千方百计争取他们的家属，与八路军保持暂时相安的关系。这样，经过一秋一冬的艰苦细致工作，将雾灵山至都山 40 多万人口的大山区，建设成为热南根据地的基本区。

（2）从“两面政权”到“一面政权”

毛主席在论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时指出：“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①] 然而，这里的每个村庄都有建立已久的伪政权，要隐蔽，势必得到村伪政权的有效掩护。所以，八路军指战员和工作团审时度势创造出一个建立村政权的介入点和过渡形式，即是在伪村政权内派进去抗日的办事员（也就是秘密村长）和武装班长（掌握村里的枪杆子）。有了前提，再进一步逐步增设村民政、粮秣、锄奸、文教等委员。这样，到 1942 年春，在境内已建立 12 个区级的区委会和区政府，在 200 多个自然村的伪政权里选派了办事员、武装班长；在群众中建立了青年报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等组织，民兵发展到 7000 多人。我秘密工作范围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393 页。

占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二。

1942年3月，日军第二十七师团调回冀东，开始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4月，中共冀东地委、专署、军分区等领导机关又转移到兴隆境内，到7月返回关里，9月间，日军进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冀东领导机关再次转回兴隆及邻近滦河东地区。当年，冀东党政军领导人在兴隆境内工作7个月之久。长足地促进了兴隆大部分根据地的基本建设。

1942年6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来唐山视察，其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报告说：八路军“象过去那样大活动在表面上是看不见了，所以在这地区里好象是很白的了，但经深入一下扒层皮，实际上里面是通红的。那么，如果问我，他们的根据地在哪里，我只能回答，在山里面。”热河方面的敌人也如梦方醒，说什么：“由于八路军地下策动极为巧妙，待表面出现某些征兆时，往往已经无法对付了”。

1943年至1944年春，抗日根据地里进行了民主建设村政权的改造和巩固工作，普遍建立了单一的抗日政权——村政委员会。进一步提高了群众保卫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3) 在发动群众中首先着力建党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①] “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以组织支部”[②] “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③] 至1943年春，境内各根据地已建立89个村党支部，有党员600多名。值得赞叹的是，这600多名党员，许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5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5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487页。

多都达到了很高的党性修养和磨难锻炼。原因有二：一是，冀东党委宣传部与《救国报》社合作，在境内东部滦河之滨的深山村河南大峪，极其隐蔽地办了多期冀东的区级党员干部训练班（每期集中学习一个月左右，之后到第一线实习）。许多干部通过学习后都充实到兴隆县的各区工作。这些干部再到农村党支部进行火线整党建党的时候，辅导农村党员学习陈云同志讲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课本和《反法西斯教育课本》。强调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抗战救国、舍己为人的民族气节，坚信中国必胜、日军必败的历史发展规律。说明农村党员的理论学习、时事展望都有了一定的深度高度。二是，各抗日联合县委抓住斗争空隙不断举办农村主要党员的训练班。如1940年春夏之交，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委在蓟县境内盘山根据地流动举办农村党员干部学习班50多天。中共冀东西部地分委副书记兼平密兴联合县委书记李子光亲自给学员们讲课。朱家沟村刚刚入党的粮秣委员范山林经过系统的刻苦学习，牢牢树起共产主义精神，在一次激战中，不顾自己身上流血负伤，抢救即遭日伪毒手的40多名伤病员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4）以组织民兵为骨干，大力发动群众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要胜利，……离不开动员老百姓。”① 境内各抗日根据地组建民兵是从1938年，包森支队、赖邦大队、赵立业支队、李满盈游击队和刘继抗等游击队开始的。经过四五年的战斗闯练，到日伪大集家前，全境已有民兵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8页。

7000多人。各根据地内都有极出色的民兵组织，这是兴隆县抗日战争中充分发动群众高扬“中华魂”的一大特色。鼓吹“武士道”的日军为什么攻不垮他们？一是，我们的民兵经受了各级党政干部多年的政治动员；二是，我们的民兵经过八路军、游击队多年的实际战斗能力的培训；三是，我们每个村的民兵都有方圆几十里奇峰异崖、层峦叠嶂的掩蔽。就是毛主席指出的“有回旋的余地”。这里关系绝大的一着，是对民兵、对群众“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①] 其载体就是普遍地建立了以民兵为骨干的群众夜校或识字班。每个民兵都有三件宝：一手枪，一手镐，揣着识字课本跑。从1942年起，全县长年坚持学习的以民兵为骨干的群众夜校（识字班）有800多处。如最偏僻的朱家沟小西天自然村，农户都隐居在崖缝林丛里，出门就爬山，近邻隔坡岭，5户是“集镇”，8户为“首都”。就是在这样“云深不知处”的山旮旯里，仍然有6处外人无法寻觅的小小夜校。没门沟一所，七八人学习；小西天一所，四五人学习；崔家台一所，八九人学习；赵家台一所，七八人学习；西叫坑一所，四五人学习；狗背岭一所，6人学习。计42人长年学习。深山里，松树多，小夜校都用冒烟少的松木核儿的小柈子照明。他们都有上级发来的寓有抗日新内容的识字课本。每晚上学时，总是由辅导员先教唱一段抗战歌曲，激发热情。每个学员都能唱几十首歌，例如男女老少都喜欢演唱这首开会歌：

领导者呀，众人提，
召集开会要速集。
一组一组要到齐呀，
不把会场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8页。

有儿童，和妇女，
青年壮年排得齐，
老头站得也不离呀，
个个守秩序。

开会时，有规矩，
说话不要乱叽叽，
都听主席把话提呀，
不要你挑皮。

封建人哪，不怎么着，
吭吭哧哧话不发，
他说讨论是白搭呀，
应该改脑瓜儿。

破坏话儿，不要说，
群众反映了不得，
要罚小米一石多呀，
看你怎么着……。

一个民兵会带动一家人学习，一个民兵的英勇抗战会促进全家人的果敢斗争。那年冬天，敌人从西边大山上压下来，偷袭小西天。住在西沟独一家的民兵排长张宝生被敌人抓去，坚贞不屈，死在外地。家中遗下一位60多岁的伯父（张顺）和已经怀孕的妻子三儿头。乡亲们过来安慰，伯父和侄媳擦干了泪，决心坚持山地，抗战到底。第二年春天，三儿头生个男孩儿，老人家在孤哀中又燃起热望。谁知，那一天，狡猾的敌人又从西大山上悄悄地围下来，大伯抱着孙子领着侄媳跑上东崖，三儿头缠着足，眼看敌人追上来，大伯一急把侄媳和

孙子藏到砬沿的一个豁缝里并有绿枝掩护。老人为了把敌人引走向南跑去，几个日军追过来，一刀挑入老人的胸腹，又一脚将老人踹下悬崖摔死。另一拨的一名日兵悄悄接近豁缝，发现三儿头是个美丽的少妇，就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逗："不要怕，不要怕，上来，上来，让我在这搂一会儿就不杀你喽！"三儿头骂一声："活鬼，狼掏的！"随手甩上一块石头，鬼子呀地一声仰倒。另几个鬼子端着刺刀扑来，三儿头喊了声："下辈子再找你们报仇！"抱着几个月的孩子猛地向悬崖下跳去。4小时后，乡亲们在几十丈高的砬子根发现，三儿头娘儿俩都碎身摔死。然而，娘俩不论轱辘多少个儿，小儿仍然被母亲紧紧搂在怀里！

(5) 泼辣深山英雄多

这些在深峻缝隙、荆榛丛中成长起来的山民们，一旦被朴素的毛泽东思想和爱国主义武装起来，在老人、妇女、少年儿童中就会出现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在这里只介绍一位习惯与剑峰悬崖打交道的大嫂。1943年1月21日，驻在兴隆县五指山东麓达峪村的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正准备率领近300人的军分区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撤进关里，去追赶主力部队完成新的任务。突然接到一个火急情报：兴隆的敌人劫获了李司令员昨天发出的电报，惊悉李运昌仍在五指山，星夜急调日伪军警7000余人包围了五指山，拂晓即进山"梳篦剔抉"。李司令员率队在大山之巅回旋竟日，傍黑探进"无人区"——小五指山沟。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有一条最隐蔽的突围之路，只有这里的地下交通员、共产党员朱老二知道。当部队来到朱老二的隐蔽窝铺时，大出意外，朱老二已经外出，去送鸡毛信。尾追的敌人已经迫近，别无去路，战士们准备拼死保卫首长。正在非常严重的时刻，朱老二的妻子、绰号人称"麻利嫂"的张翠屏挺身而出。她说走过这条秘密线路，她要给李司令员带路。这是位30出头的农妇，

虽然爽快，怎奈她是双身子，已经显了怀。李司令员犹豫着，怎么能连累这位多有不便的女乡亲……。一片片子弹已经压着头顶掠过来，麻利嫂不容分说，掖上一个手榴弹，挎出两大捆绳子让弟兄们背上，硬拉着尖兵们头前奔出去了。这条路的确让人晕头转向，连着钻过2里多远的大弥猴桃丛，接着眼前变成了漆黑的世界。她摸黑攀上十几丈高的悬崖——大石憋砬，从上边扔下一条大绳子，指战员们就用这条生命线越过了鬼门关，大批日伪军被远远抛在山那边。

随后，越过50多里的大山脊——分水梁，暗渡冰沟，踏到黑河冰川时，天尚乌黑，突然麻利嫂呻吟一声倒在冰上。弟兄们前来帮扶，她却喊了声“兄弟们离我远点!”随即，她的身下发出了呱呱的啼哭声！人们惊呆了，李司令员急令战士们围成了人墙挡风，一缕手电光射来，麻利嫂回身一口咬断婴儿的脐带。几名战士忙用大衣把婴儿裹严抱在怀里，又用几条被子裹好大嫂抬上担架继续急行。

拂晓，部队脱离了险境，麻利嫂被安置在堡垒户家中。早饭后，李司令员提着红糖、白面、鸡蛋来慰问，看到母子平安，身经百战的将军才如释重负，随即自疚地说：“昨晚上，我一时疏忽，没看清大嫂已将临产，叫你吃了这样的大苦，实在于心不忍，向大嫂道歉，致谢了!”说着，司令员深深地鞠躬。

躺在炕上的麻利嫂陡然坐起，仍然爽快地说：“司令员，你可折煞我们庄稼人了！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哪有山里的老百姓呀，要说谢，我们得谢你们。你们这一走，不知道驴年马月再碰头，您就给这个没冻死的‘讨账鬼儿’起个名儿，留个念信儿吧。”

李司令员说：“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这场浩劫，这个孩子生在冰上就叫‘冰儿’吧!”

“麻利嫂”既是非凡的，可又是普通的，像这样敢于舍身为国的中华儿女在冀热边大地涌现多多。

(三) 千里“无人区”里的12片抗日根据地

嗜杀愈甚，愤抗愈烈。从死神黑翼中拼杀出来的人，更敢于直面淋淋鲜血。历史证明了一条发展规律，只要中国人团结一心，坚如磐石，是永远杀不绝的。在日军血腥制造的千里“无人区”里，仍潜在着五指山、大小黄岩、狗背岭、老岭、云蒙山5片以县区为单位的抗日根据地；还隐蔽着王厂沟、吴杖子、佛爷洞、周岭沟、天凳山、盘山、喜峰口山区7处以联村为单位的抗日根据地。共计12处，有5万多民众。

大范围的县自为战

五指山根据地，东有滦河隔阻，西有獐猖山（海拔1251.6米），南有大石镐（海拔1227米），北有五凤楼（海拔1475.5米），中有五指山（海拔1383.7米）等山脉，连成“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一片大山区。其范围东西70多公里，南北55多公里，境内有2000多户，1.3万多人。其核心是位于大马架沟至南大台的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辖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九区、十区、十一区、十二区。这片根据地保卫工作的一大特长，是有3000多名善于大摆地雷阵、石雷阵的民兵，严密封锁着根据地的四面八方。例如其西北部的部落驻着最凶恶的日伪混合讨伐大队和最残暴的警察署，而把守西北大门的成功村的民兵恰恰是日伪多次悬赏捉拿的“五虎”爆破组。“五虎”爆破组并不是5个民兵，而是该村110名民兵的总称。他们的地雷战已经进入神鬼莫测的专业领域。开始他们也是搞“预埋待炸”，敌人挨炸后搞探雷、扫雷，民兵们便改为“飞行爆炸”，在山头上看准敌人行进方向，飞速绕到敌前的必经之路，出其不意地临时布雷。敌人挨炸后开始搞烧山引爆，走山坡，民兵们又改为“暗中投雷”、甩“张手雷”，居高临下地变地雷为手使雷。并以地雷阵为中心，多方面配合打夜扰战、夜袭战、麻雀战、截

击战、追击战、攻心战等等。“五虎”爆破组确实有虎胆孤胆，敢背着13斤重的大地雷夜奔15公里，炸毁车河梁中心大碉堡；敢以3个人出击，造成3个班的声势，吓退100多警察和伪自卫团员；敢夜出20公里，深入部落，一夜征粮1100公斤。每当敌人杀进来的时候，共产党员们都首先赴险，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党支部委员、青年报国会主任傅春，仅仅17岁，在敌人的多次围攻中救了60多名乡亲脱险。最后一次，当一群敌人抓捕他时，他突然擦响了手榴弹，炸死敢首先挨近他的日军也炸开自己的胸膛。硬不惜五尺躯，舍生取义；敢洒尽满腔血，救国为民。成功村人民为捍卫根据地，炸死炸伤打死打伤100多名日伪兵，而自己也牺牲了91人，为坚持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消息树”，是这片根据地的创造。为了迅速传达信息，从守卫大门的各村依次到核心区，都设有一行行特备的消息线路。就是在一座座明显的山尖上立着一棵棵消息树，一旦树倒了，就是敌人进来了。一会功夫，便把敌情传出几十里。在保卫根据地方面，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在大山上打游击的群众，经常吃糠咽菜，有时要长时间的忍饥挨饿。即或弄来点粮食，也得用石头把粮食粒捣碎，用石凹煮粥，砸杏仁挤油，在石板上炒米，生活困窘至极点。在这里，县一级政权发挥着极大的作用。1943年冬，有很多人穿不上棉衣，县委及时派员去关里向上级报告，上级从关里急速拨来800多套冬装帮助群众过了冬。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县里成立了贸易局，利用与滦河20多个部落的内部关系，由县里派武装“走私”，从关里秘密运来群众急需的生活用品。同时，也保护有条件的群众去关里“走私”。许多的区干部都有结合工作秘密进部落经商的任务，把山产品运进部落，把部落里的东西运回根据地，相互交流。

1944年春，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插坝豁、垒坝墙，恢复梯田，解决种子问题，扩大耕地面积。县里还在中心点，建了两处铁工合作社，生产原料和工人的生活用品由县里供应，生产的锹镐锄镰等工具由政府统一调拨。同时，还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把抗日斗争与广大基本群众目前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减租，因为战争情况紧张，各种情况不同，有减二成的，有减三成的，依具体情况经过协商达到双方满意。在执行合理负担政策时也有许多改进，不使政策过“左”，又便于算账。通过协商，使劳动力与土地的负担更加合情合理。

正在山区群众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高涨的时刻，1943年12月上旬，1万多日伪军警窜进五指山根据地核心区，他们带着食粮和帐篷，吃在高山，住在高山，黑夜看火，白天看烟。扬言要把每一块石头都翻过来，彻底“明朗”五指山！县、区、村干部冒着极大的风险紧急疏散群众，隐蔽老弱病残。日伪连续对县、区驻地围攻11昼夜，被杀害群众300多人，仅中田村被杀害274人。日伪军撤离后，县区干部立即从绝顶森林中赶回，逐村慰问受害群众的家属，安排群众生活。趁敌人刚刚收兵之际，民兵配合县总队的一排战士远出50里，智取车河川最顽固的敌据点——大坡，征粮征款，为根据地群众解决吃粮问题。1944年4月，正是春耕播种时节，获悉敌人又将倾巢出动万人进山来围，得到上级指示后，县区村干部又将老弱病残群众和妇女儿童安排到最安全的隐蔽地或最可靠的部落里，之后，组织1000多名共产党员、基干民兵和各协会干部做一次战略转移。隐蔽地越过长城由遵化的干部和乡亲们热情地安置在北山区侯家寨一带。敌人到五指山腹地，再也看不到树梢、人影，再也听不见枪声爆炸声，便开心地退了回去。不料，敌人前脚走，我们的1000多名党员、干部、基干民兵即刻返乡，找回各村的群众抢播快种，恢复家园。这

一年，虽然遭受敌人多次割庄稼之害，而根据地平均亩产粮食仍达25公斤。

在千里“无人区”里，长期屹立着这片最大的根据地，与正规军的经常支援是分不开的。1945年7月上旬的一天，垂死挣扎的日伪军强迫半壁山、靳杖子一带部落居民数百人进入五指山来割即将成熟的庄稼。日伪军怕民兵迎头痛击或怕趟着地雷、石雷，逼迫部落居民头前趟路。这一着确实毒辣，纵然我有迎击力量（适逢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晋率第十一团在此休整）也不能直接作战。紧急间，承兴联合县办事处主任王佐民、第八区区长李文等负责人与赵司令员谋出一策，决定再来一次“围魏救赵”。当夜乘敌后空虚，我第十一团绕到澈河川，一气攻克鸠儿峪、青杏沟、古儿石、佟家沟、白旗营5个部落，其中的警察全部被俘，枪支全部被缴。进山的敌人大惊，立即撤回。山里的大片庄稼始得以保全。八路军、游击队是支援群众坚持“无人区”斗争的主心骨，对建设根据地起着极大的鼓舞作用。

中规模的区自为战

大小黄岩抗日根据地，位于燕山主峰雾灵山（海拔2118米）西麓，由小黄岩川、大黄岩川组成，东西35公里，南北35公里。境内山如围城，崖似连寨，谷多深涧，沟多石门。梯田绕在山脚，坝田嵌在沟凹，农民运输只能人背驴驮，小车也不能通行。这里是1938年，宋（时轮）邓（华）纵队挺进雾灵山时，留下第三支队继续开辟的。先属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第三区，后属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第四区。区委会区政府设在中心点营南峪、大石湖等地。因为地型隐蔽、纵深，1942年，日伪军便在这里纵火20公里，烧掉20多个自然村，屠杀群众140多人，仅儿童就被挑死、摔死48人。1943年大集家以后，这片根据地内仍有5000余人。这里，除了各村计有1500多名极其顽强的民兵以外，在区委区政府的

直接领导下，有一支具有80多支枪的民兵大队。这个区大队非常机智，并不与强敌硬拼，而是经常巧妙地外线作战，主要任务是为根据地群众解决吃粮问题。1943年6月，乘日伪当局忙于大集家之机，区大队夜袭周家庄石棉矿，俘伪军20多人，缴枪20多支。同年秋，区大队去后深塘峪、红梅寺、六道河、北坎子、下石洞、梨树沟、拦马墙等据点和部落，征来大批粮食分给各村。1944年春节，区大队去二道岭子、三道梁子截击敌人的运输车，截获很多大米面粉，供应部队和群众中的病号。

为了尽快地传达信息，这里创造了“活电线杆子”的方法。就是组织专业的男女民兵，在35公里的大山脉上都站了岗，先把敌人看住。只要六道河（驻有日本守备队和警察分驻所）的敌人一出来，岗哨就喊：“羊出来了——！”。一站接着一站喊，不过10分钟喊出20公里。这是勇士的呐喊，喊得群众雄心大振，喊得敌人胆颤心寒。

由于这里山场大，耕地少，绝大多数都属贫苦人家，因而根据地的群众家家是糠菜半年粮，百纳破衣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房子都被烧光了，很多户都住山洞，山神庙自然村西沟有一面很好的黄土坡，群众在那里挖出一排排的山洞，夜间篝火错落，层层迭起，犹如一座接天的星楼，人们幽默地称这里是“花市大街”。每个洞里都有一个背篓，里边盛着菜刀、糠菜、残锅、破碗、烂布单、麻袋片等等。一有情况，村干部一发令，每个主妇就背起背篓，扶老携幼上山去游击。因而，人称这是“背篓家庭”。

1943年隆冬的一天，兴隆县警务科的特高课特务生驹（日本人）和3个特务悄悄进了中石洞，抓住一位老太太，正在逼问游击队去处和藏粮地址的时刻，村武装班长马文喜领着3名民兵突然出现在近前。击毙特务生驹和另一名日兵，还打死另两个特务，救了老大娘。一批日伪军来围，4名民兵奋战到底，英勇牺牲。承兴密联合县委、

县政府赠给四烈士一面奖旗并通报全县表彰。

1944年春，承兴密联合县县长江卓来到小黄岩川，进行民主建设村政权试点，进一步改建村政委员会。运用“豆选”的方式，由群众直接选举了村长、副村长、委员。试点后，在全区铺开，黄土山村选出全区第一名女副村长玉臣。普遍加强了村政权建设，进一步提高了群众保卫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几个月后，李运昌司令员来到这里，表彰了这里的民兵工作并奖给一万个雷管。民兵们制造出大量的地雷、石雷，将大小黄岩布置成连环八卦阵。

小区域的村自为战

狗背岭抗日根据地（包括四座楼、南北水峪、罗家沟、梨树沟、塔洼一带），东至陡子峪西山、响水湖，南、西至长城，北至朱家沟、黄门子，东西宽30余公里，南北长35余公里。地域虽小，但其境内怪峰突兀，山势奇险，多入云绝壁，多夹马深谷，多藤丛蔓蘧，多密洞隐窟。1938年宋邓纵队开始开辟，遗有邓华将军的指挥山洞。建立抗日联合县后，先属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第二区，后属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第一、六区。1943年春夏，日伪制造千里“无人区”后，这里仍有5000多人坚持在层峦叠嶂之中。岭北侧的朱家沟村系首当其冲的根据地北大门，距六道河日军山下队只有10公里。朱家沟村有一支70人的民兵中队。几年时间，日军始终未能除掉朱家沟这道铁门。其原因是，历险的人艺高，艺高人胆大，再经过充分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动员，这里的民兵同仇敌忾，意气风发，“诛暴不避强”，“敌近而静恃其险”，特长是“以奇用兵”。

狭谷之战　朱家沟村境内小西天自然村，位于一座马蹄形的绝顶之上。1943年1月的一次“大扫荡”过后，这里已经弹尽粮绝，牲畜被抢光，窝铺被烧光，60多口人一连半个月没见到一粒粮食。共产党员吉祥、范山林带领大家刨开冻地挖来地管子（大芋术），再用石

凹掺雪煮熟了吃。为了防止浮肿，便掏洞挖獾、猎兽、捉鸟，野食穴居像原始人那样强悍地谋生，一直坚持到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适逢大队日伪军从关里掠夺回来，从脚下的悬崖迂回路过。吉祥、范山林等急中生智，立即率领20多个民兵扒开一溜作掩蔽的大草墩子，从一条20多丈（约60多米）深的大砬缝里钻下去，悄悄来到东峭壁二层坎上的东砬盘，拉开很远的距离。等待山下狭谷里的600多日伪军和讨伐队绕过多一半的时候，一声令下，人们一齐往下滚大石头和朽木枯杆。顿时，烟尘云涌，惊雷隆隆，满涧滚木飞石乱崩乱炸，砸的敌人丢魂丧胆抱头鼠窜。这一仗，缴获子弹500多发、粮食1000多公斤，猪、鸡、鱼、粉等各种年货应有尽有，人们笑逐颜开地过个胜利年。

秘洞之战 1943年秋，日军令讨伐队逼着部落居民进朱家沟割庄稼。割庄稼的队伍刚到朱家沟门，为首的两警察被突然飞来的子弹击毙，敌人退回。同年12月18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伪军又来进犯。十来名警察又被飞来的子弹打死，敌人大惊，仍然不知道子弹从哪射来的。第二天，刘文选讨伐队300来人引着“山下队”200多日军来支援。狡猾的敌人避开朱家沟门，从黄门子绕上西大山，再从沟里奔向朱家沟。眼看着讨伐队从朱家沟门闯出去，接着奔出一群部落居民，给日伪军赶着牲口背着粮食，后边跟着的是被圈下来的妇女乡亲。这时，突然响枪了，子弹一齐向人群的前方空地里射击，牛羊驴炸了群，背背子的人们扔下东西向两坡乱跑，女乡亲们乘机向拐弯处的张相沟里跑去。此刻，后边的日军露了头，为了掩护女乡亲们转移，民兵们的子弹都向为首的日军射击。截在沟里的日军愣一会儿，终于发现了目标，3个日军架起一挺机枪向北面的峭壁上还击。几个回合，机枪下的两名日兵被击倒，后边的日军被阻在狭谷里，众乡亲们脱险。日军用望远镜发现，北峭壁20多丈高处，树丛后隐着

一个洞口，子弹都从那里射下来的。几名日兵从西山上绕过去，横攀一段砬面，为首的突然向洞口抛过去一枚手榴弹，不料那颗冒着烟的手榴弹又被扔出来。接着像壁虎似的3名日兵连续向洞口投去7枚手榴弹，然而又全部被扔了出来，峭壁上炸起一团团火花和崩石。接着，其中的一个蓄着大长胡须的老日兵悄悄从一侧悬空攀到洞口下，一手攀着树杈，一手突然举起“十四年式”手枪（俗称王八盒子）向洞里连续射击。正在他准备一手再上子弹的一刻，树丛中突然踹出一脚，那个老日兵嚎了一声，连同一棵小色树一起坠落下来，摔得脑浆崩裂，衣挂尸悬。“山下队”疯了，拿出武士道精神，一个登着一个肩膀地搭起人梯向峭壁上爬。最上边的两名日兵又攀到洞口下，举着两支手枪向洞里狂射。忽然，从洞里滚出一个锅口大的石头，探头的两名日兵随石翻下，底下的人梯被砸得似断了节的黄蟒，一段段的嚎叫着脱落。日军指挥官呀呀的暴跳挥刀，传令兵的小旗一劲晃摇，开始从西梁上往洞口扫射，又从南山上向洞口炮轰，结果子弹炮弹都进不了洞口。天已经黑了，日军不肯认输，将这座悬崖严密地包围了一夜。翌日拂晓，又炮击、扫射了一个小时，等一些日军忐忐忑忑地再次攀上洞口时，竟惊得连连怪叫。丈余深的洞里，顶棚上被射的坑坑洼洼，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崩下来的弹头以外，竟空无一人！愚蠢的敌人哪里知道，正是在寒风呼啸的午夜，从几十丈高的峭壁胸腰上攀过来6名民兵，将洞中受伤的民兵李秀峰、王玉祥背走。其实洞中只有3人，民兵杨长起是有名的攀山能手，身上虽然7处流血，仍然自己从悬崖上攀出重围。这一仗，据内线情报，净被摔死、打死的日军18人，受伤的几十人，还摔死、摔伤十几个警察，日军运回的尸体装满一大汽车。而3名民兵，在我军医院的治疗下，几个月后均康复。从此，这个秘洞被人称为“英雄洞”。

山缝之战 1944年1月24日（农历春节）下午，一部分警察讨

伐队从东北方向奔袭朱家沟。共产党员、村干部曹宗德领着5名枪法好的民兵占据有利地形，将敌人阻在东狭谷。敌火力施展不开，几名警察中弹。讨伐队长刘文选发火，登上东山狂射。此时已经昏黑，另一部分伪军从西山奔来。东山与西山之间只隔着一道直裂到顶的大山缝，6民兵从大山缝飞速攀上，向西部敌人猛烈射击，西部敌人大怒，立即返转向东山上猛攻。此时，6民兵隐蔽撤出。山顶上两路敌人由远而近大打出手，火拼起来，直到他们动了迫击炮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两队俱伤，连夜懊丧撤回。不敢向日军如实报告，只得将死伤的警察先安置在五道河部落每户居民的炕上。据部落内线地下党员统计，这次敌人死伤50多人。

石窟之战 1944年隆冬的一天，驻六道河日军山下队100多人，乘着正下雪来狗背岭“围剿”。狗背岭上高耸开阔，向南向西可远眺百里。岭上坦缓逶迤，两坡陡峭纵深，茂密的松林、柞树林、杨桦林中夹杂着大片大片的溜石坡，一坡坡的长着青苔的大石头垒落出无数的大石窟、大空膛，里边可以隐藏数人、数十人不等，当地群众把这样的地方叫“溜石窖”。一百多名日军钻进这样的大山林，只见树木不见人。有两个日兵沿着雪上足迹钻到一堆假山似的大石窟前，把藏在里边的符运贵逼了出来。符运贵是刚刚出来探听敌情的，不期与日军遭遇。他明白大雪天不能引“狼”入村，灵机一动，引着日兵钻进这座根本没有藏人的大石窟。两名日兵的刺刀直逼符运贵的胸前，用生硬的中国话追问游击队藏在哪里？符运贵看看周围只有这两名日兵，便故意向他们身后一指，两名日兵一扭头，符运贵趁机抓住一名日兵的枪背革猛地向下一推，那名日兵从溜石上向下一仰，哧地一声，与另一名日兵撞个满怀，两名日兵一块从房脊似的一块斜石上翻滚下去。日兵都穿着大皮靴，等他俩晕头转向一吭一哧地站起来，符运贵已经握着那支步枪如履平地的从巨石尖上向下纵去。一名日兵放

了几枪，无可奈何地眼看着对手无影无踪了。

1944年春，中共冀热边特委第一地区委在平谷县刘家河召开西部地区民兵英模大会。第一地区委奖给朱家沟村民兵中队一面绣有“民兵模范”的红旗，还奖给民兵英雄们两支崭新的“三八”步枪。

战斗在境内五指山、大小黄岩、狗背岭三块根据地的民众有2.3万多人，加上其他各大山上的小群体，全县有7910户，26230人坚持战斗在深山老林之中。如加上经常往来于部落和关里的流动人口，全县约有3万人游击在白云深处。

这说明一条真理：中国的农民虽然贫困、落后，然而，他们最热爱祖国，最深明大义，一经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他们的头脑武装起来，他们就能“毁家纾难，死兄死弟死妻死侄，鲜血洒遍燕山麓；捐躯殉国，成仁成义成英成烈，勋献洋溢滦水滨。”[①] 以中国人的特色，以中华精魂去战胜世界上任何强大的入侵者。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是可以战胜的。今天和今后，任何入侵者如果再搞类似千里“无人区”的灭绝人性的统治，决然是可以战胜的。中国共产党人那种与山民们相濡以沫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创业史，雄辩地昭示：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像希腊神话巨人安泰那样，永远不脱离大地母亲，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够踏在脚下，推动历史巨轮永远滚滚向前。千里“无人区”的5万人民是了不起的中华儿女。千里“无人区”的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楷模。这一珍贵的历史经验，永远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地总结研究、提炼、运用和发扬光大。

关于千里“无人区”暴行的总结，1988、1989年，日本学者、东京中央大学姬田光义教授来兴隆等地考察之后写了一本书《又一个三光作战》，在日本出版后反响非常。他在该书的序章里说：“本书只

① 冀东军分区追掉魏春波烈士挽联，载《迁西县革命斗争史料选》（一）第267页。

不过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无人区’问题）。那么，‘无人区’化政策的历史特征又是什么呢？虽然不象‘南京大屠杀’那样集中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但是，它是长期的一场大屠杀。也不象‘七三一部队’那样露骨的、非人道的活体实验，但是，它是有目的地摧残人生和土地，这是比‘七三一部队’更大规模的活体实验。‘无人区’化政策超越了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的偶发性、个别性，它是有计划地追求广泛性和长期性的‘又一个三光政策’。总之，‘无人区’化政策是追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事件集大成的体现。”这位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比中国这方面专家的研究有所突破，对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启发。

日军制造伪西南千里“无人区”的暴行是极其惨重的。据不完全统计，日伪军警屠杀中国同胞 6.1 万人，在部落里饿死、冻死和瘟疫死亡 7 万多人，被“大检举”抓走去东北各地当劳工 15.2 万人。据敌特人员估算最低有 12 万人死在外地。以上被屠杀、冻饿、瘟疫、酷刑、监狱折磨和劳役折磨及暗害、毒害等非正常死亡达 25 万之众。这样惨无人道的大惨案，为什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注意呢？正如姬田光义教授认识到的，因为它是长期的大屠杀；因为它是长期的和广泛的杀光、抢光、烧光；因为它在大范围地摧残人生和土地中搞大规模的活体实验。因而骇人听闻的大惨案被分散、支离、破碎、淡化而消逝。“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还能淡忘吗？怎样把千里“无人区”这个特大惨案集中、具体、真实、准确、醒目地再现出来，经常而深刻地警醒、教育我们的后来人，汲取沉痛的经验教训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国防建设，应该是这一地区各级领导同志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二 迸发光辉的历程

开辟迁遵兴联合县关外山区

田 赛

1941年10月，党中央指示冀东“巩固平原，建设山地，挺进东北，开辟新地区”。中共冀东区委和行署派陆拓（袁介）同志和我到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工作。陆拓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任县长（原县长李春光同志因病休养）。

冀东地委宣传部长徐志同志送我们到迁遵兴联合县，与第二地委组织部长苏林宴同志接头。我们到迁遵兴后，春光同志病好了，已经上班。苏林宴同志给我们分工：李春光同志负责关里（长城以南），我分管关外（长城以北）兼任民政科长，接手长城工作团的工作。长城工作团正、副团长是高敬之、姚铁民同志。他们已来一两个月，是搞政权建设的。迁遵兴联合县已建立了政权。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科长、民政科长，还有一个县基干队（队长曹致福），并在关外建立起迁遵兴联合县第六至十三区。联合县的范围这么大，在冀东来说还是第一个。

我们接收工作任务是一方面巩固政权，一方面开辟新地区。配合我一起工作的是组织部副部长张唤然同志。他带我熟悉情况，我俩每人骑一头毛驴，从潵河—黑河—车河—柳河—滦河南到承德边界。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山高林密，便于游击活动。当我们走到雾灵山脚下时，张部长介绍说：“雾灵山上有清凉界、莲花池，还有庙，还可采

茶。”因时间关系我们没有上山。从此，我对山地一草一木都有了感情，并立下誓言：“要与山地共存亡”。

在建立基层政权的同时，特别注意群众武装。每到一村就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一次，我到八区，发现那里有很多人用猎枪打狍子。我对区长王佐民同志说：“把会打枪的群众组织一下，考查一下步兵枪法”。通过实地打猎，发现有很多人枪法很好。于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发展壮大了民兵组织，在山里与敌人周旋，使敌人不得安宁。

日伪把长城一带做为第一线，是游击区；把建昌以北做为第二线，是非游击区。我到迁遵兴以后，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关里是齐燮元治安军，关外是伪满洲军。敌人虽然不断地进行内外夹击，然而我们党、政、军、民，同甘苦、共患难，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凉，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英雄的山区人民没有被吓倒，仍坚持在山地斗争。

1942年秋冬，日伪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进行大扫荡、大检举、大屠杀。我们每天也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日夜都在战斗。就在日伪搞集家最疯狂的时候，一次日军扫荡五指山，我们组织群众转移，一个未离娘怀的小孩哭了起来。这个小孩的妈妈为了不暴露大家，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活活把小孩堵死了，这是他妈妈身上的肉哇！

日伪要摧毁山地，我们要建设山地。为了使群众不受或少受损失，及时准确地得到情报，注意团结利用各方面的人。搞统一战线，是以保存自己、瓦解敌军、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同时，还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我建议宣传部长冀光同志办报，定名《呼声》。反映反集家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报上报道了五指山上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同志的壮举。时间不久，八路军前线总政治部记者来采访我们。

记者说："你们的处境比当年内战还要艰苦得多，那时走雪山、过草地，离敌人较远，而现在你们被敌人包围、扫荡、搜山、屠杀，随时都有牺牲。"

1943年春，日伪进行合击大扫荡。八、九区的情况更加紧张，吴云清等几位区长同我在一起活动，还有好几名女干部。我们从黄花川到三道梁子，又奔河南大峪。发现敌人后，又转移到早子岭山顶上的农民家吃饭并召开会议。会议决定让各区长能突围出去的回各区，实在突不出去的跟随我在一起分散活动。我们从早子岭到蘑菇峪，打算去龙井关。龙井关前有一条河，两边儿冰还没有化，中间化了，又发现有敌人的埋伏。我鞋袜未脱第一个趟过去，随后其他人也都跟着趟过去，一直跑到洪山口（遵化县境）才化险为夷。

1943年夏，陆拓同志调走，宋诚同志接任县委书记。我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对坚持山地、建设山地充满着信心。有一次，冀东行署的陈秘书和民政科长谢平同志来检查我们的工作，走进我们的简易房，他们笑着对我说："老田，你还这么幽默哪！"原来他们发现简易房上的对联。那时我们县政府没有固定住地，没有房子，都是走到哪里在哪里搭小窝铺。那是在五指山以西的黑河上游，县委设在南四道沟上尖的森林里，县政府设在南大台的森林里。我们的办公室是小茅草窝铺，我在草窝铺留门的一面贴一副对联。上联是："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下联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横批是："烧了再盖"。那个时期，我们能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宿，就很知足了。所以他们管我们叫"乐天派"，还表扬了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时候，不知什么叫发愁。日军从东北到华北制造了千里"无人区"，我们的根据地大部分被蚕食，唯独我在的迁遵兴联合县，向牛角一样插进去，是个长条形，始终未被摧垮。其原因有四：一是党中央的正确指示。1939年中共中央提出"巩固平西，开展平

北，坚持冀东”的三大任务。1941年，又批示冀东“巩固平原，建设山地，挺进东北，开辟新地区”。有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河北省委、冀东地委的正确领导；二是兴隆县具备进可攻、退可守的特殊地理条件；三是日伪没有群众，我们有群众；四是有武装部队的配合。有十三、十二、十一团和各个区队。1942年、1943年，十一团赵文晋团长、吴宗鹏政委经常配合我们建设山区根据地。

环境越是艰苦，领导干部越要吃苦在前，关键时刻要果断。我们提出干部要坚守工作岗位，县长不离县、区长不离区、村长不离村。尽管区域大小不一样，都要分清责任，一旦有什么情况，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王佐民的第八区、吴云清的第九区、李鉴铭的第十二区都是比较好的区。

1943年冬，日伪集中重兵对根据地山区实行长期大围剿，斗争最残酷。根据地的老乡不仅没吃的，还没有棉衣棉被。民兵站岗放哨时，冻得在山头来回跺脚。我听到王佐民区长汇报情况后，就向军分区反映情况。恰巧，部队发的军装是土红的，部队没法穿，经上级同意，我们派人到关里取回很多土红色军装，发给了老乡穿。群众都非常感激，坚持山地斗争信心更足了。

1944年4月，兴隆要成立承（德）兴（隆）联合县办事处，上级准备让我担任驻承兴办事处主任。我推荐王佐民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地委采纳了我的意见。不久，我便调到丰（润）玉（田）宁（城）联合县工作，离开了兴隆山区。

山里的烽火岁月

李　文

我是兴隆县蓝旗营榆树沟村人。我的故乡，层峦迭嶂，沟岔纵深，连接澈河川至北大山一带，进可攻，退可守，是抗日游击战中一块要地。

包森同志播下的火种

我的家乡虽然很偏僻，尽管是山缝深处，绿荫掩映的一湾豆棚农舍，却踏过许多冀东党政军负责人的匆匆脚印。1938 年秋季的一天晚上，第二支队长包森率部队，带着 70 多名俘虏来到我们村，其中许多人住在我家院子里。第二天，包森队长向俘虏进行政治教育，然后把他们全部放了。支队一位负伤的连长，留在我家休养一个多月。赖帮同志负伤，也住在我们村，是大帽峪的曹希全医生给治好的。

同年冬季，包森队长转战关里（长城以南），留下大赖、小赖，还有王郝，带着游击队在这一片山区活动。他们的活动面很广，东至黄花川，西到乌头牛，群众称赞他们是“飞毛腿”。榆树沟一带的老乡就秘密地给他们筹集粮食、鞋，转运物资。由于这一带发展成游击区，逐渐地形成为八路军与群众密不可分的一家人。日军妄图切断军民的联系，从 1939 年冬季开始在这一带搞集家并村。集家并村，就是强迫深山沟的零散住户集中到人口较多的地方，合并成较大的村庄。榆树沟的老百姓被集中到杨树台，中田附近居民主要集中在羊羔峪。对于这种小集家，群众想出一种应付的方法：有的户建简易房

子，有的户住在亲戚家，家中的物品藏到山里。到1940年春，群众又陆续地搬了回去。

冀东党委开辟根据地

1941年，中共冀东区委组织长城工作团（团长高敬之、姚铁民）来这里开辟地区，派区干部建立政权和群众组织。蓝旗营一带被划为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八区。第一任区长李玉，助理有王子明、李新、国希良等。村建报国会、妇救会等组织，选任武装班长、办事员等人。办事员（村长）主要负责征集公粮、派人转运物资、接待过往部队食宿；武装班长主要负责组织群众站岗放哨、传送信件；报国会主要负责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保守抗日秘密等工作。

在山里游击区基本是抗日一面政权，在大川实行两面政权。游击队到大川，就直接到保长、甲长家，让他们负责下通知，送粮送款。一方面争取他们为抗日服务，另一方面教给他们对付日伪的种种办法，同时也教育他们为抗日出力。好的要表扬，坏的要惩办。因而，澈河川的保、甲长都和抗日政府建立了联系。

关里关外互相配合

1941年冬，关里日伪正在搞五次"治安强化"。为配合关里人民的反"强化治安"运动，第八区群众和游击队一起大搞"破交"运动。砍倒电杆，切断电线，挖壕沟，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牵制关外的敌人。当时，我公开的身份是小学教员并担任村报国会主任。夜间秘密配合区干部到各村开会、除奸。李玉区长调走，张友德任区长。不久，我的真实身份暴露后，就正式同游击队一起活动了。

进一步打开两面政权的局面

1942年春，日伪统治更严了。抗日政权在大川发动抗粮抗款、收“良民证”的时候，有的保、甲长变心投敌。为争取保、甲长，我们采取争取与镇压相结合的策略，以教育争取为主，镇压是个别的。靳杖子村有一个甲长，一心向敌，与日伪来往密切，办了许多坏事，民愤极大。张友德区长把他抓来枪毙了。把蓝旗营的甲长郭老品抓起来，进行教育，他接受了抗日政府布置的任务。这样，西部枪毙了一个，东部抓了一个，在保、甲长中震动很大，两面政权局面又很快打开。夏季，白天我们在山里活动，夜间我们到大川据点附近活动。

大集家、大讨伐、大检举

1942年冬季，日伪开始大规模地集家并村，修建部落，把多数群众集中到东至三道河、西至黄门子这一条大川里，把山区划为“无人区”。

山区群众坚决不进部落，实行坚壁清野。各村相继组建武装民兵，加强山头哨，守卫山区，同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敌人来了，上山转移；敌人走了，下山生产。从横河老虎沟以北，群众根本没有进部落。这片山区就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农历正月，日伪对山区进行大讨伐、大检举。这时，我担任区文书和民政助理，因为人情地理上比较熟，组织上派我在蓝旗营一带活动。白天在山上隐蔽，夜间进部落了解动态，做群众工作。一天晚上，我们部队的一个排从天桥峪下来，计划经大帽峪向关里进发。大部队接近大帽峪村时，走在前面的两个侦察员已经出了村南口，突然，迎面来了个特务。特务开了枪，侦察员开枪还击。我们部队听到枪声马上后撤，又向天桥峪返回。这时，正在公路上休息的日

伪讨伐大队进沟把大帽峪村包围，只有靠墙边的一户姓温的哥仨跳墙跑了，其他青壮年全被抓到蓝旗营，和其他部落被检举来的人圈在一起。敌人进行审讯，有的把衣服扒光，用棍子打，有的用火烧，有的头朝下吊打。有个叫张凤阳的老乡，被吊打时绳子断了，他爬起来拿劈柴朝敌人打去，然后攀墙逃跑，还没等过墙，被日兵用刀刺死。敌人白天把老百姓打死一批，垛成马莲垛，夜间拉出去埋了。大帽峪村42户，被抓去73人，被杀死72人，从此成了寡妇村！被日军扫荡过后真是火过山黑，新坟遍野。

深山里的鱼水情

1943年春季，我们发动群众抢种，组织武装保卫春播。敌人知道粮食是根据地的物质基础，便狠毒地破坏深山里的粮食生产。到玉米刚长水泡泡，敌人就逼着部落里的居民进山割青苗。敌人把青苗割了，我们就派区游击队到关里弄来种子，种萝卜，种荞麦。游击队和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带些粮食同群众一起吃，有时我们带些咸盐，老乡们采野菜，一起煮野菜吃。一次，我在榆树沟里碰上了一个哑巴乡亲哥哥，向他打手势，比划我肚子里太饿，没有东西吃，他回去向他母亲示意，老太太明白了，就向甲长请求，用毛驴往地里送一驮粪。甲长同意了，老太太把吃的东西藏在粪里给我们送来了，我的心头热乎乎的，多么感激榆树沟一带的乡亲们多次冒险帮助抗日干部的深情呢！

为救济根据地的群众进部落里征粮食，部落里谁家粮食多，就向谁家征集，给老百姓打征粮条子。老百姓想给我们送粮食，可是敌人看守很紧，送不出来。急需的时候，就采取武装征粮。有一次，我带着县大队的一个排，王佐民、孔昭各带一部分武装，武装干事带一个排，分别去部落征粮。那是夜间，从楸木林北沟出来，我们这个排摸

到小子庄部落南门，正过一座小桥，上面机枪响了起来，我们只好向北撤退。敌人追上来，我们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民兵很机灵，在敌人追他的时候，他把上衣裳脱下来挂在棍上，插在地里。繁星眨眨，影影绰绰，敌人一再朝黑影影开枪，总也打不倒。到眼前一看是件空衣服，再找人，已经跑远了。王佐民同志见这名小民兵光着膀子跑回来，冷得直打颤，马上把自己的褂子脱下，给他穿上。

1943年，日军大搞“三光”政策，斗争最为残酷，情况也最严重。到冬季，根据地的老乡不仅没吃的，还没有棉衣，也没有被子。看着群众没穿的，我们都非常心疼和着急。王佐民同志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经上级同意，我们派部队到关里背来很多土红色的军装，发给老乡穿。因此，还出了这样一件事。敌人来讨伐时，老乡们都转移在山上，日军用望远镜一看，大吃一惊，满山遍野都是穿红军装的八路军，吓得跑了。群众都说：“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944年春季，敌人以上万的兵力来围剿第八区根据地。为了缩小目标，保护群众，上级决定由区干部领导群众向关里做一次战略转移。可是根据地的群众都不愿意走，区干部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由区游击队护送大队群众转移关里。这时，整个形势有了很大变化，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本土推进，希特勒眼看要垮台；大部分日军南调，企图打通粤汉线，给太平洋上的日军准备退路。到播种后期，转移到关里的群众又转回来，开始抓紧抢种庄稼，恢复山洞窝铺，筹集军粮，巩固根据地。

时刻为人民着想

1944年7月间，冀东八路军十一团挺进兴隆。一天打几次仗，很疲劳，又回到第八区根据地休整。敌人得知后便向山里进犯，妄想围剿八路军和割净青苗。我们考虑，如果在山里打埋伏，群众中的老

弱病残和孩子们怎么办？我和佐民一起去找十一团赵文晋团长商量。赵团长也正在深思这个问题。文晋同志用电台请示了上级。最后上级决定到敌人的屁股后面去打，干扰他们后防。我们配合十一团，从山后绕到西首、大山，分几路出击。一路出蛇皮（村名），打青杏沟、古儿石、鸠儿峪；一路出西沟，突击佟家沟一带。佐民我们从北沟出去，带着大山（村名）担架队，打青杏沟。整个部署是：十三团的一个连把蓝旗营敌人控制住，不让他们出来；其余部队同时攻打几个部落。不长时间，几个部落的部落警全部被打垮，缴获全部枪支。进山讨伐的日伪军一看“后院”着火，立即撤回。这一仗打得好，既保护了群众又保住了大部分的青苗。

坚持就是胜利

1945年春季，为了配合全国形势，准备大反攻。冀热辽区第十五行署在迁安县三屯营召开了英模大会。有两件值得庆贺之事：一件是，曹致福部下的侦察员王二虎，智勇歼灭日本宪兵队长、大特务千叶；一件是，王佐民同志被评为坚持山地的模范工作者，奖给他一套毛主席著作。

不久，日军投降。由于消息不灵通，开始听说日本要投降，但还不确信。直到佐民同志从关里派人送来日本投降的确切消息，我们才相信消息的真实性，真是高兴的不得了。诚然，童年的记忆最深。可是，最艰难的岁月，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永远怀念的老区人民

李　东

1941年，我在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三区工作。1942年关里（长城以南）日军搞五次“强化治安”，环境恶化。中共冀东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长城以北分散活动。迁遵兴联合县委和县政府设在沟门子（今安子岭）马架沟北山一带，我调到第十区工作，第十区区委书记是夏鸿霖同志，区长是吴云清同志。1943年初，党组织又调我到第八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是赵启田同志，区长是王佐民同志，区委组织委员是社会同志。第八区范围东到五指山，南至潵河，西至五凤楼，北部是黑河上游（1942年属第九区，区长程新民牺牲在天明村的双窝铺）。我在第八区工作了一年，又调到关里。

1945年春，抗战形势迅速发展，我又调回黑河、车河一带。此时，这里划为承（德）兴（隆）联合县第四区，即迁遵兴联合县原第十一区和黑河上游。我任区委书记，李志兴同志任区长，还有一个20多人的武工队，队长黄士忠同志。我们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几年的抗日斗争中，我与车河、黑河的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也与人民一样地饱尝了日军统治之苦。有那么多、那么好的群众、战士、干部，骨埋燕山坳，血洒滦河水，而含笑九泉。这些死去的亲密战友和英雄的山区人民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冀东地区人民子弟兵、地方干部和人民，英勇斗争，前赴后继，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长城

以北广大山区的人民已经发动起来，对敌人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敌人无不恐惧。

1942年秋后，日伪调集重兵，大规模地进行集家并村，把群众赶进部落，制造惨无人道的“无人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距部落较近的三里五村的群众被迫赶人部落，距部落较远的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坚持山地斗争。黄花川、黑河川、蘑菇峪一带民众的房子被烧，没有家，他们搬进山沟，住在山洞里。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鼓舞和坚定人民斗争信心。车河口日军田中队，在这一带无恶不作，屠杀群众，经常扫荡围剿山区根据地。同年冬，驻在王宝石的李运昌司令员的直属部队，接到群众的情报：这股日军又要出来扫荡。直属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黄花川的河口。敌人进入包围圈，直属部队猛烈射击，仅用20分钟就歼灭敌人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这次战斗后，中共冀东区委在河南大峪举办“党组织训练班”，各区委书记、区长都参加了。训练班主要内容是讲中共党的基本知识，鼓舞干部坚持山区斗争。此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冬季，连托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住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炕上没有席，铺的是草。我们到老乡家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炕上，头脚颠倒着。有时还和老乡睡在一起，不分男女老幼，真是一家人，有着“父母、手足之情”。那时环境紧张，睡觉连鞋也不敢脱，衣服长满虱子，有时一宿换几个地方。吃饭更艰苦，吃的是棒子渣，有时连棒子渣也吃不上，一连几顿饿着。没有菜，一个人身上带着一块盐，不敢多吃，只到碗里沾一沾。

1943年1月，县委书记宋诚同志让我到第二区（即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的黑河上游）。这个区的群众仍然坚持在部落外面，八路军部队转来的伤病员都集中在这里休养。

夏季，日军急了眼，就组织部落里的群众出来“割青”，日军称“清水摸鱼”。庄稼大部给割掉，只剩下敌人未到过的地方（山里）还有少量庄稼。群众没粮吃，抗日政府就用公粮救济。敌人一来，人们顶着锅往山头上跑，有一点粮食的都藏在石洞里。

10月，日军又来一次大扫荡，我们干部和群众全部上山。几天不下山，只能在山上吃炒米。每人身上带一点，舍不得多吃，渴了就喝凉水。我记得1943年的一年时间里，只吃过一次搞情报的同志从关里带来的大米。

第八区开辟较早，党组织比较健全。1943年，已经有几个党支部，有的村就有十几名党员了，党员少的地方3个人组成一个支部。为方便活动，山沟里设党小组，大的支部里有武装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入党手续也是很严格，雇农出身的没有预备期，贫农、下中农出身的有预备期。加入党组织，就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父母、妻子儿女也不能讲。我第一次到黑河上游时，只有李清等3名当地的党员，后来我们分工，积极地发展党员，争取每人每月都完成发展党员的工作计划。区委书记赵启田（李文玉）负责黑河梁南分区，组织委员社会同志负责上庄分区，我负责黑河分区。我在车河堡西洼、大坡一带，发展有六七十名党员，其中有一名党员非常坚决、勇敢，1944年被日军杀害了。村干部赵玉星是赵大地人，表现很好，入党后积极完成任务。在八区发展有一百五、六十名党员。这些党员在最艰难、最紧张的环境下没有叛变投敌的，给一个任务，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完成。

1944—1945年，根据地环境更艰苦。热南地区群众大多数被赶进部落。由于饥、疫、打，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每天都要从部落里往外抬尸体。黑河上游有个村干部叫红光，全家21口人，最后剩下5人，其余全都死了。

1945年春，我从关里回来，在黑河南四道沟老朱家，这是我们的老关系户。老二见到我，叫声："大兄弟，你回来了"，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在我们之间，如果叫声同志那就太疏远了，我们是一家人啊。大人孩子都面黄肌瘦，一看就知道好长时间没有粮食吃了。我问："大哥干啥去了"？他说："南山有几颗棒子（玉米），耪耪去。"我说："饿得这样，还咋耪地呀"!？他说："他刚才回来，吃了几个山杏和一块咸菜，总得想法活着。"当时我身上带有3公斤小米，对大嫂说："大嫂，做点饭吃吧"。他家里一条被子补丁罗补丁，大人身上的衣服都是十块八块的碎布拼在一起，孩子根本就没有衣服，赤条条的。

第二天，我又到五指山的老王家，他家住一个马架窝铺。王老四老婆从地里摘回个拳头大的南瓜说："大兄弟，包涵点吧，没粮食了。"我把身上仅剩的二斤小米取出来，做了顿饭吃。老四从地里回来，抓住我的手说："大兄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日本鬼子啥时候才能滚呀?"

幸福的日子终于盼来了！8月的一天，五指山边的觉悟村，群众喜气洋洋，奔走相告说日本投降了。车河川的群众自觉组织起来耍舞会，扭秧歌，人民终于盼到了光明。

战火深处有课堂

——忆刘庄冀东地委训练班

高静波

入学通知

1942年8月，中共党组织派我到迁（安）遵（化）兴（隆）抗日联合县第三区当儿童团长。

不久，日伪军第五次“治安强化”开始了。日军大兵压境，到处建据点、挖壕沟，因此就把我们三区的干部和在当地不能隐蔽的村干部，都挤到口外（长城以北）去了。县委把我临时分配到第九、十区帮助工作。1943年1月12日，我在榆树庙子村，接到迁遵兴联合县委书记宋诚的信，通知我去河南大峪地委训练班学习，信内还有我组织关系的介绍信，训练班的地点在河南大峪的刘庄（元旦前训练班在河南大峪的高庄）。

我接到信件时，已是下午。我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感谢党组织在如此残酷艰难的环境中还这样关心我，我决心努力学习，当即准备赶路，但不知到刘庄30多里路程怎么走？没有向导，夜间行走是难以寻路的，可又不忍心再找群众带路。榆树庙子村虽有十几户人家，都是联系关里关外、滦河东西的枢纽。抗日军政人员常来常往，冀东军分区交通大队长刘芝就常住这里。军、地两个交通系统均常以此为交接点，战勤负担比较繁重。

此时，恰好有救国报社铁（编辑）路过此地，刘芝和他说了之后，他就引我上路了。出发当夜住大车峪，次日上午到了刘庄。他一

直把我送到李杉那里。李杉告诉我训练班正在筹办中，报到的学员连我才有 3 人，暂时都住在张庄等候。这样我就回到了三里以外的张庄，和先来的一位同志住在一起，另一名则是姜瑞同志，当时他因患病住在部队的卫生所。张庄虽比刘庄大些，也仅有十几户人家，除已住有一个部队卫生所，又临时住了主力部队一个连。因此，也就住得满满的了。

报社办班

这次地委训练班和以往不同，是冀东地委宣传部长吕光委托冀东《救国报》报社承办的。这就解决了以往办训练班师资不足和缺少管理干部的问题，也使报社编辑人员能够人尽其才，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使报社人员有机会接触各地来的学员，更多地了解各地对敌斗争情况和经验，丰富办报内容，也使我们学员有机会看到《救国报》报社还有这样一支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当时，吕光、顾宁、水川、吴明、郁芬（吕光夫人）等都给我们上过课。凌云、丰原、武近山、田涓（白洁澄）、山桥等均在报社工作。

训练班学员来自冀热边迁（安）遵（化）兴（隆）、丰（润）玉（田）遵（化）、丰（润）玉（田）宁（河）三个联合县。1 月 20 日，当我返抵刘庄时，学员已集聚 20 多人。尤其来自丰玉宁联合县的学员要行走多日，穿越几道封锁线才能到达。因此，参加培训的学员仍在陆续报到，但时间又不能再拖，学员暂时分为三级，宣布正式上课。首先是合堂大课，由吕光讲组织领导、水川讲革命气节等内容，顾宁等也各讲一课。大致是每天一课，半天上课，半天讨论。

到 1 月 25 日，学员还在陆续报到。将已到学员 22 人（均为中共党员）分为 4 个班，每班 8 人，指定了 4 个班长。一班长王洪(洪华),是丰玉宁联合县区委书记,也是丰玉宁学员的领队。学员有程文

(李东)、保民(刘保民)、新丰、博文、中宁、新社(高静波)等;二班长程坦或雷保贤;三班长傅新(孟希同);四班长刘春华。二、三、四班学员有:进步、姜瑞、春林(李明辉)、卫民、子东、乃如、济民。每个班也就是一个党小组,党小组长即是班长,每周开一次党的生活会。

学员中年龄最大者为济民,已40岁左右,最小者为保民,仅16岁。有三个儿童团长,即春林、保民和我,其实我在三个中年龄居中,只是个子较小,所以就认为我是最小的,我们的吴明老师和学员也就总爱和我开玩笑。

虽然学员中只有王洪一人带手枪,报社编辑也是短枪较多,长枪只有几只,但因有一个18人的加强班担任警卫,站岗放哨(阎班长是一位在平北教导队受过正规训练的排级干部,精明强干,带兵有方,把战士们带得一个个生龙活虎,有时他还帮助我们指导早操训练)。所以报社的编辑可以专心工作,学员们可以安心学习。外围则有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十区区委书记夏鸿霖、区长吴云清和滦河东岸的迁青平联合县第七区区委书记石新、区长张永年等的关照。他们严密注视附近宽甸、八家、潘家口、车河口等日伪据点的动向,经常派人有时还亲自到报社报告敌情。

当时河南大峪尚未集家并村,都是原来的民房。刘庄有一个喜峰口,石家地主当年在此收租存粮的大院,吕光、李杉及编辑部连同伙房都住在里边,只把警卫班和训练班学员分散住在院外十几户民房里。没有教室,是个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把老乡的一个闲着的牛棚打扫干净,铺上玉米秸,天气好时就在此上课,天气冷时,32个人只好挤一班的屋子和堂屋地上课。

主要课程

训练班主课有两门,一是党的建设,一是党的基本政策,两门课

穿插进行。党建课由刘郁芬担任，她从苏联列宁建党学说讲起，列举列宁和马尔托夫在建党学说上的分歧，联系我们建党工作的经验教训。基本点是：一个共产党员既要承认党纲党章，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又必须在一定的组织中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拉夫主义。基本政策课由吴明担任，主要内容是从党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到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等。

郁芬北方口音，比较好懂。吴明南方口音，不太好懂。对我们这些未出过远门，很少接触南方口音的学员来说，就是个难题。好在吴明经常到各班参加讨论，就地回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又经常把他的讲稿提纲给同学们传看，弥补了这个不足。久之，学员们对他们的口音也就听懂了。

艰苦而愉快

首先是住宿。为了便于管理，每个班只能挤在一条小炕上。有的炕太小，挤 7 个人都困难，挤 8 个人连翻身都困难，只好颠倒着睡，即 4 人头朝里，4 人头朝外。这在南方可能不希奇，在北方就少见了。因为我们的全部家当都在身上，即使夜间也是鞋不脱、帽不摘，小包当枕头，一遇敌情随时一跃而起。由于多数学员没有大衣，这样一挤，也就显得三面暖和，并且多数学员在来学习前都经历过这样密集的生活，也就不以为苦了。

其次是伙食。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天小米 28 两（16 两为一斤），不久又改为 24 两，菜金每天一角。报社管理员按这个标准给我们准备粮油盐菜，一日两餐，学员领回自行轮流做饭。由于河南大峪、黄花川、王宝石一带到处住满了冀东党政军机关部队和后勤单位，所以物资供应很困难，即便有钱也难买到东西。由于多日无肉，甚至无油，学员们早已口馋，等待春节改善生活。可是报社管理员费了好大

劲，春节也只是给每名学员发了半斤肉。恰好春节前两天焦若愚专员来报社看望，一个老同志就想和这位老领导说说给我们学员改善一次伙食，但当得知周围住有这么多的机关部队，尤其住有伤病员，也就自动打消了这个念头。

学习条件困难，吃住艰苦，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却异常高涨。32个人挤在牛棚或小屋子里听课，一个紧挨一个，加之光线不好，听课、记笔记是十分困难的事。可每次上课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认真地记，下课后又抓紧时间互相对笔记，作补充，并且激烈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主课听讲和讨论之外，学员们还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国际国内形势和实际斗争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来自冀东平原和热河山区各县的学员，交流着如何发展游击区和巩固根据地、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经验和教训。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对我们一些经历较短的青年人来说，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促使我们对老同志们所提出的、讨论的一切问题，无不感到极大兴趣，如饥似渴地利用一切机会来努力充实和提高自己。

除了紧张的学习外，也有锻炼和休息。每天早晨6点起床跑步，8点吃早饭，上午上课，下午讨论，3点吃晚饭，饭后以打柴代散步游戏。好在这里村庄稀少，人口不多，不必走远路，即可把柴打回来，送给房东并自己做饭用，晚上还有一段讨论和唱歌娱乐时间。所以训练班的生活既是紧张充实的，也是丰富多彩的。

力量的源泉

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精神振奋、刻苦学习呢？如前所述，既不是优厚的物质生活或金钱补贴（学习期间津贴费由原来的7元一律减为3元，连同菜金3元共计6元），也不是为

了镀金，拿个训练班结业文凭，当然更不是有人强迫我们学习。

是为了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和短期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接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学习深造、掌握革命理论和党的知识、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以求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把我们团结联系在一起。训练班初始，就以抗大校训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在这里我们不仅学习了党的建设和党的政策，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还交流了革命斗争经验，介绍了不少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所有这些都激励着我们更加勇往直前地去迎接未来的艰苦斗争。

追悼会、纪念会、开学典礼

1943年2月4日，是农历除夕。中午，报社人员和训练班学员在村边一块场地上清除了积雪，为1942年4月日军第四次“治强”以来报社牺牲的范捷民、布于等几位革命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李杉在悼词中报告了烈士们的生平事迹及殉难经过，他们的名字对训练班多数人来说虽然是陌生的，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体学员含着眼泪听完了悼词，决心踏着烈士们的足迹去迎接明天的殊死斗争。

追悼会结束后，纪念会开始。纪念冀东《救国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一周一期到三天、五天一期，所走过的战斗道路和它在动员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坚持冀热边区根据地所起的重大作用。并号召大家在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和提高办报水平的基础上，把中共冀东地委机关报——《救国报》办得更好。纪念会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以《救国报》社的代号之取名星火部队的来历，也给报社工作人员和训练班学员以极大鼓舞。

随后是追补的开学典礼。学习班安排了3个月的教学计划（上课1个月，实习1个月，总结上课1个月）。开学典礼，进一步激发教师学员的积极性。半天时间就开了三个大会，最后还举行了春节联欢会，丢手帕，唱歌曲，很是热闹。谁输了便由谁出节目，顾宁、程文和我都被罚打了油。对顾宁大家都晓得顾宁会唱苏联革命歌曲，可他只唱了一首就不唱了，大家就抬起打他的油。

当天晚上，吴明老师怕我们寂寞，又在编辑部院内当年存粮的地方为学员们举行了小型联欢会，唱歌的、数快板的、唱评剧的，什么节目都献出来了。后来成为烈士的李明辉还唱过一段“老妈开房。”

紧急疏散

训练班主课仅上了10天，日军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谋划已久的调集重兵在热南发动大围攻、大扫荡、大集家、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罪恶活动就开始了。从春节前开始，热南各据点就陆续增兵，并在蘑菇峪建立了新据点，这是日军在滦河西岸离我们最近的据点。随后滦河东岸也出现了敌情，2月6日，张友德区长亲自来报社汇报。当天上午紧急集合，我们转移到张庄隐蔽。

2月8日早饭后，报社领导向我们宣布：立即进入反扫荡，训练班学员作临时疏散。迁遵兴联合县的18名学员，西去八区横河找宋诚安排分散实习；丰玉宁、丰玉遵联合县的14名学员随报社转移。何时再集中上课，另行通知。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老师、同学们，告别了刘庄！

我们在领队学员刘春华带领下，当即整队出发。大雪初霁，积雪皑皑，路滑难走。我们西行至河南大峪高庄岭上，再沿大山梁阳坡向西穿行，当夜宿刺儿峪。

9日拂晓，绕经菜园子、榆树庙、石胡沟，黄昏抵达王杖子。在

该村办事员家会见了新从后方调来的年仅22岁的迁遵兴联合县民政科长白雪振。晚饭后，不顾两天来雪地行军的疲劳，又继续西行9华里，经李杖子到五指山东麓的大小十二岭方才宿营。再往前进就要横越五指山了。五指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两个半月前，即11月23日，我已走过一次。那次也是自小十二岭被敌人赶上五指山的，不过那次是从东坡上山、北坡下山，路程较短。自东而西翻越五指山，这还是第一次。

五指山，高1383米，每年10月即开始积雪，次年5月底前后才能全部融化。清朝时期是封禁之地，森林茂密，虎狼出没。民国初年开始砍伐，高大的树木被砍倒在地，因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虽经20多年风雨腐朽，但还是到处横躺竖卧。雪山上的脚印，陷得更深，更难走。东坡上还有一段险崖，不仅不能走牲畜，就是行人也多要脱鞋才能爬上去，大大减慢了行军的速度。

从大小十二岭到大小分水梁，几乎要走一天的时间。这条重山曲径，固然是前人走出来的，但在八路军来此之前，又有谁经常要从这绝壁悬崖里攀越穿行呢？只是八路军来后才把它踏得清楚了，并开拓了毛驴也可绕过那段险崖的别路。“山深人迹少”，这只是一面，又由于当时山东面归青龙，山西、山南面归兴隆，山北面归承德，属伪满几个县份管辖的结合地带，便于我们机关部队运动，所以敌情一紧，这条小径几乎每天都有人东来西往。加之1943年春节前，有数路日伪军进犯五指山，也只到山下或山腰，极少翻越顶岭，所以我们住在它的山下，一般是比较安全的。

烽火中的实习

10日，我们整整行军一天，到达横河川中原村的小马架沟，找到宋诚同志。他向我们介绍了当前敌情的严峻形势，告知第三区新任

区委书记安祥（谷云亭）牺牲在兴隆县澈河南王杖子附近，这是三区四个月以来的第三位区委书记。通报敌情后，随即分配孟希同、卫民、义清我们四人仍然去第九、十区实习，并嘱咐我们乘敌人尚未开始扫荡，速返黄花川找到区委书记夏鸿霖同志。

次日晨，羊羔峪方向传来激烈的机枪声。我们连向导也未找就翻过大分水梁，沿连站沟大川东去。殊不知自昨天（即2月10日）早晨起，日伪大扫荡已经开始，形势已急剧恶化。日伪军在我们离村上山不久，就奔袭合围到大小十二岭。日军在这里烧房、杀人、抢东西，无恶不作。幸亏当天我们起身早，才没有被日军堵在屋子里。

我们走出20多里，快到连站沟口时，迎面遇见刘芝大队长带着一个警卫员，气喘嘘嘘地跑了上来。他说："你们怎么还顺大沟向外走？外边都是敌人，从昨天就大扫荡到处烧房杀人了。昨天早晨，敌人包围到红石峪，姚铁民、张会、张××（迁遵兴联合县交通队长），连警卫员都被捕了。敌人也到了大小十二岭。有人说你们这18个人没有武器，不一定怎么样了呢？"至此，我们方知黑河中下游敌情已如此严重，为赶时间走大川几乎撞入敌群，真是好险！随后和他们一起回头翻过大分水梁，听羊羔峪方向仍有枪声，并且火焰冲天。我们返抵小马架沟时，宋诚等同志早已转移，我们就和刚刚遇到的县政府会计光前等一起进了大马架沟，过北岭到了黑河上游的双窝铺南沟。从光前等口中得知，早晨之所以枪声激烈，是八路军十一团的一个连，凌晨在羊羔峪集合准备转移，受到敌人突然袭击，以致造成一定的伤亡，撤出战斗后北去黑河，敌人仍围追，到处搜索烧房子。

12日凌晨，我们登上了南大台，只见黑河上游的群山上，到处都有回旋的群众，也发现几处有日伪军。当晚，我们下到大歪把沟，想经五凤楼山，过车河去柳河。走到双窝铺遇到北来的交通员，得知五凤楼北三岔口也住有敌人，说明我们正处于敌人四面围困之中。本

来这里的地形和群众抗日的条件都很好，有利于我们和敌人周旋，可是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这个区工作，必须按县委的分配去第九、十区实习。在敌情如此严重、道路又不熟悉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暂返大歪把沟住下。

王佐民指路

13日上午，我们商定还是去小马架沟西找宋诚同志，从大歪把沟经正北岭登高直达小马架沟山上。正是在这里，我们初次遇见了第八区区长王佐民同志，我们向他说明了目前的困境，希望他能帮助我们返回第九、十区。王佐民区长非常热情地给我们指出一条比较安全可行的路线，又派他身边的一位财粮助理送我们到黑河小西三道沟。

次日晨，由于我们思想麻痹，又冒失地走了大沟这条路。在二道沟几乎与自车河过来扫荡之敌迎面相遇，只是在敌人尚未发现我们之前，我们退入树林中，才化险为夷。我们沿敌人来路到达车河西大山，至此，方与那位财粮助理分手。我们又依靠向导，连夜沿车河南山腰一条历来不为敌人所注意的路线东行，半夜住在大冰沟山里一个独户人家。

15日上午，到达东化鱼沟的东南沟里，找到了吴云清区长，总算到了第九、十区境内。得知夏鸿霖同志已到承德县境内八卦岭一带，当晚我们北过车河公路后折向西行，本欲经杨树沟直接去石洞子沟，不料在接近杨树沟时，又几乎撞进敌人怀里。原来车河口有18名日兵去柳河一带扫荡，归途在此吃饭。只是因为我们由东向西的有利方位，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之前，我们的向导已借助月色发现日兵哨兵明晃晃的刺刀。向导立即带领我们速退东山，才离开险境。当夜，绕道过北岭，住在石洞子沟东边六、七里的一个村子（已被敌人烧过）外的地洞中。至此，我们就进入了孟希同同志原来活动的地

区。干部群众无论男女老少，对孟希同同志都很熟悉，也很亲热，群众热情地招呼他“付新”（孟希同的化名），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并用春节饭招待我们。其实入训练班前，他来此区工作也仅半年，和群众关系能够做到如此亲密无间，令人钦佩。

16日，我们经石洞子沟到八卦岭，找到区委书记夏鸿霖同志，交出了组织关系介绍信。总算完成了从地委训练班回县又到区实习的最后组织手续，并返回石洞子沟。此地虽然也时有敌伪出来扫荡，但已远非黑河、横河等地之敌用重兵反复纵横穿插围剿可比。由于在这里集中的县区干部较多，不甚方便。

17日，我们几人自石洞子沟北去牤牛窖。此村在柳河之北、滦河之西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半山腰上，东距下板城（今承德县城）仅10多公里。由于此地工作扎实，贯彻政策好，各方面都较有基础，又因属于抗日“两面”政权，没有引起敌人注意，在敌情紧张时，我们仍能在这里随便活动。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两夜，消除了十几天来的疲劳。

这里虽较安全，毕竟是第九、十区边缘地带，并且是上年12月才从十一区划过来的，并非第九、十区的中心地带，故从19日起我们开始分散转移。我和孟希同返石洞子沟。当晚，我和夏鸿霖经杨树沟南过车河回到黄花川一带，投入反“扫荡”去了。

纵观这次地委训练班，由学员开始报到至上课，等待了10天，上课16天，其中主课只讲了约10天。一个月预定的课程，只讲了三分之一，就遇到了日军的热南“大扫荡”，使训练班未能继续办下去。至今回想起来，仍感是一件遗憾的事。

重访刘庄

1943年2月底，历时20多天的大扫荡结束了，劫后的第九、十

区中心地带，除转角楼、聚宝盆一条小山沟（因地图上无标记）没有到过敌人、住房也完好无损外，其余地方到处都残垣断壁，大部分群众含着眼泪被迫进了部落，区、村干部伤亡、被捕人数很多。我被分配到北起河南大峪、南至长城边的三分区做青救会工作。我所去的三分区原有3名同志，民政助理西云生到任不久，就和通讯员小陶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了，只剩下负责党群工作的国会1人。3月初，国会和我以及新派来的民政助理罗耀东（也是我区唯一的大学生）带着通讯员贺彪，从黄花川踏上三分区的土地，重访劫后的河南大峪。第一站就是刘庄。河南大峪满目荒凉，非昨日可比。其中刘庄情况好点的也只剩了半截墙架子，多是人去房毁，片瓦无存。大多住户已被赶进蓝旗营、蘑菇峪、梓木林子等部落，剩下的只有5户人家。原来，在我们走后第三天，敌人就窜进了刘庄，宣布集家并村，否则逾期点火烧房。在敌人淫威之下，有的无奈进了部落，避避风头，但也常回来看看原住房屋，我们一班和四班的房东就这样来来去去；有的则边拆边观望，所以拆成了半截子，人还住在里面，三班的房东刘家，就是这样。他在我们到来后，不仅向我们倾诉了敌人扫荡给刘庄带来的种种灾难，还请求我们帮助他们父子寻找在跑敌情时已失踪近一个月的五、六岁小孙女。我们对他们一家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但也想到，当时大雪封山，天气寒冷，又有野狼为害，既已失踪这么长时间，恐怕难以找到了。但为了安慰老人，我们还是陪着他们到骆驼脖子（地名）和旱子岭（原名凿子岭）一带寻找，并委托各村干部群众帮助打听。以后，这一家长期坚持在“无人区”斗争，对我们分外亲切。两个月后，我又调往第八区，国会也于同年10月调往锦承路北，并牺牲在承平宁联合县境内。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我又路过刘庄，还看望了他们一家。提起三年前的往事，老人家对孙女的失踪还非常难

过，说起日军扫荡，切齿痛恨；对我们当时给予的一点关心，深怀感激之意；对国会等同志的牺牲表示无限惋惜和悼念之情。此时的刘庄和整个河南大峪，已是一片生机盎然，几经浩劫的幸存者大都迁回原地，家家户户在其旧址因陋就简地盖起了新房。同年夏，贯彻中央“五四”土改指示，高庄、张庄、刘庄、老房子四个村佃户又都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

报社的隐蔽房

由于黄花川、河南大峪、旱子岭一带的地理位置特殊的隐蔽，对《救国报》社来说，实为重要。自1942年秋季，报社就设在这里。在东面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第七区的王厂沟和西面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八区的柳树洼南沟，分别建立了印刷点，南距迁青平县关里第一区西水峪较近，所以这里的位置非常适中，对连结这两三处印刷点和沟通东西两个地分委的联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区域位置。因此，尽管房子已经烧了，报社还是要在这里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冀东基本区恢复以前。

1943年3至4月间，报社的凌云同志率吴振兴等同志到旱子岭找到我们说明来意，要在这一带找个隐蔽地点自己盖房，以适应工作的需要。我们几个人对报社在此进行建设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把他们领到了旱子岭西沟和北山骆驼脖子一带观察地形、寻找地基，最后选中骆驼脖子水泉沟一个南北向的小山沟，作为一个隐蔽点。吴振兴（迁西县下洪寨最老的党员，开辟地区的首批区干部）等两人自带工具粮食，就地取材，伐木砍枝搞基建，一个多月时间就盖起了五、六间小房，连当地群众也不知道，后来在群众中传说很多，也很神秘。时隔40年后的1983年10月，我在宽城遇到当年旱子岭老支书魏起顺同志的儿子（时任大队管委会主任），他还问起我

水泉沟的房地基的原因，我告诉他那里是冀东救国报社自建的隐蔽房，不是区政府机关。

访老师盼复课竟成永别

1943年4月，反扫荡之后，我们十分关心地委宣传部和《救国报》社在反扫荡中怎么样训练又何时开学。有一次听到吕光同志也在黄花川活动，在一次周旋时还是郁芬同志扶着他（身体弱）上山的。我们这些学员既为他们的健康担心，也对他们夫妇间诚挚的感情由衷地敬佩！过了不久，适逢我们从早子岭返回转角楼开会，听说吕光和报社其他同志都住在我们后山上的住户家，孟希同、卫民我们去看望了吕光、郁芬、顾宁、吴明等人。他们向我们问长问短，非常亲热，我们也询问了训练班何时复课，他们说还要等一等才能决定（不久听到传达，训练班不再复课，学员们就地分配）。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和吕光、郁芬、顾宁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见面，竟成永别！

缅怀先烈　学习先烈

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当年关心我们学习成长、亲自为我们授课的吕光、郁芬、顾宁同志在1944年，壮烈牺牲了。他们说到哪里做到哪里，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实现伟大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师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年关心报社和训练班的安全和生活并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张友德区长，也在1944年春牺牲了；敌伪闻之胆寒、急欲杀之而不可得的吴云清区长和区委书记石新同志竟都在“文革”中被害致死。

第十二区武装大队长雷保贤同志1943年牺牲；第三区姜瑞同志于1944年夏，遭日军突袭时牺牲；第二区的进步同志1944年春，牺

牲于迁西县下洪寨；博文、中宁（沙坡峪人）同志也是在这个时期牺牲；丰玉宁联合县的春林同志1945年2月牺牲于东水峪。

这些革命先烈，将永远值得我们敬仰怀念！将永远激励着下一代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两度黄花滦水兵

卫　民

1943年1月，我奉命到河南大峪刘庄参加地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这里见到高敬波、春林等20多名战友。春节刚过，因为日伪军进行“大扫荡”，训练班领导组织我们急速转移。当天，我们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的10多名学员便向西疏散。在大批日伪军的包围圈里艰难地回旋，隐蔽了20多天。日伪军撤走以后，我们绕了一大圈又回到黄花川一带。由于环境的关系，学员们都回到各县实习。我分配到第九、十区任武装特派员。初期我与第九、十区武装队长赵元泽一起活动，后来我又和搞群众工作的民生一起活动。

1943年春，日伪正在疯狂地搞大“集家并村”。我们区委、区政府仍然坚持在以黄花川为中心开展工作。一次，在转角楼（地名），中共区委书记夏鸿霖派我和民生去王杖子、大小十二岭一带走访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抗日。此时，黑河转山子以下的村庄和王杖子、大小十二岭、莱园子、孙杖子一带的群众都被迫集中到蘑菇峪部落（人圈），梓木林、宽甸也都建了部落。我和民生带着炒米隐蔽地来到大小十二岭，所到之处都是被日伪焚毁过的断壁残垣，一片洗劫后的荒凉、凄惨景象。夜里我们藏在大山上，等白天有老乡来这里种地，我们就和老乡们接触，了解部落里的情况，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晚上收工后，老乡们回部落，我俩就上五指山隐蔽。

农历的三月底，虽然阳坡上绽开了一片片的山桃花，可是每到晚上还是春寒乍冷。在野兽出没的高山上过夜是很艰苦的。但是不管如

何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们在认真思考怎样对付日伪毒辣的“集家并村”的阴谋。几天后，炒米吃完了，我们就回来了。走到广东山上见到有区小队站岗，便与区长吴云清见面。这一夜，我们就住在广东山上。山上还有少数几户人家，有一户叫赵永的老乡住在接近黄花川的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晨，突然岗哨报告敌人从二道岭子奔来了。此时，我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广东山往北走，经西北向撂荒地，上月牙山；一条是从广东山往东走，奔黄花川。我们迅速商量后，便决定从广东山往北走。刚走出不远，撂荒地的东山上便响起枪声，日伪军向我们扫射。吴云清区长和他的通讯员刘殿阁，还有区小队10多名战士一边回击一边撤到沟下，转向黄花川。我们都从广东山东山下去，敌人从撂荒地冲下来上了广东山东山，用数挺机枪的火力封锁我们，我们被打散了。我攀到一个山洞上边，隐蔽在一个小石胡缝缝里，做了决死拼斗的准备。临到中午，日伪军吹集合号撤走了。我从石胡缝出来，正碰着老乡赵永，互相介绍了情况，我下去奔黄花川。下午，我找到吴区长和区小队，吴云清负伤，右耳流血，缺少民生和两名战士。

我们又返回去，寻找民生和区小队两名战士。一直寻找到广东山的东山边上，发现区小队的两名战士已经牺牲。残忍的日军竟将两名战士的心脏都剜去了！血色的夕阳已经压山了，还是找不到民生。第二天，蘑菇峪部落里出来人，我们去打听还是没有结果。后来，老乡终于发现民生牺牲在月牙山的山坡上。民生是迁西县龙井关北峪人，姓董，18岁，刚参加工作几个月便与世长辞。

嗣后，吴云清区长总结了这次被日伪军包围的教训。原来，头一天夜里，吴区长率领区小队曾袭扰蘑菇峪据点，痛击了敌人。但是撤退以后，没有发觉狡猾的敌人暗暗地跟了上来。特别是夜间在广东山上的荧荧夜火，又被日军发现。一股日军潜伏在撂荒地东山上，一股

日军潜伏在二道岭子上。天亮时，一小部日伪军故意造成我们的错觉，妄图一网全歼。我们虽然顽强突围，但由于失误，使3人不幸牺牲。吴云清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作战机智勇敢，以后又屡挫顽敌。他是迁西县南团汀人，30多岁，身材很高，在这一带是出名的。

以后，我们还是到各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进部落，克服困难，坚持山地斗争。虽然日伪军不断地进山“扫荡”，但许多人仍在深山上坚持抗日。广东山、转角楼、大台子、雷家沟及横河川、臭水湖、三道石湖，孙杖子的小南沟、杨树沟、北山等山地群众至死不下山进部落，孙福来就住在大梁顶上一直不进部落，还有九区村干部中马喜庆、马喜俊等共有百十多户人家，这些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有着深厚的鱼水情，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也是舍身忘己。

农历四月的一天，我与赵元泽住在雷家沟老雷家。天还没亮，雷家媳妇出去抱柴禾烧火，发现山上影影绰绰有敌人。雷家媳妇火速进屋，急拍我们的腿叫：“快快快！”我们一跃起来，辨清去路就往外跑。一片枪声，子弹呼啸，我们边卧倒边迅跑，终于脱险。可是雷家的几位乡亲被伪军抓进蘑菇峪部落！

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生活是极其艰苦。我们组织人力去关里往回背食盐、救济衣等等，千方百计地安排群众生活。工作虽然艰难，但并不孤立，关里关外能够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许多领导人员仍然冒着战火来帮助我们。此时此刻，我见到县委书记宋诚、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焕然、县公安科长钟克、县民政科长白雪枫等。这些人刚到来，分外增添力量。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反对日伪的“集家并村”。斗争虽然异常残酷，由于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群众的情绪仍然很高涨。夏季的一天，有几个小伙子琢磨怎样才能武装起来？他们便有意识地来到半年前冀东军分区部队歼灭田中讨伐队150余人的滦河里的战场

洗澡。雨季的滦河水深浪高，可是小伙子们都精通水性，果然从细沙旋的河底捞上一支“三八”步枪，膛里还压着3粒子弹。子弹被水泡的有些发红，擦了擦，还都打响了。

1943年秋，我奉命去行署公安局举办的公安干部训练班学习，地址在迁西县东水峪。这一期20多名学员，其中有迁遵兴联合县的学员7名，学习两个多月。结业后，组织上分配我们回迁遵兴联合县九区任公安助理。我回来时组织上让我带给迁遵兴联合县政府很多的公款，路过迁西韦庄时正赶上日伪“大扫荡”。我把公款埋在羊圈底下，在村外边住的。晚上来到何家口，见到迁遵兴联合县的二区区长王化武，我们在一个叫狼窝的山洞里住一夜，第二天沿着潘家口北山绕了20多里。王化武护送我返回大东峪，奔黄花川到黑河大石梯子（地名）县公安科驻地。几天以后，钟克东科长让我把公款取回来交给党组织，分配我去遵化城东北第三区任公安助理。这个区所辖范围以黄花川的转角楼至臭水湖一带为中心，区委书记余光，区长丁冲。

1945年春，我调回承（德）兴（隆）联合县第三区（即原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十区）任区长，区委书记孟希同。

承兴联合县办事处主任王佐民交代我的任务是，首先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此时，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虽然比1943年少了，但是转角楼、臭水湖、三道石湖等地仍然有群众坚持。孙福来还在三道石湖，马喜俊等10多户还在臭水湖。我们给群众筹备种子，春耕播种时组织人站岗放哨，争取多种一些。第二个任务是给部队准备粮食。五、六月间，赵文晋率领部队约一个营来到河南大峪的上游。每一个战士都带一块雨布，把雨布的四角连在树干上，底下铺上树条子，战士们就在树条子上过夜睡觉。我们组织群众把坚壁在孙杖子、转角楼的玉米给部队送去十几麻袋。可惜，许多的玉米已经发霉了。我们只好给部队再筹措粮食，把已经发霉的玉米分给群众和区干部、区小队

用。部队撤走后，佐民指示我再给部队准备粮食，买小米，越快越好。过一段时间，佐民给我来一封信，让去找大彭杖子的岳珠环联系买粮食。老岳家与关家庄有亲戚，关家庄是亲我们的“两面”政权。

8月，我和公安助理张忠正，来到河东椴树洼。椴树洼距大彭杖子十几里，我们派人去大彭杖子送信，邀岳珠环出来会面。岳珠环果然按照接头地点来了。他带着我们的信件为证，谈了一下午。谈妥买5石多小米（每石650市斤），并约定了交粮的时间、地点。几天后，他派人送封信，说大彭杖子的日伪军慌乱地都走了，车辆等物品没带走，情况有变。我们不知底细，回信约他出来到指定地点再次会面。到指定时间果然来了五六人，多穿着长袍，都带着手枪。除岳珠环外，还有大彭杖子伪协和会会长、第五宪兵团的特务等，他们领着我们进了大彭杖子与椴树洼之间的那个部落。岳说八家警察分驻所的警察还没走呢，有百八十人，所长是东北人，别让他们把枪带走了，咱们应当去。我让岳给他们打电话，岳立即在部落里给那个伪警察分驻所朱所长打个电话，对方答应出来在约定地点和我们见面。

傍晚，我和张忠正助理，还有岳珠环一起会见朱所长。为防止意外，我把身上的文件交给张助理，让张组织民兵黑夜到这个部落。夜里，朱所长来到距八家二三里远的路边与我们接头。岳介绍以后，我动员朱抗日，朱同意，让他回去立即集合警察，一律不准带枪。我们一起进了八家伪警察分驻所，朱对集合完毕的警察们说：“国兵奔承德去了，咱们怎么办？大家怎么想的？现在请咱们八路军区长讲话。”这时南门炮楼突然砰地响了一枪！朱问：“怎么啦？”“走火了。”“下来！”朱把那个警察的枪下了。我主要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他们的出路，愿意参加八路军的一起干，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朱对警察们说：“你们准备去吧，注意，谁敢动枪，我就枪毙谁！”到天亮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警察分驻所的90多支步枪和一部电话机送到大彭杖子，朱

也跟着我们来到大彭杖子。我与张助理商量怎样尽快地组织个游击队，此时，区委书记孟希同还在北部，仍然联系不上。我们在大彭杖子住两宿，北边的柳河口不时地响着枪声。张助理带着十几名民兵在村口布岗，岳珠环让我去柳河口收缴伪警察署的枪支。

第二天，我拿着岳珠环的一封信，坐船过了滦河，进柳河口，找到伪警察署长，让伪署长把伪所长、村长们找来开会。会上，我讲了形势和他们的前途。伪警察们都没有说话。我约伪村长罗振之到村外，进一步了解内情。罗振之说："这些警察靠不住，都是东北人，都得逃跑。区长先到我家去吧。"我们趟过柳河，迎面来了几个陌生人，其中还有穿军装的伪军。一问，他们说是从关里来的，是缴了枪放回家的。他们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朱总司令发出的七道命令。朱总司令的命令有极大的威力。次日，我拿着朱总司令的命令又进了柳河口找到伪署长。这时，有几名警察带着家属已于夜间跑了。我在会上宣布了朱总司令的命令，接着说明谁想偷着跑是跑不了的。此时警察答应缴枪。第二天，我和罗振之商量，把车河口的群众组织起来，用伪警察署的枪支武装车河口的群众。这时，孟希同、张希川也来到车河口，我们一起在柳河口接收约有500多支枪。我在车河口呆几天，才知道此时日军已无条件投降了。

从黑河到车河、柳河的搏斗

李　清

革命的火种

我的故乡成功村，位于雾灵山东南约50公里、五指山西20公里、五凤楼南脚下的黑河上尖。是个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10公里的深山村。

1938年6、7月，八路军宋邓纵队来到这一带。我第一次看到八路军，战士对老百姓和蔼可亲，非常亲热。他们吃的都是小米杂粮、素菜清汤，衣着十分俭朴。入村重俗，不吃群众的东西，不占群众的便宜，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群众都爱戴他们。每当他们出发时，部队首长都亲自到各户询问有无丢失和损坏的东西，以便赔补。住在我家的一名12岁的小战士赤着脚，想从我家买双旧鞋用，可是领导发现后立即被阻拦。我看到这支军队这样好，又听到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感到中国有出路，人民有了救星。共产党、八路军这个名字从此埋在我的心里。此时，我多么向往参军，去抗日救国呀！

9月以后，宋邓纵队奉命转移，赖邦率游击队继续在这一带开辟游击区。

第一次集家并村

1939年9月，日伪当局为了防止抗日游击区的发展，开始集家并村，是通过当地伪甲长、牌长进行的，把我们村分散居住30多处

的几十户深山人家集中到小梁东，还美其名曰“安乐村”。横河、车河、柳河、柴河、白河的深山区都搞了这样的集家并村。

1940年4月，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给我们这一带派来一个由李玉、高俊峰等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在伪村政权内秘密发展抗日干部。武工队经常深入到部落里进行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青年壮年回原地进行春耕生产，只留一些老小残弱暂住集家村里，以搪塞日伪耳目。抗日工作也是通过伪村政权活动，即是把敌伪村政权建成“两面政权”。

开展游击区工作

武工队在成功村一带，开始是公开地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冬以后，便秘密地对一些贫苦的基本群众进行阶级教育，讲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一米三谷”等高利贷，激发贫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并从贫苦群众中物色抗日工作干部，在大村派联络员，在小村派办事员、武装班长。办事员负责行政工作，武装班长负责岗哨、送信、转运物品、带路等勤务工作。1940年冬至1941年，建立了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包括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各救国会都设正副主任、委员5至7人，儿童团有正副团长。除普遍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外，还配合行政工作。到1941年下半年，被集家的大部分户都已回到原住处去生产度日。日军来察看时，甲牌长就立刻通知各山沟来一部分人应酬，日军走了再回去。抗日干部和一些青壮年往往躲开，有甲牌长以及由抗日政权组织起来的维持会负责人应付。

建立根据地

1941年秋冬，冀东地委长城工作团和主力部队开进兴隆，迁

(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委和县政府设在成功村梁南的马架沟一带。黑河川建立了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区区委和区政府，并派来许多县、区干部，工作力量大大加强。到1942年春，距日伪据点较远的深山区都成为亲抗日的两面政权，只有距敌据点较近的少一部分集家村是亲敌的两面政权。在深山区，开展了文化教育工作。在青年中建立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妇女剪发、放足等等。在黑河、横河上游和黄花川、车河、柳河等广大深山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抗日救国会发动青壮年参军参战，加入民兵组织，建立村头、山头岗哨和转送文件、物品的通讯联络站。同时发动各个群众组织拥军优属，给军烈属代耕，妇女做军鞋、军袜，拆洗缝补军衣等，群众抗日的劲头越来越大。为此，日伪不敢轻易进山活动，也感到深山里的部落巩固不住，便集中兵力进山搜捕烧杀。

1941年10月的一天，从东边进来一股日伪军把成功村小梁东河南的房子给烧着了。青壮年都躲了，村里只剩一位老人李玉朴大伯。李大伯不顾一切地灭火，日军就把他推进大火里。日军走后，乡亲们回来赶紧把李大伯从火堆里抢出来，但是李大伯早已被活活烧死。群众切齿痛恨，决心为李大伯报仇。

1942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初六)，一部分日伪军来到黑河见草沟村。有3名特务让伪甲长周旺带领来到成功村小梁东，他们对维持会的负责人说："满洲军在见草沟发放组合食盐呢，让大家快去领吧。"我们发现敌人在搞鬼，就暗中告诉群众不要去，千万不要上当。结果特务在成功村只抓去三个村干部和两名群众，在赵大地又把九区助理员贺波抓去。敌人回到车河堡，只放回两名群众，其他干部都在监狱里惨遭杀害。

1942年春季，中共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迁遵兴联合县第八、九、十、十一区以后，成功一带根据地的建设工

作跨入黄金时代。成功村是黑河根据地的西大门，保卫领导机关任务繁重。于是在区抗联会和区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建设民兵组织和情报网组织，使成功村与东、南、西、北四面的各村都建立起情报点，构成情报网。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日伪军一有动静，情报很快传到成功村，成功村再速传到后防机关和部队。许多部队、游击队战后都到成功一带根据地休整，各村便组织慰问，召开庆功会、军民联欢会，唱歌扭秧歌等，抗日热情非常高涨。

1942年夏季，成功一带与日伪彻底决裂，再也不给日伪交粮、交款和出勤务工。维持会取消了，伪甲牌长组织也逐步消失。各村抗日干部迅速增强，村（地）名、干部名都起了化名。成功村就是这时起的化名，一直延续下来。我们这批村干部化名为虎山、虎林、虎地、虎春、虎平、虎明、虎义等等。为什么叫了一大群虎？原意是日兵是东洋人，是羊（洋），虎能吃羊（洋）。6月一天，高俊峰游击队从柳河川回成功村休整，当地村干部和群众不仅杀猪宰羊，而且30多名妇救会会员一齐动手，仅用一天多的时间，便把100多名战士的衣帽鞋袜拆洗缝补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见草沟惨案

1942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一日），车河堡据点的日伪军200多人过桥木梁，到黑河的南沟子，晚上又返回车河堡。后半夜，这股敌人又从车河堡出发，经三十二盘梁，从成功村北沟向东面天明村的见草沟急奔。到见草沟小梁西大甸子下坎，抓住一名由见草沟向成功村送信的民兵——周三喜，暴露了见草沟区干部情况。敌人马上兵分两路包围见草沟。在敌人到达见草沟以前，正在这里开会的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区程新民区长已接到成功村和本村岗哨的两次敌情口信。程新民区长总认为是八路军何子桥连队从北边回来，等最后见草沟岗哨

又喊敌人快进村啦！这时村子已被包围，敌人向他们开枪。区村干部根据地形向南突围，南面的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村口。程区长手握三号盒子枪边打边冲，经一阵激战，但没有冲出去，有几名干部牺牲。程区长冲到陡崖跳潭，在潭水中牺牲。程区长的尸体被敌人捞上来，手中还紧握着手枪。这次牺牲在村头的还有第九区抗联会干部石巩、通讯员张士洪、贺鹏飞，交通员范有财，村办事员周昌，群众周贵、周田、周春义、张富等10人。另外，被捕的还有送信民兵周三喜、一名新参加游击队的战士、甲长周旺（程区长等住在他家），被日伪带到黑河下游的三道梁子西河套均被杀害。惨案发生后，第九区的干部、群众非常悲痛。日伪军撤走后，成功和见草沟村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向烈士们进行了哀悼，干部、群众纷纷来到见草沟，悲愤地埋葬了牺牲的烈士。大家还讨论总结了这次惨案的深刻教训。从此，黑河川上游彻底取消了伪甲牌长设置，完全变成抗日一面政权。

日军的“三光”政策

1942年秋，日伪对黑河川根据地开始推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年9月23日（农历八月十四日）下午，驻扎在车河堡讨伐队300多人隐蔽地绕到成功村二道沟，将正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宋常春抓住，强迫给其带路。宋常春看后边的日伪军离得比较远，转过山弯，突然返身抓住日伪兵的步枪，和敌人扭打起来。宋常春怕后边敌人赶上，把枪抛掉寻路跑脱。敌人行进一程，又抓住放哨的民兵傅万增，仍强迫给其带路。傅万增看到敌人沿途烧房子，割庄稼心如火燎，突然站住说：“我的鞋不太跟脚”。随后就将鞋脱下来拿在手里，赤脚行走。当走到二道沟白家时，看看前后只有一个伪兵紧跟着，便冷不防地用鞋底向敌兵脸上砸去，伪兵被砸蒙。傅万增又抓起一把土，扬在伪兵脸上，然后一气跑进村里报告。这次由于傅

万增的机智送信，讨伐队没抓住一个人，仍把二道沟和贾家台、小梁东一带的庄稼割了，烧了几处房子，当晚露宿在贾家台。

这天下午，成功村干部正在南燕窑台开会，得知敌情后，立刻安排群众转移和隐蔽物资，几名主要干部和部分民兵急商对策。天黑后，干部和民兵摸到贾家台山崖上，每人都悄悄准备一堆堆大石头。半夜时，民兵队长虎地命令“开始!”虎春首先向敌宿营地投出唯一的一颗手榴弹。随着爆炸声，大家一齐向敌宿营地滚放大石头。一边放，一边大喊：“冲呀！冲啊!”滚石隆隆，火星飞溅，势如山崩。顿时伪军的一堆堆篝火灭了，夜幕中一群群伪军慌慌乱乱地退向东山，天亮时撤走。村干部和民兵到敌宿营地找到5颗手榴弹、20发子弹、10多把镰刀和其他零散东西。这是成功村民兵第一次徒手对敌战斗的胜利。从此民兵的胆子更大了，勇气更足了。开始在山上挖山洞，建密室，把6处的单人岗哨改成松树哨。进一步组织骨干民兵和地雷爆炸组。

第一颗地雷的爆炸

1942年秋，日军已把黑河上游、横河上游、黄花川、车河、柳河深山区划为“无人区”。11月中旬，车河堡的日伪讨伐队300多人又窜入成功村进行“大扫荡”。夜间，伪军又宿在贾家台。成功村干部和骨干民兵观察敌人的动向，分析第二天敌人东去的可能性较大，估计有三条去路。此时，全村的民兵只有两、三支步枪，子弹很少，铁皮地雷一个也没有，只有几管硝安炸药。村干部和民兵就用仅有的炸药做一个软包地雷，决定用碎石埋上。地雷一旦爆炸，就可把石块炸得乱飞，起到弹片的作用。天刚亮，由虎地带民兵掩护，虎春等3人到敌人必经之路三岔路口上的二道沟埋设地雷。为不被敌人发现，把地雷的拉火线用玉米秸穿起来横在路中间，把线头搭在路边。民兵

们隐蔽观察，果然敌人来了。这第一颗地雷很快就在敌群中爆炸，当场炸死炸伤特务胡焕章等十余人。伪军带着残兵撤回去。这一次爆炸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兵的斗志和群众的信心。上级对爆炸工作给予肯定和重视。从此，成功村民兵就正式组成了地雷爆炸组。

两次飞行爆炸

日伪军挨炸以后更狡猾了。再来扫荡，都有工兵在前用长杆子和探雷器搜索，或者绕道不走正路。我们看到预埋待炸的办法不太适应了，加之炸了野兽浪费了地雷，还对群众及游击部队、工作人员来往也很不方便。便发动民兵想新办法，组成一个飞行爆炸组。

1943年春季，敌人又一次大扫荡。白天搜了一天，夜间有一股日伪军300多人在南燕子窑台宿营。民兵们彻夜监视，第二天清晨见敌人出发奔向南窑东沟。便由虎地、王同等民兵在山上掩护，由虎春等三人飞跑下山，到南窑东沟路边一个拐弯处，快速安放好一个1.5公斤重的铁皮踏火地雷，并用乱石掩盖伪装。不久，“轰”地一声巨响，敌人又抬着十几名被炸伤的官兵匆匆回去。以后，敌人再来扫荡时便采取围山放火的手段，一是妄图烧死困死藏在山上的抗日军民；二是想用山火烧断地雷的导火线，使地雷被烧后自行爆炸。此时，民兵们又想出新对策。上次敌人被炸的几天后，车河堡和高杖子的日伪军500多人，在一天夜里突然包围了成功村二道岔子一带。特别是以虎山、虎林、虎平的居住地二道岔子沟里，进行更严密地包围。天亮开始烧房烧山，搜查。狡猾的敌人偏坡巡行，避开民兵伏雷圈。可是，村干部、民兵多处隐藏，也避开敌人的烧山圈。东梁暗处的飞行爆炸组、虎平等人急来应援。趁机快速穿插把一颗铁皮地雷埋在敌人必须经过的一个乱石滩里。敌人在纵火区搜完，恰恰来到埋雷的石滩处集合。突然，地雷爆炸了，一个指挥官被炸死，23名伪军丧命，

大队敌人狼狈退去。民兵缴获一具望远镜和其他一些物品。此后，不管哪股日伪军来成功村扫荡，都大伤脑筋。

保粮突围战

1943年春，敌人开始更大规模的集家并村，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围攻。迁遵兴联合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到黑河上游，成功村要保存很多公粮。3月，车河堡、高杖子的400余日伪军，突然夜间摸进成功村二道沟，四面包围了二道岔子。民兵岗哨迅速报告了敌情。可是，这天夜里刚好有从外村运来的1000多公斤公粮（小米）存在二道岔子，还未来得及隐藏。有百余名男女老少、运粮群众、民兵都被围在这条沟里。情况十分危急。村干部命令大家听从指挥，不要慌。立即派虎平带两名民兵去守住进沟的路口；派张富去南山梁以虚张声势的办法截击敌人；派妇女主任葛秀荣、周秀芝带领妇女群众，分两路奔梁南角和东北角突围；派王同等干部带民兵掩护运粮群众把粮食迅速分散掩藏，绝不能让敌人抢走公粮。正在大家掩藏粮食的时候，伪军已经进到沟口。虎平突然厉声断喝："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伪军反问："你们是哪部分的？"虎平机智地回答："我们是十三团的！"敌人立即停止前进，散开准备战斗。正在南梁上的张富等民兵已经抢在敌人的前头。月光朦胧，听到北坡有动静，张富故意以命令的口气喊："一排长！怎么还不打呀？敌人爬北坡啦！"守护沟门的民兵会意立即开枪向敌人射击。敌人也还枪试探。民兵以此延搁敌人进沟时间。沟里的群众迅速把公粮分散坚壁好，就由民兵队长虎地指挥将群众分成两路，群众在前、民兵殿后，掩护向东南角突围。霎时四面枪声，激烈的响作一团。弄得敌人也分不清哪是敌我，也弄不清我们有多少部队。天亮后，沟里已不见人影。敌人折腾了一夜，除烧了几间草房，其他一无所得，悻悻而去。

加强组织建设

在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的关怀下（程新民区长牺牲后，黑河上游划归第八区），到1943年4月，解放村已经发展了3名共产党员并正式建立了党支部。到8月，党员发展到7人，以后又发展到13人。正式建立解放村村政委员会。设村长、副村长、武装委员、财粮委员、保卫委员、民政委员、文教委员等职；民兵组织有中队长、武装民兵游击队长；群众组织有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各设正副主任委员3至5人。儿童团有正副团长。并且上半年还进行了减租减息。不管敌人怎样大扫荡，全村群众总保持在300人以上。在生死搏斗中，成功村的抗日星火越燃越旺。

敌人的阴谋

日伪军的多次“扫荡”总达不到目的，便派出特务到处悬赏：如果有人抓住虎山和虎林（即高凤林），捉住活的奖给伪满洲币1万元，拿来人头奖5000元；如果虎山、虎林自来投案，可保全家安全幸福，本人可以升官……。然而，成功村人民不仅毫不动摇，反而向日伪内部展开工作，向部落里渗透关系，不断地从敌方传出许多情报。村干部和民兵配合区政府多次完成部落征粮、征鞋袜、锄奸、袭扰敌据点等任务。

缴枪变征粮

1943年10月，我们得到情报：敌人发给横河黄土梁子部落伪自卫团25支步枪。民兵们搞枪心切，村干部商量决定夜间去缴这些步枪。便选拔17名精干的民兵穿着伪军装，带着大枪、手榴弹、大刀，

夜间出发几十里，来到黄土梁部落外面，由手持大刀、手榴弹的民兵看住部落的南北两个大门和东西两个水沟，严密封锁消息（因为南方2公里以外有北台、砬根、双庙据点；北面1.5公里便是万人求（地名，伪军连部）。然后由虎地、王永芝等三民兵，从没有岗哨的南大门攀登进去，打开门锁，开了南门，持枪民兵摸进部落。虎地、王永芝等3人，首先闯进伪自卫团长李振鳌的家，叫他立刻集合带枪的团员出发。李说白天上边把枪又全调走了。经核实，枪确实调走。我们便把伪甲长王重找来，叫他派了驮子、口袋和驮夫，从甲长家秤出1100公斤粮食，给他开了收条。我们押着驮子撤出部落后，便告知甲长：我们不是双庙警察署的，是八路军。因为你们部落不缴纳公粮、公款、公鞋、公袜，你甲长先跟着我们走一趟吧。我们躲过敌据点，顺利返回。连夜放回驮夫，坚壁了粮食。第二天把伪甲长送到区政府，经进行教育后放回。此后，这名甲长果然暗中送来一部分鞋袜和现款。

青年英雄——虎春

虎春，真名傅春，18岁。194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选为党支部组织委员，是成功村青年救国会主任、飞行爆炸组骨干。他出身贫苦，对敌斗争勇敢；他阶级觉悟高，爱国心特别强，工作积极，遵守纪律，埋地雷、送鸡毛信等都是勇挑重担，出色地完成任务。1943年5月上旬，日伪军包围二道岔子东山。东山石崖下建有密洞，经常藏人藏物。还有20多名乡亲被围困在包围圈内，情况非常危急。虎春告诉身旁的乡亲在洞内隐蔽好不要动。他挺身而出，从柴林里钻到二道岔子东北山梁上，迎着围剿的伪军时隐时现地向梁东跑去。敌人一看目标很近，一直向他急追。他仍然时隐时现，若即若离，引得敌人穷追不舍。当把敌人引到离群众隐蔽地和密洞很远的

地方时，他就飞快地跑过东梁钻入树林跳下石崖隐蔽起来。敌人找了一阵再也见不到踪影只好过去。二道岔子里的20多名群众得到时间转移，密洞也保住。几天后，又来300多伪军从头道岔子东梁由南向北搜索。虎春等民兵看出敌人的动向是从这里往北过梁，向梁北西大山村大南沟围剿过去。那条沟里藏着周、宋、李几户40多名群众。眼看要遭毒手，时刻紧迫。虎春向同伴说了声我去送信，便从树林里向北急跑，绕到敌人前边的北梁上。回头一看，敌人离自己已经不远，再下山送信来不及了。便急忙从梁顶钻向北坡，向山下抛出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梁下的群众听到南坡上手榴弹爆炸声知道有了敌情，40多名群众迅速转移。敌人只在大南沟里烧毁几间空土棚。之后，大南沟群众知道是成功村虎春冒生命危险给送的信，感激万分。

1944年3月上旬，周围各据点的日伪军联合起来，集中几千名日伪军向五指山根据地进行为期两周的疯狂大扫荡。3月18日，由横河川万人求窜进一股敌人，在成功村小梁东搜索后，吃完午饭东去。下午，成功村一组民兵从五凤楼山下来回村侦察，发现村干部掩埋的粮食已被敌人挖出来，但尚未运走；发现北山岗哨无人，怕群众回来受损失。他们当即决定，由虎地、虎春、傅英三人留在北山放哨，准备天黑后，回村把粮食再掩埋好。太阳落山后，村中仍然没有动静，虎春等商议由傅英去东梁放哨，监视那股东去未回的敌人，虎地、虎春进村掩埋粮食。他俩从小梁东过河登上东北山坡时，突然有几百敌人从东而来。傅英未发现敌人。敌人却发现虎地、虎春。敌人立即散开，分东西中三路追击。又在河南东坝坎架起机枪向两民兵扫射。虎地、虎春无法从山上走脱，便顺着小山凹向上猛跑。虎春边跑边藏埋党员课本和文件。当他俩跑出300多米时，虎地左腿连中三弹倒下。虎春又跑出十几米，从坡上就近追来的东西两路敌人已经逼在眼前，虎春已陷入包围之中。虎春一看已经无法逃脱，便把一颗日本

擦火手榴弹擦着放在腹前。敌人扑过来抓住他时，手榴弹爆炸。虎春胸腹开花，壮烈牺牲，抓捕他的敌人也被炸死。随后围来的敌人向虎地、虎春头部打了两枪。敌人走后，当夜村干部便下山寻找他们，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两名烈士的遗体以及虎春掩埋的党员课本和文件。民兵和乡亲们得知虎春、虎地牺牲的消息后，泣不成声。区委书记张克和区委宣传委员程文立即来到成功村，在三道南沟为两烈士召开了群众追悼大会。张克书记总结了两位英雄的事迹，号召群众向英雄学习，为死难者报仇!

柳树洼夜扰战

虎春、虎地牺牲后，民兵们对敌人恨得咬牙切齿，进一步研究对策打击敌人。半个月后，又有一股伪军 400 余人来扫荡。夜宿柳树洼，烧起一堆堆篝火。村干部和民兵将情况侦察清后，民兵们摸到敌宿营地对面坟东沟南梁上。午夜，十多名带枪的民兵分工，每两支枪射击一堆围着篝火取暖的敌人。一声令下，一齐向敌群猛射，立刻把一堆堆篝火打炸了。敌打我停，敌停我打。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持续近两小时，天亮撤走。敌人被民兵打伤伪军 9 名，拾获子弹千余发、手榴弹 21 个。大大地补充了民兵的弹药。

对伪军的攻心战

一次，驻车河川高杖子的伪军一个营进入成功村扫荡。巧遇区委程文在成功村。在程文的启发下，村干部决定打一次政治攻心战。夜间，村干部和民兵在山上对着敌人宿营地喊话，讲了二三十分钟。特别提到他们都是东北人，你们的妻子儿女都当了亡国奴，你们来到这里杀害中国的同胞手足真忍心吗？……。

第二天，这股伪满军撤回去，路过之处果然没有烧杀抢掠。几天

后，这股伪满军又来了。一名伪军官在山梁东坡对着二岔子也喊了几句话，说："同胞们，老乡们！我们是奉命来这里扫荡的，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干，不过没有办法……"太阳快落山时，一股敌人在柳树林里搜出十多名群众。日本军官命令张翻译把被捕的群众统统杀掉。这名翻译把十多名群众带到沟底一片乱石丛中，然后架上机枪。张翻译向乡亲说："同胞们，你们都趴在河沟大石头根下，我们对空打一阵枪，回去就说把你们都杀了。我们走后，你们赶紧离开这里，这里目标太大了。你们见到虎山他们替我说一下，如果一旦有那么一天时，请他们关照关照。"张翻译说完就命令机枪手对空射击一阵子，就回去了。被抓捕的十多名群众毛发未损，安全地转移了。事实证明我党争取多数、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在伪满洲军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一次惨案

1944年2月11日（农历腊月廿六），夜里下了一场大雪。一天早，驻车河堡的朱胜讨伐队、驻三岔口的李国讨伐队计500余人，包围了成功村姜家西沟和北沟。他们顺着雪上脚印跟踪抓捕了40余名群众。敌人押着被捕的群众从北沟返回途中，惨无人道的日兵剥光群众的衣服，走一段便杀死几人，有的被剜心挖眼；有的被剜去生殖器。5公里的雪路上，惨遭杀害的有姜海恩、李存隆、赵凤阳等群众31人。李存隆妻怀着孕，还抱着一个3岁女孩，不仅母女均被杀死，孕妇的胎衣都被剥出，场面令人发指。贾成富被日军的军犬一口一口地活活咬死。被捕的乡亲，除几名青年妇女被带到据点，只有两名男青年死里逃生。一名叫姜贵，敌人向他要枪，他说枪在洞里，敌人叫他钻进洞里去取，姜贵钻洞后就在洞里隐蔽起来。敌人向洞里打枪、扔手榴弹，又将洞口堆上柴草烧着后才撤走。天黑后，姜贵才从洞里出来，获得重生。另一名叫张景春，被带到三十二盘梁上。日兵把他

衣服脱光，手持刺刀恶狠狠地把他向石砬沿猛地一推，准备随后一刀刺死。不料张景春就势从陡坡上滚了下来，敌人打了一阵枪也未打中。张景春赤身裸体地从满山大雪中逃生。

夜炸炮楼

1944年2月，日军集中数千名日伪军向迁遵兴联合县五指山根据地围攻。为保存根据地实力，迷惑敌人，县、区领导动员各村民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敌人以为“无人区”真的无人了。然而，“五一”后，根据地的群众又返回本区本村，更策略地与敌人展开不懈的斗争。6月，上级发给成功村民兵一个7公斤重的大地雷。经党支部和爆炸组研究决定，用它炸毁卡在车河通往柳河交通要路上的车河粱炮楼。一个夜里，下着毛毛雨，成功村的十几名民兵带着大地雷出村几十里，一直摸到车河粱炮楼根下。突然，敌人养的一只狗叫起来。率队去的村长、中共党员赵文宽将一块干粮扔过去，狗不叫了。伪巡逻兵又出来察看，伪兵的脚几乎踏着赵文宽的身了，但是未发现什么，转身把狗骂了一顿。又过了一会儿，趁深夜下雨，由两个民兵把赵文宽托上炮楼。赵文宽将大地雷塞进炮楼的枪眼里，用胳膊推进去，又用刺刀顶着往里送。但因炮楼墙体太厚，地雷仍然没落进炮楼里去。此时，再想别的办法已来不及了，只好堵在枪眼内。赵文宽悄悄下来，离开炮楼3米就把地雷拉火线拉断了。霎时，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炮楼塌下一大块，没有炸倒，又扔上几颗手榴弹也无济于事。但是敌人被炸蒙了，民兵们迅速撤回。撤到五凤楼山顶时，才听到敌人的乱枪声。从此，炮楼里的敌人每夜都是提心吊胆。以后又通过内线关系向他们做工作，时隔不久，炮楼里跑出半个班6个人，带着6支步枪、300多发子弹、16颗手榴弹，投奔向根据地。在成功村休息两天，又把他们送到区政府，成为了小队战士。

三人小组出击

成功村民兵接到车河川西大山村群众报告：车河堡警察及伪自卫团员经常来西大山骚扰群众，抓捕隐藏在山里种地的农民，搜抢粮食物品等等。1944 年 8 月，村干部经过研究，派出一个三人游击小组去寻机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第二天，车河堡警察和自卫团果然来了 100 多人到小南沟、大西沟、蔺家台搜山，抓人，抢东西。过午，伪警察等在村头平台上集合休息，审问、拷打抓来的群众。三民兵从青纱帐里摸到敌人身后不远的小山包上，用两支步枪突然地向敌群射击。敌原以为这地方历来无事，猝然遭击，不知来了多少八路军，便象蜂窝似的崩散，纷纷从河沟里逃命。三民兵一看敌人如此狼狈，便立即公开充作部队大声命令："一班向左出击！二班从右边包抄！"两个民兵从东西两面追击，一人在中间掩护，三人同时喊起"捉活的呀！……""缴枪不杀！……"。伪警察四处逃窜，而充作两班战士的民兵紧追不舍。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 20 余人，活捉 1 人，缴获步枪 1 支、子弹 30 发；救出群众 7 人，缴获毛驴 3 头。

特殊任务

1944 年初秋，承（德）兴（隆）联合县第二区委书记张克找我谈话："虎山，区委决定给你一个特殊任务，叫你去柳河开辟工作。那个地区已全部被敌人摧垮，区委书记郭羽牺牲了，其他干部也都调走了，只剩个别村干部没入部落，跑在外面……。你考虑一下怎么样?"我问什么时候去？怎么去法？张克书记说："现在就去。前梆子沟有一名党员干部现在这里，你跟着他去。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谈完话后，当晚上我就与刚玉（原名毕德印）从中原（今马架沟）村出发。

第二天我俩从成功村过五凤楼山西大安时，天已快黑。天黑以后，我们从山间小路来到公路旁（是车河梁炮楼通向下台子、鹰手营子的主要公路）。观察一会儿，我们跑过公路再奔前梆子沟，到刚玉家的原来老房场处。可巧，这夜有董家夫妇俩白天出来做活，未回部落。我们在这里吃点饭，对董家夫妻作了些慰问鼓励工作。住了一天，我们过山到三道河子小北沟胡家沟找到张进力老大娘和张大伯等人。经刚玉介绍，我们亲热地交谈起来。这里离下台子、朝梁子部落据点，有十多里路程，她们的户口明在部落，只要敌人稍一放松，就暗地来到老房场种地，偷着住下过夜。大娘大伯向我诉说郭羽牺牲和掩埋的经过。老人们说："这边也没人管我们了，只好明着入部落，实际我们的心一点也没离开山地，时刻想念你们，这回可把亲人盼来了！"我们就以三道河子张大娘家、前梆子沟毕家两处作为开展工作的联络点、根据地。白天深入庄稼地里串联动员农民如何应付敌人，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同时了解敌人活动情况和部落内的各种情况。就这样和农民一起干点活，一起弄饭吃，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夜间就住山涧里的房岔草棚里。敌人扫荡时，就整夜钻进山洞、土洞和草堆里。一个月以后，有四、五户基本群众冒着风险找到这两处临时住处，开始建立了暗地岗哨和安排监视敌特汉奸活动等。

新的困难

经过一段艰苦工作，我和这几户抗日同胞的关系密切了。可是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这几户群众的越冬棉衣裳怎么办？没有食盐怎么办？经过一番思考，只好回区请示。经上级批准从关里运到黑河的救济物资中拨给这里每人一身棉衣裳鞋袜，再拨 70 斤食盐。从成功村到三道河子有 50 公里，隔着大山和敌人封锁线，只好我们自己去背。把救济物资背回来后，我们又一户一户地送到群众手里。以后又听说

离这20公里外的大复兴沟深山里住着一户人家，母子3人，孩子很小，她们是从下坎子部落跑出来的，吃穿都非常困难。我们请张进力大娘翻山跑了25公里，才慢慢地找到她们并告诉他们："共产党又派人来了，准备给你们送棉衣裳和盐来。"张大娘回来，我们又把棉衣、食盐送去，进行慰问和教育工作。她们没有吃的，有时偷着到部落里要点饭来给孩子吃。主要靠在山上采挖野菜、野山药、大地管子（大芋术）、花咯答（百合）、橡籽等能吃的野生植物维生，没水就化雪积水。以后，又通过张大娘的亲戚等关系扩大联系范围，在山里建密洞、密室、密窝棚几处作为藏身之地。就这样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向部落里开展工作

在寿王坟东北山区又有了这块小小开辟地。我们就通过几处联络点向部落里开展工作，建立单线联系。通过刚玉的亲戚，与大南沟部落里的张国余、刘祥二位取得联系。他俩的老房场位于部落东沟的一里地之遥，是敌人允许种地不允许住人的地方，把这里作为联系点，他俩可以从部落里往外给我们送情报、送吃的。我们有时就住在房场的柴草堆里，在他们院外一块大石头上放上几个小石子或划上几个白道道。他们利用起早拾粪、拣柴禾时偷看暗号，有几个石子或几个白道，就是来了几个人还未吃饭，他们就想办法弄出吃的来，再告知敌人的活动情况。通过他俩提供的消息，我们知道了大南沟部落书记员李万录、郑家庄部落书记员禹明生过去都是中共党员。敌人只知道他们过去是干部，不知是党员。为考察这两人的情况，我们就秘密写信给他们，要求他们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给党做些工作。不久禹明生送来敌人分布和部落设置图等情报。李万录协助张国余向外送饭送粮送情报等。有一天下午，我们5个人到部落东沟，被人发觉报告给甲长。李万录一听，就知道是我们来了。他马上偷着找到张国余：

"你赶快给弄几个人的饭，我去给敌人写情报。"天黑后，部落长下令把部落大门上好，谁也不准开门出去。李万录说："那还行？得派人给郑家庄警察所送情报，不开门出事谁负责?"部落长只好叫送情报人张国余出去。刘祥已把饭弄好装在口袋里，由水沟把口袋塞出去。张国余出部落明着是给敌人送情报，暗中给我们送吃的。饭后张国余在前面引路，我们紧跟其后，他既得到敌人的"信任"，又掩护我们安全转移。以后，我们对东河北、朝梁子、范家大地、下坎子几个部落也建立了不同的单线关系。

对日伪人员开展工作

为使一些山地群众受到部落伪组织的掩护，就必须争取过各部落的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三大关。他们在查户口时马虎一点就掩盖过去。大南沟、东河北、郑家庄3个部落比较松些；而朝梁子部落甲长李振江和张部落长替敌人卖命。我们先通过写信给李振江，对其进行教育，后来约地点与他见面。第二天便带着警察、伪自卫团百余人来三道河子，包围了胡家沟一带。因为我们有了戒备，敌人未搜到我们。但是把我们留下监视敌情的抗日青年张孝增打死，烧毁了我们的密室、窝棚，搜走物品。同时范家大地部落甲长也把他部落的几户八路军家属报告给敌人，准备把他们迁往东北做劳工。我们考虑在寿王坟一带山区活动的情况已被敌人发觉，他们对各部落控制更严了，仅靠一般的教育和争取是很困难的，于是把全面情况向区委作了汇报。恰巧区里正在研究对这个地区如何开展工作，侯建华指导员带着他的连队来配合活动，区委马上请这个连配合下柳河开辟工作。

1945年4月下旬，侯建华连从成功村出发，夜里到达三道河子北沟。第二天，我们通过关系从范家大地部落弄出50多公斤小米及其他物品，部队在此隐蔽两天一夜。第三天晚上，由侯指导员、一排

长、侦察员等8人化妆为兴隆宪兵队的日本军官、翻译、特务，叫开了范家大地部落大门。部队进入部落后，立即把伪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找到，命令他们马上集合群众查点有无八路。我当场向群众宣布我们就是八路军并宣布了姚甲长的种种罪行，征求群众意见后，当即处决了这个甲长。随后部队步伐整齐、雄纠纠地在部落街上走了一圈，群众看到八路军真有这么好的武器，还有机枪、钢炮，大受鼓舞。随后我们又到朝梁子部落，处决了伪甲长李振江。原计划如时间允许，把郑家庄警察所也拔掉。此时夜已过半，部队就未去郑家庄而向小水泉转移。区委干部也转移到石井子山顶。

这次行动对敌伪组织震动很大。以后通过关系下台子、朝梁子、下坎子三个部落的甲长与我们建立了联系。与其他部落、警察所去信，一般都能回信和出来接头；在范家大地、大南沟两个部落中发展了单线联系的党员，同时与个别警察建立了联系。从此，在柳河川站住脚了。

日军投降

1945年4月，我母亲和舅爷被捕，受尽了酷刑。后来，我母亲在被关押劳动时，由于难友和群众的掩护逃了出来。我舅爷在关押转送途中也逃脱。5月间，我们5人在周杖子被双庙警察署的100多名警察包围。有1人牺牲，1人（傅久洲）受重伤，我也吐了血，但终于突围。同年夏末，黑河根据地军民吃粮很困难，区委动员所有工作人员想办法从部落里买出一些粮食，并由区里带出一部分土布，背到寿王坟大南沟部落东沟，由齐祥、张国余两位把布带进部落，秘密卖给可靠的群众换小米。这样，既解决部分军民吃饭问题，又解决部落里一些无衣无粮户的困难。正在这时，传来消息日军投降了。我们便投入一系列的接收工作。此时，我担任下台子区区委书记，李志兴任

区长。在下台子原伪村公所旧址建立了区公所。

1938年，成功村84户398口人。抗日战争胜利时，还剩66户317口人。在抗日战争中，成功村的乡亲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虽已离开故乡在外地工作，然而我永远怀念抗日战争中的革命先烈和兴隆山区的英雄人民。

战斗在“无人区”

丁春生

1942年初冬，中共党组织派我到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十二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兴隆县和青龙县是日军在伪满洲国搞的两个“模范县”。第十二区在兴隆县城以东的山区，东西50公里，南北宽20公里。我到该区刚两个月，日军就开始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以此割断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置我们于死地。面对这一形势，我们的斗争任务是：打破敌人分割封锁，保持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残酷的“无人区”

日军搞的集家并村，目的十分阴险，手段十分毒辣。他们把老百姓从世代居住的村落一律强行赶出，统统拆掉住房，并要老百姓把拆房的砖石运到沟门大川去修建部落。部落围墙高约一丈五尺（5米），呈长方形，四个墙角上方都建有炮楼，每个部落只有一个大门。门楼就是一个较大的炮楼，每个炮楼都有伪警察或反共自卫团持枪把守。日军把老百姓集中到部落里居住，不经许可不准出入。老百姓愤怒地把这种部落称之为（人圈）。部落建成后，日军紧接着搞“无住地带”和“无人区”。规定部落以外、五里以内为“无住地带”，许可耕作，但不准居住；五里以外则为“无人区”，既不准居住，也不准耕作。违者均以私通八路军论罪，见人就打死。

被赶进部落的群众，没有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部落内居住拥挤，人畜同屋，常有疫病流行。记得一次瘟疫蔓延，每个部落天天都要死人，少的死几个，多的几十个，甚至一二百人。大水泉部落一天就死了300余人，真是家家陈尸，户户嚎哭，景象之惨，目不忍睹。

迁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有三种政权。第一种是敌占区和近敌占区的部落，属于日伪的一面政权。第二种是中间地区的部落，日伪统治较弱，抗日政府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这一类部落里面的政权多为两面政权。其中又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亲敌的两面政权，真心向敌人，假心向我；二是亲我的两面政权，真心向我，假心向敌；三是中间的两面政权，谁来了应付谁。第三种是“无人区”的政权，纯系抗日的一面政权。这样的政权结构，使我们有条件广泛地开展公开的或隐蔽的对敌斗争。在日军搞集家并村之前，广大群众都受过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群众大都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报国会”组织，并在一些村发展了党员，建起了党的小组或支部。因此，在敌人实行集家并村的过程中，这一地区始终有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活动。

在部落里尽管有日伪的血腥统治，但广大群众并不屈服，他们不堪日军的压迫，进行着各种巧妙的斗争。为了避开敌人，方便出入，群众把部落的围墙弄出一个个手扒和脚登的豁豁来，攀登越墙而过。为了生活，不少群众冒着危险回到原先住的地方种地。他们把被敌人掀翻的碾子、磨盘，搬到隐蔽的地方重新装好，把粮食和锅碗瓢盆藏在秘密的山洞里，还有的群众在家里住上几天。

在距离日伪据点较远的深山沟里，是抗日工作基础较强的地方，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反对集家并村，宁死不进部落。在“无人区”公开反满抗日，同日伪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伪满洲国县以下的行政建制是村、甲、牌。一个大的山沟为一个基层行政单位，称为

甲。除驴儿叫、乌头牛、见财沟这三个（村）甲没有部落外，第十二区内每甲都有部落。这些地方山大、沟深，交通极不方便，群众居住分散，不论春种秋收，都靠肩挑人扛或用驴驮。在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就建起了党的组织，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工作基础较好。敌人千方百计要把这里的群众赶到附近的部落里，但群众始终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宁死不进部落。穷凶极恶的敌人对这些地区经常进行疯狂的扫荡，多次把群众的房子烧掉。而扫荡过后，群众依然把房子盖起来。其中日军把驴儿叫村的群众住房烧毁22次，群众便重新盖了22次。那时候的住房也很简陋，下边埋几根柱子，上边搭个马架子，马架上边铺上黄麦草。炕都是用石头垒的，炕面一般是铺椴树皮，也有铺板碱珠。开始窝棚还垒墙了，群众称之为“透风楼”。这样的“房子”，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就难了。炕烧得很热，热的烫人，可是挨不着炕的那面身体又冷得要命，群众取笑叫“一面糊，一面生。”睡在上面只得翻来覆去地烙“烧饼”。住房尽管如此简陋，但抗日军民却凭借它，坚持“无人区”的斗争。当时，冀东区党委苏林燕，专员焦若遇，县长李春光等各级领导和部队首长也都曾把这些小房作为司令部，指挥过练兵打仗。“无人区”的这些简易小房，对坚持反满抗日斗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化险为夷

1943年秋，日伪军集中兴隆、石庙子、半壁山、鹰手营子等据点的兵力，由西往东对“无人区”逐村进行包围清剿，妄图一举将坚持在“无人区”的抗日军民消灭掉。我们区干部被迫退到驴儿叫村的几座大山上，情势十分危险。正在这时，接到了县委组织部长李泽的亲笔信，内容是：敌人决心要把坚持“无人区”的抗日力量彻底消灭，为保存实力，可把“无人区”老弱伤残人员暂时安排到附近较为

有工作基础的部落去，区干部和“无人区”的青壮年民兵自卫队员也暂时撤离。接到县委指示的当晚，我们就在村长张振久家里召集党员、区干部和村干部会议，传达县委指示。当时，我正患重感冒，由区长李建民主持会议。李建民念完县委的指示后，会场一时沉静，无人吭声。过一会，老党员费占林说：“事到如今，先叫我们这些老村干部商议一下，然后向区委汇报”。我同意这个意见。过了半个多小时，村干部回来了。他们的意见是：坚决执行县委的指示，应该保存革命力量，请区委带领全体区干部下山，撤离“无人区”，由村干部在山上坚持斗争。他们说：“我们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里山大沟深，敌人不可能把我们杀净。”同时，他们又提出：“希望在敌人大扫荡过后，请区委再回来领导我们。”我躺在炕上，听着这些老乡的话，心里象针扎似的难受。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些与我们生死相依的群众。我叫警卫员王凤银把我扶起来，我问他：“王凤银，你怕死不怕死?”王凤银回答说：“不怕死，要死也是我先死，主任后死!”我说：“好!”于是我又对区长李建民说：“建民，请你带队下山。”李建民却问他的警卫员高山：“你怕死不怕死?”高山说：“不怕死，至死保护区长!”这时，李建民对区委宣传委员国栋说：“请国栋带队下山。”国栋由县委交通员曹文引路带领全区干部连夜下山了。我和李建民及警卫员留在山上。党员、群众知道区委书记、区长和他们一起坚持对敌斗争，都十分高兴。老大娘把珍藏的生姜、红糖拿出来给我冲姜糖水喝，还用满洲铂给我把浑身都刮紫了，然后盖上被子发汗。这个法很见效，立时感到浑身轻松多了。这时已近午夜，外边下着鹅毛大雪，群众见我感冒刚好，身子还软，就把三个人的搭包（外边用的腰带）拴在一起，把搭包的一头绑在我的腰上，一个人在前面铲雪开道，另外两人一前一后，边拉边推。就这样，我和李建民在群众的簇拥之下爬下了南山。天刚蒙蒙亮，扫荡的敌人也到了驴儿叫。时间不

长，我们住的房子就被点着了，另外几处小房也冒起烟柱。由于群众事先已有准备，敌人这次扫荡扑空了。除了烧房子，还乱打了一阵枪，近中午时分，就撤走了。

我们在山上坚持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见没有什么动静，正在准备下山，忽然又看见大批的军队开进山里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情很紧张。这时，听到山下有呼喊声。我两手贴耳张棚，隐约听到："丁春生……丁春生……我是曹致福!"一听到曹致福浓重的乐亭县口音，我说："是咱们的部队，曹司令回来了。"大家喜出望外，异常兴奋，很快跑下了山。见面时那个亲热劲，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因为敌人经常扫荡，环境异常残酷，坚持在"无人区"的干部群众非常盼望自己的部队回来。部队由于长期对敌游击作战，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也需要找个地方，以便休整。曹致福向我们介绍说："敌人集中兵力，夹击合围，妄图将我们一举消灭，但我们和他们一兜圈子，他们就只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还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敌人的这次扫荡结束了，利用这个间隙把部队休整一下"。我们看到自己的战士衣服划破了，鞋底也磨透了，而且很疲惫，非常心痛。于是，立即召集干部群众烧水供战士们烫脚、洗衣服，并取来锅碗瓢盆，拿来粮食，宰了几只山羊，做了一顿小米饭炖羊肉，战士们美美地吃上一顿。第二天，战士们又帮助群众把被敌烧毁的房子重新盖好，到傍晚时分，部队又出发了。

袭击楚榆沟

日伪大的扫荡结束了，但仍指使各部落的伪警察、自卫团对本地的小扫荡不断。

为了领导西部部落里的群众进行反满抗日斗争，在曹（致福）司令率领部队出发的第二天，我和区长李建民及警卫员等四人从驴儿叫

出发，趁星夜赶往楚榆沟了解敌情。登山瞭望，除楚榆沟部落里灯火通明外，“无人区”地带一片漆黑，唯南沟的一个小山岔里有一个豆儿大的灯亮。于是我们翻下几层山，循灯亮奔去。这是一家住户，进屋一看，只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是罗锅，另一个是瘫子。经询问知道他们都不能劳动，全靠到敌人据点里讨饭过活。他们说：“大扫荡刚刚过去，警察、自卫团还经常出来搜山。伪甲长史家父子都是铁杆汉奸，把从部落里逃出来的人都给赶回去了，整个楚榆沟可能只剩下我们这三个没用的人了。你们几位白天上山，晚上到这来吃点儿饭，就在这里避一避吧。”无奈我们只好从讨饭人那里讨饭吃。两天后我们临走给他们菜金、粮票时，他们说：“别给了，盼望咱们有一天把鬼子打出去，胜利了，就啥都有了。”多么好的三位父老啊。我至今非常感激他们。

当晚，我们来到了大竹胡沟。进沟不远，遇到了这个村（甲）的青年干部邹连贵，和我们打招呼之后，立即把住在部落里的共产党员傅国勋、积极分子李贵找来，村支部书记徐仲连、办事员李安祥也从大灰窑坚持在“无人区”的保国那里回来了。时间不长，区警卫班副班长杨二虎带着几个刚参军的新战士也赶来了。邹连贵说：“部落里只有 30 多个警察，30 多个自卫团，没啥抵抗力。咱们去把楚榆沟据点拿下来吧，我带着去！”我说：“敌人有 60 多支枪，我们才有六、七支枪，敌我力量悬殊，得慎重从事。”邹连贵解释说：“敌人的大扫荡刚刚过去，他们以为八路军无影无踪，根本想不到咱们今晚会去打据点。咱们攻其不备，给他个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况且‘人圈’里的情况我们都熟悉，准能拿下来。”警卫班副班长杨二虎刚从部队转到区警卫班，有战斗经验，家就住在岭西大灰窑，他对攻据点很积极。他说：“干吧，我打头阵！”住在据点里的傅国勋、李贵等人也都主张打。李建民区长说：“春生！就这样吧。你坐阵，我带他们

去打。"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打吧，敌我力量悬殊；不打吧，他们请战心切，而且对敌情分析的比较透。我说："好吧，傅国勋、李贵，仍回部落里去，到时候作内应，其余人员一起行动。"我亲自规定了口令，对作战方案进行了详细的部署。这天是农历腊月十五，夜晚皓月当空。为了缩小目标，我们都翻穿起了棉袄，并规定了几条纪律。午夜过后，我和李建民带领邹连贵及警卫班的几名战士悄悄地摸到了楚榆沟据点的南大门，蹲在大墙根儿下。这时，听到岗楼上站岗的两个自卫团丁一边磕烟袋，一边叨咕说："丁春生和李建民也不知到哪去了"，另一个说："唉？他们早把咱们忘了。"这时邹连贵和杨二虎已经纵身上了大墙进入岗楼，命令说："交枪！八路军打据点来了！"两个站岗的说："连贵，你瞎闹什么呀！"杨二虎用枪指着他们："不许动！快交枪！"下了他们枪之后，邹连贵打开大门，我们随即进入据点内。邹连贵、杨二虎很快地把部落四角炮楼上的枪都给收了。我们便径直朝警察和伪自卫团的住地逼近。在距敌人住地不远的地方，忽听有人喊："谁?"仔细一听，是李贵的声音，于是回答了规定的口令。李贵用手一指，说："西边住的是警察，东边住的是自卫团。"于是，按照既定计划，杨二虎和李建民带着几个战士去打伪警察，我和邹连贵带着几名新战士去打伪自卫团。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毫无戒备，大枪都挂在墙上，都脱个净光蒙头大睡。我们几人进屋把枪拿出来之后，伪自卫团们还在呼呼打鼾呢，西边住的伪警察们睡的更香，呼噜打得更响。李建民见屋里漆黑，转身出来找了块松明子点着又进到屋里，这时一个伪警察翻了翻身说："怎么了，有事吧?"李建民趁机耳语说："可别动呀，外边八路军都围严了！"这时，邹连贵、杨二虎和几名战士一拥而进。伪警察们没等起身就全部当了俘虏。我说："咱们走吧。"邹连贵低声说："不行，山上边还有个岗楼呢。"于是，李建民命令一个伪警察头前引路，带领着邹连贵、杨二虎直奔山上岗

楼。这时，少甲长史文斌，快跑过来慌慌张张地说："老总，来匪了！"见到史文斌，我气不打一处来，喝道："史文斌！"史文斌一见是我，吓得不知所措，连连说："主任、主任。""把他捆起来！"警卫员立即给他上了绳子。李建民命令引路的伪警察把岗楼大门叫开，邹连贵、杨二虎闯进去把几个伪警察的枪下了。刚要转身往回走，听到炮楼上还有响动，杨二虎大喊一声："交枪不杀！"一个伪警察就乖乖地把大枪大头朝下递了过来。当老李他们正往山下走时，老甲长史宗理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老总，来匪了！"李建民骂道"史宗理！你这个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史宗理见是李区长，顿时吓得象鸡啄米一样，一个劲的点头施礼，连说："李区长，李区长。"老汉奸自投罗网。我们几个人，夜袭楚榆沟，一枪未放，缴获了60多支步枪，抓了30多个俘虏，还抓住两个汉奸。

邹连贵等按预定计划弄来驴驮子，驮上枪支，警卫班押着俘虏正往回走，部落的乡亲们被惊醒，都出来欢迎我们，互相问候。不少乡亲忙回家把准备过年的粘饽饽、糜子面馒头一个劲地往我们衣袋里装。正在这时，几个伪排长走过来小声地说："你们走时，要冲着小灰窑伪警察据点打几枪，不然，我们受不了哇。"按他们的意见，我们朝着小灰窑打了八枪，告别了乡亲。南行到楚榆沟沟脑，天就大亮了。在越岭向见财沟村行进时，被押送的伪警察回头向我们发愣地说："大部队呢？"杨二虎用枪指着伪警察喝道："少废话，快走！"不大功夫到了见财沟村。村支部书记张福旺、党员张福昌和坚持在"无人区"的乡亲们，都来和我们一起祝贺胜利。对俘虏来的伪警察们进行了民族教育，分别发了路费各自回家，把伪甲长史家父子押送到县政府。老甲长史宗理罪大恶极，被依法处决；少甲长史文斌，原计划在处决史宗理时，让他陪绑，然后教育释放，没料到他吓得撒腿就跑，突然也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就从一丈多高的坝坎子上头朝

下栽了下去，不治死亡。

大营盘隋四立功

1944年农历正月的一个夜晚，我和李建民到北台子部落里去开展工作。原计划给干部们开完会以后，往北翻过大山仍回到“无人区”驴儿叫村去。开会时间长了些，散会时天已将亮，我们只好就在北台子村北沟的一个炭窑里拾了一些冻干的玉米秸，铺在窑洞里合衣而睡了。上午十点钟左右，北台子部落里的一位老太太到北沟取东西，我们向她说明情况，请老人家回去告诉办事员常德旺，中午给送些吃的来。

中午，这位老太太挎着竹篮，给我们送来了用小米儿饭做的四个热呼呼的大饭团，并关切地说：“这饭团是上山打柴人吃的，吃了禁饿，带着方便，趁热吃了吧。”我们狼吞虎咽地把四个大饭团全吃了。太阳将落山时，我们走到北台子北山的半山腰时，听后面有人喊，回头一看，见一个百姓和一个伪军朝我们边跑边喊，由于不明底细，我们就拉开了准备战斗的架式。“别打！别打！我是常德旺”，来人用力地喊着。

走近跟前，常德旺把那个伪军介绍说：“他叫隋四，在大营盘当下等兵，经常挨打受骂，他实在忍不下去了，让我给他指个出路。”那人也一再央求我们帮助他，我们给他讲明了政策，布置了任务，说完就分手了。从此，隋四经常通过常德旺向我们汇报大营盘据点及伪军内部情况，使我们对据点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几天后，曹致福部队的二连指导员侯建华带着一个排转移到十二区。他说：“我们出来两个月了，要回司令部去，回去之前想打个胜仗，你们给出个主意。”我和李建民把在大营盘据点伪军隋四的情况说了一遍。“那好，咱们就打大营盘吧。”侯建华充满信心地说。第二

天上午，我们把隋四从据点里找来，他汇报说："大营盘部落北山包儿上的小楼里驻有一个排的伪军。"于是我们立即研究了作战方案：由隋四把当天据点内的情况和当晚的口令搞清楚，然后由隋四引领队伍打据点。晚上八点多钟，我和李建民、侯建华来到大营盘部落开明士绅陈子明家里。谈话间，忽听外边响了一枪，陈子明惊问："怎么回事?!"话音刚落，就听：不许动，交枪不杀的喊声。原来隋四引领队伍摸近据点屋门儿时，被伪军发觉，伪排长刚要伸手掏枪，我军杨排长一枪击中伪排长的手，随着一阵喊杀声，冲了进去，缴获了30多支大枪、一支手枪和一部分子弹。石庙子伪讨伐大队长孙德英派兵前来救援时，我军早已翻过南山，安全地转移到遵化县境内。

万全巧计斗顽敌

由于无人区环境残酷，干部伤亡很大。1943年，原十二区区长陈易新、区武装大队长雷保贤相继牺牲；石庙子伪讨伐队袭击驴儿叫时，新到职的区长李国负伤，警卫员牺牲；粮秣助理李春山牺牲后又被砍头；六区区长本二、新接任的区长刘握枢也都先后牺牲了。六区干部和坚持在"无人区"的群众也有很大伤亡。

1943年冬，上级决定进行地区重新划界，把六、十二区划归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领导。由于干部大量减员，区党政一把手奇缺，县委决定我担任第六、十二两个区的区委书记兼六区区长，工作重点在六区。该区南界长城，北邻十二区，西至八卦岭，东至喜峰口。这个区开辟较早，工作基础较好，特别是草场村一带群众基础更好些，大多数部落里都有抗日组织。同时，日伪据点内中共党支部的"适龄"党员，经过区委讨论同意都当上了"反共自卫团"团员。所以，在没有外来特务、外来伪军的情况下，可以进出部落或到据点内开展工作。

草场是八卦岭伪警察据点东仅一公里的一个部落。此前，就有中共支部、武装班长、办事员以及“报国会”组织。担任草场伪甲长的就是中共支部书记万全。

一次，小水泉的日军趁黑夜包围了草场，日军非常狡猾的谎称：“我们是八路军，是李运昌的队伍，快开门!”。万全感到其中有诈，就叫人敲锣聚众，刹时间不少群众翻上了部落的大墙，纷纷拿起石头向下砸去，日兵被砸伤数人。翻译官忙喊：“别砸了，我们不是八路，是小水泉的皇军。”打开大门后，万全把日军迎了进去。日军队长训话说：“草场大大的好，大大的良民。”其实小水泉的日军已不只一次地到草场搞试探了。

有一天，我军的两名侦察员在草场附近的公路上打死两名伪军。万全听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杀了一头猪拿着猪血奔向公路，并派两人把两具死尸抬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然后把猪血洒在尸体的枪口周围，制造了一个假现场。一切布置停当以后，万全跑到倒流水伪警察署报告，伪警察署派人到现场一看，深信不疑。由于万全在敌人面前屡建“功勋”，倒流水伪警察署将万全由甲长晋升为警尉，受到破格提拔。经区委讨论决定，草场村党支部书记成了驻守八卦岭日伪据点的万警尉。我调六区工作后，常到八卦岭据点里去，吃住都是在万“警尉”家里，既安全，又方便，也便于作些统战工作。

第六区的统战人物大部分是地主及伪满官吏，这些人虽同情抗日，但也欺压百姓。区委组织委员李文元听小水泉党支部书记汇报说，该甲甲长老申田依仗敌伪势力欺压百姓时，一怒之下，李文元违反党的政策把申田抓起来就处决了。这下子可惊动了该区的上层成员，他们纷纷集会，写呈（状）子向抗日县政府告状，要李文元给老申田偿命。一天傍晚，八卦岭伪协和会会长张元波亲自带我到八卦岭村去。他备好一桌酒席，邀了张连生和其他甲的一些头面人物，他们

明着是请区长吃饭，实际是想借刀杀人。席间，张元波把写好的呈子递给我说："区长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写了个告李文元的呈子，请区长过目给修改修改。"我说："告李文元是你们的权力，我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他们步步进逼，说什么："当官要给民作主，不要小看我们，我们是李运昌司令的人，我们有证明"等等。听到这，我把桌子一拍说："我是李司令派来的，是区长，区管村，正是管你们的，你们想干什么，想造反?!"张元波等人一看诡计未逞，忙陪礼说："区长别生气，我们酒喝多了些，胡说八道了。"说完，纷纷散去。

第二天刚刚亮，我命陪我的人把我送出八卦岭，回到草场。时隔不久，张元波又专程到草场来求见我，被拒绝。他无奈，只好把万全请出来，万全说："有我保驾，回去吧，教训教训他们就行了。"于是我回到了八卦岭。

轻取三道河

1944年秋，为加强和提高县大队的战斗力，县委通知我到县里讨论如何攻打伪据点，解决枪支弹药问题。我把六区、十二区各个伪据点的具体情况作了汇报之后，经过详细讨论和周密的研究，县委决定打六区的三道河子伪据点。由我负责作好打三道河子据点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县大队长刘继抗带一个连执行攻打据点的任务。从县委回区之后，我同区民政助理刘月亭协助进行战斗准备。时间紧，任务急，秋雨连绵下个不停。我和刘月亭化妆成农民模样，他扛着一根木头，我扛着一捆秫秸，于黄昏时分和三道河子干活的农民群众一起，混过了门岗，进入到三道河子据点。来到村党支部宣传委员李建国的院儿里，我俩把木头、秫秸往地下一扔。屋里问："谁呀?"我们没有作答。当李建国走到我们近前一看，惊呀地说："老天爷，你们怎么进来的呀？这太冒险了，为啥事先不给个信儿?"我们把刚才化妆进

门岗的过程说了一遍之后，让他把支部书记李田、组织委员张宏找来，召开支委会，传达了县委的指示。后又召集党员和骨干分子会议，进行了动员，对每个人都详细交代了具体任务。

第二天，我把伪警察和反共自卫团驻地平面图、行进路线图及“晃火”为开始攻打的联络信号等，写了详细说明派人送给刘继抗。刘回信表示满意，并议定按计划行事。晚饭后，刘继抗来一个连按计划埋伏在部落西南角墙豁门岗，距门岗不远，忽听：“口令”，“大洋钻”准确地作了回答，此时，我们已走到门岗近前。伪警察问：“后面是谁呀?”，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窜上去用手枪顶住警察的胸口，下了他的枪。“大洋钻”把准备好的火绳递过来燃着，我高举火绳朝着我军埋伏的地方晃了三下，队伍迅速地冲了进来。还没等伪军转过神来，据点就被拿下来了，未发一枪一弹。此次轻取据点，缴获步枪 60 多支，手枪一支，还有不少子弹。

回忆承兴密联合县抗日工作

李守善

1941年8月至1945年11月，我在承（德）兴（隆）密（云）等抗日联合县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这一带是平北与冀热边区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交通要道，当时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殷汝耕的伪自治政府所辖，东靠长城，长城外与兴隆、承德相毗邻，是伪满洲国西南重要防线。因此，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8年，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开始注重后方的“巩固”工作，对抗日地区加强了军事扫荡。在中共冀热边区委和西部地委的领导下，承兴密联合县广大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抗日斗争，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武装斗争，建党建政，蓬勃发展，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

1938年秋季以后，宋（时轮）、邓（华）纵队留下的三个支队继续在平谷、密云、兴隆交界一带坚持抗日斗争。三支队派出的李满盈游击队一直在这里艰苦转战。1940年11月，中共冀热边区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决定成立以县委书记李子光（兼）、李兴汉为首的平密兴联合县。县委、县政府为开辟新三区，派区长王裕民和做党务工作的林远等人到三区工作。县领导给三区划的界限及开辟地区的任务是：平谷县北部的长城以北，潮河以东的密云县境，密云县以东长城以外的兴隆、承德县，开辟的越多越好。王裕民同志来三区后，带十余人的区小队，经常到兴隆境内活动。林远同志等在关上、镇罗营、

南北水峪（编者注：包括狗背岭、黄鱼坑、小西天一带）等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41 年 8 月，为加强第三区工作，县委又派我任区委书记和区委组织委员王凌阁等同志建立和健全了区委组织，充实了助理员和武装干部。到 1942 年上半年，兴隆境内也开展了建党建政工作，组织民兵和建立青年救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迅速高涨。同年冬季，王裕民区长在兴隆北部开展工作时，不幸牺牲。他的牺牲给三区的抗日工作带来很大损失。后来平兴密县委又派刘长城任三区区长。1942 年夏季，刘长城也不幸被捕牺牲。

1942 年初，建立承（德）滦（平）兴（隆）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我担任县工委书记，王子庸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同时派来组织部长李建国和宣传部长田峰。李建国、田峰，以兴隆的大小黄岩一带为中心，开展工作。不久地委又派来王泽、张静之等同志到承滦兴工作。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在宣传抗日、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都有显著成绩。1942 年夏末，李建国同志在小黄岩东部壮烈牺牲。秋天，田峰被捕（后在兴隆县城内向日伪投降，成为叛徒）。秋后，我到兴隆东部找到了办事处主任王子庸同志。他向我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在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第三区的基础上，建立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工委和县政府。江东同志任县工委书记，王慕林同志任县长，我任县委组织部长。1943 年秋，承兴密联合县工委改为县委，马力任县委书记，江卓任县长。1944 年 4 月，马力同志调地委工作，我接任县委书记。同年 12 月，江卓同志调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工作，项一接任县长。

二、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广大群众的日益觉醒，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进攻，也越来越疯狂和残酷。从 1942 年夏季

开始，日军为切断平北根据地与冀热区根据地的联系，在承兴密联合县西部进行第五次“强化治安”。在长城以外，频繁进行大“扫荡”。从1943年春季开始，日军在长城沿线和长城以外，推行灭绝人性的烧、抢、杀的“三光”政策，进行集家并村。靠近根据地建立武装部落，并以日伪军据点为主，形成一条包围根据地的兵线。在兵线和根据地之间有一条纯无住地带，在这条无住地带背后建立了设有武装部落。武装部落设在靠近根据地的兴隆境内有三道河、九神庙、六道河、北坎子、马圈子、杨树沟、思家岭、大磨台、前苇塘、后苇塘、黄酒馆、十四顷、北双洞、陈家庄、大石洞、大沟、牤牛素、将军关等几十处。规定部落里的群众每人一年三尺布，一天五两粮，给一点火柴，不准到关里（长城以西）买物品，如有去者，一律砍头。到部落外种地规定统一时间，并发给证明，限时回部落。

日军大搞集团部落，到处建武装立据点，给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第四区（编者注：即大小黄岩一带），辖区全部在兴隆县境内，东西南北长宽各35公里，全部被日军划为“无人区”。据区委委员鲁克同志回忆估计，仅1943年，日伪军对四区的扫荡约近百次。据1944年县武装部的不完全统计：日伪军对全县大规模扫荡50次，小规模扫荡388次，出动敌伪军37860人次。1944年以后，环境虽然更残酷了，但日伪军进行全县性大扫荡减少。因为日伪设立的据点很稠密，经常集中几个据点的兵力，对一个区或数个区进行小扫荡和清乡。

从1942年夏季开始，为破坏日伪修建部落的计划，我们同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白天抓群众强迫修部落，晚上我们就组织力量去拆。这样修了拆，拆了修，相持了几个月的时间。日伪看这种办法不行，就采取进驻日伪军的办法，即修一个驻一个，再修一个，再驻一个。这样，我们夜间再去拆就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也改

变了办法，夜间带部队去烧。日伪在六道河下游建立一个部落，就是由十四分区的一个主力连和四区的区小队一起给烧掉的。不管拆也好，烧也好，虽然使日军的统治计划受阻，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修建部落的进度，而且往往使群众受很大损失。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方法，做到既能保护群众，又能破坏日伪计划，达到对抗日有利的目的。我们采取在日伪修建的部落附近对群众进行劝说工作，动员他们与日伪斗争，不进部落。对有困难思想不通劝说不了的，我们就找些可靠的伪保甲长和群众，对他们进部落之后，做些隐蔽的工作和瓦解工作。这种办法，由于后来敌人加强了统治，关系也中断了。在距离部落较远，抗日工作又有基础的村，如小黄岩、好地子以西，大黄岩、北双洞以西，除个别人以外，大多数群众不愿去部落。我们就及时在那里扩大民兵组织，以民兵为骨干带领群众坚持斗争。

随着斗争的发展，日伪军也越来越狡猾。在敌人统治比较严重的部落中，又修筑了很高的碉堡，并增发了枪支。部落外面铺上了高粱秸、玉米秸，一有动静，很快就能发现。一经发现有八路军来了，里面就敲锣打鼓，放鞭炮，甚至打枪，附近的部落和日伪据点很快就会知道，并马上增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再扩大抗日地区更困难了。全县六、七十个抗日“一面村”，约 3 万左右群众，能否巩固、坚持住是承兴密联合县能否坚持斗争的关键问题。于是县、区召开了干部会，研究形势，统一思想。大家认识到：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干部同群众同舟共济，生活、战斗在一起，在原来的基础上，广泛发展民兵，保卫群众，才能保卫根据地，才能战斗到最后的胜利。此后，1941 年就到大小黄岩任区长的岳林同志和后来到大小黄岩任区委书记的张静芝同志，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扩大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

在基层党支部、村政权的领导下，把青壮年组成武装民兵，大村

有中队，小村有分队。武器的来源，有的是部队给的，也有缴获伪军的，还有自己造的土地雷。民兵的任务除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外，主要是反“扫荡”，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保卫根据地。各级民兵组织建立后，积极性高，斗志旺盛，不顾环境如何残酷和生活如何艰苦，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讲究战略战术，坚持与日伪斗争。表现最突出的是第四区大小黄岩、第二区大岭至南北水峪一带的民兵。他们仿照古代战争中一发现敌情就点“锋火台”的做法，在山顶上每隔 3 里左右设一个联络哨，男的不够女的顶替，昼夜监视敌人的活动，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做“活电线杆子”。这是承兴密人民的一大创造，是前所未有的。敌人进攻根据地，我们的联络哨一喊，几分钟就可以传出几十里远，虽不如电话快，但比电话传的更广，党政军民都可以听到，群众最欢迎，敌人对此最恨。我们地形熟，山高，地险，隐蔽，只要日伪一路过民兵岗哨就放冷枪，敌人上山去追，民兵又早就转移了。敌人进根据地扫荡时，民兵就站在山顶上向群众喊话，说敌人到什么地方去了，群众知道了消息，就在山沟里躲着敌人转移。有时很多山头有民兵，敌人一到，民兵就在山上和敌人打麻雀战。有时敌人在山沟里活动，又往往遇上我们的地雷，挨炸。有时敌人用老牛或老百姓在前趟地雷，因为面积大，敌人也搞不过来，起不了多大作用。

从 1943 年至 1945 年 8 月，日军对根据地人民镇压愈加疯狂，斗争更加残酷。为了消灭“一面村”的抗日力量，日伪军每年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这种大扫荡往往都是先在山口和山顶上建立临时据点，然后分几路顺山沟反复多次进行扫荡（日军称这种办法为“剔块战术”）。所到之处，都实行彻底的“三光”政策。除个别群众的房子在山腰隐蔽的以外，均被烧毁了，有些村庄被烧过几次、十几次，有的连房基地也被挖过几次。衣服、被褥除隐蔽剩下几件外，其

余也被烧光抢光。群众有些小农具和一点点粮食，临时都隐藏了起来，剩下的物品用一两个背筐就背走了。日军所到之处，真是片瓦无存。对于敌人的这样大扫荡，我们首要任务是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先把妇女、老人、小孩都转移到敌人包围圈以外躲避起来，留一部分精干民兵同敌人周旋。由于根据地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尽管日伪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花了很大的代价，而收获甚小。群众的财物受到了洗劫，但对日伪更痛恨了，抗日更坚决了，在政治上、军事上更强了。四区、五区的民兵在反扫荡中、反割青（苗）中都曾用自制的土地雷杀伤过敌人。

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根据地人民越战越强，不仅能坚持根据地，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进攻，同时还时常抓住时机，主动向敌人出击或逼敌撤退。1943 年上半年，潮河川周家庄石绵矿驻守着 20 多名伪军，为了消灭这股敌人，四区的负责人找到八路军十三团的一个侦察员带路，组织民兵和区小队 30 多人，夜间摸到了据点跟前。把手榴弹往据点里一扔，把敌人炸懵了。几分钟时间，敌人缴械投降。大石洞的一个武装部落，也是民兵夜间突袭，先掐断电线，然后发起冲击，使伪军很快缴械投降。

在同日伪斗争中，根据地广大军民，不管是人多人少，不管是集体战斗还是单独作战，都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顽强。1943 年冬，日军对四区进行大扫荡时，小黄岩东部中石洞村民兵班长马文喜带着三名民兵隐蔽在山上，饿了，想到附近的罗圈沟去找点吃的，正好发现一些日兵和特务在那里抢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几个人顿时忘了饥饿突然向敌人开火，打死两名日兵和两名特务之后，便马上隐蔽起来。日伪军便假装撤退，天黑后又偷袭回来。山上隐蔽的四名民兵下山时，误入敌人包围圈，但是他们一直坚持顽强战斗，英勇不屈，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全部壮烈牺牲。承兴密联合县委、县政府，为表彰

四烈士英勇斗敌的光辉事迹，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他们热爱祖国、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并为四烈士做了一面锦旗表彰他们。

日军破坏根据地，除用残暴的军事手段以外，还想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卡死我们。每年一到芒种季节，敌人就调集重兵强迫部落里的群众，对靠近伪满地区抗日的“一面村”进行割青（苗），除山坡小片庄稼外，其余都被砍倒，再想改种别的作物，时间也来不及了。群众的吃、穿、住都非常困难。多数住房是在废墟上用木杆子、柴草盖一盖，搭上简易炕，也有少数人家挖洞住。环境虽然艰苦，但群众精神饱满。小黄岩川山神庙西沟的群众，挖的是成排的窑洞。我们去了，他们打趣地告诉我们：“我们住的是花市大街。”每户窑洞里一铺炕，一两个背篓，全部的家当都放篓里，敌人一出动，联络哨一喊，马上背起篓就上山。穿的是政府救济的一些旧衣服，多是补丁摞补丁。吃的就更可怜了。每年收一点玉米、高粱、谷子、掺些野菜，树叶子搭配着吃。每年春耕时节，正是缺粮最严重的时候，不少人都得浮肿病，锄地时干一会，在地里躺（歇）一会。地方政府也缺粮食，除支援主力部队外，还要想尽办法救济群众一些。地方工作人员和出勤民兵走到那里，都把自己的带一点粮食交给群众做饭吃。有的群众把我们带的粮食，做好饭后，干的给工作人员吃，剩下米汤放上野菜自己吃。而工作人员往往是和群众一起做，一起吃。从对敌斗争到日常生活，真正体现了军民鱼水深情。1944 年，为了打破日伪的封锁，我们组织了以王凤春同志为队长的十多人武工队，以五区为基础，通过雾灵山向兴隆方面挺进，深入到“无人区”里开展工作。正因此，根据地党政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军爱民、民拥军、同舟共济，我们终于战胜了人间少有的经济和生活上的困难，连续抗战十几年，直到最后胜利，抗日根据地军民表现出不怕苦、不怕死的高尚的革命英雄主

义气概。

承兴密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建设，八路军主力部队始终起着骨干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四纵队三支队和十三团在承兴密联合县境内多次打击和消灭敌人，推动了全县人民的抗日斗争，给地方党政军民撑了腰，提高了斗争士气。日伪军知道这一带有八路军主力部队，小据点里的伪军就不敢轻举妄动，给抗日地方工作人员创造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对地方民兵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三、做好“两面村”的工作

团结各阶层，做好“两面村”的工作，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又一关键问题。随着斗争的深入，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巩固，特别是在斗争中建立的抗日“一面村”，是我们开展斗争的主要依托。但是日伪控制的地主，其中一部分是我们应团结的力量，而且在数量上占优势，这类地方我们称之为“两面村”。1944 年，全县共有行政村 191 个（7 个区），其中，抗日“一面村”97 个，抗日占优势的“两面村”53 个，敌我力量均不稳定的 35 个，亲敌的“两面村”4 个，敌一面村 2 个。当时全县总人口约 15 万人，抗日“一面村”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近五分之一。从人口、耕地面积上看，主要在“两面村庄”。“一面村”群众抗日坚决，牺牲大，贡献大。但是离开“两面村”的广大群众配合和各阶层的人力、物力支持，也根本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无论是当时形势需要，还是从执行我们党的抗战方针上看，我们必须大力做好“两面村”的抗战工作。

“两面村”的特点是：既有伪政权，也有抗日政权；在日伪占优势的村庄，也有抗日的秘密的村干部；在抗日占优势的村庄，也有伪村干部，但被我方控制，应付敌人。农村伪政权干部和一些上层人物，有赞成抗日的进步分子，也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的动摇分子，大多数是同情抗日，但由于家庭等牵挂，而不敢公开站出来的人。至

于亲日分子和敌特分子是极个别的。“两面村”广大群众赞成抗日，但对我们的力量还不够相信，怕日军的“三光”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做“两面村”的工作，主要是发展我们的党政骨干力量，发展和组织好广大群众抗敌支前，这是我们的基础工作，也是抗日的基本力量。同时要做好伪政权人员和一些上层人物的工作，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打击个别敌特分子和亲日分子。

日伪的政策是：在其统治区域即实行“三光”政策，根本不准“无人区”里有人存在。在广大的“两面村”里，日伪也知道有抗日组织，总想搞垮，但是却无法实现。我们对“两面村”采取了现实政策，对广大群众既关心又保护，号召和组织他们抗日，但不公开要求他们干过分刺激日伪的事情，群众的抗日活动和对我们的支援，我们给予保密，以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伪村政权，我们的办法是采取承认、控制、利用的政策。在工作基础好的村庄，我们的党组织村干部可以监视村里暗藏的敌特分子、亲日分子，并及时提供情报，或者除奸，制裁敌特分子，贯彻抗日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对日伪的命令和要求，则采取抗、拖、应付的办法，但也得应付过去，例如日伪向村里要人、粮、款等，就采取不给或少给等办法。在抗日占优势的“两面村”，抗日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活动则是公开的，有的村庄的上层人物的子弟也跟民兵活动，日军一进村，我们的村干部都躲避了。这样的“两面村”伪政权虽也存在，但不健全，敌人提出要求，下了什么命令，首先经过抗日村干部研究，怎么样应付敌人，要按抗日政权的规定办，完全拒绝的也有，但一般地要能应付过得去，对这部分伪村干部的安全，我们也注意给予保护。

敌我争夺的“两面村”，日伪常去搞清乡活动，抗日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也常去村里做工作。这些村庄伪政权是健全的。对这样的村子，我们就要求他们执行抗日政府的法令，不许违抗。抗日村干部

有的也是公开，但不健全，日军进村时，他们就躲避起来；有的是秘密的，日军进村，他们出面应付。我们对伪政权支持抗日工作是保密的，对提供给日伪的人、财、物是允许的，但是严禁暴露抗日的村干部，严禁给日伪提供危害抗日情报，违抗者要严厉查办。伪村政人员在行动上是否真的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当时不好检查，需要事后看效果，比如抗日的村干部或区干部被捕了，是伪村干部告密还是暗藏的敌特告密？这需要认真调查，然后认真处理。

在坚持“两面村”的斗争中，我们也着重做了团结上层的工作。根据党中央抗日救国的纲领，着重宣传了抗日不分阶层，只要不当汉奸，参加和支持抗日，就可得到抗日军民的保护。这对分化瓦解敌人，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加强党组织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承兴密联合县的抗日斗争，由始至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组织的建立，发展，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开辟第三区开始，县委即派林远等人做党务工作。1941 年 8 月，西部地委和平兴密联合县县委，从后方派来的干部中挑选了区委干部，加强了三区的领导和党务工作。从此以后，承兴密联合县（承兴密是由平兴密北部第三区扩建而成——编者注）各区几乎都有了作党务工作的干部。

当时的形势是，群众抗日情绪高涨，部队、地方干部抗日坚决，关心群众，作风也好，党在群众中很有威望。除一、六区外，在车河、潮河、清水河川的一些村庄，1942 年上半年，就建立了党支部，有的村建立了党小组或发展了党员，到下半年，斗争环境变得更加残酷以后，在山沟小自然村又普遍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发展对象上，一般都注意阶级成分，吸收一些贫苦农民入党。强调介绍

人要注意考察、培养、教育工作。具备入党条件的，一定要严格履行入党手续，有的入党后发党员证明书。在发展党的工作中，特别注重表现，把抗日坚决、能干、受到群众拥护、愿意为党为人民贡献一切的人，作为发展对象。因此，发展的党员、组成的支部或小组，战斗力都很强。无论任务多重，条件多么艰苦，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不起作用的党员很少。在村里掌管武装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这样就保证了团结广大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抗战方针、路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日伪据点里或在抗日“一面村”以及抗日占优势的“两面村”里，坚持抗日斗争的，大多数是一类支部或小组。有的党员借给日伪出劳务之机，搜集敌情，给政府写情报、送情报、除奸，保护抗日人员。哪里任务重，哪里任务艰险，哪里就有党员起先锋作用，如北庄（密云县境）支部是1942年上半年成立的，当年这里建立了敌伪军据点。但是由于有坚强的党支部，所以都能坚决执行抗日政府的命令，每次调人或征集财、物都能按时完成，同时还经常向抗日政府汇报有关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

根据地的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面对日伪利用残暴的手段进行镇压、扫荡，不管生活上怎样艰苦，始终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和广大群众风雨同舟，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有牺牲的，有受伤的，但是前赴后继、抗战到底的决心始终不动摇。

区干部到村里检查工作，也十分注意给党组织和党员撑腰。在“一面村”的党组织和党员中，大多数能够做到个人事、家庭事服从抗战之大事。党支部、村干部、民兵大多数时间都是研究敌情，研究对付日伪和执行勤务，虽不是脱产，但主要精力做抗日工作。在斗争中磨炼了意志，学会了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本领，每个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灌输了这个思想，入党后一直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党的战斗力很强。

在“两面村”的党组织和党员，一般不公开拿起武器和日伪战斗，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抗日活动上，在“两面村”中打击公开和暗藏的敌特分子，保持和发展抗日力量优势。没有忠于党、忠于抗日的党组织和党员起作用是不行的。一些落后的上层人物和伪政权里一些表现差的人员，所以不敢干坏事，他们有两怕：一怕村里的抗日力量，二怕共产党员和区、县结合起来制裁他们。

农村党组织成立后，正式上党课的并不多，但是研究敌情、讲战争形势、坚定抗日信心、讲遵守党纪、起模范带头作用等教育是不少的。县、区干部经常到下面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违反纪律的党员、干部及时处理。二区区小队有一个队员，因家务事把他嫂子打死了，不到一天查清后，这个队员也被处决了。对于表现好的、工作成绩显著的，及时表扬或者得到提拔重用。承兴密联合县县级干部大多数是本县提拔的。由于是非分明，奖惩分明，就保证了党的纯洁、团结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战斗性，这是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于承滦兴联合县办事处和敌后武装工作队的回忆

王泽民

1942年8月，我和张静之同志从北方局党校毕业后，分配到冀东军区。同年10月末到冀东十四地委，地委书记是李子光同志。我和张静之同时被分配到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第三区。不久，李子光、江东二同志找我和李建国、方子庸、张静之谈话，让我们由承兴密向东开辟，成立承（德）滦（平）兴（隆）联合县办事处。方子庸任办事处主任，我任组织部长，张静之任宣传部长。此外，还调备了一些同志。办事处下设3个区：我兼任一区区委书记，王裕民同志任区长，活动在盘道岭以北；李建国同志兼任二区区委书记，方子庸兼任区长，活动在盘道岭以南的鹰手营子、寿王坟一带；三区暂没设。

1943年春，李守善同志受地委委托，召集承滦兴办事处的干部开会，传达地委决定：将我和李建国留办事处，同方子庸同志一起活动，我仍任组织部长兼第一区区委书记，在盘道岭以北坚持工作；张静之同志同李守善同志到承兴密联合县的大小黄岩一带开辟第三区，张静之任第三区区委书记，岳林任区长。

承兴密联合县和承滦兴联合县均属新开辟地区，除大小黄岩川下游少数的几个自然村及上游一带是抗日的一面政权或抗日的两面政权外，其余少数是抗日的两面政权，多数是日伪的一面政权。除抗日的一面政权外，均向日伪缴纳粮款，尤其是承滦兴联合县的雾灵山东

南，盘道岭以南，兴隆县城以北，承德县的柴河上游，曹家路、大沟、小白旗、榆树底下、涝洼、陈家庄、小西营子等地，以及鞍匠、新杖子、夹马石、潘家店、上板城等，都在日伪控制下。我们在这些地区只是建立了少数的秘密联络员、情报员。那时，我们也时尔在夜里到大川等日伪占据村庄，但天亮前必须返回山里来。在长城以北，承（德）——古（北口）铁路以南的区域里，我们只能到达滦平县的南川、长山峪、王营子、陈栅子、付营子等地以南。白天可以到白草洼下部山沟黄木局子一带的小山村去住。有时，我们在夜里也常突击到铁路以北的滦河镇、大庙、小营、通沟一带附近的山村，由于站不住脚，当夜仍须返回铁路以南胡里的大山中隐蔽。

开辟和坚持这个地区的斗争是残酷的，特别是1943年，日伪经常对这个地区进行围剿和扫荡，搞集家并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他们将长城内外的深山里的人赶下来，圈到部落里，把东西抢光，把房子烧光，把躲在山里的人杀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同志，同抗日的人民群众一起，坚持这个地区的反集家并村的抗日武装斗争。

在斗争中，由于我党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不断深入，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觉醒，抗日热情逐渐高涨，抗日政权逐渐扩大和巩固，日伪越来越孤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是，日军不甘心灭亡，他们聚集兵力对抗日地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扫荡，妄图扑灭抗日烈火、歼灭抗日军民。在日伪疯狂的扫荡下，大川和敌据点附近的抗日政权一个个被摧毁，甚至承滦兴联合县办事处也曾一度垮了下来。

那是1943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太阳快要落山了，日伪突然出动大批兵力包围了办事处所在地的克梨木枣东沟。在战斗中，联合县办事处工委书记李建国（新中华）和一些同志壮烈牺牲，日伪还惨无人道地将建国同志的头割下来，分尸示众。在严重的挫折面前，我们并

没有悲观失望，人民群众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决，我们和幸存下来的村干部及部分抗日群众进入深山。同年11月间，我们撤退到雾灵山周围，并给随我们一起进山的抗日青壮年发了枪支，组成了一支抗日武装，继续坚持深山区的抗日斗争。这支武装主要活动在雾灵山西部、曹家路口的下游、蔡家店、遥桥峪、新城子、吉家营、令官大川的南北山青草顶、大树洼、南车洼、北车洼、董家坟、梆梆石、小关门、遥桥峪的南沟等区域。

1943年3月间，日伪出动上万人的兵力又轮番扫荡这些地区。他们到处张贴布告，进行集家并村，宣布他们的所谓“无人区”，在“无人区”内“格杀勿论”等等。从此，这些地区又进入了更加残酷的斗争阶段。日伪在扫荡中，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有的村庄曾先后被日伪纵火烧过15次之多。在扫荡中，他们还强迫群众毁掉庄稼，组织“砍青队”，破坏青苗，以达到迫使民众进部落，与八路军割断关系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没有被吓倒，他们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日伪进行了更加英勇的斗争，敌后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特别是大小黄岩和木河川的武装民兵，在同日伪的殊死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北火道的民兵在和日伪的一次战斗中，曾打死了日军队长1人，在斗争中，这些地区又恢复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10月末，我们又回到了原来办事处所在的地区后，地委派原来的老交通员刘治国同志将我由承滦兴联合县敌占区接回到承兴密联合县第三区。组织上任命我为区委书记，张静之为副书记，岳林同志任区长。到任不久，大约在1944年初，县委宣布我和张静之同志为县执行委员（同现在的常委）；江东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李光汉同志任县长；李守善同志仍任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宣布我兼任第五区区委书记，张静之兼任第三区区委书记。不久，江东同志

调出，马力同志任县委书记，江卓同志任县长。

1944年6月，地委决定：再向北开辟新区，并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由冀东八路军十三团抽调一个较精干的武装排和几十名地方干部组成，名字叫北进出口武装工作队。郭子忠同志任队长，由我任政委，高原同志任副队长，张振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武工队下设若干分队。武工队组成后，进入雾灵山曹家路口西南的遥桥峪南沟时，同驻扎在曹家路口和大沟据点之敌遭遇。在这次战斗中，政治部主任张振东和第五区公安助理刘亚如，在雾灵山西南侧大沟搬厥梁下的龙潭沟内牺牲。日伪撤退后，我们将这两位同志安葬在小关梆梆石下的河南边。此后，武工队以雾灵山为基地，大体在雾灵山以东、以北的承德县柴河川、兴隆县的柳河川、滦平县的承古路南端活动，也就是以原承滦兴联合县办事处失去的地区为基点的长城内外。后来，郭子忠同志调走，高原同志任队长，王华荣同志任副队长。武工队逐步向远活动，最远活动到滦平县的滦河镇以北的伊逊河川、大庙附近的红旗、小营、通沟、三岔口、古北口以东的长山峪、靳家沟、王营子等地，再就是承德县的鞍匠下游新杖子、夹马石、潘家店和上板城一带。大都在夜间活动，白天要返回窄道沟树林里隐蔽。活动最多的地方是兴隆县以北的柳河川、鹰手营子、马圈子和寿王坟一带以及盘道岭以北的柴河川上游。

武工队主要任务是：广泛进行抗日的宣传发动；建立抗日的村政权和建秘密的联络员、情报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展中共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扩大抗日武装。这支武工队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扰乱敌后，一是巩固后方政权。这支武工队一直活动在日伪的心脏中，直至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这支队伍除队部外，还发展扩大到10个分队，每个分队的干部战士都在50—70人之间。各分队配备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其它武器也比较齐全。

1945年8月，当武工队包围新杖子与日伪据点一仗之后，就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武工队的干部战士都为此而欢欣鼓舞，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开进了解放了的承德市，同苏军会师了。

巍巍黄岩志成城

——回忆大小黄岩抗日根据地

鲁　克

1938年2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第四区，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建立发展起来的。它位于兴隆县西北部，雾灵山的西南麓，包括：大小黄岩川和东古磬、西古磬、北火道、大石洞、拦马墙等地。全区面积东西50余公里，南北30余公里，多悬岩绝壁，全部是大山区，人口约1万。除大黄岩川东部北双洞有日伪据点外，其它日伪据点都在外围。如南面和东面的六道河和前苇塘有日伪的据点。黄酒馆、十四顷、北区等地有讨伐队重兵驻守，周围还有十几个部落。

兴隆县当时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由于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地向兴隆发展，1942年伪满当局就惊呼“延安触角已伸进了满洲”！为了阻止抗日游击战争向伪满洲境域发展，日伪制定了沿长城线33公里划为“无住禁作地带”，进行集家并村。将民众从30公里无住禁作地带赶到被指定的部落（民众称“人圈”）。部落周围筑起高墙，由部落警看守，按规定时间出入。

第四区全部属于“无住禁作地带”。日伪原来计划在大黄岩川的刘寨子、小黄岩川的好地子和中石洞各建一个部落，将北火道、东西古磬的老百姓分别赶入北坎子、马圈子和杨树沟部落。但是，到1943年1月，还未能实现上述的计划。

大、小黄岩的人民群众为什么能顶住日军“三光”政策的摧残，不进部落，坚持在“无人区”呢？首先，这里的群众基础和基本条件比较好。1938 年夏季，为了开辟冀热边的抗日游击战争，宋（时轮）、邓（华）纵队首先到达这里，使沦陷多年的山区人民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其次，兴隆与长城内的密云、平谷、蓟县、遵化等县相接，这些地区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从几个方面都向兴隆发展，给兴隆人民极大地影响。另外，1941 年秋，岳林（郑利山）区长和其他干部先后来大、小黄岩开辟工作，范围已经扩展到南、北火道、大石洞、梨树沟、北区等地。这里的伪保甲长已向抗日政府交纳爱国公粮等，使单一的日伪政权转变为抗日的两面政权。在大、小黄岩各村已经开始建立党组织和各种抗日爱国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非常高。

我（划名王化中）是 1943 年 1 月到小黄岩工作的。由于这里的群众没有按日伪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进行搬迁，因此，日伪正准备对这个地区进行讨伐，情况很紧急。区里正在紧张地动员群众开展反对集家并村的斗争，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坚决不进部落。我和区委书记张静之接上关系后，由区委组织干事山林送我到栅子沟找到岳林区长一起开展反集家并村的斗争。我们一到前后栅子沟、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等村检查坚壁清野的情况以后，到山神庙找到八路军十三团政治处主任王文。他告诉我们：“敌人已是重兵压境，随时都可能进来。地方组织要抓紧时间做好群众的动员工作，坚决不进部落，困难再大只要有群众在，我们就有办法。为了避开敌人，部队要暂时转移一下，这里就全靠你们了。”

1943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十七日），日伪军一涌而进。大黄岩川的刘寨子、苗耳洞、网子沟、水泉沟，小黄岩川的好地子、栅子沟、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山神庙以及东部的大石洞、

北火道、东西古磬等地都住上了敌人。在这里安营扎寨20余天，一条山沟一条山沟地进行扫荡。杀人、放火、烧房子、抢劫粮食财物和牛羊。20余天的血洗，被日伪军打死无辜群众300多人，抓走100多人。房屋全部被烧光，粮食财物抢劫一空，牛羊全部被赶走。

一、反对集家并村，坚决不进部落

日伪军撤走后，区委书记张静之、区长岳林带领我们从大山上回到黄土山，县委领导李守善也赶来了。我们将情况向守善同志汇报后，决定首先派干部到各村去慰问受害群众和了解灾情。对那些粮食被抢光的村户，及时进行救济，解决好群众吃的问题，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其次是组织群众在原地搭盖临时棚铺，避风取暖，并动员群众自行调剂生活用具，克服暂时困难，度过难关。

李守善同志还引导我们着重讨论今后如何坚持斗争问题，大家预计敌人并不会到此为止，还会要继续加紧对这个地方摧残，我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各种难以估计到的困难，做坚持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的准备。大家认为坚持斗争下去还是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第一，这里的群众基础好，虽然没有住的没有吃的，还是愿意跟共产党、八路军在一起，而不愿进部落去当亡国奴。跟共产党走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只要我们和群众在一起，把群众组织起来，依靠群众，就能将反对集家并村的斗争开展起来。第二，我们工作的关键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敌人既然已经摧毁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立即废除伪保甲制度，在这里建立抗日政权，再将各种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建立健全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好了，就可以将被敌人摧残不要的地方，建成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大家认真讨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将反集家并村的抗日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向群众深入进行反对集家并村的宣传教育

我们到各村召开村干部和群众会以及家庭会，反复向村干部和群众宣传反集家并村和坚持抗日斗争的道理。让群众懂得只有在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军民团结起来，把日军赶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才能有幸福的生活。进部落就是当亡国奴，当亡国奴就是死路一条。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大大增强了群众的信心，使原来产生动摇的人不动摇了，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也更积极更坚决了。日伪妄图在大黄岩川的刘寨子、小黄岩川的好地子和中石洞建立三个部落。这对抗日威胁太大了，只要这三个部落建立，不但占全区三分之一的东部无法进行抗日工作，整个大、小黄岩也不一定能站住脚了。为此，我们下决心不让敌人建成这三个部落。集中力量做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和这几个村周围的群众反复商量坚决不进部落的办法。如敌人白天建，我们就夜里拆；敌人来扫荡，大家都跑开，叫它找不到人，部落就建不成。经过这样的反复宣传教育，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大家都不愿进部落了。由于敌人在这三个地方未能建成部落，将这三个地方的房屋都烧光了，结果更使群众增添了对日军的憎恨和坚决不进部落的决心。大石洞原伪甲长孙云，伪甲长不当了，决心抗日，自己不进部落，还动员群众不进部落，以后担任抗日办事员（村长）。1944 年春，在一次反扫荡中不幸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初期，我们想争取群众都不进部落，但事实上不可能。因为靠近日伪据点较近的群众，只要敌人一出来，他们便首当其冲，躲又躲不了，而生产又无法进行。因此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告诉群众："你们暂时住进部落，以应付敌人。但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忘记抗日，还要和抗日政府保持联系。"所以这些群众虽然被迫进了部落，仍然积极拥护抗日政府。有的和我们保持联系，秘密送情报；有的被迫随日军到"无人区"来割青苗时，不把青苗真的割掉，把玉米秸踩

歪，把高粱杆弯下来，以减少割青苗的损失。事实证明，他们虽然被迫进了部落，但并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和抗日斗争。

三、做好对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

随着斗争的发展，区政府采取行动取消了伪保甲长制。普遍建立以办事员为主的村政权，村公所下设若干委员，主要有：治安、民政、财粮、武装、妇女等。除村政权外，为了将群众都组织到抗日斗争中来，各村都建立健全了各个抗日救国组织，如工会（做长工的）、农会、青年报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这些抗日救国组织，以青年、妇女、儿童最活跃、最积极，每天晚上各村抗日歌声四起。抗日救国群众组织，是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的最好形式。有了这些群众抗日组织，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就更加广泛和巩固。通过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在群众中产生积极分子和骨干，再从积极分子中培养和发展党员。抗日政府在群众中生了根，站稳了脚，有了依靠。1943年前，全区有党员约50名左右。1943年，区委强调要在反扫荡和反集家并村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里考察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党员百余人，建立党支部17个。各村的干部、武装民兵及各个抗日救国组织对敌斗争，搞劳武结合，保管和运送公粮，抬担架护送伤员，出勤站岗放哨，慰问伤病员等都是各村党支部组织各个群众组织完成的。

四、全民皆兵，劳武结合

由于“无人区”内居住和粮食供应都很紧张，因此主力部队和县大队的活动十分困难。但他们还是经常化整为零以连队为单位来活动，对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无人区”的武装斗争，主要是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群众自己掌握了武器，这样既能劳动生产，又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这就是全民皆兵，劳武结合。民兵组织也是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一般

民兵站岗放哨，发展到武装民兵的联防；由组织基干民兵打麻雀战，发展到用地雷封锁根据地的地雷战。初期组织民兵各村都争着要枪，特别是青壮年都想要一支枪，可是枪支弹药很少，一个小村只有几支枪，大村也不过十几支枪，不可能每人发一支枪，因此就把多数人编为一般民兵。一般民兵主要是抬担架和传送情报。

第四区辖区内出门就爬山，山区小路很不方便。特别是讨伐队来扫荡，要想把情况很快地传送给各村，在当时的条件下，靠人步行传递太慢了。黄土山、清水湖、栅子沟几个村的民兵就想了一个站山头岗的办法。开始是上下几个村互相喊应，后来发展为小黄岩川 35 公里都联接起来。据点边缘地区的民兵加强侦察，了解敌人调动和出发方向的情报。只要敌人到“无人区”来，小黄岩川上下一喊就都传到了。武装民兵埋设地雷和负责警戒，老弱群众该转移的转移，群众该生产的照常生产。这种山头岗哨的土广播，对打击敌人保卫人民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这个办法很快在大黄岩川、大石洞和北火道推广。同时，为了掌握敌人对“无人区”扫荡行动的准确性，设法在日伪据点内建立情报联系。1943 年夏季，我们对敌人开展了政治攻势：号召在伪军和在敌伪机关做事的中国人进行良心大检查。告诉他们抗日政府对他们每个人都立了善恶簿，将他们做的好事和坏事都记在善恶簿上，日军迟早会被赶走的，到那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否则，是没有好下场的。自此以后，北坎子、杨树沟、大石洞等部落都先后建立了这种关系。很多在敌伪组织中做事的人主动和我们拉关系，表示悔改，不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并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如六道河警察所长刘文生等）。

武装民兵都是由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的，他们原则上不离本村，并组织上下村民兵联防。主要任务是：在日伪军来扫荡时，掩护群众转移，保护群众；埋设地雷，寻找机会打击敌人。

基干民兵是由各村武装民兵挑选出来的，属区武装大队部掌握的机动武装力量。区委书记兼任区武委会主任，武委会副主任是区武装大队长张爱国。他搞武装斗争经验丰富，经常带着武装干部和基干民兵，深入到敌据点边缘地带的米铺、苇子坑、北火道、大石洞、水泉沟、刘寨子等地。他走到哪里就和当地民兵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总结打击敌人的办法和经验，战地培训民兵。

小黄岩3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很少有主力部队活动，游击队也不多，主要靠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全区武装民兵共有百余支枪，大量的武器是手榴弹和地雷。除生铁铸的地雷外，还有一部分雷管，利用山区路边的石头打眼下雷管进行爆炸。当时我们有地雷一万余个，就是靠大量的地雷封锁根据地的边界。根据地各村的民兵也备有手榴弹和地雷。敌人进山时，民兵三两支枪配合一个地雷组，根据情况随时埋设地雷。每天晚上，边缘地区的民兵在敌人可能进山讨伐的路上和山坡等地布满地雷和石雷，因此经常有狼和狐狸触雷炸死。日军和讨伐队对民兵埋设的地雷望而生畏。苇子坑村民兵中队长许文良对六道河据点来犯之敌很有办法。他埋设的地雷很巧妙，叫敌人看得见的地雷是假的，而真的地雷隐蔽着，当敌人躲假地雷时，往往就触上真地雷。他用这个办法在米铺、桃园、苇子沟、深塘峪等地多次巧妙地打击敌人。

民兵是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力量。他们不与敌人进行正面作战，而主要是袭击扰乱敌人。敌人进山时，民兵靠地形熟，三两个人一组和敌人周旋。这里打几枪，那里放几枪，打了就转移，叫敌人摸不清头脑。敌人往东走，西边打，敌人往西走，东边打，这就叫麻雀战，到处都挨打。1943年夏，日伪军来小黄岩割青苗，由清水湖往东行进，为怕触到地雷，不敢走正路，靠南坡行进。清水湖民兵中队长庄青山率民兵把地雷早已埋在营南峪村西的河滩上，民兵

在北面的高山上设伏。当敌人大队路过时，山上民兵向西南一齐开火，敌人就拼命地往北山下躲避，正好触上了地雷阵，炸得敌人马仰人翻，死伤十余人。敌人往东撤退还不到5公里时，在王胡子沟又遭遇栅子沟的民兵迎击。另一次，敌人在杨树沟挨了民兵冷枪袭击，要策划报复，在后深塘峪一块空地集合准备训话。民兵一拉火，地雷阵爆炸了，炸死炸伤30多人，只好收尸走了。敌人连遭打击，不敢轻举妄动，才使藏在山里的群众免遭敌人的残害。

日伪在周家庄开的石棉矿，驻有几十名矿警。这些矿警不但配合讨伐队扫荡、抢东西，还经常到附近搜刮民财，扰乱群众的生产。张爱国大队长多次建议把矿警端掉，因区小队和民兵不但武器少，而且攻打据点也没有经验，区委研究建议由张爱国设计不要强攻，来个智取的方案。他一连发动两次佯攻，待敌人麻痹了以后，他和十三团侦察员田庆率民兵30余人，把敌人通讯线路切断。一阵手榴弹炸得矿警昏头昏脑，只好大叫投降。缴获20余支步枪和子弹。俘虏的20余名矿警，经教育后释放。

大石洞民兵中队长马文喜带领民兵多次完成北水泉、梨树沟、北区、大石洞等部落的征粮征物任务，日伪机关曾悬赏捉拿他。

1943年10月26日大雪，日伪军袭击罗圈沟。马文喜闻枪声作了战斗部署。他见敌人对被抓捕的10余名群众正在吊打，他选准位置，一枪把日本特务队长生驹击毙，其余敌人仓惶逃走，被抓的群众得救了。他们估计，敌人虽然撤走，但打死了一个日军特务，肯定不会甘心，还会来报复。于是民众们到前边埋伏，准备再打击来报复的敌人。不料敌人设了埋伏后才假撤退的，因此反而中了敌人的埋伏。日伪军把民兵的两个尖兵放过去，当马文喜、齐宗文、陈世才、张义瑞等来到时，敌人机枪猛扫，马文喜等四民兵壮烈牺牲。为表彰他们英勇杀敌的功绩，中共承兴密联合县委和县政府授予大石洞民兵一面

锦旗，上书“英勇四烈士”。

1944年冬，由于日伪对“无人区”东部反复扫荡日趋增多，大石洞、北火道等地群众生活已经很困难了，特别是食盐更加困难。一次，探知兴隆日伪机关要给北双洞据点运送大米、面粉和食盐的消息。张爱国我们研究后决定，把情况弄准确再组织截击。我们共组织民兵和区小队30多人，在北双洞东面一道梁子设伏。当日伪运送物资的四辆马车进入伏击圈后，民兵一开火，押运物资的警察就被吓跑了。我们把马卸下来，所有的物资驮的驮、背的背，全部带走，车不能带就烧掉。民兵们带着胜利品凯旋而归。随后，把缴获的盐分配给各村户，群众非常高兴。

几年里，日伪到小黄岩川进行了大小扫荡百多次，民兵和敌人打麻雀战、地雷战也不下百次，敌人死伤百余人，民兵缴获步枪20余支，马车4辆。另外几次对敌展开大破交（通）行动中，六道河至前苇塘段、北区至北水泉段、北双洞至拦马墙段，日伪的电话线被各村的民兵分段割断，共有百里长。除大石洞民兵中队长马文喜等四民兵在战斗中牺牲外，北火道支部书记王臣在1944年的战斗中牺牲。

五、克服困难，同甘共苦

日伪为使“无人区”民众失去生存条件，除烧光“无人区”的房屋外，还抢光“无人区”的粮食。从1943年起连续到无人区割青苗，使群众辛勤的劳动化为乌有。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无人区”的生产运动，不需要开垦新荒，而是组织群众劳武结合，把应种的土地尽可能种上，口号是“不荒一寸土，争取多打粮”，支援抗日战争。区委书记、区长带领区干部在清水湖、黄土山、栅子沟等村和群众一起抢耕抢种，区长和群众一起劳动，对群众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无人区”内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没有吃的，又要春耕生产。

虽然政府发了春耕救济粮，无奈数量太少，只好采集树叶和野菜充饥。有的人吃了树叶、山葱、野蒜拉不出屎来，许多人由于严重缺少营养而全身浮肿。区里干部和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副区长张志峰和公安助理李庭身患重病，严重缺少营养，行动都很困难。最好的营养品是数量极少的小米，煮一点小米粥，就是对伤病员最好的照顾。区卫生所的伤员每人每天一斤粮，区小队每人每天一斤粮还要扣二两节约粮，区里工作人员每天只几两粮，而几两粮也不是自己吃，因为工作人员不是自己起灶，而是在老百姓家里吃饭，在谁家吃饭就把几两米给谁家，和老百姓一样吃糠和野菜。只有到夏季日子才开始好过些，豆、瓜、菜多了，比树叶和野菜好吃得多。糠菜虽然不好吃，但是和群众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活再苦，精神却愉快。为把“无人区”斗争坚持下去，我们常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干部和群众关系的教育，把人民群众比作水，八路军和地方干部比作鱼，鱼是不能离水的，以此教育干部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我们的干部都以自己的实践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3年秋收开始后，全区干部就专门开会讨论粮食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无人区”内由于敌人割青苗，能够收的粮食不多了。有些村子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主力部队来活动，卫生所伤病员所需要的粮食，不但无法保证供应，就连区工作人员、区小队和民兵的粮食也解决不了。征粮工作宜早不宜迟，宜多不宜少。另外不论是内地群众自己收的粮食或征来的粮食，都要分散保管好，不要再让敌人抢走。

经过研究后，区政府确定了对各部落征收粮食的数量，并向各部落发出征收粮食通知，规定了送粮的地点和期限。通知发出后，明子沟、南火道、杨树沟、马圈子等部落均能按期限交粮。唯有大石洞、六道河和北双洞部落交粮期限已过，仍没有音信。其重要原因是这几

个部落的伪甲长，依仗部落驻有日伪军或距据点较近，认为抗日政府不敢去，所以拒不交粮。为此，我们首先派人将六道河部落伪甲长傅荣臣抓获，他认为抗日政府不会把他怎么样。而我们没有马上向他要粮，而是把他带到六道河日伪据点附近设伏打击敌人。仗虽未打响，他却吓得要死。他一再要求不要去了，保证回去后马上把粮送来。大石洞、北双洞部落，都是由区小队配合当地民兵夜里进去抓到伪甲长后才把粮食送来的。我们首先切断了大石洞部落的电话线，把部落警的步枪收缴，并限他三天送粮还枪。伪甲长吓得又作揖又打躬，战战兢兢地答应马上就送粮，并保证以后再分配什么决不拖延。这样一来，消息传开了，北区、梨树沟、北水泉等部落，都瞒着日伪军夜里偷偷地送粮来。当年从各部落共征收粮食 5 万多公斤。

地委、县委对第四区人民的生活是十分关心的，除了拨给人民的救济粮外，并从内地各县动员衣服鞋袜给“无人区”。所有支援物品都由副区长、民政助理和营房村长程福平分发给大、小黄岩川各村，基本上能达到大人小孩发两件以上，共计一万多件。“无人区”人民生活虽苦，由于抗日政府对他们的关心，男女老少政治上一律平等，群众对共产党和抗日政府非常满意。

六、整风和民主建政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无人区”整风运动是 1944 年春进行的。整风，对坚持在“无人区”工作的干部主要是进行正面的教育。县委派守善同志来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学习。根据形势把干部分两批分别在营西峪和营房集中学习，每批三至五天，由守善同志给我们上课。其主要内容是：一、为什么要整风，整哪些不正之风；二、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军队、地方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三、搞好军民、军政、政民等互相之间的关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经过几天的学习和讨论，使我们对依靠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对坚持“无人区”抗

日斗争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在思想上时刻不能忘记群众，时刻关心群众，处处依靠群众，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承兴密联合县县长江卓来到第四区亲自在清水湖村进行民主建政试点。为了搞好民主建政，江卓县长首先给区干部上课。其主要内容是：1. 抗日政府是领导人民抗日的，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2. 人民是主人，主人就要当家作主。3. 区干部和村干部都要树立依靠群众的观点，有事要和群众商量。

通过学习讨论后，区政府首先召开清水湖村五大委员会议和各抗日组织的干部会议，反复讲解建设好抗日村政权的意义，然后再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各抗日组织民主提出村长、副村长和各委员会的候选人，最后提交村民大会通过。选举时，针对选民多数不会写字的实际情况，采取候选人坐在一排长凳上，在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要选举哪个人，就在哪个人的碗里放一个玉米粒的方法，以此来计算当选票数。通过民主建政，群众对民主的认识提高了，懂得了什么是民主权利，在选举前对提候选人很认真。对有的干部平时工作态度生硬、不民主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希望，使村干部受到了民主教育。村干部表示诚恳接受批评，今后希望民众多监督。通过民主选举，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团结。群众说，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办法真好，这是自古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日伪的保甲长，一要钱，二抓人，从来不讲理。现在当干部由群众选，给群众干事。试点后，先后在15个村进行民主建政工作，黄土山村还选出了女党员向玉臣为副村长。她当选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大大地提高了妇女地位。

日伪施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并未能阻止住抗日力量的发展，反而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的斗志。这片只有30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万的“无人区”，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

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打死打伤日伪军百余人，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出动300多名民兵，配合八路军十三团解放了兴隆县城。“无人区”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斗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赋诗一首，以表达我对无人区人民群众的赞颂。

黄岩人民斗志昂，
不畏日伪摧残狂。
劳武结合齐奋战，
誓与长城共存亡。

长城烽火中的文艺轻骑兵

王雪松

1942年、1943年，伪满洲国“国防”最前线的冀东地区，敌我斗争异常激烈。

1942年2月，在原冀东《搏斗》社基础上，成立了《救国报》滦西分社——第一地委机关报，出版了《救国报》(滦西版)。滦西分社的诞生，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

大红峪《救国快报》

1942年秋，日军在冀东的“强化治安”运动越发疯狂，在冀东西部其矛头指向蓟县盘山。抗日根据地由盘山向长城线的黄也、太平沟及兴南一带的崇山峻岭转移。这时，中共西部地分委书记田野在兴隆县石门台的沙峪沟壮烈牺牲。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平原地区几乎全部被敌人蚕食，环境日益恶化。组织上调我进山。县委高昌同志传达地分委关于当前工作的紧急任务：以极其隐蔽方式，坚持平原地区抗战；加强山地工作，开展群众性反集家斗争。然后决定调我到下营（蓟县境内）东南一带山地坚持工作。我接受了任务，独自来到桑树庵、大红峪。初期翻印了两期《救国报》，向群众进行宣传，后逐渐同群众熟悉并建立了两户堡垒关系，天天跑敌情，总算扎了根。

10月，天气渐冷；日伪集结兵力进山烧杀，并强迫驱使由平地圈来的成千上万老百姓身带大镐的“大镐队”将桑树庵、大红峪一带

的房子全部烧毁，推倒房山、坝台坎，砍伐山林。山地无家可归的民众，被敌人圈下山去，集家并村。此时，高昌同志在瓦房峪战斗中负伤，用担架抬到大红峪时已将午夜。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高昌同志身边，他吃力地拉住我的手说："雪松啊，你要继续留在这坚持下去。我们黄也、太平沟和兴特区（当时兴南地区为蓟宝三联合县兴隆特别区）通往平地的交通要道就只这一条了，相信你能担当这一重任。"说着给我一张百元的"大被窝票"（当时流通的一种纸币，全称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兑换券"，群众叫它大被窝票），做为工作费用。我依恋难舍地望着高昌同志的担架，隐入深沉的夜幕中。

从此，环境越来越紧了。北面，日伪强迫下营至窜岭沟的白滩川老百姓组成"剿共自卫团"站"人电杆"，不时呼喊传递情况，遇有风吹草动，即鸣锣报警。西面，下营到蓟县的公路一线，洪水庄、城下、杨庄等处修筑据点，日伪军日夜巡逻封锁；川方峪往南接近平原蚕食区，并且川方峪也修筑据点。在这环境险恶的狭小地区活动，日夜跑敌情。我同桑树庵一家堡垒户崔大娘的儿子——崔盛，结为生死弟兄。他家老小四口，崔大娘老俩口和崔盛，还有一个年仅 14 岁的女孩子，名叫"丫头"。这孩子从小死了爹娘，崔大娘收为童养媳。当年崔大娘一家从平谷峨眉山要饭来到桑树庵，开荒种地落了户。崔盛担任村自卫军（即非武装的民兵组织）队长，比我小两岁，称我为哥。崔大娘家的房子被烧后，一家老小三口集到翟庄去住。崔盛坚决不下山，我们患难与共，形影不离。白天扎在山林里隐蔽；夜间住在山洞、炭窑里。崔盛手拿松木明子火照明，我编写宣传材料。稿件的来源是附近村党支部负责人（主要有：大红峪的白恩、桑树庵的李福贵、翟庄的岳华等），经常找我汇报群众反集家斗争提供的情况。同时，为保障山地、平原来往信件畅通，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由我负责工作，并确定桑树庵的李景芳担任交通员转送报纸、信件、情报。南

面到青山、三间房，再转石毛房、瓦房峪；北面突过白滩川日伪封锁线，经车道峪、葛头沟（常州），再转黄也、太平沟或兴特区；西面突过下营川敌人封锁线，达桑园、泥河。因此，不但信件畅通，而且所获得的消息也比较灵通。我写好稿件及时刻印，当时不便使用油印机，只靠崔盛二拇指蘸油墨往蜡纸上抹。一行行印在小块白纸上，全称《救国快报》。为扩大宣传，还翻印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的宣传品。《快报》每期虽只印几十份，然而发到集家村去。小小的《快报》对坚持地区，鼓舞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坚定必胜信心，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了腊月，滴水成冰，没有住处，又缺吃少穿，环境更加困难。下营、杨庄、城下、川方峪等地日伪军频繁围攻、扫荡。尖山子背后陡坡上有一个狼洞，就成了我们经常居住的“保险地”。情况稍缓和时，我们从山上打来山草，找地势隐蔽的炭窑，把草塞进窑里烧着，等灰火燃尽，我们钻进窑里过夜。崔盛管这办法叫“烧霸王炕”。

另外是大红峪东沟宋大爷家也是我们的常住地。宋大爷名叫宋继均，老俩口所生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女儿出嫁到王庄子，女婿是小区工作人员，在一次与敌搏斗中壮烈牺牲，后来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先后参军。我们与宋大爷、宋大娘同仇敌忾，患难相助。宋大娘是一位诚实热情的老太太，把炕上睡得着着的孩子挤了又挤，腾出容身的地方，安置我睡觉。崔盛、李景芳实在挤不下了，就叫他俩到炕里打横睡。其实宋大爷的这个“房子”，只是上盖苫草的地窨，所以尽管日军反复扫荡，也没被发现烧掉。

大红峪没水，每隔几天在深更半夜到小口外去抱冰。站“人电杆”的“剿共自卫团”一听到动静，就敲锣追喊。李景芳、崔盛我们三人做了简单分工，多是李景芳上山放哨，崔盛在山坳熬粥。做饭的“锅”，是李景芳从他家猪圈里找来的，原是用来喂小猪的一个日兵钢

盔。我找个背风阳坡负责写稿、刻钢板。

崔大娘得知我们做饭的难处，便蒸了玉米面夹馅饼子，打发丫头给我们送上山来。有一天傍晚，我们到桑树庵的小山神庙探敌情。看见丫头从西坡来了，大家高兴地迎上去，只见她嘴巴肿胀，眼窝青紫，一见我二话没说，流下眼泪，不住地抽搭。我吃惊地问："丫妹，怎么啦？"她把饼子口袋递给我，说起方才在西坡碰见两个贼头贼脑的家伙，说是八路军，打听这里工作人员的关系。她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没理他们。两个家伙三拳两脚把她打倒。她哭叫着咬牙忍痛，死也不说……。我听了，对这两个特务气得发恨。崔盛告诉她："以后再送饼子来。放在小庙里，挡块石板就回去，不要到处找我们，免得碰见敌人。"丫头答应着用手一抹眼泪，回身走了。

连日来，几路敌人不断扫荡大红峪一带，在山里住的老百姓越来越少。桑树庵只有李福贵俩口和李福才、李福江、夏满海等 4 家；大红峪就剩东沟的宋大爷一家。一时消息不通，四外情况不明。一天，天色将晚，据点的敌人盘据在川方峪山梁，一声一声地打着冷枪。这时阴云布满天空，刁刁的寒风吹洒着雪花。我同崔盛、李景芳默默地坐在大石磬的一家房碴里分析敌情：估计明天几路敌人仍要向这一带分进合击，搞什么所谓的"淘干拿鱼"、"梳篦战术"。如何应付这种合击是我们的紧迫问题。我提议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方能保得安全。可是往西的下营川、往北的白滩川，敌人日夜活动的非常猖獗，况且人生地不熟，瞎闯乱撞将会遭到追击。后来崔盛说："过西梁就是苦梨峪，离下营虽说比较近，敌人却不注意。"李景芳表示赞成。苦梨峪！这在我的记忆中并不生疏。我小时听说我村有一户贫农，名叫张福才，因被生活所迫，全家搬到苦梨峪开荒种地。但不知现在他家生活得怎么样。如能相遇，不是很好的关系户吗？我想到这儿，同意了他俩的意见。于是三人马上起身，崔盛前头引路，盘上西梁。

夜幕沉沉，我们来到苦梨峪。果见几家房子依然存在，可是已用土坯堵了门窗，人已不在了。后来在南沟找到张福才的侄子——张连科。他告诉我，全家都被敌人圈到下营，住在大庙里。他同七叔张福才在山里照看房子，并说他七叔背一捆柴草刚下山。他说着话，不住地打量我，看我长长的头发，穿一件被荆棘撕坏的棉袄，腿上仍穿着夹裤，两脚穿的鞋头露脚趾，后露脚跟，鞋底、鞋帮缠着麻绳、布条。惊异地问："三叔，您咋闹成这个样子？"说着要给我脱下他的棉袄。我急忙上前拦住，然后要求他抽空儿下山，向我老妈要一身棉衣和一双夹鞋、袜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安置我们住在他家。

敌人一连几天的围攻扫荡，象刮了一阵狂风，又暂时过去了。张福才冒着生命危险，从我家取来棉衣、鞋袜。听他说敌人在村北挖了"防共壕"，修建了据点。"剿共自卫团"日夜巡逻，实行政治诱降，迫害抗日家属。抗日家属门前插了小红旗，叛徒、特务拉帮结伙不时地进家搜抄……种种阴谋毒辣手段一言难尽。他带来我老妈殷切的嘱咐："敌人找得很紧，千万别惦念家，只要好好的比啥都强。"这一坚定而忠贞的母训对艰难中的儿子赋予多么大精神力量的支持呀！

1943 年 1 月 17 日（农历腊月十二），县委高昌同志派来交通员通知调我去边北（长城以北）工作。临别的时候，我同两位最亲密的革命弟兄——崔盛、李景芳紧紧握手，眼含热泪分别了。我走出很远，回头望见他俩仍呆呆地伫立在坡上，相互招了招手，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途。

搏斗在长城内外

领命后，高昌、苏光和我一行三人，找到一位姓刘的老大爷做向导，直向下营东北高山上的万里长城奔去。寒风刮得枯草"沙沙"做响，脸被寒风吹得象刀削一样的疼。我们走不远儿，就搓搓手，捂捂

脸。进了车道峪山口，天空仿佛只剩了一道窄缝儿。我是头一次见到这样陡峭的山岩，不禁惊讶！刘大爷笑了笑，说：“那陡的还在里头哪，十冬腊月，正晌午只照一个钟头的太阳。”峡谷中乱石堆积，错落崎岖，约行十多里，越过两道城墙。最后一道叫“三道城子”，上边的墩台已经坍毁，这里是连接山峰上的长城主要的一段了。我们登上墩台，只见山外有山，满眼波浪般的层峦叠嶂。刘大爷往东一指眼前的山崖，说：“转过这个山弯，就到熊羔子峪了。”我们用敬佩的眼神送别了刘大爷。

我们绕道进熊羔子峪村，寒林中茅屋隐现。我走向前，推开柴门，喊了一声：“屋里有人吗？”当即从正房西屋走出一位年纪约三十多岁、络腮胡的老乡。苏光来到跟前，给大家介绍：这位老乡姓戴，排行老三，我们就称他“戴三哥”。东厢屋住的是戴二哥，西坡还有一户罗家，这三户就是熊羔子峪仅有的住户了。

第二天，陈大光、田志伍、国章等同志陆续到齐。高昌同志向我们交代了任务，成立了冀东西部唯一的印刷宣传机构——油印股。苏光担任油印股负责人。任务是：编印《搏斗》文艺月刊，翻印《救国报》和印制宣传品，对外称“冀东搏斗社”。

《搏斗》文艺月刊所反映的内容是以真实为主的文艺性新闻，兼收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诗歌、散文、故事。选材多样，不拘一格，使之成长为鼓舞抗日斗志的刊物。第一、二两期因是创刊，稿源不足，只印四开对版，每期印发四、五百张。后来稿件增多，四开对版容纳不下，改装三十二开本。3月，出版的《搏斗》第三期，扉页画一个赤身裸体，腰围兽皮，头发蓬乱披肩的奴隶，手执长矛，怒视前方，表示要求解放，欲与对方搏斗的姿态。文字说明引用鲁迅《这样的战士》——“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

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幅图画和引语鲜明地突出了《搏斗》的意义。

《搏斗》刊登的稿件多来自承兴密、蓟遵兴联合县辖区，特别是兴特区。如：本期刊载了陈大光同志写的《看电杆的人》，主要是写日伪强迫下营川的老百姓看电杆的惨景。敌人指定两个人看一根，电杆被八路军砍倒，就杀头。一边站杆，一边不定期得不断呼喊传递消息。在一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深夜，看电杆的人们衣薄肚饿，冻得手脚麻木。每个人的内心都在燃烧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他们嘁嘁喳喳谈论着传闻的好消息，盼望着八路军早日回到家乡的急切心情。县委宋林同志写的《敌人的血手在兴南》一文，尤其是日伪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有力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同仇敌忾的斗志。文章写道：

“日寇在兴南，伸张血手，越发干起杀人的勾当来。前些日子将二拨子甲长叫到据点内，问我军活动情况，没等甲长说话，用凉水灌死两三次。以后，又用烙铁将身上都给烙焦了。”“最近，半壁山的老百姓被敌人用汽车弄到兴隆，活埋了42人；将大灰窑的老百姓连杀带埋，死了50多人；六拨子敌人袭击龙洞峪，杀死老百姓30多人，其他村庄被零星杀戮的，已无法统计了。”

再如《移民大会》写的是：“敌人强迫老百姓移民到黑龙江省，采取收买、欺骗等手段，迫使大灰窑甲长一家，先去了一个多月后，这个甲长来信说：‘我家八口人，来到这里妻儿老小被迫分散了，你们千万别来。其他地区搬来的，老年人都被推到黑龙江里淹死了，青年人当满洲队，壮年下煤窑，真凄惨哪！’”通过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揭穿日军的种种阴谋，激励老百姓“誓死不到黑龙江省去，不到“人圈”里去，熬过今年一年，以争取最后胜利！”

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开展反集家斗争。可是那些甘心媚敌

的汉奸，玩弄阴谋诡计，破坏抗日工作，终于落得可耻的下场。主编高昌同志写的《狮子吼变成失望的悲鸣》，事情发生在三拨子村附近某村：

“嗥——！嗥——！”夜里赵村北山发出了奇异的声音。天亮，村里的老百姓凑到一起，嘁嘁喳喳猜想这奇怪声音：比狼的嗓音粗，比牛的叫声壮，却不如豹的声音脆，可也不是虎……也许是什么精灵？

太阳落山，家家关门闭户，没人敢在路上行走，更甭说站岗、放哨、送信。天黑了，陈家的媳妇抱着孩子喂奶，孩子爹白天干了一天活，早已呼呼地睡着了。

“嗥——！嗥——！”从山里传出的几声怪叫渐渐逼近，仿佛来到房前的院里，震得窗纸直颤，女人的耳朵几乎震聋了，怀里吃奶的孩子吓昏了，熟睡的男人惊醒了。他们吹灭了灯火，连大气都不敢出，心里只是不作主的“扑扑”直跳。忽听隔壁的肥猪一阵惨叫。声音渐渐远了，人们才恢复了知觉，喃喃地说：“阿弥陀佛，命又保住了……”

恐怖空气笼罩着赵村每一个角落。有的靠天祷告保佑，有的计划着搬走。可是到哪去呢？此时赵二磕巴透出话，说：“集家那儿人多，那里保险。”谁都知道他是个阴险狡猾的家伙，没人理他。

这天，牛头上山打柴，清早起猛（早）了。走进山谷，天还没亮。只好躲在石砬缝儿避风。忽然看见一怪物从山弯里出来了，两眼冒着红光，“咕咚咕咚”在地上行走。仔细看去，象老爷庙门外那对石狮子。牛头没顾打柴，跑回庄里告诉大家。庄里人听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唉呀！不得了。是个狮子怪，这一方要遭殃子。”

“你亲眼看见是个狮子吗？”一个打猎的、很有经验的青年猎户怀疑地问，“我琢磨这个声音很奇怪，可怎么不见爪印呢？”

“我亲眼看到的，那还有错？庄里已失掉了牛、丢了猪，准是那家伙干的。”

“嗥——！嗥——！”每夜仍在村子附近吼叫着。乡亲不敢在这里住了，纷纷搬走了。有的被赵二磕巴哄进了部落，剩下的几户人家也惶惶不安，不知咋好了。那青年猎户说：“我就不相信老爷庙门前的狮子会变成妖怪！”他找了一群身强力壮又有胆气的小伙子，个个拿了花枪、砍刀、木棒，藏在山口陡坡上。

刚过半夜，“嗥——！嗥——！”几声怪叫，震荡山谷，两只红光从远处渐渐移近。青年猎户低声悄语向小伙子们发出号令：“准备好，听我的枪一响，大伙一齐冲下山崖！”说话之间，那家伙“咕咚，咕咚”来到近前。青年猎户把枪倚在肩头，瞄准目标，二拇指一搂，“砰”地一声枪响，“嗥”声立时停止了。石壁下象有人低声呻吟。

“快点起火把，下去一看便知是什么东西了。”青年猎户说着当先跳下山头，随后小伙子们手举火把，吆喝呐喊冲下山崖。青年猎户指着一个血迹模糊的家伙，吓人的兽披扔在一边，两盏小油灯抛在地下摔灭了。说：“你们看看是个什么东西！”说着从地下拣起一个牛角号，用嘴一吹，“嗥，嗥”的响声震荡山谷，大家一齐笑起来。见那地下躺着的伤很重，腰上中了一枪，脑袋磕在石头上，鲜血直流。嘴唇颤抖着，有气无力地哀求说：“饶——饶命啊！”这家伙是谁？原来是赵二磕巴。人们这才醒悟了，异口同声地说：“怪道这小子成天向各家散布进‘人圈’哪，敢情是个汉奸。他白天装人，夜里扮鬼，太可恨啦！”打这天起听不到怪声音了。人们打定主意：死也不进“人圈”。（原载1943年编印的《搏斗》文艺月刊。本文略有删改——作者）。

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以犀利的笔触，对敌人的阴谋、残忍作了无情地揭露和讽刺。通过许多活生生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教育群众增

强革命必胜信念。当时，日伪疯狂地大搞“强化治安”、集家并村、杀人放火，在异常残酷的环境中，这本油印小册子不时出现在群众面前。可以想见，该起到多么亲切而巨大的鼓舞力量啊！

日伪不断集结兵力，围攻扫荡长城沿线。我们利用关里、关外敌人行动不统一的弱点，每当下营一带各据点增加兵力、窜扰长城时，我们往北越过长城，到兴南（兴隆南面）大杨木沟南沟隐蔽工作；而兴隆、茅山等地的伪满军闯到长城时，我们只往山前一溜，到熊羔子峪，就安然无事了。日军登上长城，望南兴叹干没辙。

1943 年 4 月底的一天上午，大家正在熊羔子峪戴三哥家里的东屋专心致志地工作。我正在整理《搏斗》第三期稿子，苏光及其他人员赶印报纸。忽听“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在山梁放哨的戴三哥气喘吁吁地跑进屋来说：“快、快，北边发生敌情了！”大家赶紧收拾文件、蜡纸、钢板等工作物品，从墙上摘下各自的手枪。这时，枪声很乱了，苏光收拾完毕，催促快走。到了当院，从枪声发射的方向判断，敌人已从东、北两面山梁上围上来。往西南是通车道峪的沟谷，估计下营据点之日伪军可能顺沟钻上来。苏光当机立断说：“向南抢抓楼子山!”他的语音刚落，便当先冒着“嗞嗞”的子弹声冲出门外。随后，大家拉开距离也冲了出去。

南楼子山北面最为陡峭。我们爬上六七十度的陡坡，再往上几乎垂直，无路可走了。只好手附葛藤，脚登山砬，一步一步往上爬，速度大为减低，目标也就明显暴露了。敌人集中火力，从北梁、东梁向我们交叉射击。枪声、风声、飞弹、迸石，烟火一片。我们艰难地往上攀登。突然我的枪被打断，若不是我的右手紧握枪柄，那枪就掉下山崖去了，我把打断的枪往右手腕一盘，一鼓作气冲上山梁。大家正在焦急地等待我，苏光看我爬上山崖，不由得脸上发出一丝苦笑。

我们从敌人的火网中拼搏出来了，但是，所储存的纸张、油墨全

部损失了，熊羔子峪、杨木沟工作地点也已暴露。地分委书记李子光同志指示我们向承兴密联合县转移。5中旬的一天傍晚，高昌、苏光、陈大光、王雪松、国章还有警卫员占华、景隆一行7人，从前干涧出发，路经平谷县黑豆峪，再折向北，跨过四座楼山，抵达苍术会(密云县境)，西上大岭，在这里暂时安了家。

7月，中共冀热边特委成立，冀东西部建第一地委，除保持承兴密联合县以外，改划平三密、蓟遵兴等联合县。李子光任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方治平、高昌分别担任地委宣传部正副部长职务；陈大光调地委任宣传部干事。同时调杨晓峰、苏健来《搏斗》社工作，积蓄力量，准备筹建《救国报》分社。

8月，《搏斗》社从大岭转移到大黄岩。在大槐峪出版了《搏斗》第六、七合刊。到冬季，伪满军频繁奔袭扫荡大小黄岩及潮河川。我们在当地区委的帮助下，登上“万人梯”，进入“没门沟”。沟里只有一户李姓人家，我们在这里进行休整学习。

1944新年后，地委调我们随部队进入平谷。我们告别了李大娘一家，离别了从艰难困苦岁月中战斗过来的大黄岩。春节过后，在平谷北山的福吉卧组建《救国报》分社。高昌任分社主编，陈大光任见习编辑，苏光调地委宣传部，杨晓峰负责电台译电组工作，我负责刻印组工作。至此，第一地委的机关报——《救国报》滦西分社正式诞生了。

转自《万壑星火》

三　旷日持久的大屠杀、大检举

（一）日伪军对无辜百姓的大屠杀

日伪统治兴隆县近13年，屠杀民众2万多人。其中仅在1942、1943两年间，敌人大搞“无人区”过程中，即屠杀农民同胞1.5万多人，这在其它地方是少见的。

兴隆县是深山区，日军是在毁灭2000多个深山小村和继续禁绝这些小村再现人迹而“没完没了”杀人的。所以，兴隆县惨案的特点：是由极分散、极小、极多的个别惨案构成了极大的惨案。有文字记载的惨案数十起，被屠杀5200余人，占全县被杀总数的四分之一。主要有：

1. 西化鱼沟惨案

西化鱼沟，地处大杖子乡境内五指山北侧。这里山高谷深，树林茂密。

1938年10月，冀东八路军赖帮游击队两名战士，化装进入伪车河据点，将警察分驻所梁所长捕获，押到西化鱼沟村，经过对其抗日救国教育，梁所长应允暗中为抗日出力，给八路军游击队提供军事情报。梁所长释放回据点后，被日军宪兵特务察觉，告发给伪柳河口警察署。日军官闻知梁所长私通八路军后，十分恼火，将梁所长和西化鱼沟甲长扣押起来，严刑拷打，追问八路军的行踪。这两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什么也没有交待。次日，西化鱼沟村有人传出谣言，“大家出钱担保，可以把甲长放出来”。在大家忙于凑钱时，柳河口伪警察署日伪军100多人，包围了西化鱼沟村，打死无辜群众34人，造

成血腥惨案。

1943年，车河川高杖子是训练日本新兵的基地，驻有一中队日军，叫“安原”部队。同年夏季，安原部队去西化鱼沟讨伐，在王家庄杀死群众39人，并烧毁尸体，消灭罪证。

1943年秋，驻高杖子日军安原部队去蔡家庄（西化鱼沟村境内）讨伐，在小梁（地名）杀死10多人，烧毁尸体，消灭罪证。

2. 白马川惨案

白马川，位于县城东北50公里处大水泉乡境内。双庙警察分驻所警长刘贵才，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编成顺口溜说：“不怕枪杀火烧，就怕刘贵才走一遭”。

1939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初四），八路军游击队队长沈荣久，应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带领战士在安子岭将刘贵才抓住，同时还抓了8个伪警察。所俘警察经过教育后释放，只把刘贵才押至糜子地的十八盘就地处死。双庙警察分驻所的日警申春、滕田听到这个消息后，即从兴隆警察署调去大批警察，配合日军包围白马川，将无辜群众驱赶到一个院子里。一个小胖墩日本军官站在高桌上嚎叫着，要群众检举谁是八路军，要是不说，就把你们的脑袋砍下来。这时，场上鸦雀无声。日本军官恼羞成怒，一招手叫过来两个警察，从人群把王立福、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雨、李永玉和一个被刘贵才凌辱过的妇女捆了起来。这个日本人一手夺过警察手中刚刚烧红的烙铁，照着王立福的头上就是一下，吱啦一声，一股白烟升起，王立福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又一烙铁，王立福头上出现两道深深烙印，昏死过去。一桶凉水浇过去，王立福睁开眼，立即被架起来，接着用烧红的铁筷子在王立福的头上吱吱啦啦地烙着。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雨、李永玉也都先后被打翻在地，不停地往嘴里、鼻子里灌凉水、煤油……这7个人受尽种种酷刑之后，谁也没供出什么，最后被一个

个拉到广场东边大坑旁处死。

数日后，这伙日伪军把该地三四百群众驱赶到广场上，令其列队站好。伪警长手里拿着一根藤条，藤条头上结个大疙瘩，一排一排地逐个抽打。农民管得清躲避不及，脑袋被打了一个大包倒在地上；一个姓张的村民头也被打的鲜血直流，群众怒目而立。广场前停放着一口棺材，刘贵才的老婆哭哭啼啼，硬要群众个个给刘贵才磕头烧纸，烧纸时还要念叨“×××给爸爸烧纸来了”。村民杨永德怒火涌上心头，走到棺材旁，大声地说“花钱了，花钱了，爸爸给你烧纸来了”。日军听罢将他一刀砍倒。第二个姓万的群众，死也不肯向前，也被砍了一洋刀。接着又把缪从善、葛成春拉出来，他们视死如归，昂首挺胸，立而不跪，被日本人双岛举起战刀将他俩当即砍死，并掏出心脏，架起锅灶煮熟后，被双岛、来旺两人吃掉。

3. 狗背岭惨案

狗背岭，位于县城西30公里处，属六道河镇朱家沟村境内。南、西部隔明长城与平谷县接壤，东部隔山是明子沟据点，北面出沟是六道河和三道河据点。境内峰峦叠嶂，沟壁纵横，林木茂密，山石奇峻。有朱家沟、小西天、没门沟、黄鱼坑，大椴洼、小椴洼、神仙胡同、响水湖等自然村落。有170多户人家，370多口人，分散居住在二十几条沟沟岔岔里。

1941年1月25日，伪兴隆县警务科得到狗背岭山后朱家沟、小西天、响水湖等地有抗日政府工作人员活动的情报后，立即派遣六道河警察分驻所警察前去搜捕。伪警察一进山后，遇到了在此地休整的八路军部队，遂将犯敌抓获。伪兴隆县警务科长，日本军官神内兼一听到后，大动肝火，亲自带领200多日伪军前去“围剿”。日军进山后，八路军早已撤离。神内兼一气急败坏地嚎叫：“山里百姓坏了良心，抓到后格杀勿论!”命令下达后，日军施以疯狂的报复行动，烧

毁民房154户，惨杀无辜群众47人。

1943年10月6日，日本宪兵队和兴隆县警务科又组织千人大“扫荡”。在朱家沟一个山洞里，杀害群众27人，其中张顺一家被杀害6人。

1944年11月27日，密云县后深辅据点之敌“围剿”小西天，抓捕群众30余人，其中杀害28人。

1945年1月20日，日兵进山“扫荡”时，杀害群众16人。

1941—1945年，狗背岭遭日伪军杀害207人，占全村总人口56%。抢走粮食1.5万公斤，大牲畜51头，羊255只，猪100头。

4. 茅山（今青松岭）惨案

茅山村，位于县城西南25公里处。抗日时期是日伪军警特重点防御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日军军火库所在地。

1941年9月18日夜，茅山警察署及花市矿警队，被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第八区武装基干队攻克后，促使100多名警察反正，加入八路军十三团。此举震惊日伪当局，便施以多种手段，在茅山一带制造了三次骇人听闻的惨案。

第一次是，同年10月下旬，日军储藏在茅山村公所内的1000公斤白面（面粉），被暗中运走。为此，日军更加恼火，次日便组织军警逐村搜查，但一无所获。日伪怀疑丢失粮食与茅山及附近村庄群众有关，就派特务暗中调查。几天后，特务搞了个常与八路军有联系的名单。然后由警察署出面召开茅山、果园、老营盘等村的牌、甲（行政组织）长会议，声称救济百姓，发放火柴、煤油、食盐和布匹等日用品，通知各村居民每户去一大人到警察署院内领取。各村群众到齐后，突然关上警察署院的大门，便把20多人关押起来。11月13日，快活林、北三岔口、果园、老营盘等几个村的10多名群众赶着毛驴往茅山送“组合粮”。日军见粮食太秕，便大动肝火，一日本军官大

骂道"你们这些山耗子，良心的大大的坏了！"一个汉奸也在旁随声附和地说："弄点破秕高粱欺骗皇军，你们全他妈的是通八路军"。就这样，10多个无辜群众也被抓进了警察署。中共地下工作者、茅山村的共产党员郭文焕，公开的身份是给警察署作饭。他与茅山村的地下办事员温秀芝密切配合，经常往外传递情报。11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因有特务告密，郭文焕、温秀芝和其他两名村干部同时被捕，关进茅山警察署。从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仅一个月的时间，在茅山就抓捕无辜百姓50多人。这些人关押在两间小屋里，吃住、拉屎、撒尿都在一起，气味难闻，很多人生了病。日伪军每天对被关押群众进行轮流刑讯，每个人都被打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却一无所获。12月上旬，将快要死的20来个人释放，其余30多人押运到兴隆，在县城南土门"万人坑"枪杀了20多人，剩下的10多人押送承德和东北锦州监狱，没有一人生还。

第二次是，1942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在石门台一带活动的八路军十三团某部两名侦察员，在茅山一带侦察敌情。第二天早晨，这两名侦察员在返回石门台的路上，被去石门台"扫荡"的伪军发现。两名侦察员边打边撤，恰巧与八路军岗哨相遇，哨兵迅速向部队首长报告，八路军火速出击，在石门台与茅山交界的线岭梁上展开阻击。仗打得很激烈，从早上打到下午，日伪增援部队赶到时，八路军部队已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毙伤日伪军20多人，一小队长被打死。日军在这次战斗中吃了亏，更加怀恨茅山群众。

3月8日（农历正月廿二）下午，兴隆日本宪兵队30多人，由特务王浩信带路来到茅山村。有群众问王浩信："鬼子是不是又来抓人？"王欺骗说："皇军是来维持治安，帮助集家的，不要怕"。第二天（9日）拂晓，日本宪兵队和附近几个据点的伪军、警察共300多人，开始在茅山、果园、东峪、老营盘四个村挨门逐户搜查，见男人

就抓。因是突然袭击，村民多未起床，时间不长，就抓捕320多人。被抓的人全部用绳子勒住脖子，7个人拴一串，两侧由端着刺刀的日伪军押着，驱赶至茅山村苏家的两个大院里。上午9时许，在院里燃起大火，摆上各种刑具。一个日军军官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公粮藏在哪里？"特务王浩信也在旁边诈唬说，"不说就都把你们活埋了"。被抓的人没有一个吭声的，都用愤怒的目光瞪着敌人。中共地下办事员陈福生被日军从人群中拉出来，按在地上，遭日军棍棒一阵毒打，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当他醒来时，日军继续逼问，可他什么也不说，紧接着又是一阵毒打，先后被打昏三次，结果什么也没捞到，最后被日军活活踹死在当场；茅山村民董信被灌饱凉水和辣椒水之后，被日军扔进熊熊大火之中，衣服、头发都被烧着了，群众一涌而上，把他从火堆里抢了出来，幸免一死。果园村李银、张重、刘春、李俭和茅山村的于占全、纪福洪父子等人都被扒光衣服，有的被灌凉水和辣椒水，有的被压杠子，有的被棍棒毒打，而后又被绑在梯子上，再用火前后烘烤。经过一天的刑讯，日军将预先调查的名单上的人继续扣押，其余250人刑讯后释放。

3月10日早晨，把折磨的奄奄一息快要死的10人扔到路边的臭水沟里，将其余61人押运到兴隆县城。当晚，把这61人和在其他地方抓来的几百人一同关押在几间小屋内。后经伪锦州治安法庭人员和承德检察官员吴宝钩等人审讯后，一部分被屠杀在县城南土门"万人坑"，大部分送往承德、锦州监狱，只有老营盘村王春一人逃回，其余人员全部死在外地。茅山村东坡20户人家53口人，被抓遭惨死的28人，占全村人口的53%；陈廷洪4个儿子被抓走了3个，陈廷启3个儿子被抓走了2个……。

第三次是，1943年3月19日下午，日军承德宪兵队生田大尉率领140多名宪兵，偷袭境内茅山至蓟县黄崖关一段部落（人圈）以外

的稀散村庄。抓捕居住在零散房屋里的卧病老人和怀抱幼儿的妇女39人（其中35名老人和4名吃奶的孩子）。日军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命令："在赤化地区，必须彻底的扫荡肃清，不留一草一木"。日军将39名老幼全部屠杀。其中，日本宪兵水野、高桥、田中、尾崎和植松5人，抢杀45岁至60岁的妇女9人、60岁左右的老翁5人、两岁左右的女孩1人。在高梁秸和蒿草洒上汽（煤）油，放火焚尸消灭罪证时，植松犹豢将3名尚有呼吸的被害者一并烧毁。

5. 前干涧惨案

前干涧，位于陡子峪乡境内。

1941年秋后，八路军十三团一个连在前干涧村一个峡谷设伏，将茅山伪警察署进犯的伪军击溃，毙伤10多人。驻扎在兴隆县城的日本宪兵队得到消息后，便集中100多日伪军，对前干涧村进行报复。当地群众见日伪军大部队进山，预感到凶多吉少，便纷纷向深山密林处转移。日伪军进山后，只抓到病残群众19人，其中有两名年轻妇女。日伪军把被抓捕群众聚在一起，将男女衣服扒个净光，然后持棒乱打。凶狠狠地追问八路军藏在哪里？跑向那个方向？19名群众被日军打得血肉模糊，无人招认。日军气急败坏，将被抓捕到的19名男女群众，驱进一个农户家的萝卜窖里，又从附近农户家搬来几百斤柴草，塞进萝卜窖后用火点燃，并封住窖口，被抓捕的这19名群众就这样被烧（熏）死在萝卜窖中。

6. 南土门惨案

南土门，位于县城南1公里处的兴隆镇境内。

1942年1月，日军因遭受兴隆各地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不断损兵折将，十分恼怒。加之伪满政权要求兴隆县征募几千劳工，在一个月内送往黑龙江修筑靠近苏联边界的"国防工程"及到抚顺、北票、阜新煤矿去挖煤。经伪兴隆县公署与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关东

军八八一夏道联队、县警务科共同议定，出动日伪军3000多人，在兴隆县境内统一行动，实行大“检举”，抓捕抗日嫌疑分子和深山群众2000多人。除在当地零散屠杀400余人以外，对怀疑有私通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人员，做为审查重点对象，捆绑押送到县城，关押在临时设立的留置场（拘留所）内。经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逐个刑讯逼供后，将200多人以“政治犯”、“国事犯”、“思想犯”等莫须有之罪名，押到南土门杀人场杀害。其余被抓捕的1400多深山居民，用车送往东北黑龙江修筑“国防工程”，或送到抚顺、北票、阜新煤矿当劳工，绝大多数人死于他乡。

1943年冬，伪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别治安法庭来兴隆，以“通匪”罪名判处38名无辜群众死刑。在南土门行刑的是特邀日本宪兵兴隆派遣队队长准尉内田一平（老百姓叫他大胡子魔鬼），一人用战刀连续砍死38名无辜群众。见死者是健壮男子，便当场剥下其心脏。南土门农民刘焕田，见一个日本特务吞了一个活人心，被惊吓至死。

1944年1月6日（农历腊月十一），伪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别治安法庭再次来兴隆，仍以“通匪”罪名判处51名无辜群众死刑。行刑时，为锻炼日军新兵胆量，日军方强制新兵每3人为一组，齐举刺刀以被无辜判刑群众为靶子练刺杀。另外还有日军从六里坪山洞内抓来的3名道姑。日军将3名双手合十、口中默默诵经的道姑一齐刺死。为消灭罪证，将54具尸体埋在一个大肉坟里。

7. 小东区惨案

小东区，位于县城东北4公里处的兴隆镇境内，是兴隆通往承德的必经之路。日伪实行集家并村时，把周围零散住户和大灰窑部分住户驱赶到这里，建成小东区部落，分东西两甲，共250户1200人。

1942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三），小东区“跑会”（即公务人员）的马祥瑞，奉命带领武装班长王力之子小沉头和李永福等13人，

给驻在楚榆沟的八路军某部送给养（小米及鞋袜等），马祥瑞带收条回来。次日，他去商铺卖茶叶时，遇到10多个特务拦路搜查。为避开特务检查，马祥瑞绕道向东北方向河套跑去。特务们便尾追上来，在追赶时日伪军开枪，马祥瑞腿部受伤后被抓住。搜身时发现了八路军的收条，便认定他是八路军的密探，随即押送县城。同时，八路军一名工作人员住在朱胡子沟（属小东区范围）宋连仲家，被突然进沟搜查的特务抓住。宋母胆小怕事，又怕受牵连，经再三央求，将八路军工作人员释放，把群众张富抓起来顶替八路军押送到县城。伪副县长西山（日本人）得知这两条消息后决定，立即对小东区进行一次大检举。

2月1日（农历腊月十六）凌晨，在西山的指挥下，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和兴隆警察署长张福庆率日本宪兵和刘其昌讨伐大队的百余人包围了小东区，封住部落四门，便逐户搜查，见男人就抓。数个小时之内，抓捕上至70岁以上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儿童140多人。分别集中到李稳、吴玉满和李振远三家院子里，用绳子绑起来，穿成长串，而后押送县城留置场（拘留所）。用灌凉水、压杠子、灌辣椒水、手指插竹签等各种酷刑，想从被抓人的口中捞到线索。十几天以后，不得不将年过花甲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孩子放回。2月20日（农历正月初六），在县城南土门“万人坑”屠杀50人，另有其他村无辜群众17人，惨遭杀害。被害者尸体无人敢去认领，被野狗撕扯遍地，惨状目不忍睹。

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三），小东区群众王惠林，正在槟榔沟八路军办事员杨守仁家躲避，刘其昌讨伐队100多人，由特务潘洪带路再次进行大搜捕，先进槟榔沟杨守仁家把王惠林和一个姓岳的群众抓走，而后去荞麦岭抓人。村武装班长见讨伐队来抓人，刚转身想跑，被伪军发现，当即开枪将其打死。随后日伪军又到大台子，抓了几个

赶驮子的人。接着又到红石坑和大灰窑等地抓人。这次共抓捕无辜群众 80 多人。被抓的人分批带到县城聚仙楼饭馆审讯。3 月下旬，把从大灰窑和其它地方抓捕来的群众，除在县城就地处死 20 人外，余下的 150 多人押运承德监狱。在承德又经过多次审讯后，17 人被枪杀在承德水泉沟；2 人以“通匪”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40 多人处以 15 年以上徒刑；其余送往东北各矿山充当劳工，绝大多数被折磨而死，只有刘思荣、于云才、高东田、王惠林 4 人死里逃生。

8. 上庄惨案

上庄的真实地名叫厂沟。抗日战争时期化名上庄，名称沿用至今。位于安子岭乡境内，是抗日根据地之一。迁（安）遵（化）兴（隆）抗日联合县工作人员经常来此活动，八路军十二团、十三团指战员也经常来这里休整。

1942 年夏季一天，日本关东军八八一夏道联队，得到上庄村住有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情报后，调集 500 多兵力，从半壁山、白马川两路合击上庄村。此时，八路军早已撤离。日伪军扑了个空，便把目标转向老百姓。以窝藏八路军等罪名，抓捕无辜群众 80 多人，强令站在山坡上，用数挺机枪当成活靶射击，80 名群众全部遇难。日军在搜捕过程中发现吴凤燕等 5 人隐藏在烧木炭的窑内。日伪军不敢冒然入内，诱骗窑内群众出来，群众誓死不出来。最后日军竟向木炭窑内放火，将窑内 5 名群众活活烧死。

9. 石门台惨案

石门台村，位茅山镇境内。这里沟壑纵横，山石陡峭，森林茂密，是抗日根据地之一。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抗日人员经常在这里活动，八路军十三团经常来这里休整。兴隆日伪机关把石门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派兵“围剿”。

1942 年 9 月，中共冀东西部地委书记田野来石门台村小砂峪沟

治病养伤时，被茅山日伪据点获悉，遭刘其昌讨伐大队重重包围，田野书记在突围战斗中牺牲。兴隆日本宪兵队、关东军八八一夏道联队、县警务科认为石门台是共产党、八路军指挥机关所在地，连续派重兵围剿。在反复"围困"一个月过程中，屠杀无群众48人，其中有幼儿7人，被抓捕后死于外地16人，因冻饿死7人。死亡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30%以上。烧毁民房410多间，抢走大牲畜12头，山羊540多只。

10. 灰窑峪惨案

灰窑峪村，位于三道河乡境内，东部与迁西县龙井关只有一墙（长城）之隔。抗日时期常有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在此活动。因此，日军决定对这里进行"清剿"。

1943年2月初，兴隆县日本宪兵队命令三道河警察分驻所所长扬文宏，把灰窑峪、高台子、二堂村群众聚集一起，然后警宪特联合行动，抓捕抗日分子。扬文宏领命后欺骗群众说：明天县警务科官员要到这里巡察防务，村民们要集中一起，表示隆重热烈欢迎。次日上午，村口处放着烟茶，列队欢迎县警官。半壁山警察署的日本队长渡边，带领200多人日伪军迅即将列队群众包围，抓捕续成发、续成明、李如树、张久善等200多人。皆以私通八路军等罪名，押解至承德、锦州等地处死。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仅有李恩德等少数人幸存。

11. 大帽峪惨案

大帽峪（亦称大磨峪）村，位于县城东南60多公里处蓝旗营乡境内。背靠五指山，是五指山抗日根据地前哨阵地。这个村经常掩护八路军和中共地方工作人员从此地通过。大帽峪惨案，是日伪在瀓河川50个部落（人圈）中制造的惨案之一。

1943年初，日本驻锦州西南防卫司令部接到兴隆日本宪兵队

“关于兴隆县潵河一带都通八路军”的报告后，即派出军事法庭人员，于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秘密来到潵河川进行调查。

2月7日（正月初三）下午4时许，八路军部队一个排从北面来到大帽峪，准备天黑后穿过公路越过潵河进关（遵化）。黄昏，两个特务（高占英、王贵山）向村口奔来，与正去换岗的民兵曹万章相遇。特务抓住曹便问部落里有没有八路军，曹回答没有。特务打了曹一记耳光继续追问。这时在部落大门里警戒的八路军侦察员向特务开了枪，高占英被打死，王贵山逃跑。八路军部队当即向北撤退。为防止日军报复，12名村干部和民兵也随部队北撤，其他群众也相继隐藏起来。

是日夜，驻兴隆日伪军警宪特同时出动，在警察署和孙德队（讨伐大队）配合下，将大帽峪村包围起来，先把山坡上的柴禾垛燃着，顿时大火冲天，照得整个部落通明。藏身的群众以为房子被烧着，纷纷回家抢东西。日伪军趁机窜进村里挨门挨户去抓人。把大帽峪被抓捕的73名男人同其他部落抓来的人统统关在蓝旗营部落中的一个大院里。第二天，日本宪兵在被抓的大帽峪村民的鼻子上染上颜色，左臂上系上白布条。对所有被抓的人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三天，被抓的人饥渴得将院里泔水都抢着喝了。随后，日军开始刑讯逼供。通过翻译追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公粮在什么地方？说不知道的就用火烧、灌凉水、轧杠子。在日伪军威逼刑讯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大帽峪村马永兴的父亲被火烤得身上流油，棉衣都湿透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同村的司俊雨视死如归，拿起劈柴把伪军记录官打蒙，最后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审问一个姓梁的哑巴时，哑巴拿起劈柴打了日本审讯官，也被日军当场挑死；日军边用刑边追问曹清时，他始终是一句话：“我说你妈×呀！”；还有同村的靳志三，对审讯的日军总是大骂不绝，日军用刺刀挑了他，第二天死去……。日军在4天里轮番审讯

中，用尽了所有酷刑，但最终仍一无所获。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早晨，伪军大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到晚上，把大帽峪被抓来的40人用汽车押送兴隆，剩下的33人连同其他村被抓捕的50多人被驱赶到蓝旗营南坎下，面朝南背朝北跪下。尔后，日军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点燃，顿时大火冲天，映得大地通明，日军上好刺刀，一个对准一人的背，听到一声"杀"的命令后，众人纷纷倒下，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劫后余生的只有杨茂林一人，他是在众人被押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乘日军去北大道站岗之机，挣脱绳索逃出去的。他头上挨了两棍，左肩中弹，幸免遇难。

大帽峪村被抓捕73人，就地杀害和以后死在外地的共72人，其中9户被杀绝，30户的男人被杀，成了事实上的"寡妇村"。惨案后，日军和特务又到该村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惨案直接造成疾病和冻饿死的又有86人。从发生惨案到1945年8月，大帽峪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66人，占惨案前总人口的80%，幸存的老弱病残41人。

12. 楸木林惨案

楸木林，地处县城东南50多公里处半壁山境内。日伪统治时期集家并村后叫楸木林部落。

1943年1月，村里来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把伤病员转移到沟门子（安子岭）"无人区"，借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两人护送。不幸到靳杖子村时，被常驻佛爷来的特务阚少贵和金明贵两人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八路军伤员和护送的两位老农坚贞不屈，先后被日伪军杀害。兴隆县城的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又抓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便引起警觉。

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刘其

昌讨伐大队进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全村人集中到村口处，四周架起机枪。村民白恩潮外出归来刚进村，一看形势不妙，便想躲开，不料被两名讨伐队警察发现，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又从各家搜来不少绳子，将 18 岁以上男子统统绑起来，后来绳子不够，就几个人拴成一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讨伐队将被抓捕的人驱赶着出村，因瘸子走路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放了他一条生命。日伪军从楸木林村抓走 107 人，押到屈占久家大院里。一日本军官通过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袜，说吧！不说，统统死了的有！"。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帐，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喊叫了四十几个人的名字，可没有一个人答理他。日军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伪军一拥而上。白景文被吊在窗钩上，用荆条狠抽，逼问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景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白玉升被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朝被绑在梯子上往鼻子里灌凉水；还有的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日伪施以各种毒刑，但始终没有一个招供。最后日伪军红了眼，使用"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上绳索，后边插根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来；每二绞把人的眼珠挤出来；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日伪军对白瑞林每绞一次之后，就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表示死也没啥说的。就这样，白瑞林被活活绞死。

天黑下来，日伪军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讨伐队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着被绑的人劈头盖脑地打来，每个人两镐把，结束了当天的刑讯。天黑后，白恩潮心想，看这阵势，要不逃走，绝无生路。随即用脚踩了付老二的脚，对着他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付老二说："行吗?""不跑就没命了"。付老二就给白解开绳子，然后白又给付解开绳子。互相帮忙，先后将付玉来、陆

荣贵、崔德生、崔永明、崔永亮的绳子解开，这7个人憋足劲，一跃翻墙而过，撒腿就跑，没跑出多远，就听到枪声，崔永明中弹倒下，其他6人死里逃生。剩下的99人，用四辆汽车押至兴隆，在南土门“万人坑”杀死43人（其中1人当场中弹未死，逃至家中后死去），另外，56人被押送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这个只有55户210口人的部落，惨遭杀害的101人，其中21户被杀绝，有21多户没了男人。

13. 靳杖子惨案

靳杖子村，位于半壁山境内北部。

1943年2月初，半壁山讨伐大队夜间巡逻时，发现靳杖子村群众于深夜往北山运送粮米。将此事报告了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特务系主任松山义雄。日军认定靳杖子村群众中有私通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人。于是，2月9日上午，联合正在此地“扫荡”的刘其昌武装警察讨伐大队200多人，包围了靳杖子部落。公开通知18岁以上男人到小学校院内去照像，说是准备发放居民证书，暗地里却大批抓捕无辜群众。进院一人，日伪军便用绳索捆绑一人。半天之内，共计抓捕196人，只有在学校内小学教员吴学温屋里躲着的3人未被抓捕。日军将这些人押解到半壁山警察署院内关押起来，用拳打脚踢，木棒打、凉水灌等酷刑，逐人进行审问。最后把年迈的86名老人放回，其他青壮年110人送往承德、北票、本溪、黑龙江等地做苦役。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仅有4人幸存。

14. 小水泉惨案

小水泉（今珍珠村）村，位于八卦岭满族乡境内。南与遵化县大安口只有一墙（长城）之隔，抗日时期常有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在此活动。

1943年2月上旬，伪兴隆县倒流水警察署的两个特务，伪装后

到小水泉村探密，被当地农民识破，被游击队抓获后予以镇压。伪倒流水警察署绰号叫大胡子的日军中队长得到消息后，于2月14日带领日伪军200多人，对小水泉等村进行“围剿”。抓捕小水泉、冷嘴头、草场、大安口等无辜群众300多人，其中抓捕小水泉村群众108人。日军中队长大胡子在黄花峪把被抓捕的70多人塞进一个菜窖里，点燃干柴将人活活熏死；还把一名孕妇用绳索捆住手脚，摁进一口棺材里，用刺刀剖开腹腔，取出胎儿，强令被抓捕妇女围观。其惨忍暴行，令人发指。

15. 六拨子惨案

六拨子，地处挂兰峪镇境内。抗日时期属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六区。八路军在这一带多次拔掉三拨子、六拨子、四拨子等日伪据点，因而这一带驻扎日军，严加防范。

在六拨子村土岭沟里，有一座巨大坟墓。坟墓前立着一块墓碑，上面刻着这样的碑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到处烧杀枪掠，实行‘三光’政策，无恶不作。1942年冬，曾在此地一次屠杀我革命志士五十七人。为使后代永远不忘阶级苦、民族恨，特立此碑，以做悼念。”每当人们看到这座大墓，就想起那次颤人心弦的惨案。

墓碑上刻记惨案发生的时间是1942年冬，这是人们习惯农历计算的缘故，公历却是1943年2月。

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七）下午，抗日游击队从八仙桌子出发到龙洞峪村进行休整，路经三拨子时被驻在该据点的日军守备队发现。于是，三拨子的日军火速通知六拨子日军守备队长一田，调集遵化县南大屯日军宪兵队、马兰峪日军宪兵队，蓟县马伸桥讨伐队和倒流水警察署等地的日伪军、警约500余人围剿八路军。

23日清晨，日伪军从锅腔沟、水口子、南峪、茶叶木四路进兵，包围了龙洞峪村的西拉蔓。游击队有3个排，岗哨发现日伪军后开了

枪，当场把六拨子日军守备队副队长打死，随即边战斗边从西面迅速撤离。日军不但未能消灭游击队，反而挨了打，便挨家逐户地搜查。付老五的妻子、张体财的母亲、妹妹（6岁）、黄海峰的母亲、哥哥（13岁）、妹妹（7岁）等9人（其中5个小孩），藏在付老五家的萝卜窖里。日军发现后，就把大量的谷草、秸杆点燃后扔进窖里，将这9个人活活地熏死。

24日清晨，日军在西拉蔓抓捕张荣成、见德田等30名青壮农民。在进攻龙洞峪，途中还抓捕江湖峪、马兰峪起早赶路和打柴的20余人。在押解去龙洞峪的途中，有4人行走不便，被日军用刺刀逼进王胜超家的萝卜窖里，也被燃起柴禾、干草熏死。日伪军押着两次抓捕的群众去六拨子据点，经过柴高树密的山路里，跑掉了10余人。路过二拨子村时，日军又抓捕了段英、段有发、邢山、周真、周发、段有发的弟弟、高前援的哥哥等9名群众。日军将被抓捕的49名群众带到六拨子据点后进行了审讯，还让他们唱歌、扭秧歌。因被抓群众不屈服，有4名群众当场被马兰峪的日本宪兵用刺刀开膛，剜下了血淋淋的人心。下午4时左右，其他日军撤走，六拨子日本守备队用烟绳子，把被捕的群众拴成串，每串14人，押到小土岭。威逼住在部落里的一个叫张五的农民挑来一担凉水，强迫那些被抓来的群众面朝东跪下，日军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屠杀。每刺一刀，蘸一次凉水，用刺刀一连挑死无辜群众44人。只有被绑在最后的见德田拼命地挣脱掉棉袄，猛然向山沟里跑去，幸免一死。

25日清晨，日军为掩盖屠杀罪行，又来到小土岭，用柴禾烧焦了一具具死不瞑目的尸体。日军走后，当地群众暗中掩埋了被害同胞，因天寒地冻，挖不出墓坑，只好把48具尸体（包括刑讯时杀死的4人）垛起来，四周用石头垒上，砌成一个巨大的肉丘坟（碑记刻着遇难的57人，包括在龙洞峪村遇害的9人）。

16. 清水湖惨案

清水湖，位于雾灵山西麓的深山丛林中上石洞乡境内。抗日时期是小黄岩川抗日根据地中部的一个村庄。这里是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三支队、李满盈游击队和平（谷）密（云）兴（隆）、承（德）兴（隆）密（云）两个联合县先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1942年以后，日伪把这里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清水湖人民顶住了日军“三光”政策的暴行，没有一户进部落，长期坚持战斗，经受了日伪一次又一次的大扫荡。当年日伪军到大、小黄岩一带扫荡数十次。

1943年2月2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拂晓雪停后，驻北双洞的马玉队、六道河的刘其队、三道河的宋庆队，还有日军共300多人，分四路进攻清水湖。日伪军沿着群众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追进南沟。因山陡路滑，柴草丛生，日伪军行动困难，想放火烧山，但因雪大，点了几次都没点着。日军就向对面和一座小山上爬，把机枪架在山梁上，疯狂地向南沟进行扫射，发现一个打死一个。有的无辜的群众被乱枪打死在树下；有的被打死在柴草丛中；有一位母亲抱着小儿子，被一颗子弹穿透了母子俩的胸膛。这次扫荡被日伪军打死在南沟的群众22人（包括米铺村的10人）其中有8名儿童。庄子路一家4口人，全部被打死……。

清水湖，一个仅有380口人的小山村，在日伪数十次扫荡中，被杀害的就有140人，占全村总人口的36.8%。

17. 栅子沟惨案

栅子沟村，位于县城西北小黄岩川的深山沟里的上石洞乡境内。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游击队和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第三区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廿三），已经下了几天大雪之后，

天还没亮。特务夏柱清（上石洞人）、任瑞凤（栅子沟村人），带着北双洞的石振队（讨伐大队）、三道河的宋庆队、六道河的刘其队计300多人，将栅子沟的南大门苇子坑自然村包围起来，在苇子坑通往各山梁的道口上都架起机枪。当群众发现被日伪军包围后，迅速向山上转移隐蔽时，灭绝人性的日军用机枪向人群扫射顿时，群众一个个地倒下去。一位年轻的母亲死后还抱着婴儿紧紧不放；一位刚分娩的母亲和刚来到世上婴儿同时被打死。苇子坑自然村70多口人，其中被屠杀50多人。许文春家死了3口、许俊来家死了6口、许文林家死了4口、许文来家死了5口，只有外出未归的10余人幸免遇难。

1943年冬天，刘其队、宋庆队、马玉队又来这里扫荡。在栅子沟的南山洼里，将20多名男女老幼围住，把村干部佟起生（化名岳山）的老父亲佟文荣、干部家属夏全清及一位老师崔善亭3人绑在大树上，逼问他们当村干部的儿子都藏在什么地方，八路军、区小队常在什么地方活动。老人们始终坚强不屈，死也不说，日伪军便在3人的脚下架起木柴燃起熊熊大火。佟文荣、夏全清的双脚被烧燃，老人死去活来；日伪军刺佟文荣7刀，死后被抛进火堆；将崔善亭老师带到三道梁上用刺刀挑死；其余妇女和孩子都被带到山里的一个破庙内，趁伪军上山再次搜捕群众时都跑掉了。

1944年冬，驻扎在好地子村的马玉队80多人再次到栅子沟的杨树沟自然村扫荡。朱玉山的母亲体弱多病跑不了就藏在地窖里，被日伪军从窖里拉出来枪毙后，还残忍地割下她的耳朵和嘴部。这次扫荡屠杀无辜群众10余人。

1943年初至1944年冬，日伪屠杀栅子沟无辜群众共126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2%。

18. 张杖子惨案

张杖子村，位于蘑菇峪乡境内。这里群山交错，交通不便。

1943年4月，驻柳河口据点的日伪军探知冀东第十三专署专员焦若愚、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书记宋诚，在张杖子转角楼一带活动，便集中200多兵力进行围剿，但扑了个空。于是在聚宝盆（地名）抓捕群众13人，追问焦若愚、宋诚的去向，无人告知。13名群众全被枪杀。5月，日军再次“围剿”张杖子村，在城墙沟枪杀36人。数日后第三次“围剿”时，在张杖子村枪杀12人。仅两月时间，张杖子村先后有61人被杀害。

19. 驴儿叫惨案

驴儿叫村，位于半壁山镇境内。这里坡陡谷深，交通闭塞。

1937年1月，县境内第一个中共支部在这里建立。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指战员经常在这里休整。冀热边区党政军机关经常驻扎这里，指挥长城内外军民进行抗战。

1940年，日伪把这里划为“无人区”，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农户中的房屋被日军烧了盖，盖了又烧，烧了草房搭窝棚，烧了窝棚住土洞，反复达22次之多。

1943年夏，兴隆日本关东军八八一夏道联队同讨伐大队一起，对驴儿叫进行血洗。一天屠杀无辜群众50多人。秋季“扫荡”，又杀20多人，其中张振久家24人，一天内有8人遇难。

1942年，驴儿叫村有人口400多人，三年多的反复“扫荡”，频繁“围剿”，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止，遭惨日军杀害的250多人，占全村人口63%以上。

20. 车河堡惨案

车河堡，位于大杖子乡境内。

1943年夏，驻柳河口之日军得知五凤楼山区经常有抗日队伍活动，便派兵进山“扫荡”。一次进山日军遭八路军伏击，造成伤亡。日军便进行血腥报复，在西南沟杀害群众13人，在北沟门杀害群众

14人。后又抓捕34名群众押到车河堡村，威逼拷打，追问八路军去向。面对严刑，被抓群众，无一人开口。日军气急败坏，便将34名群众一起杀害。一年内车河堡村惨遭日伪杀害的无辜群众61人。

1944年春，日军驻车河堡佐藤（队长是日本人佐藤，绰号老豆包）讨伐队在车河堡杀死20多人，将被枪杀群众埋在3个坑内。

21. 姜家庄惨案

姜家庄村，位于大杖子乡境内，北与承德县交界。抗日时期经常有抗日队伍在此休整，日伪对此地抗日军民扫荡围剿越来越残忍，深山旯旮都要扫荡一次，甚至数次。1943年夏，柳河口之日军派兵“围剿”，便一次杀害群众15人。

22. 赵大地惨案

赵大地（今名解放），位于蘑菇峪乡境内。抗日时期人们盼望早日赶走日军，获得解放，而更名为解放村。

1940年2月，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建立的领导机关设在此地。日伪当局闻讯之后，扬言在八路军站脚的地方，要彻底扫荡，以绝后患。1943年夏，日伪军进山“扫荡”，在小连站（地名）杀害群众11人，后又在北沟杀害群众14人。

23. 蘑菇峪惨案

蘑菇峪，位于兴隆东部，与迁西、宽城两县交界处。

1943年秋，驻扎在蘑菇峪警察分驻所的日伪军，到五指山东侧的三道梁、二道岭、李杖子、双塘子、张杖子、孙杖子等地“扫荡”时，发现深山里有人种植玉米、高粱等农作物。日军官认为深山有人能种粮食，就能给八路军吃住，将构成大患。便命令士兵毁掉青苗，并抓捕隐蔽在密林里的无辜群众52人，押回到据点内。由于白天进山身体疲倦未能审讯，深夜有5人挣扎逃走。翌日早晨，日军官发觉后勃然大怒，将未逃离的47人押至黑石湖峪，用刺刀刺死，只有闫

起一人后背挨了12刀，忍痛假死，留下一命。

磨菇峪的黑湖峪，是日伪军重点杀人场之一。此地界于五指山背后“无人区”和集家区之间，从方园35公里抓来的人大都被杀在这里。1941—1945年，在此地被杀的民众在300人以上。1943年一次，日军抓来3个姑娘，扒光衣服，再用刺刀挑死；一次，从清河口抓来5人，杀死4人，剩下一名张姓媳妇“配给”姜大祥讨伐队的一名警察了。1944年秋，在部落里居住的赵明永、陈书田目睹日军一次挑死12人。



日军原杀人场周围仍然遗骨累累

24. 河南大峪惨案

河南大峪，位于蘑菇峪乡境内。抗日时期冀东《救国报》在河南大峪村出刊。

1943年秋季，驻蘑菇峪姜大祥讨伐队从滦河沿一带“无人区”抓捕23名群众。在老郝家住一宿，第二天从河南大峪到刘庄，将从北兴隆抓来的妇女张赵氏（带着3个孩子）和老郝家的一个妇女配给了警察，其余的18人均被日伪军用刀刺死。其中北兴隆的张连兴父子（儿子狗剩十几岁）被捅了数刀而死。

1943年冬季，青龙县瀑河口日军20多人，到河南大峪骚扰，遭承（德）青（龙）遵（化）抗日联合县余光部队伏击，击毙日兵3

人，其余溃逃。翌日清晨，瀑河口日军200多人，“围剿”河南大峪，进行报复。群众视日军兵力众多，来势凶猛，纷纷向密林深处转移。日军抓不到人不甘心，进行大面积搜捕。在一个峭壁下抓捕躲藏的无辜群众20人，全部杀害，其中张文山全家11人，无一幸免。

25．中田惨案

中田村（今羊羔峪），位于安子岭乡境内。是个深山区，北靠高山屏障，有海拔千米以上的五指山、五凤楼、大石镐、摩天岭、大小十二岭等大山天险。层峦迭嶂，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洞多穴深。由窟窿石、水泉子、大西山、岭根下、东台子、羊羔峪、大门沟、沟门子、老虎沟、东台、椴木岭、大石头后、伊大地等13个自然村组成。

1939年9月，八路军干部周家美、马骥、杨志林各率一个连在兴隆境内东部横河川休整。羊羔峪化名中田村，是周家美根据第一任办事员付进中（忠）和武装班长付国田名字中最后一个字而起的名。

1943年11月初，半壁山警察署邢长林讨伐队进山“扫荡”时与八路军十一团一部相遇，讨伐队伤亡严重。11月11日（农历十月十四），日军便从兴隆调集关东军八八一夏道联队500余人，对中田、沟门子、天桥峪、上庄、红石沟等地进行报复性“血洗”。中田村被日伪围困11昼夜，有247名无辜群众残遭杀害，其中在小黄木沟的炭窑里被日伪放火熏死11人；霍玉成妻、张凤彦妻两妇女怀抱刚1岁的小孩，被日军在山林中抓住，分别用刺刀刺穿两对母子四人的胸膛；藏在小天桥峪石洞里的11名群众，被日军用刺刀刺死10人，只有伊俊江被刺了三刀，死而复生；伊永德家6口被杀光；王俊一家9口被杀死7口。烧毁房屋2000多间。抢走大牲畜300多头，羊2000多只。

26．大河西惨案

大河西，真实地名称高板河。抗日战争时期化名大河西，位于安

子岭乡境内。八路军十二团、十三团指战员经常来这里休整，抗日工作人员经常来这里活动。

1943年，日本侵略者把这里划为“无人区”，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令群众往部落搬迁，遭受殖民统治。但是，深山里的居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引起日伪统治者仇视。同年夏季的一天，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与日军八八一夏道联队一起，对大河西、槐木林等一带深山区进行“扫荡”，抓捕群众60多人，被日军训练的几十条军犬活活咬死，惨不忍睹。

27. 印子峪惨案

印子峪，属自然村，位于蘑菇峪乡门子哨村境内。抗日时期此地群众拒不下山进部落，与八路军往来频繁。日伪当局声称投匪者“一律逮捕”。

1943年，日军派兵多次“围剿”，年内枪杀无辜群众124人。

28. 李杖子惨案

李杖子，位于蘑菇峪乡境内，属五指山根据地范围。此地有优越的游击环境，经常有抗日人员在此活动。日伪当局扬言，凡有八路军、游击队脚印的地方都要“扫荡”。

1943年，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枪杀此地无辜群众20人。

29. 沙坡峪惨案

沙坡峪，位于孤山子乡境内，南与遵化县交界。全村160户人家，800多口人，分散居住在多条沟岔里。

1933年3月，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第二师在罗文峪展开长城抗战时，沙坡峪群众出人出力、献粮献物、护送伤员，做出过贡献。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里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群众抗日情绪高涨。

1942年初，半壁山伪警察署不断派遣特务来此刺探情报，探知此地经常有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出没。一次日军宪兵特务来此地侦探，被抗日政府抓住予以镇压。因此，日伪军100多人扫荡沙坡峪村，一次枪杀20多人，并连续围剿频繁出击。到1943年，仅两年时间，滥杀无辜群众201人，占全村总人口的25%，其中有28户被杀绝。

30. 双林惨案

双林村，位于兴隆镇境内，南与茅山镇石门台村毗邻。此地沟深岔多，山峦起伏。

1943年初，兴隆县日本宪兵队侦得双林村经常有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在此活动，遂派兵“围剿”。在沙梁子、磨盘山两地，抓捕王瑞林等4人进行拷打，逼问八路军藏在哪里？然后将4人屠杀。日军随后对灯杆岭、双坑、窄窝窝（地名）等地进行“围剿”，将于连才家7人杀害，其中有一名刚出生7个月的婴儿。烧毁民房500多间，抢走大牲畜60多头，山羊400多只。1943年至1945年8月，双林村遭受日伪军连续“围剿”，频繁“扫荡”，被屠杀、抓捕死于外地和冻饿死28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50%以上。

31. 红石沟惨案

羊鼻子洞，位于安子岭乡红石沟村境内。

1942年初冬，日军来红石沟“扫荡”，在东山羊鼻子洞里枪杀13名群众。

同年冬季，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组织17名群众给八路军运送粮食，在红石沟被日伪军包围，被敌人砍死16人。

1943年春，双庙警察分驻所特务为日军带路，再次围剿红石沟，枪杀群众11人，其中葛福田家被惨杀9人。

32. 马架沟惨案

马架沟，位于安子岭乡境内。抗日战争时期化名“中原”。

1943年春季，张杖子一带的抗日村干部在马架沟开会，被驻蘑菇峪姜大祥讨伐队包围，牺牲村干部11人。其中有雷音方叔侄，张文秀的叔父，张凤瑞的岳母等。

33. 西陡子峪惨案

西陡子峪，位于陡子峪乡境内。

1943年春，西陡子峪群众去“无人区”种地，一次被日伪军杀死12人。

34. 成功惨案

成功村，位于蘑菇峪乡境内。这里深沟险壑，巍巍群山，是通往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也是五凤楼山的南侧、黑河的源头。黑河由此流向五指山北部，然后折向西，从五指山以东再南下而去。成功村原名柳树洼。抗日时期，人们盼望抗日早日成功，便更名为成功村。黑河川就有三个村改为成功（柳树洼）——天明（见草沟）——解放村（赵大地）。表示人们战胜黑暗，争取光明的一种愿望，也是不让日伪机关掌握和了解八路军活动地点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李国讨伐队、朱盛讨伐队500余人包围了成功村。日伪军在雪地里跟踪抓捕群众33人，在寒风凛冽的雪山将这33人的衣裳扒光，在艰难行进的路上杀害31人。有的被剜心挖眼而死；有的被割掉生殖器后，再一刀一刀地刺死。李存隆妻子怀孕，怀里还抱着刚满2岁的小女儿，被日军剖腹挖胎而死；贾成福被打得死去活来，然后用绳子拴住两只脚的大拇指倒挂在树上，一刀一刀地被剥下皮肉，尔后又叫狼狗撕咬致死；张景春被带到三十二盘（地名）的山顶上，让其站在峭壁沿上，准备用刺刀挑下山涧。但张景春猛然跳下山崖，却劫后余生未被摔死。

35. 澈河川惨案

1944年1月春节前，抗日政府发动五指山獐帽山民兵，在一天深夜，将兴隆县西起八品叶村、东至龙井关村，长达40公里的电话杆全部砍断，电话线全部割断，使日伪通讯瘫痪，变成聋子。兴隆县日本副县长西山知道后，调集日本宪兵队、日本关东军八八一夏道联队、武装警察讨伐大队1000多人，抓捕澈河川数十个部落里2000多名群众，经过拳打脚踢，木棒打，灌凉水，灌辣椒面等酷刑逼供，以私通共产党和八路军罪名，在蓝旗营就地枪毙、刀砍、火烧、活埋等形式屠杀400多人外，其余被押往兴隆、承德，有的转送到东北各地，或投入监狱或强迫当劳工，生还者很少。

36. 广东山惨案

广东山，位于蘑菇峪乡二道岭村境内。

1944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驻蘑菇峪姜大祥讨伐队去广东山讨伐，在倒捋坑（地名）围住13名群众。倒捋坑，是50多米长平顶，七八丈（约20余米）高的陡砬子。讨伐队副大队长黑岩（日本人，警佐）命令李景山、杨“爬子”等警察，每喊叫一声“一、二、三”，便从峭壁上仍下一个人。共仍下13人，其中4人为女性（两个媳妇、两个姑娘）。摔死12人，只张永昆落在死尸堆上，有幸逃生。最后，剩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被扔在雪地里活活冻死。

37. 庙岭惨案

庙岭村，位于南天门满族乡境内。

1944年7月间，日本关东军八八一联队长夏道、伪县长于文英、县警务科长于沛山、县协和会日本会长佐佐木小春等人召集会议，安排部署各讨伐队、警察署长参加的“投匪家族”大检举任务。在这次“大检举”中，全县被抓捕500多人，仅庙岭和驴儿叫两地，被抓捕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家属30人，均惨遭杀害。

38. 转石湖惨案

转石湖，位于大水泉乡刘杖子村境内。

万人求（今黄土梁村境内）部落（人圈）里居民王耀财、王耀福两户农家，原住转石湖沟里王家沟门，距万人求部落5公里，没有超过划“无人区”的边界。所以，他们往返王家沟门耕作，万人求部落的伪军和甲长均未限制。

1944年9月27日（农历八月十一），王耀财俩口和儿子王永芝及一个14岁的孙子，王耀福和儿子王永增、王永旺及女儿王永兰(13岁)在王家沟门割谷子。被驻蘑菇峪黑岩讨伐队包围，只有王永旺跑了。另一部分讨伐队将同在这条沟里收秋的刘桂花、张广海等6人包围。讨伐队押着13人离开转石湖，过山梁来到“无人区”——成功村的姜家西沟。这里属黑岩管辖区域，随即命令开枪。一阵机枪扫射，13人倒成一堆。日伪军撤走后，有10人死亡，1人佯死逃生，1人轻伤逃生，1人（王永兰）重伤后得救重生。



王永兰（73岁），每当想起60年前的往事，仍然眼泪模糊，语言哽咽(2004年8月)

39. 大杖子惨案

大杖子，位于兴隆县东北部，与承德县交界。

1944年11月，柳河口据点之日军到深山“扫荡”，遭到“无人区”内民兵阻击。当日伪军撤退到大杖子南沟时，遇见山里有群众割

柴，便无辜枪杀11人。

40. 冷嘴头惨案

冷嘴头村，位于八卦岭满族乡境内，南与遵化县交界。

1945年1月，八路军主力部队来这里休整，群众自动献粮献物，保障抗日队伍供给。半壁山警察署长刘伟、日本关东军队长土冢冈，讨伐大队长王汇东得知情报后，带领日伪军200多人，对冷嘴头、牛圈子等一带深山区进行“围剿”。抓捕无辜群众100多人，押至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均惨遭杀害。

41. 八沟岭惨案

八沟岭，位于大杖子乡南道村境内的大坡西沟。

1945年4月，驻蘑菇峪讨伐队副大队长黑岩配合驻车河堡佐藤讨伐队，对车河上游“无人区”再次进行“扫荡”。一天，将隐居在西大山的农民任宝江抓到车河堡。第二天，任妻抱着刚满1岁的孩子下山给丈夫送饭，当即被扣下。第三天，把留在山上的两个孩子（女儿10岁、儿子任怀清7岁）也抓进部落。把他们5口人锁在一个木笼里，只给点稀粥喂孩子。几天后，又抓来20多人。第七天，讨伐队用烟绳将20多个男人绑成一串，妇女和孩



任怀清老俩口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子紧随其后，日军在两边押着往前走。到了八沟岭上，拐进一个山弯

的乱石碴，抱着孩子的任妻走不动坐在路边，10 岁的女儿扑到妈的怀里抱头大哭。随后佐藤下令，一阵机枪狂扫，把 30 多男女老小全部打倒。日兵挨个检查，发现几个能动弹的又用刀刺死。任怀清哀嚎，看到他的妈妈、姐姐倒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只有 1 岁的弟弟还在吃奶。一名日兵劈下一刀，将其弟弟的头砍掉。任怀清拼命地挣扎，被那个警察抱走。

42. 小河西惨案

小河西（今称槐木林子）村，抗日时期是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八区与第十二区重要的地下交通线。1943 年 1 月—1945 年 8 月，日伪来这一带讨伐 100 多次，屠杀群众 523 人之多。

（二）日伪统治时期兴隆县大检举

王庆生　栾福忠

大检举，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当局在“满洲国西南边境”实施的“治安肃正”政策的一项重大措施。日伪当局为隔绝人民群众与八路军、共产党的血肉联系，妄图通过大讨伐、大扫荡、大检举、大集家和惨无人道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把人民群众赶进其划定的部落（人圈）里，制造“无人地带”，最终达到镇压民众抗日、消灭八路军、共产党的罪恶目的。为此，在境内进行了无数次大检举 、大屠杀，制造了数十起惨案，在全县共抓捕无辜群众15400多人，除先后在县城南土门“万人坑”集体屠杀2000余人外，其余全部送往承德、锦州监狱或送往东北当劳工，生还者甚少。

大检举、大屠杀，是逐步进行的。最初始于1939年秋，当时只限于某些村落。首先，在八路军频繁活动的五指山周围，试行“集家并屯”。1940年秋，扩大到黑峪沟、驴儿叫、龙洞峪、大小黄岩一带。以后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其次，1942年10月，日军把制造“无人区”的措施，强调到更高的战略地位，并调集部队，为实施大面积的“集家并屯”，做军事上的准备。大检举的时间一般常选择在农历年关（春节）前后，利用农民过年全家团聚之机搞突然袭击。境内规模较大的检举有四次。

第一次大检举

1941—1942年，日伪当局把无辜的群众赶进部落，实施“民匪

隔离”（民众与共产党、八路军隔离），统一行动，数日内抓捕群众2000多人，其中就地杀害400多人。这次大检举以茅山村（今青松岭）最为残酷。

1941年9月，茅山警察署被八路军袭击后，日伪当局对该村进行报复性大检举。检举之前由警务股长孟祥大、特务股长生驹（日本人）以及宪兵等进行多次调查，并将刘文（选）讨伐大队调至茅山驻扎。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由县伪警务科直接指挥刘文讨伐大队及临时应援的警察和日本宪兵将茅山村包围起来，按先调查所列名单检举抓捕50多人，押到兴隆警务科留置场（看守所），经过多次刑讯逼供后，被处死27多人，其余送往东北劳改，生还者无。1942年3月，日伪军、警、特300多人同时出动，抓捕茅山、东峪、三岔口、果园、老营盘、西湾等地群众300余人。经审讯后，释放年老多病及妇女240多人，其余61名青壮年押送兴隆、承德、锦州监狱。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仅王春1人幸存，其他60人无一生还。

第二次检举

1943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和翌年正月初五。日伪当局进行“一齐逮捕”的普遍大检举。这次大检举经过充分准备，日期选择在农历年关（春节）前后，利用农民过年团聚之际突然袭击，阴谋手段之残忍可想而知。由日本宪兵渡边队及王汇队、刘其队等伪讨伐大队实施。检举范围西起八品叶，东至迁西县龙井关，瀔河川数十个部落（除蓝旗营未全部波及外），以及横河川的大洼、宝地、乌头牛、大小水泉、糜子地、双庙、靳杖子一带，无一村幸免，共计检举抓捕5000余人。被集体屠杀（兴隆南土门“万人坑”）数百余人，其余被遣送东北本溪、鞍山一带当劳工，生还者甚少。这次大检举以宝地、糜子地、双庙、大水泉、庙岭、牛圈子、八仙沟、小碌洞、钓鱼台、

西窝铺、榆树沟、二堂、偏岭子、洪山口、瀔河南、龙井关、沙波峪等村庄最残酷。在三道河检举时，当场被日军狼狗咬死1人。

第三次大检举

1944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和翌年正月初四。日本宪兵队、县警务科、警察署、讨伐大队、军事特别法庭等共同组织实施。检举日期同样选择春节进行，这次检举以牛圈子、冷嘴头、靳杖子、赵杖子、西窝铺、车道峪、高板河、大石门等村庄最为残酷，共抓捕1400余人，仅靳杖子一个村就被日伪军抓捕300余人。被抓捕群众运回县城后处死者甚多，其余人被送往东北当劳工，生还者无几。

第四次大检举

1944年6、7月间，日伪当局进行所谓“投匪家族”（投共产党、八路军）大检举。伪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佩山，召集全县19个行政村的村长集中到县城，举行秘密会议。将全县各村部落，凡参加中共、八路军的党、政、军人员的家属，哪家做过抗日工作的，供给八路军粮食鞋袜的，将姓名、住址、职业一一登记。然后按登记名单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抓捕起来。这次检举抓捕500余人，全部送往东北当劳工，生还者甚少。

此外，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从县警务科“非常持出”秘密文件中发现，拟于1945年冬，再次实行更大规模的大检举详细计划，包括8至60岁的男人，连同伪满政府机关中所谓“思想犯”在内一起抓捕。因日军投降，这次大检举阴谋未能得逞。

（三）兴隆县部落瘟疫危害调查表

区域	村名	年度	症状	死亡人数	病名（推定）
澈河川	三道河	1944 年	※ 发烧，意识不清，食欲不振，疟疾 ※ 发烧，呕吐，脓血夹杂腹泻 ※ 发烧，有红点，卷缩和黑紫色疮痂	700 人	疟疾 赤痢 疮痂
	偏岭子	1944 年	※ 毒气，腹涨，咀吐泡沫		毒气
	二堂子	1944 年	※ 高烧，恶寒，战栗，退烧反复	不明	疟疾
横河川	羊羔峪	1941 年	※ 高烧，吐血，鼻出血，身体变红，再归热或称回归热	400 人	流行性出血热
	大水泉	1943 年	※ 高烧，呕吐，无力，全身疼，食欲不振，有红点 ※ 高烧呕吐，有脓血夹杂腹泻 ※ 高烧发疹，脖子、头、脸、眼鲜红，小孩居多数 ※ 大人痘疮少	400 人	伤寒 赤痢 麻疹 痘疮
	厂　沟	1944 年	※ 高烧，有脓血夹杂腹泻 ※ 恶寒，战栗，阵烧	265 人	赤痢
	双　庙	1944 年	※ 呕吐，象米汤粥状的腹泻 ※ 高烧，呕吐，食欲不振，全身疼，有红点，意识不清 ※ 发烧，溃疡，皮肤破裂，有黄水，猪只有同症状	200 人	霍乱 伤寒 炭疽
	白马川	1944 年	※ 呕吐，白痢	不明	霍乱
	万人求	1944 年	※ 发烧，脓血夹杂腹泻，有豆粒大的红点	300 人	疟疾 赤痢
洵河川	茅　山	1943 年	※ 高烧，意识不清，食欲不振，疟疾 ※ 高烧，呕吐，下痢	110 人	疟疾 赤痢

（续）

区域 \ 村名		年　度	症　　状	死亡人数	病名（推定）
黑河川	蘑菇峪	1944年	※ 头痛，发烧，意识不清，疟疾 ※ 发烧，脓血夹杂腹泻	2000人	赤痢 痘疮
	梓木林	1944年	※ 恶寒，战栗，阵烧，意识不清 ※ 发烧，呕吐，脓血夹杂下痢 ※ 发烧，有红点，大腿、肘下部有黑点 ※ 脓血夹杂腹泻 ※ 有大小碗发疹	1200人	赤痢 痘疮
	宽　甸	1944年		70人	赤痢 痘疮
车河川	大杖子	1943年	※ 发烧，高烧，退烧反复，意识不清 ※ 高烧，呕吐，下痢 ※ 痘疮也不少	300人	疟疾 赤痢 痘疮
	柳河口	1943年	※ 发烧，头晕，昏迷，全身疼痛，红斑点蔷薇疹，抬过尸体就染上 ※ 臭雾一来就疼，呕吐	1000人	发疹 伤寒 毒气
	高杖子	1943年	※ 脓血夹杂下痢 ※ 下痢呈白米汤状 ※ 吃了野菜便死	死亡极高	赤痢 霍乱 毒气
	车河堡	1944年	※ 发烧，呕吐，脓血夹杂下痢 ※ 呕吐，呈米汤状下痢 ※ 恶寒，发烧，全身疼痛，浮肿，昏迷，发疹，红斑 ※ 吐血，鼻血，三四天或四五天死亡 ※ 体腔水肿，皮肤糜烂 ※ 雀朦眼，吃盐眼就变瞎，意识不清 ※ 看到气球，毒气出来，发出难闻臭味，流泪，头疼，意识不清	800人	赤痢 霍乱 发疹 伤寒 疟疾 毒气

（续）

区域	村名	年度	症状	死亡人数	病名（推定）
潮河川	二道河	1943年	※ 高烧，头痛，全身疼痛，无力，吐血，鼻血，头、脖子、前胸因出血变红，浮肿	50人	流行性出血热
	五道河	1943年	※ 浮肿，从鼻、口出血死亡		流行性出血热
	六道河	1943年	※ 浮肿，从鼻、口出血死亡	40人	流行性出血热
合计				7835人	

注：（日）仁木富美子著《无人区·长城线上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

四　部落——摧毁人生的统治

滦河的长恨

佟靖功

滦河的流水流潺潺，流不尽的仇来流不尽的冤，仇恨堆积如山厚，眼泪把铁石也滴穿……——劫夫：《忘不了》

侵华日军刚刚无条件投降，延安的著名音乐家李劫夫便匆匆来到承德，创作了《忘不了》这首唱遍热河大地的歌。至今，滚滚的滦河已经流去60余年，然而，浪啊并未淘尽沉淀在沙场深处的血和泪。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和迎接胜利60周年，将这一户有代表性人家的绵绵长恨挖掘出世，以进一步痛斥"大东亚共荣"、"日本文化最先进"的无耻谰言和以资鉴后人。

(一)

在滦河九曲、象一条青龙似的旋过兴隆县、宽城县交界的一脉峡谷之间，在清河塘、湾子北侧的2里处，有一座挡水的砬湾。一围庄稼绕着一洼丛林，绿荫深处隐着一户蒲柳人家，这里叫北兴隆。向阳凹里错落着10多间草房，是个有13口人的大户。当家的是个中年人，叫张连发，还有个二当家的叫张连兴，他们是亲兄弟。上边有老爷子、老奶子。老大屋里6口人，老二屋里5口人。日本兵来了，因为他们和村子的关系好，有人缘，仍然保持着某种世外的状态。

1942年秋，日军在滦河一带进行大规模集家并村，把这里往南

的人家集中到40里以外的蓝旗地部落，把这里以东的人家集中到35里以外的偏桥子部落，把这里以北的人家集中到70里以外的伪承德县城下板城。这一带被划为“无人区”，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猫山户了。

在集家并村过程中，日军极残忍地烧杀抢掠，激起张家人的痛恨和愤怒。正在他们感到形单影只的时刻，不期来了八路军的游击队，30多人，队长叫王印。他们个个都亲如家人，配合下网打鱼，帮助开荒种地，日夜放哨，还教给怎样隐蔽和坚壁清野。为了保证子弟兵们吃饭，老爷子和少哥俩不断地出去借来小米、黄玉米和乌谷米。老奶子和两个儿媳妇经常贪夜给战士们做鞋和缝缝连连。三面环水的砬湾里竟然保持了近一年的神秘的生活。

1943年初秋，游击队奉命调走。一天夜间，驻蘑菇峪讨伐队的副大队长黑岩（日本人，前伪承德县警务科警防股股长，出名的杀人魔鬼），走水路从下板城返回驻地。中途，因为追逐一艘渔船，离艇登上一座山岗，发现砬湾里隐隐透出一点灯光。他回到蘑菇峪，第三天便率一个中队去“围剿”。

黑岩，40多岁，大拍子个，宽肩膀，肥头庞脸，两鬓青胡痕间缀着一点丹胡，长眼毛下嵌着一双黑瞪瞪的眼睛，懂得中国文学，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他命令警察们悄悄住在被发现的老郝家、老莫家的空房子里，坚持搜索了一星期。张连发被杀死在塌山梁上，他的老父亲被杀死在桑园，张连兴的妻子被杀死在瀑河口。这天夜间，藏在乱石窟里的剩下的一家人，因为饿一天了，不得不悄悄地烧些玉米棒子吃，敌人窥见烟霭，包围过来。张连发的妻子张赵氏，张赵氏的二儿子张玉祥（11岁），三儿子张玉奎（9岁），四女儿张桂兰（4岁），还有他们的二叔张连兴，张连兴的儿子狗剩儿（12岁）等6人都被逮捕。第二天，讨伐队押着从这一带围来的23名老百姓过滦河奔蘑菇峪，傍晌午进河南大峪走到刘庄。讨伐队用抢来的粮食令背夫们给

做饭。这个时候，陈凤秋等几个受重视的警士向黑岩要求把逮来的两个女人“配给”他们。黑岩满载而归，狎兴勃发，奸笑一下跟着他们去看两个女人的长相……

驻蘑菇峪讨伐队叫姜大队，大队长名叫姜大祥。他们的多数人都是伪吉林省桦甸县一支森林讨伐队的属下，因为配合日军卖力地“围剿”东北抗日联军而受到青睐，再加上姜大祥会讲日语，常向日本人表示“效忠”，因而被提升警佐并组编了姜大祥讨伐队。1940 年调到伪西南国境青龙县西部的长城关口。1941 年农历正月十六，该队参予日军策划的大屯惨案，配合日军一夜惨杀大屯民众 187 人，从而更加受到倚重。这支讨伐队 150 多人，其骨干体系是由其吉林省原籍的亲族故旧而结成的亡命之帮。为了使他们“乐不思蜀”，日本人允许他们任意掠夺妇女象“配给”其他用品那样给他们当“性奴隶”。1942 年，该队多次去蘑菇峪一带讨伐，杀害深山居民 50 多人，掳掠民女 30 多人。1943 年初，因为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于五指山神秘突围，日军醒悟五指山背后是其防卫的薄弱一环，才命令姜大祥讨伐队驱前 70 里进驻蘑菇峪，为了加强联防，又特别将熟悉那一方承德县情况的黑岩调入该队全权指挥。黑岩驻队后很快利诱笼络一批骨干警察，“杀人不眨人”的老牌警士陈凤秋就是其中的一个。陈凤秋，40 多岁，大个子，方脸，探肩，吉林省盘石县石嘴镇人。

被捕的老百姓都圈在 3 间空屋子里，张连发的妻张赵氏，35 岁，虽然是农妇，却生的白嫩，团容脸，大眼睛。还由于她娘家父亲酷爱民俗的文艺演出促使她从小就接触了通俗的民间文艺和民间文化。因而，眼前纵然在极痛心的悲哀中，仍蕴着一股清清淡淡的秀气。陈凤秋一眼相中，抢先向黑岩要求。黑岩沉吟片刻，奸笑一下，才对陈凤秋耳语几句。陈凤秋连连点头“哈依!”、“哈依”之后，终于把张赵氏“配给”了他。另一名郝家的媳妇“配给”一个姓石的警士。陈凤

秋立即把张赵氏调出来说明要了她，可是张赵氏冷对如冰，至死不从。陈凤秋只得托一个翻译去说，跟了他，可以保住她的3个孩子都不死……。逼的张赵氏抱着孩子们哭得昏迷过去。

敌人吃完饭，命令23个老百姓都跪在一棵大核桃树下，黑岩开了一枪，几个鬼子和一群警察扑上去，呀呀地吼叫着，几十把尖刀乱刺乱攮。一片血光崩溅的惨嚎声中，18个人的身上都被攮烂，渐渐地都断了气。张连兴曾奋力反抗，骂声不绝，一团团肠子全被挑了出来，惨不忍睹。狗剩儿虽是个孩子，仍然挨了六七刀，睁着眼睛死去。浑身乱抖，瘫在地上的两名妇女和3个孩子经过一番近死的惊吓，终于被喊叫起来。蹒跚地跟在队伍的后面。途中，张赵氏的二儿子张玉祥被一个绰号叫郑三狠的警察要去当儿子。到了蘑菇峪当晚，陈凤秋占了部落居民赵明义的哥哥的一间屋子，强逼死拖地与张赵氏同了房。

（二）

蘑菇峪部落，是日伪军对峙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是由河南、河北、河东3个部落组成的特别部落。河南部落，也叫陈家，原是当地几家陈家地主祖居的村子，其代表人物陈永祥是伪协和会的常务员、黑河川的头号官绅与“笃民”，与黑岩、姜大祥结为至友，姜大祥的一家人（包括其父亲）长期住在他的家里。因而，黑岩命令给陈家单修个部落。这个部落30多户，主要是陈家几大户和原来的当地户及其亲友。与其一条小溪相隔的河北部落，叫赵家，这里住着的某些户与陈家有着几代的关系，为了形成倚角之势，这里也修个部落，以当地户及其亲友为主，加上从黄花峪集来的一些户，计60多户。日伪的特别着眼点则是河东大部落，这里与陈家、赵家隔着一条五、六十米宽的河滩（即黑河），这里原来住着几户张家的农民，所

以，也叫张家。这个部落的围墙既高且宽，长500多米，宽80多米。凡多次从北方东方“无人区”赶来的，有通八路嫌疑的户都圈在这里。这个大部落有750多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住宅，都是猫着腰钻进钻出的，里边的地面不过五六平方米的小窝铺。而且奇型的密集，每3分地面要挤15户以上，如果顺风，2里地以外就嗅出这里恶臭的气味。说穿了，这里是个被严密监控的近似乞丐社会的集中营。上述3个部落统称蘑菇峪部落，计800多户，4000多人，是这一方第一大部落。

陈凤秋和张赵氏住在赵家部落，郑三狠领着张玉祥住在陈家部落。在如此凶杀、惊吓、骤变、陌生的鬼门关里，一个11岁的孩子多么想念就在眼前那片尖尖草脊下的妈妈呀！……夕阳压山，每当陈财主家的牲畜归圈的时刻，张玉祥都异样的羡慕：那黧黑的牛犊被警察追抓的时刻便钻到妈妈的膝前，妈妈不断地舐抚使它摇着小尾巴倚着安静下来。那淘气的羊羔挣脱了警察的围堵，窜到妈妈的跨下，妈妈嗅嗅它的气味，依偎着让它吃起奶来。张玉祥恨不得钻进羊群里，他哽咽、流泪，有病了。那一天下午，他忍着病痛冒死跑了出来，钻进赵家部落，钻进那个两进的小院落，终于扑到妈妈的怀里。妈妈的泪一串串地滴到他的脸上……这本是贫民百姓最同情的一件事，然而却招来一场横祸。当张玉祥不得不离开妈妈回到河南的时候，郑三狠竟掐着他的脖子搡到大河套去，一脚将孩子踹倒，抡着4尺长的劈柴棒子狠打。孩子惨叫着在沙地上翻滚，砰砰地毒打还在继续着，孩子满身流血，昏了过去。郑三狠把尚未断气的孩子扔在河套，准备第二天演习时补上一颗子弹。

张赵氏的心里像扎进几把刀，她坚持不理睬陈凤秋，跑到前屋给赵明义跪下，哭求这位房东大哥去救孩子。赵明义，40多岁，两口子只有一个姑娘，他的一只腿还拐得挺利害，虽然不能干重活，可是

颇有正义感，办事不怵头，说话挺赶趟，他把眼前这个苦命的女人扶起来，说明儿个试试去。

第二天一早，赵明义经过部落长特准来到河套给张玉祥送些热汤喝。一会，郑三狠引着黑岩像散步那样遛过来，他顺便一指满脸泪痕的张玉祥说，“这是从禁住地带抓来的小崽子，一会打靶时我用他打活靶子好吗?”

“约喽细——!”黑岩杀人如麻，瞥了一眼就答应了。

赵明义被派工给兵营里宰过鸡、帮过厨，因为拐的特征，与黑岩和郑三狠都有一面之识，就先向郑三狠要求，请郑修好积德，把孩子给他当儿子吧。郑三狼决心要枪毙张玉祥，便说这事已经太君批准了，得听太君的。赵明义便向黑岩请求，说自己腿上有残，要要这个孩子。黑岩说不行，必须枪毙。

赵明义急了，大声说：“军令如山，长官得守信用。这是大队长说过不杀的孩子，怎么又要枪毙?”

向来没有人敢对他这样说话，黑岩愣一下，再次打量着赵明义，瞪着眼睛说：“我不认识这个崽子，更没说过不杀他，你怎么敢这样妄说?”

赵明义一笑，缓和地说：“队长还记得10天前，在河南大峪，队长‘配给’陈凤秋警士那个女人吗?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孩子……。”

“张赵氏?”黑岩忽然想起曾经嵌在他脑海里的那个女人，随即问郑三狠，他怎么被打成这样?

郑三狠立正，敬礼，才说张玉祥怎样不听话，又跑到那个娘儿们那里去，他不要他了，才打了他。

黑岩一向注意大事，对于这种琐事向来不屑一顾，不过这一次颇有些例外。他的黑眼睛突然一闪，脸上似乎掠过一丝得意之色，一挥手，对郑三狠说：“咱们回去吧，这个孩子不要毙了，你不要，就给

赵吧。”

赵明义表面上连连哈腰，急忙把不断呻吟的张玉祥背回了家。

（三）

紧挨着陈家部落的南坡上有一片几十亩的平地，就是在这片大平地上，于1943年春调集黑河川的大量民工突击修建了姜大祥讨伐队的兵营。兵营是长方形的，其出入的大门设在紧东北的犄角，其西边北边有几十间警察宿舍，兵营的四角筑着4个炮楼，炮楼的底层还都住着警察，兵营外的西坡南坡的山头山脊上还有4座堡垒。其大队部设在兵营中间的一片倒“工”字房子里，座东朝西的一溜房子是大队长、副大队长、中队长和队部人员的办公室。院子中间座北朝南竖着一溜厢房，东半截是黑岩的卧室和浴室，西半截是几个日本警察的卧室和电台室，其西侧座西朝东的一溜房子是厨房和餐厅。

就在赵明义背回张玉祥的这天深夜，队部办公室里挂着的12个“家宿牌子”，有11个已经翻过来，说明那11个警尉补以上的警官都已回到陈家部落里的家，只有直辖队队长、警尉补韩长脖子（绰号）还在这里值班。一会儿，小土豆（绰号，日本人，机要警察兼传令兵）通知韩长脖来到黑岩卧室，黑岩机密地通知他，据报，河东部落进来3个嫌疑者夜间在跳梁，命令他带着特务王连彬、陈永荣和4个警士速去查户口，一户不漏的详查一遍并填好《普查户口记录》。详查一个整夜，明晨6时前回队报告。韩长脖子领命急速出去。

又一会，小土豆进了赵家部落的陈凤秋家，通知黑岩队长要审讯张赵氏，令他马上带着人去队部。陈凤秋、张赵氏随着小土豆悄悄进了兵营，又令陈凤秋先进了那间机密的卧室。明亮的大保险灯下，黑岩穿着睡衣正面红耳赤地品着白酒吃焖炖滦河大龟。

陈凤秋行礼，黑岩劈头就问：“张赵氏，现在来了月经没有？”

陈凤秋哈着腰回话："接到太君的命令，张赵氏现在已经来了，正在外面候审。"

"不，不对的。"黑岩再一次缓缓地问："张赵氏，现在来了月——经没有?"

这回，陈凤秋明白了，不敢说谎，急说："她现在没来月经，没来月经"。

"约喽细——！来，先干一杯！"黑岩的眼睛笑成两个月芽，两掌啪地一拍，即兴递过一杯酒。受宠若惊的陈凤秋行了礼再接过来一饮而尽。

随后，黑岩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命令："陈君，今夜要实现你在河南大峪的诺言，将张赵氏贡献一宿。这也是给你立功的机会。你马上协助太田（小土豆的姓）去准备好一切！"

缓过神来的陈凤秋，这才了解了突然审讯的目的，不仅毫无醋意，而且连连谄笑着告退。陈凤秋随着小土豆将张赵氏领进对门的西屋，屋里虽然明亮但蒸气霭霭。呆一会儿才看清，原来屋地上放着一个特大的木制的日式浴盆，盆里汪着多半下冒着沸气的热水，一边的小桌上还放着牙粉牙刷瓷缸和香水敷粉胭脂。小土豆做个示意的手式便退出去。

陈凤秋稳稳神，才低声对张赵氏说，"黑岩太君喜欢上你了！这是别的女人烧高香都摊不到的喜事，他现在就想和你睡觉，你赶快刷牙漱口脱衣服洗澡，好好侍奉太君吧。"

因为孩子眼泡都哭红了的张赵氏象被蝎子蜇了似的一震，哑声岔气地说，"你已经占了我，你还让我跟日本人？你披的还是人皮吗?"

陈凤秋低声解释，这是在河南大峪已经答应的，太君什么时候要你，必须服服帖帖地侍候。张赵氏愤怒地问："这几天你总说日本国先进，日本人文明，他们这样糟踏我，跟猪狗有什么区别？……"

陈凤秋急忙捂住她的嘴，张赵氏一挣向西墙撞去，陈凤秋一拦就势把她抱住，耳语说："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你不能再因小失大，你若不从，你们娘儿四个就都得枪毙！你得顾全几个孩子呀！"

突然，小土豆闯进来和陈凤秋一起扒了张赵氏的衣服，按进大水盆，像擒缚一只鹅似的强迫洗漱了半个钟头。直到小土豆认为基本合格，才令陈凤秋退出去，随即又进来一个日本人，用军毯将张赵氏裹上，夹进黑岩的卧室……

（四）

秋末，张玉祥的伤渐好，懂事的孩子便随着义父赵明义下地，背个小篓，拾点土杂粮穗和野菜。他们走路都特别小心，注意绕开那宽宽的黑河套，因为附近 2 里远的大河滩都成为讨伐队的练兵场了。各种钢炮猛地一蹲一咳的，把远处炸的团团黄烟。轻机枪、重机枪乱射乱扫，步枪的子弹嗞嗞地就从耳朵边穿过去。一天，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把一个姓李的姑娘的膝盖打开了，无医无药，那姑娘死了！

张玉祥第二天下地，看见讨伐队清早出发了，烧后晌火时才回来。一些警察俩人一对地扛着根一两丈长的细杆子，有的杆子上系着滴血的人头，有的杆子上系着一串人的耳朵！突然，竟看见陈凤秋和杨爬子（绰号）也抬着一个人头进了队部大院。孩子害怕，义父让他先回家了。陈凤秋、杨爬子登记领赏出来，正与奔西沟刨萝卜的赵明义碰个对面。

"老四（赵明义排行第四）！"陈凤秋喊他，"你顺道把这个 给埋了，我们有事先走一步了。"赵明义不敢不去，只得用一条柳枝儿串起十几片桲椤叶把还招虻蝇的人头裹上，远远地埋了。

晚上，陈凤秋进赵明义的屋抓那种好抽的旱烟叶。赵明义不解地问："警长，我看那人头是河东部落的人，为啥也砍了？"

陈凤秋抽着烟，洋洋自得地回答："这小子是河东的，叫张海军，可是他去了二道岭子大岭沟，还背着半口袋棒子。问他是给八路送粮食去了吧？他说在部落没地种没吃的，回老家弄点粮食。问他，知道进无住禁作地带什么罪过吗？他说他不应该在部落里饿死。让他低头，他竟扬着脸说不会低头。杨警士做做试验，就把他的两条大懒筋砍断了。谁知这小子还真有股尿，大懒筋都断了也不低头。看你的脖子硬还是刀硬，杨警士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了……"

（五）

黑岩和姜大祥一伙是非常狡猾的，1944 年夏季的一天，竟毫无迹象的突然调走，且走得无影无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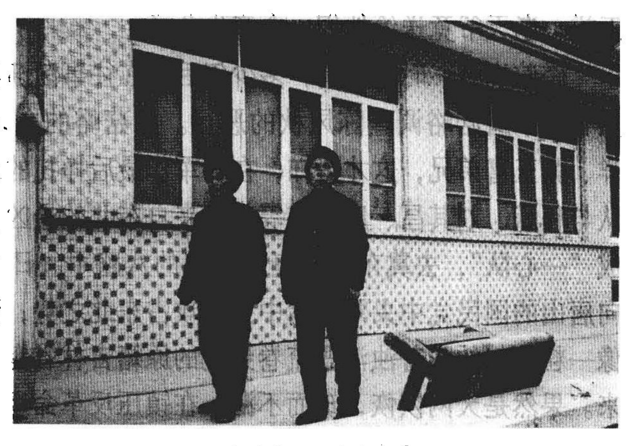
日军刚刚无条件投降，在下板城给人家放牲口的张玉富（张玉祥的哥哥），便回到北兴隆。不久，张玉富来到蘑菇峪将张玉祥接回老家。两个孩子多么想念苦命的妈妈呀！打听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他妈妈是死是活？还是流落到天涯海角？几年后，50 多岁的赵明义夫妇竟意外地生了个男孩！蘑菇峪的人们都说老天有眼，赵老四救了张玉祥，老天爷竟送给他们一个亲生儿子。

磋砣岁月，时光无情，多少年后，在往事渐渐淡忘的过隙中，忽然有人来蘑菇峪调查陈凤秋的恶行。蘑菇峪的乡亲们急急找来张玉祥、张玉富弟兄，这才得知，在日军作最后挣扎的时刻，姜大祥讨伐队与程斌、刘其昌、唐振东等这些来自东北的最凶残的讨伐队合流编成"一心队"，去冀东阻击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日军投降后，他们投向唐山的国民党中央军，借中央军攻占东北之势，陈凤秋胁迫张赵氏像一粒沙似的随着浊浪恶流卷到他的原籍吉林省盘石县石嘴镇潜伏下来。果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陈凤秋。

张玉富、张玉祥急切地多次地去信与妈妈联系。然而，“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一名长期陷入魔窟的弱女子何等的多灾多难啊！1945年，已经43岁的她意外地生了个男孩，当地的陈家怎肯放行？张赵氏又怎能带着陈凤秋的后人回到滦河！悬念两地的她，泪尽了，心碎了。然而，故乡啊，对千千万万的流浪人是多么具有不可抗拒的地心引力！耐到1958年，张玉祥的三弟张玉奎、四妹张桂兰都已在那边结婚成家，那个无辜的男孩已经7岁，过继给他的叔叔，已经50岁的张赵氏终于被儿子们接回生离死别的滦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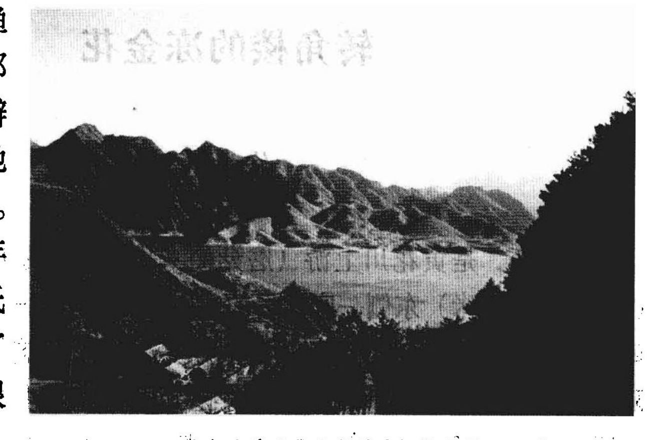
滦河的水虽肥，山虽美，然而张赵氏的脸上尽是泪，心中尽是悔！北兴隆啊，还有故家痕，然而却不见结发人，却不见公婆的坟，却不见他二叔和侄儿们！滔滔的滦河水啊，洗不尽的冤，涮不尽的债，一个浪里一分恨！

万幸的是，赶上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金瓯光复，破镜重圆，沦落为奴的人终于脱离了苦海。然而，新的家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张赵氏在大儿子家生活了一年，儿媳妇再也不肯与她共处。名声，在继续压得一个老年人抬不起头来，旧的伤痕上再添新伤痕，悲惨的历史还在噬咬她的心，难道不幸的女人啊将穷其毕生的不幸！张赵氏终于醒悟，在“众口铄金”习俗里，必须寻一个真正能理解、同情、宽恕自己的伴侣，独立而隐蔽地渡



张玉祥老俩口在新居前合影

过自己的余生。她看准了，自愿自主地嫁给属于王宝石村、但近在滦河西岸的孤村渔民梁永富。在那个隔山隔水极僻静的山湾里，她又生活了 29 年。1987 年，享年 80 岁的张赵氏因病离开了给了她悠悠长恨的滦河。



张赵氏隐居数十年的清河梁小村

转角楼的冻金花

佟靖功

转角楼，是黄花川上游（磨菇峪乡境内）广东山的主峰月芽山（海拔1257.9米）东侧一座比肩的山上山。其上似一座巨楼，其下的南、东、北三面为转角形峭壁，因而得名。由于这里既险峻又有屏障，三面均可进退，所以，1943年春季日军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之后，迁（安）遵（化）兴（隆）抗日联合县第九十（合并）区的区委、区政府便设在这里。经历敌人返复的“大扫荡”，这个区仍有200多户、1000多人，坚持在黄花川和下柳河川的深山老林里。

转角楼，是日军地图上没有标记、日伪军还没到过的山巅小村。除了区干部、区小队的十几间砬棚窝铺以外，砬根、沟岔里还隐着20多户人家的草舍茅庵。

一

1943年2月中旬的一天，区委书记夏鸿霖引着10多名灰棉装的干部，穿过区长吴云清率领的区小队的防线攀上转角楼。经过区委委员杨智静的斟酌，立即把这些干部安置在几户较大的茅庐里住下。区干部告诉群众，他们是从关里过来的同志，在这里休整一下。山尖上的老乡确实也隔行，这些人都是冀东区领导人着意保护的一批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区党委宣传部和区党委机关报《救国报》的一些知名的理论家、编辑和记者。他们在办报的同时，受区党委的委托，已经在河南大峪为几个县举办了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前些天，正

在举办第3期区干部训练班的时刻，敌人开始“大讨伐”，训练班暂停，这些同志奉命转移到转角楼。《救国报》报社社长李杉和那些编辑、记者住在后坡。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吕光因为患病，将他和夫人刘郁芬（理论家）安置在阳坡洼雷永龄家里。雷永龄是一名老实厚道的农民，主要是他有个当家主事的二闺女——二头。二头仅仅18岁，是个秀外慧中的好苗苗，拧尖的眉，灵秀的眼，甩着辫子能跑山，特别是她急公好义，勇于为奔波在外的干部、战士们排忧解难……

山尖上的生活异常艰苦，区武装部长雷永华和青救会主任赵文芳带着4名民兵从砬洞里掏出两只大猪獾，剔了几十斤肉，耗了不少油，分给各户给客人们改善生活。

夏鸿霖、吴云清他们不仅能战斗，还都是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他们抓住这批精英到来的机会，打扫出一个温暖如春的大砬棚，开办个夜校。凡是晚上回来的区干部、区小队战士都参加学习，同时又约来20多名村里的党员、积极分子一起听课，计有40多个学员。弄来松油杏油点灯，弄起几堆过了烟的余火，每天晚上分别请李杉讲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请郁芬讲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请水川讲抗日战争中的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请吴明讲党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统一战线政策；请顾宁讲毛主席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高水平的砬棚夜校犹如在转角楼上燃起一盏辉映心灵的灯，使爱信老皇历的山民们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每到晚上，二姑娘借着引路、护送郁芬的机会，夜夜在砬棚里听课；每个白天，她都上山寻雪、采药，给吕光部长治病。吕光患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头痛、感冒发热、行走无力，出现持续的疲劳感。二姑娘因为热情好客，早些年从一名来收购杏核、桃干的老客那里得了一个专治失眠、头痛、爱感冒的偏方，现在派上大用。她敢拿

着镰刀攀登陡坡来到月芽山背后的阴洞里，取一桶洁净的积雪。再从转角楼下到拐杖沟的阳洼根，采集过了冬的山蒜的鳞茎，或者刨枸杞子的根皮。回来煮沸后煎成药茶，每日3次地给吕部长服下。没曾想果然有效，吕部长的病竟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郁芬以她特有的敏感喜欢上这个既俏又野的女孩，等她一沾炕，便拿着《救国报》教她识字。二姑娘的聪明使人惊赞，每天能认能读能写能记6个字。在那火光烛天，黑烟漫山的环境里，这样学习的机会多么难得而易失啊。一晃，夜校、治病、识字竟难能地坚持了一个多月。病愈的吕光部长奉命率队去关里追随区党委机关去了。

二

青年农民们一旦接触了先进的文化，便会从刚刚识字开辟的一条夹缝去探求陌生的外部的知识世界。吕光部长和老师们走了，区干部区小队同志们都去了第一线，然而，那砬棚里仍然闪着光。不过已不是油灯而是油松明子，是民兵们在继续学习。大家选二姑娘为夜校辅导员，二姑娘也运用《救国报》为教材，浅显地教民兵们识字解义。她那半个八路军的风采，吸引着更多的青年迈进了砬棚。

1944年夏季，日伪当局发觉“大扫荡”并不能完全实现“无人区”的目的，便通过协和会施展“下山自首”的阴谋伎俩。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部落的居民通过亲属关系劝说抗日群众“下山自首”。他们欺骗说：“只要下山自首就既往不咎，平民入部落给安排吃住，干部入部落给安排职务……”配合这种宣传，蘑菇峪部落还演了几个月闹剧。烧杀抢掠的姜大讨伐队走了，立即来个王新讨伐队，王新队宣扬要把蘑菇峪建成“王道乐土”。他们设立个粥场，支起一口大锅，煮了一锅红高粱米粥，大肆喊叫：“都来喝呀”！凡是来粥场的人，都给一勺粥。敌人鼓动施粥再加上特务的渗透胁迫，两个邻村果然有一

些人家进了部落。

而转角楼上，由于区干部及时揭穿敌人“假慈悲”的花招，二姑娘又通过砬棚夜校使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不仅没有一个人下山，反而更加努力适应高寒山地的农业生产。为促使庄稼早熟，进入伏天，人们便割来大量的嫩荆梢，就地铡得粉碎，顺着垅沟埋在庄稼的根部。一遭伏雨，嫩荆梢快速发酵，一股股肥力促使玉米、高粱、谷子、豆子由淡绿变成翠绿，由翠绿变成墨绿，秋季增收了不少粮食。

三

1944 年入冬以来，因为邻村有人背叛，敌人终于得知转角楼的情况，几次从南北两方面上山“围剿”，但都落了空。1945 年农历正月二十几的一天，驻车河的朱盛林讨伐队与蘑菇峪讨伐队的特务密谋后，逼迫、利诱邻村的一个人引路上了转角楼并住在山上。终于在高尖将二姑娘等 13 名老百姓捕去。

朱盛林讨伐队是一群残无人道、血债累累的衣冠禽兽。隔天的一早，他们将被捕的人押到大杖子南沟沟口，一声嚎叫，首先将包括雷永龄在内的 11 人枪杀。在陈尸狼藉的血泊里，二姑娘仍然迎着寒风挺立着，直直地瞪着一群刽子手，而她的怀里仍然搂着一个埋头恸哭的小姑娘——她的 13 岁的妹妹四头。

这时，一个带着警佐肩章的大红脸日本人橐橐地奔过来，此人叫大厂，是讨伐队的副大队长。他从细发拂拂的二姑娘的脸上仍然透视出一副特别清丽纯美的神韵，便通过翻译命令地说：“夜里陪我去睡觉，就不枪毙你了！”

“鬼子！恶狼养的！”二姑娘破口大骂，“姑奶奶宁可死，决不跟牲口搅在一起！”

那个警尉翻译劝二姑娘压住火气，近前一步悄声说：“你不跟太

君，只要跟我，也能保命。"

"呸——!"二姑娘狠狠啐道，"没脸的败类，像你这样活着还不如一只看家狗。"

那个拿枪执刑的小队长将翻译拉到一旁，回身用枪口点着二姑娘说："你可别错过最好的机会，能跟着我，也能保你不死。"

"你们这群活牲口，都得挨枪崩!"二姑娘大怒，"中国姑娘不怕死!"她离开妹妹，猛地直撞鬼子的枪口，猝然英勇就义。

刑场被震撼了，惊得日兵连连后退。当他发现姑娘就是在他的枪口前倒下，懊恼地一甩手枪走了。他是这里的太上皇，一群警官急忙追过去，有的送回那只手枪，有的问这问那。一群警士匆匆围过来，有的看二姑娘死没死，有的扒二姑娘的衣裳……。乘着混乱之际，一个警长拉着四姑娘跑了。

讨伐队走了，当地群众奉命来烧埋尸体，一位教过书的白发老人挎个包袱也跟过来。老人先从包袱里拿出那件他教书时穿的青布长衫，让他的3个孙子先给二姑娘的尸体穿上。接着他又领着一个孙子从阴坡上割来两捆青棵棵，铺在二姑娘身下一层，用那个包袱皮遮了二姑娘的脸，身上再盖一层青棵棵，才让他的孙子们厚厚地埋严。

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问："爷爷，大雪漫山的，您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青枝子？为什么用它给二姑娘围上?"

"锁柱儿，你记着。"老人抹了把泪水接着说，"这种棵棵只有那老阴坡花秸子行里才有，花秸子比它高，拨开花秸子才能露出它来。"

又有几个青年围过来，有的问爷爷冬天怎么还有青棵棵，老人凄楚地说："部落的监禁，行无自由，近在南山，相对不识。这是一种奇花异草，一墩一墩的，它的名叫冻金子。夏天开花，洁白如玉，奇就奇在花的容貌，松柏的性格，不怕风暴，不惧严寒，越是冰冻它的叶子越翠绿翠绿的。所以，叫冻金子。你们看，楼上的二姑娘就是这

样永不凋谢的冻金子花呀！……”

那个警长叫陈金铭，是柳河口警察署的，他与这个讨伐队的大队长是同乡，常来常往，因而他敢来这个刑场观察逗留。二姑娘宁死不屈的壮烈，惊得他出一身冷汗，心底极受震动，想到自己的将来更加忐忑后怕，而最现实的，是眼前他家中急需一个人。因而，他不顾有人几次阻拦，绕了两次弯，还是将四姑娘领回他的老家承德，侍候老婆的月子和给带大点的孩子。日军投降后，四姑娘被接回家，长大后成家，才起了大名雷秀英。如今忆起她二姐的浩气和不幸，仍然热泪长流。



雷秀英（四姑娘）家境舒适、身体健康（2000年）

我的童年

——记进部落前后的日子里

郑福堂

人生如梦，岁月无情。当年还是儿童的我，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银发老人。

2003年，回乡探亲时，我来到了大水泉村。当看到日伪统治时期大水泉部落（即“人圈”）的围墙废墟时，60年前的历历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有生之年，把这段亲身经历的悲痛历史，分别用三个村名做题目记下来，对社会应该说是做了一点贡献。

一　乌头牛

关于乌头牛村的由来，诗人刘章曾以《乌头牛》为题，写过一首散文诗。大意是：有一头公牛和老虎结下仇，日夜在深山里决斗，村民们为保护公牛，打死了老虎，把虎皮晒在石头上。公牛再也找不到仇敌，从远山扫兴回到村头，公牛老远望见虎在，便夹尾低头猛向老虎撞去，只见牛头入石，热血涌流。

我家住横河源头獐帽山下的乌头牛村。抗战时期是冀东一小块革命根据地。20世纪60年代初，天津在此地建了一个“三线”军工厂，叫庆丰厂，因此更名为庆丰村。伪满时期，这个村和见财沟村，都被划为“无人区”，美其名曰：“无住禁作地带”。

日伪当局划“无人区”的目的，就是为使八路军与山区人民群众

"完全隔绝"，即日军所称："民匪隔离"，封锁人民群众支援抗日战争。

在我们村四周的墙壁上，用白灰醒目的写有"无住禁作地带"标志。西起杨树沟庄东山口，东至与大水泉村交界的小抄岭、南与宝地(地名)、北与鹰手营子的分界，分别为鸡冠山和喇嘛岭。划为"无人区"后，伪满政府强迫农民搬到临近的大灰窑、东南沟、大水泉和宝地几个部落。日伪军在这个地带里，实行灭绝人寰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在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和李鉴铭等领导下，一部分群众坚持山地、坚持抗战，与日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山区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房子烧了住山洞、住窝棚，没有粮食吃树叶子，也不动用为抗日武装储藏的一粒公粮。

我家有三人当村干部：二叔郑焕德当办事员（即村长)、妈妈刘素贞是妇女主任，我是儿童团长。任务是组织民众抗日、召集会议、坚壁清野、征集和掩藏公粮、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等。

妈妈是个小脚，为了破除农村旧习，带头剪掉了纂儿，解掉了裹脚条子，一瘸一拐地在山沟里走家串户，耐心做群众工作。

1942 年，山区老百姓的房子被日伪军烧光以后，群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生产和生活难以继续维持了，纷纷下山投亲靠友，最后只剩下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户。我家躲在驴园西山的砬子上，搭起窝棚，全家 4 口人只有一条被子维持生活。

山上没有路，有的地方用四肢爬行，冬天吃水要下山凿冰块，背上山化着吃，那艰苦的环境是可想而知的。

一次，二叔被检举，日伪军把他抓到宝地部落，拷打关押了几天，经多方求救释放。这段历史，我在部队也受到一点牵连。为此，我曾让二叔把他的情况讲清楚，以便向党组织有个交待。不久，二叔给我写信说："抗战时期，被敌人抓去，打得死去活来，实在受刑不

过了，交出了公家的三八步枪一支，子弹30发，油墨一盒，自家的独子毛丝土枪一支”。

那时候的斗争环境太严酷了。1984年2月18日，父亲郑焕恩亲笔写的回忆：

“1942年农历正月初四那天，敌人集中鹰手营子、土城头、金扇子、兴隆、大水泉、宝地和石庙子等7个据点的日伪军，对乌头牛和见财沟进行了大扫荡，杀害了十多位无辜老百姓。有枪打的，也有刀砍和用刺刀挑的，真是有冤无处诉。”

2002年10月16日和2003年4月4日，我先后两次来到大水泉村，在侄子郑冬云陪同下，访问了86和81岁高龄的老人李合和李同兄弟二人，论乡亲，我还叫他们表叔呢。

当谈到日军的侵华罪行时，老人家悲愤的向我们诉说了他家的不幸遭遇。他们说：“抗战时期，他家住乌头牛村大榆门沟。在1943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四）敌人大扫荡中，母亲、弟弟等9人，被抓到见财沟遭枪杀。他们是：母亲（郑氏）、五弟李贵、五妹子、老舅母（郑胜妻子）、老舅的5岁儿子和大舅13岁的女儿；还有白玉春妻子和见财沟村的郑良妻子及其怀抱女儿共9人，其中李贵和五妹子，在敌人撤走后，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死里逃生。”

我的哑二爷，也于这年春天在慌乱中失踪。

二　宝　地

1943年底以后，由于武装班长郑洪瑞叛变，乌头牛的抗日活动遭到了严重破坏，斗争环境日趋恶化。

记得，那是个腊月天，除二叔留下继续坚持山地外，我们全家人突破日伪军的包围，连夜投奔宝地二婶的娘家。走到大抄岭子的时候，二婶在冰天雪地里，找了个避风处，生下了二女儿。

1944 年春节，是在宝地部落里过的。因为是下山户没有居民户口，老百姓叫什么“黑户”，经常遭敌搜捕。农历正月十四那天，父亲被石庙子据点的特务抓走，在甲长王怀仁家，严刑拷打，还灌凉水，折腾了半宿，没捞到口供就放了。吓得父亲连夜逃到杨树下部落里的亲友家，躲了两个多月，才回到宝地与家人团聚。

在部落里 15 岁以上的男人都要有伪满政府颁发的“证明书”（即良民证），作为合法身份。我和父亲同其他群众一起，到石庙子据点照了相。过了些日子，为领《证明书》，来到滦河川儿佛爷来警察署。那天父亲有事，是我一人去的。在街心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前来领证明书的人，还挤满了围观的老百姓。几个荷枪的伪军，站在人群中间的一张八仙桌旁，其中一个当官的坐在桌子后面的凳子上，挨个叫着名字开始发证。我领过自己的之后，在叫父亲的名字时，我又回答：“有！”随即往前迈了几步还没等接到证时，伪军发觉我是冒名顶替的了，便大声喝道：“到这边儿站队！”此时，心慌得直跳，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如果弄到警察署去审问，非漏“馅”不可，这可怎么办呀！正在焦急之时，只见有人给我使“眼色”，意思是叫我快逃跑。说时迟，那时快。我假装镇静无事的样子，退了几步，乘人不注意时，象猫一样向后猥到人群中溜了。沿着地边子，经钓鱼台北山，一口气跑到八仙沟，等到大帮群众赶来时，才放心的跟乡亲们一起回了家。

好险哪，证明书没领到手，还差点儿搭上小命！

三　大水泉

由于暴露了身份，在宝地实在呆不下去了，于 1944 年冬季，全家搬到了大水泉。

在大水泉部落，除经常偷着回乌头牛耕作那点还不知能否收获的庄稼外，还在大水泉东山里租种了几分山坡地。

大水泉部落，围墙高有丈二（4米），宽五尺（1.5米），设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围墙四角有炮楼，墙头上垒有射击用的垛口并有断续铁丝网。内（里）墙根儿修有人行环道，夜间有民团或自卫队巡逻。在部落的中央，设有木制高架了望台。部落大门由伪军把守，每天早上太阳老高时才打开，晚上天不黑就关上。若是有点“风吹草动”或当官儿的不高兴时，甚至一天不开门，老百姓没有一点人身自由。

部落里民房非常简陋，一排挨着一排，拥挤不堪，锅台连着炕。窗外是猪圈，有的人家是人畜厕在一起。夜间，老百姓不许关门，以便警察和特务们查户口，任其为非作歹。老百姓在日伪的压榨勒索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吃的牛马食，穿的乞丐衣。有不少人特别是妇女儿童，衣不遮体。个别从山里被强行搬迁来的人，因衣物被烧光抢光，连条破裤子都穿不起，只好腰间围一块破羊皮或是麻袋片儿。还有的冬天没棉衣穿，用晒干的河套青苔做成毡子围在身上，如果有人进屋时，就围上破被，依偎在炕角里，不敢见人。

部落里的日伪军，还经常配合其他部落的部队，到驴儿叫、小横河和乌头牛一带围攻扫荡，见人就抓、就杀，见物就抢，没有百姓的活路。

由于部落里人畜拥挤，加之医疗卫生条件差，伤寒、霍乱和疟疾等疾病经常发生，瘟疫流行，死人的事儿乎天天发生。1943年，大水泉部落死于瘟疫的就有200多人，占总人口20%。赵黄连一家4口，死了妈妈和两个弟弟3口。有的甚至一家人死绝，尸体臭在屋里。真是“无村不带孝，处处有哭声!”

1945年8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石庙子老姑家住着，看见兴隆、大水泉和石庙子等地的日伪军，慌恐不安，一帮子一帮子的带着家眷，背包握伞往关里跑，一时不知何故。有人传来口信说是日本投降了。

几天以后，区长李鉴铭来到石庙子并召开了村干部大会，向大家传达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好消息，还布署了下一步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等事宜。

会后，我立即回到了大水泉。全家人高兴地收拾东西，回到了故土难离老家——乌头牛。借南墙塔起了偏厦（棚）子，搭上火炕，开始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父亲坐在炕头上，嘴里叼着烟袋，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说："多亏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千方百计打败了小日本，我们才得到今天的平安日子。"

日伪统治下的茅山

郑福堂

茅山（今青松岭），是兴隆县西部的一个重镇，今是镇政府所在地。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妄图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兴隆县境内共建立部落199个。

茅山部落，是从1941——1943年期间建起来的。日伪实行大集家后，风景秀丽的茅山，变成了有105户500口人的部落。

茅山部落，有东西两个大门，东门在温秀贵家房东，西门在今信用社处。大门口中有岗楼，由警察日夜把守，在部落围墙的四个城角都修有炮楼。

日伪军对部落里居住的民众控制是非常严密的，每天早晨太阳老高时打开大门，晚上天不黑就关大门。外出干活的农民在天黑之前必须回城，否则就说你私通八路。

在茅山的果园河东，设有警察署和警察分驻所，常驻警察的数量由开始的十几人增加到近百人。

1941年9月18日夜间，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第八区的武装基干队，为解救茅山人民，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攻克了茅山警察署和花市矿井队（后来改为花市警察分驻所）。

我四叔郑焕青在这个分驻所里当警察，那时我被派到花市修公路，生活特别艰苦，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豆饼。四叔经常偷着往工地送咸菜给我吃，他用小铁罐头盒装满咸黄豆或是咸萝卜丁，假装监

工的样子把咸菜交到我手中。之后不久，郑焕青带领该所60多名伪警察反正，被编入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当排长。

在茅山藏匿着几个特务，他们经常与日本宪兵联系。村公所办事员刘日，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的会议，每次开会他都把与会者的名单记下来交给日本宪兵队，因为他的告密，在1942年3月8日日军大搜捕时，在茅山东坡被抓住26人，有28个被带走，另逃回1人，老温家就抓走温秀贵、温礼和其二子温秀功3人，罪名是给八路军送过信和粮食，后来放了温秀贵，另二人下落不明。

3月8日的晚上，敌人又抓走温秀贵的爷爷和堂兄温秀田、温秀东和温秀之（兴隆县政协前副主席温义之父）等28人，并在他们的脑门上画上圆圈，没画圈的（包括温秀贵）当天晚上放了，画上圈的押往承德。

3月9日拂晓，日本宪兵队和附近据点的伪军、警察300多人，在茅山、果园、东峪和老营盘等地抓人，因群众多未起床，时间不大就抓300多人。把被抓的人用绳子勒住脖子，每7个人串成一串，两边有端着刺刀的日伪兵押着，赶进茅山苏家大院。那天，温秀贵的父亲温志起得早，听到枪声躲到菜窖里躲过去了，温秀田给日本背背子时活活累死了。

9点多钟，日伪军在院子里点起大火，一旁摆上各种刑具。一个当官儿的日军官声嘶力竭地审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公粮藏在哪里？谁是共产党员？"特务王浩信也在一旁诈唬："说！不说就把你们活埋了！"众人没有一人吭声的并用愤怒地眼光瞪着敌人。

办事员陈福生，被敌人从人群中拉出去按倒在地上，没头没脑的遭到一顿乱棍毒打，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当他醒过来时，敌人又审问，还是一无所得，接着又是一阵毒打，可陈福生什么也不说，敌人见什么也得不到，最后被一个穿大皮鞋的日兵活活踹死。

农民董信，被敌人灌饱凉水和辣椒水后仍进熊熊大火中，衣服和头发全都烧着了，在场群众急红了眼，一拥而上，把他从火坑里抢救出来。

于占全和纪福洪父子等人，被剥光衣服，有的被灌凉辣椒水，有的被棍棒打，然后各个被仰面朝天绑在梯子上，下面用火烤，上面在胸部、腹部或生殖器上放上炭火。此情真是残忍至极，令人发指。同胞们各个被烧烤得胸部冒烟，后背流油，肉都烧烂了。群众仍坚强不屈，敌人用如此残酷的暴刑整整审逼了一天，什么也没得到。

从这年10月开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茅山又被抓走50多人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到12月初，穷凶极恶的敌人，在群众身上捞不到什么，把折磨半死的20来人放了，把其余30多人运往兴隆县城，在南土门沟里枪杀20多人，其余10多人被押送承德和锦州监狱，无一生还。1943年闹瘟疫时，部落大多民众高烧、昏迷、呕吐、不进食和腹泻，茅山死70多人。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茅山人民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中共地下工作者茅山村共产党员郭文焕，利用给警察署做饭的公开身份，与本村地下办事员温秀之密切配合，往外传递情报。11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因特务告密，郭之焕、温秀之和其他两个村干部，又同时被关进茅山警察署。

英雄的茅山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犹如茅山村头那两棵如云的劲松，顶风遮雨，万古长青。

惨无人道的部落生活

王久侠

巍巍五凤山，以其不屈的形象，见证着车河两岸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每一次事件。

清澈的转湖水，以汩汩清泪向世人讲述着当年日军烧杀抢掠的罪恶。

飒飒山风，仿佛发出阵阵呐喊，告诉我们后人勿忘历史。

2004年春天，我来到距兴隆县城东75公里的车河堡。此时的车河两岸已是山花烂漫，鸟语林绿，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在欢快地播种着希望。车河正展示着一幅人间最美好的画面。

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侵略者在车河堡一带强行集家并村，建立“无人区”，修建部落。数以千计民众死于刀剑之下，血火之间、毒气之中的那段经历，以警示后人永远记住那段屈辱历史。

车河堡村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今年82岁的孙希恩，曾是八路军的办事员。虽然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家就有些激动了。他说我不把那段历史告诉你们，我心里不安宁，我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了。说着老人家两行浊泪早已打湿了衣衫，老人边擦着泪，边诉说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1943年春季，日伪军开始让村里的住户全部搬进西洼部落。西洼距车河堡西南一里之遥，属车河岸边。日伪未占领前，这里十几户人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商人李文英的“意德堂”粉房生意兴隆。日伪进村后首先把“意德堂”垒成围墙建成部落，强迫当地人从河套

搬来石头，把方圆几十亩地方垒成围墙。为防止民众逃跑，把部落外半米处挖成两米深的壕沟。有两名日兵和数十名部落警看管。两名日兵带领部落警占领了“意德堂”的所有房子，然后把西洼、西化鱼沟、西大山、贾庄、沟门、解放和黑河川的百姓全部赶进部落。初期住进去300多户，半年后成为车河最大的部落，达到900多户。部落内人挤人、人碰人，简直成了人粥，仅“意德堂”30平米左右的一个门楼下就住着4户人家20多人。

孙希恩家用四捆秫秸棍搭在部落墙边，其实跟三角架没什么区别。夏天，大雨飘泼，部落里大人孩子哭成一团，有许多孩子和老人被雨水淹死。大雨过后，部落往外抬许多死人。冬天部落里的日子更是没法过，家家都是缺吃少穿，一家人有一床被子就不错了，有的人为了御寒夜里把锅盖盖在身上。每天早晨都有冻死的例僵尸抬出。

日军不许部落里人耕种，只许人们在部落附近5里地范围里活动，拾柴、扒树皮、采树叶吃；5里地以外是划为无住地带的“无人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越过边界就杀死。孙希恩老人亲眼看见过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耍时，一个小女孩越过了警界线，被日兵用枪刺杀死。

为统治部落里的中国人，日军把部落里人编成自卫团。无论大人孩子都编进团里，发给证明，没有证明的就视为八路军格杀无论。

孙希恩是八路军的办事员（村长），经常利用到部落外采树叶或打柴的机会，为八路军送信；组织部落内妇女为八路军做军鞋。日军以为是为自己男人做鞋也不过问。但做好的鞋子如何往外送却是大难题。后来，想出借每天往外抬死人的机会，与殿胜、候起明一起，把军鞋藏在死尸身下，抬出部落，再设法埋在一个地点，让八路军夜里取走。他和其他办事员一起偷偷组织部落内的人开会，宣传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并把八路军干部铁巩和程区长（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区

程新民)，他们在“无人区”里的战斗形势讲给部落里的乡亲们听。乡亲们很受鼓舞，他们利用深夜日军睡觉时间，撞倒圈墙，组织青壮年逃跑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日军把杀人当成乐趣。一天，驻蘑菇峪的日本军官黑岩到车河堡一带视察，在西南沟门把十几个妇女集中到一起，围成一个圆圈。黑岩站在她们中间挨个细看，长的好看的，黑岩和他的兵一起在光天化日下就地强奸，最小的姑娘只有十一二岁；长相不好看的，就用刺刀给挑了。一个长的不错的张氏妇女被十几个日兵轮奸后，又用刺刀剖腹而死。

为练兵，一个叫安原的日兵带着6个日兵在车河堡村南街，用枪瞄准来往的行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一枪射不中，就用刺刀刺死。大西湾和西南沟两个杀人场，天天都是血流成河，夜里豺狼乱吼、野狗狂奔真是凄惨。

车河川范围内车河梁、车河堡、乔木梁、三道河、大坡、西湾、达连坡、高杖子、大杖子、车河口、柳河口等十多个部落。其中西湾部落与根据地解放的山路交通方便，联系较多。附近的几名八路军办事员经常组织部落人的抗日活动。在车河川所有部落范围内，西湾部落里人最多，斗争最激烈。日军为镇压抗日活动，在食盐里掺毒药，人吃了精神晃忽、眼睛看不清东西，身体虚弱的致死，身体好的就活了下来。他们还以“消毒”为名，往部落里洒东西，人们呼吸了像臭鸡蛋味的空气就发烧而死。在西洼一个部落里共死了七八百人。

一天，日军在“无人区”抓来两个青年，正赶上黑岩也在西洼部落给两个日兵训话。听到从解放抓来人，就带着两个日兵到贾庄南山小沟子的地方给杀了。当场把心脏剥出来用水一涮就生吃了。吃完人心两个日兵的眼睛都红了。解放后，两名被挖了心的青年人的尸骨，被家人埋进了祖坟。

孙希恩经常利用到部落外干活的机会为八路军送信。一次，他用

鸡毛信向八路军报告车河堡槐树底下（地名）驻扎着100多名日军和无数伪军，在安原和安波的带领下，准备对八路军进行大包围大扫荡，八路军接到信后安全转移。

在采访孙希恩的同时，村里82岁的唐木坤老人，诉说起日军的罪行。他说："1944年，日军带着十几名部落警，在车河两边的山上埋毒气弹。在埋好毒气弹的地方插上太阳旗，以此来报复和孤立解放一带根据地的抗日力量。但日军的恶行并没有得惩，老天还是有眼呀。那是1945年夏天，一连下了十多天大暴雨，随后是连阴天，一共是七七四十九天没晴天。毒气弹多一半被山上的泥石流卷走，剩下的也失效了，车河川群众免了一大劫难。"

孙希恩老人说："1945年8月，日兵在部落外拷打一名八路军办事员，不屈的办事员与日兵抗争。穷凶极恶的日兵抡起大刀就要杀这名办事员。关键时刻，孙希恩用鞭子抽打了日兵高举的手臂。日兵大叫时八路军办事员跑掉了。孙希恩转身躲进部落。他立即脱掉了穿在身上的家织布青褂子，换上别人的篮夹袄。日兵醒过神来后，一个一个在部落里过筛子，就是找不到穿青布褂子的小伙子。日兵说：如果部落里人不交出用鞭子打他的人，明天就把部落里的人全部用机枪给扫了。孙希恩想，如果日兵真杀无辜的，也只好站出来不连累乡亲。正在这关键时刻，驻车河堡的日军官安原来到西洼告诉那个日兵，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了。只见两个日兵哇哇啦啦一阵子抱头大哭，然后夹着尾巴逃走了。"

采访之后，孙希恩老人拿出一个红本，那是优抚证。现在孙希恩老人在当地民政部门领取定期的补助款。他说："这是政府对我革命活动的肯定呀！"

五 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

中共兴隆县委党史材料征集办公室

1939年冬，日军为“确保满洲”，阻止八路军向东北挺进的战略目的，开始在兴隆县局部试行集家并村。逐年扩大集家并村的范围，惨绝人寰的“大讨伐”、“大扫荡”、“大检举”逐年升级，到1943年上半年，在兴隆实现全县范围的集家并村。制造了东西100余公里、南北50公里的“无人区”地带。从而连接成沿长城一带的千里“无人区”。

日军的残忍野蛮手段，虽然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千古浩劫，给冀热边人民的抗日斗争造成巨大损失；然而也锤炼了冀东的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兴隆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展开激烈地反集家斗争。在兴隆“无人区”内建立起三片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三片根据地面积虽然很小，但经历日伪数百次的围攻，却始终摧不垮，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小面积根据地长期存在并日益壮大的范例，在抗日战争史上，不能不有其值得研究的典型意义。

一、根据地位置及范围

五指山根据地，其范围东起五指山，西至獐帽山，南至老虎沟，北至五凤楼山、下柳河川的北山。东西70公里，南北55公里。东有滦河相隔，西有群山屏障。境内有五指山（海拔1383.7米）、五凤楼山（海拔1475.5米）、大石镐山（海拔1227.0米）、月芽山（海拔1257.9米）、獐帽山（海拔1251.6米）、观星台山（海拔962.4米）

等山脉，连成“千岩况秀，万壑争流”的深山区。

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委、县政府，设在根据地的中心点的马架沟、黄砬墙、南大台、南四道沟等地。南有第八区、西有第十二区、西北有第十一区、东北有九、十区（合并）四个区委会和区政府。日伪大搞“无人区”后，这片根据地内仍有民众2000多户1.3万多人坚持抗日斗争。根据地周围有100多个伪武装部落，其中有日本关东军三个小队、两个日伪混合讨伐大队、五个警察讨伐大队、两个警察署、五个警察分驻所、伪满军三个团，计万余人。

大小黄岩根据地，地处燕山主峰，海拔2118米的雾灵山西麓，由小黄岩川、大黄岩川组成。东西35公里，南北35公里。根据的中心点营南峪、大石湖等地。境内山如连城，谷多涧深。农民运输只能靠驴驮人背，小车也不能通行。这里先属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第三区，后属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第四区。

日伪实行集家并村以后，这片根据地内仍有民众5000余人。根据地周围有日伪26个武装部落，其中有日本关东军一个小队，伪满军一个团、两个警察讨伐大队、两个警察署、三个警察分驻所计4000余人。

狗背岭根据地，南、西至长城，东至陡子峪西山，北至黄门子、响水湖。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25公里。地域虽小，但群峰突起，山势奇险，多绝壁、峡谷，多秘洞隐窟。此地先属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第二区，后属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第一、六区。日伪实行集家并村后，仍有民众5000人坚持在层峦迭嶂丛中。根据地周围除有10余个日伪武装部落外，还有关东军一个小队，伪满军两个营、一个警察讨伐大队、一个警察署、一个警察分驻所。是伪兴隆县警务科直属讨伐队重点围攻的地区之一。日伪聚集兵力3000人以上。

二、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这三片小根据地虽均受日伪军四面包围，但都不是孤立的。五指山根据地与滦河东的迁（安）青（龙）山区根据地、与长城内遵化北部山区根据地有密切联系；小黄岩根据地与密东山区根据地有密切联系；狗背岭根据地与鱼子山、盘山、平（谷）北、密（云）东根据地有密切联系。这些小根据地相连，形成对日伪军的大包围圈。因而，这三片根据地面积虽小，却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一，是冀东党、政、军的重要回旋区。比较重要的战略行动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1 年 7 月，日军在冀东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冀东军分区主力部队第十二团、十三团，因冀东基本区回旋范围不足而遭受严重损失。8 月 1 日，中共冀东区分委于丰润大张屯第三次扩大会议总结了经验。9 月，冀东党、政领导组织长城工作团，并由十二团、十三团主力配合，转移到兴隆的五指山区及周围地区，进一步开辟热南山区根据地，一直持续到年底。

第二次是，1942 年 4 月，日伪军 4 万余人围攻冀东基本区，实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冀东党、政领导和主力部队又隐蔽地进入五指山区。6 月中旬，军分区领导人李运昌、李楚离，在五指山区的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三仙（化名，今天桥峪）村召开军事会议，组建第十一团。赵文晋任团长、吴宗鹏任政委。至 7 月上旬，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冀东，开展恢复基本区战役。

第三次是，1942 年 9 月中旬，日军调集 4.6 万人围攻冀东，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冀东十三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又转移到五指山区。西部地分委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地方干部也分别转移到兴隆的天秤山、狗背岭、大小黄岩根据地。9 月间，李中权奉晋察冀军区命令来冀东十三军分区任政治部主

任，在五指山区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八区羊羔峪村与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军分区政治委员李楚离会面。同年 11 月 20 日，军分区参谋长彭寿生率特务连和侦察连一排在黄花川河口村设伏，一举全歼车河口日伪混合讨伐大队 180 多人。击毙该大队长日军田中。是继王厂沟胜利后震慑日军的第二次成建制的歼灭战。直至 1943 年 2 月，冀东党、政、军负责人及主力部队又返回关里基本区。第四次是，1943 年 6 月，军分区参谋长彭寿生指挥十一团一部、十三团一部和第三区队进入迁遵兴联合县，开展了恢复迁遵兴战役行动。10 月，热河之敌配合冀东之敌进攻冀热边特委、行署驻地迁安东水峪。赵文晋率十一团掩护行署机关突围进抵五指山区的河南大峪和黑河。十一团两个连与张友德、崔炳一连配合在东河北歼灭与俘虏伪满军一个连。以后，冀东领导人及主力部队也不断地来这三片小根据地内工作、战斗与休整。把回旋区建设成与冀东密切相关的冀热边之中心地区。

第二，牵制日伪两万多兵力。

由于这三片巩固的小根据地的存在，冀东军分区主力部队第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和第二、第三、第六区队，经常以这三片小根据地为基地开展外线作战；再加之承（德）滦（平）兴（隆）和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不断地向兴隆境内开辟，1940 年至 1941 年，日伪试行“无人区”时，深感兵力不足。于是派伪热河省警务厅保安科长葛铭以警正衔充任伪兴隆县长。葛铭到兴隆宣布《伪治安维持法》，兴隆县进入“非常时期”，建立和调入 20 个县辖警察讨伐队。他们是：申永队（主官申永）、李振队（主官李振起）、金殿队（主官金殿书）、刘敬队（主官刘敬）、禹信队（主官禹信臣）、沙鼎队（主官沙鼎勋）、邢长队（主官邢长胜）、吴太队（主官吴太福）、宋庆队（主官宋庆云）、朱盛队（主官朱盛林）、刘文队（主官刘文

选)、范文队（主官范文玉)、李庆队（主官李庆生)、金海队（主官金海)、田松队（主官田松林)、郭维队（主官郭维)、郭建队（主官郭建民)、陈惠队（主官陈惠民)，约计兵力近万人。同时又从伪满第五军管区调入直辖混成第八旅步兵第三十四团（团长刘书元)，分布长城沿线一带。

1941年秋至1943年春，除原驻的日本关东军“八八一”部队（部队长松吉中佐，全队1000余人）继续驻守长城沿线以外，在整个战场日军兵力已明显不足的情况下，热河日军司令部“山田队”调入兴隆（该队300多人，有重机枪4挺、轻机枪20多挺)，沿长城内外进行“讨伐”。日伪又不惜从他们视为心腹“地下长城”的伪通化省调来围剿杨靖宇将军的最凶残的10个省属讨伐大队进入兴隆，约计4500人。他们是程斌队（主官警正程斌)、刘其队（主官警正刘其昌)、石振队（主官警正石振东)、孙德队（主官警正孙德英)、曲焕队（主官警正曲焕文)、安田队（主官警正朝鲜人安田存夫)、唐振队（主官警正唐振英)、王喜队（主官警正王喜)、马玉队（主官警正马玉亭)、王汇队（主官警正王汇东)。又由伪吉林省第三军管区调来步兵第八团，由奉天（沈阳）第一军管区调来步兵第三团，由佳木斯第二军管区调来步兵第二十四团，由伪第五军管区混成第八旅调来步兵第十二团，约计伪满军7000人。

以上聚集的日伪军、警部队，再加地方警察署系统的武装警察共约2.1万余人。一个县能钳制日伪两万多兵力，显然对冀东、对华北整个抗战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第三，是境内11万多民众的精神支柱。日伪在兴隆境内建立了199个部落中共党组织与其中120多个部落中的民众建立了联系，在12个部落内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党小组或有地下党员活动。1942年，伪兴隆县日本宪兵队向锦州伪西南防卫司令部汇报中称，澈河川上的

50个部落都通“八路匪”。

第四，为向热河境内开辟建立了第一线的基地。冀东八路军十一团、十三团及第三、第二、第六区队向北挺进时，都曾在这些小根据地内修整和准备。

第五，为黄方刚起义和平解放兴隆奠定了基础。日军投降后，冀东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与伪满西南防区司令黄方刚（少将）谈判，使黄方刚率部下两万人起义，接受八路军改编。承兴联合县、承兴密联合县积极配合，在黄方刚起义前就开始分区域接收基层伪政权，在其起义后又积极地做逃兵及接收逃兵武器等工作，粉碎了国民党策划抢先接收兴隆地区的阴谋。第六，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时赶赴东北，提供了一条别径。1945 年 9 月中旬，国民党军和日军一部抢占秦皇岛。9 月 30 日，国民党军进攻唐山、山海关一线。原兴隆境内的刘其、程斌、石振、孙德讨伐队投靠国民党，继续盘踞遵化县城。11 月末，中共中央委员陈云、邓小平、林彪、罗荣桓、李富春、林枫等率 2000 多名党政军干部取道兴隆赶赴东北。这些中央领导人在兴隆县城住一夜，对兴隆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表扬了兴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并送给兴隆县委一台军用电话机以资纪念。

三、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

兴隆境内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主要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正规军的长期开辟。1937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38 年 2 月 10 日，毛泽东向八路军总部指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须

作充分准备……”。

1938年6月17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4000余人挺进兴隆。四纵队在兴隆境内打了许多胜仗，加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新风，给在日军统治下的兴隆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10月，四纵西撤，留下三个支队在冀热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其中第二支队队长包森领导的第一大队，即赖邦游击队开辟五指山区。第三支队政委赵立业率一部以大、小黄岩为基地开辟雾灵山区。第三支队队长单德贵（1944年叛变投敌），率一部以鱼子山为基地开辟四座楼、狗背岭一带山区。1939年，第三支队二营教导员李满盈率游击队继续开辟大、小黄岩。冀东抗日大暴动高潮后，抗日斗争处于低潮时期，这几支小支队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并且打了许多胜仗，与五指山区、大小黄岩和狗背岭一带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

1938年7月，四纵队一部路过五指山区厂沟时发生这样一件事。16岁的贫苦少年刘福山的一双青布鞋不见了。屋里撂下一双没有底的烂草鞋。他很生气，动手翻动，一只草鞋里放着一封信，一只草鞋里搁着4元边区币。信中说我是四纵队的一名战士，因为有紧急任务需要急行军，迫不得已违反了纪律将您的鞋穿走了。请您替我再买一双鞋吧，真是对不起，请您原谅吧！4元边币能买两双新鞋，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好的军队！刘福山感动得流下热泪，拿着钱追出去，山路上留下的只有斑斑血迹。日军追过去以后，刘福山家的干草垛里却留下一名受重伤的八路军战士。当刘福山的爸爸刘旺弄清这名战士是四纵队三十四大队一营一连的班长，叫王普连，20岁，陕北人。打曹家路（密云县境内）据点时负伤，全家人立即忙碌起来。乘夜间将战士掩藏到村外的破窑里。日军走后，又秘密地抬回家，给战士换上便衣。一起吃，一起住，找偏方给战士治伤。刘福山的奶奶、婶婶天天

给战士接屎接尿，洗伤口，换药，从伤口里往外挑蛆。经过几个月的秘密疗养，战士能走动了，就让战士装哑叭（因为口音不对）去山里放牛，以躲避日军耳目。1939年春，敌情越来越紧，又将战士转移到红石沟南岔王富田家。后来赖帮游击队过来，群众帮助已经康复的战士与赖邦取得联系。王普连重返二支队。临走，王普连回到刘旺家，给爷爷、奶奶磕了头，给叔叔、婶婶行了礼，洒泪而别。往事已去46年，现在王普连改名王荣，在国务院某局工作。1970年他重返西厂沟省亲。如此感人肺腑的逸事在这些山区还有很多。兴隆山区人民与八路军、游击队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创业，有200多人参加第二、第三支队，成为二、三支队的发祥地；兴隆山区人民亲手帮助二、三支队由弱变强，壮大为冀东军分区主力十三团。

第二、冀东党、政、军的四期开辟

第一期开辟（1940年春至1941年夏）

1940年1月1日，冀东区党分委遵化阎老湾会议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决定开辟新区，创立敌后小块根据地。1940年3月，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建立。4月，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建立。7月，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西北办事处（也称特区）和区委建立。开始开辟北寨、白羊、以及兴隆境内的椴洼、梨树沟、南水峪、狗背岭等地。11月，蓟平密联合县扩建为两个联合县。南部为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北部撤销西北办事处，建立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下设三个区，第二区继续向罗家沟、白羊、椴洼、南水峪、狗背岭、小西天一带开辟。第三区，从密云塘子川向兴隆的大小黄岩开辟。1941年4月，以王文为教导员的十三团一个营向兴隆的天秤山、六里坪一带开辟。

第二期开辟（1941年夏季至1942年春）

1941年夏季，中共冀东区分委派出青平工作团开辟滦河以东的

热南山区。9月，派出长城工作团及十二团、十三团大部主力计几百人，开辟以五指山为中心的兴隆东部（赖邦游击队编入十三团）在长城北侧兴隆境内建立迁遵兴联合县第六区（沙坡峪、天高一带）、第七区（黑锅顶、潵河南一带）、第八区（羊羔峪、马架沟一带）、第九区（黑河上游）、第十区（门子哨至滦河口一带）、第十一区（下柳河、车河一带）、第十二区（驴儿叫、獐帽山一带）、第十三区（上下板坡、白河川一带）。

1941年底至1942年春，中共冀东区分委又在雾灵山东麓、南麓、北麓建立承（德）滦（平）兴（隆）联合县，在雾灵山北麓建第一区，在克梨木、荒地沟一带建第二区。至此，中共冀东区分委、专署，在兴隆境内建立起11个区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在200多个自然村的伪政权里选派了八路军办事员、武装班长；在群众中成立了报国会、妇救会等组织；民兵发展到7000多人。工作范围约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第三期开辟（1942年4月至7月）

中共冀东区分委、专署、军分区及主力部队转移到兴隆境内的五指山区和驴儿叫一带。在冀东区分委、专署的直接领导下，抽调关里（长城以南）的大批干部充实了兴隆各区的领导干部和助理员。在开辟根据地的基础上巩固、建设根据地。建立八路军一面村政权，发展党组织，吸收党员和工农先进分子参加村政权工作，清除村政权中各种坏分子。健全基本组织，训练民兵，武装自卫，锄奸反特；动员新兵、拥军优属；征收粮秣，支援部队；发动生产，救济灾荒；合理负担，发展统一战线等等。

第四期开辟（1942年9月至1943年春）

中共冀东地委、专署、军分区又转移到兴隆五指山和驴儿叫一带，逐级部署反“扫荡”、反“集家并村”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

选举村行政委员会，进一步训练民兵，坚壁清野，努力巩固民主政权。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努力向外开辟，在日伪统治薄弱区域内建立更多的两面村政权。注意执行统战政策，扩大统一战线力量。在残酷的反“扫荡”战争中，各级干部注意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尽可能地发动更多的群众展开反“扫荡”斗争。

第三、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

1940年6月以后，中共蓟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委员会宣传委员林远深入到兴隆西部狗背岭根据地一带建党。相继，平密兴二区区委组织干事下川配合林远继续在这一带发展党组织。1941年春，中共冀东西部地分委副书记兼平密兴联合县委书记李子光到小西天一带进行社会调查。这年麦收前，这一带的党员干部吉祥、范山林（朱家沟人）、山田（梨树沟人）、中文（南水峪人）等10余人参加李子光主持的政治训练班，在反“五一大扫荡”的战争环境中流动学习50多天。为朱家沟——狗背岭根据地培训了第一批坚强的党员干部。下半年，南水峪中心村建立了党支部（其范围内的小西天、朱家沟等自然村建立了党小组）。同时，中共平密兴联合县委又用两个多月时间，开办支部委员和党员训练班，普遍培训党员。1942年春，响水湖村又建立党小组。下半年，在平密兴联合县第三区区委的组织下，大小黄岩根据地开始建党。杨树沟、栅子沟、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台等村建立党支部、党小组。

兴隆东部的建党工作，除驴儿叫村（1932年建党）、沙坡峪村（1937年建党）由京东特委个别发展党员外，主要是随着中共冀东区委对迁遵兴联合县的开辟进一步建党。1941年，黑河川的成功村、解放村开始建党。1942年，中原、中田、羊羔峪、三仙、大山等村建党。1943年春，迁遵兴联合县第六区、七区、八区、九区、十区、十一区、十二区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至此，全县已建立89

个党支部，有共产党员600多名。

上述三片巩固的根据地，都是建党较早，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地方。

1942年秋冬，日伪开始大规模的集家并村，以2000兵力向狗背岭一带“扫荡”。共产党员、村财粮委员范山林领着部队留下的40多名伤病员爬上只有一条险路的峭壁“憋死猫”隐蔽。日军终于也爬上来，在非常紧急的时刻，范山林把伤员们的绑腿接在一起，把伤员从悬崖上一个一个地系下去。保障了伤病员的安全，而他自己却挂了花，但终于脱险。

1943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三日），日伪又重兵包围小西天。八路军十三团供给处及时转移，五连被围。小西天东、南、北全是悬崖峭壁，五连退到东南沿。占据北山头的日军用七挺机枪扫射，眼看五连要遭伤亡，范山林、高福两名共产党员和民兵冒着子弹分别领着五连从较缓的峭壁上攀蹭下去。为了掩护部队下山，五连王强等三名战士向扑来的敌群勇猛射击。弹尽后，三壮士毅然跳下50多丈高（150多米）的悬崖，壮烈牺牲。范山林背着负伤的五连指导员李光远突围脱险后，他才发觉自己的脚也流着血。

经过日军的烧杀抢掠，小西天上已经弹尽粮绝，坚持在山上的群众一连10多天没见到一粒粮食。在这样非常的日子里，有人也曾有过动摇，而吉祥、范山林、赵起等党员干部们却振作精神，发动大家刨开冻地挖地管子（大玉术）吃，一直坚持到2月13日（农历腊月十二八日）。正逢日伪军从关里掠夺回来，从小西天下的东峡谷路过。吉祥、范山林、赵起等干部立即组织群众扒开掩蔽的草墩子，从四、五丈长，十几丈深的东砬缝钻到下边二层坎的东砬盘。迅速安排大家拉开距离，一声令下，从峭壁上一齐往下滚大石头。刹那间满涧飞石，砸得日军拼命地往外逃奔。此仗缴获子弹500多发、粮食两千多

斤，还有猪、鸡、鱼、粉等各种年货，人们笑逐颜开地过个胜利年。

第四，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33年4月后，日伪在已经在地方建立一套“村、甲、牌”的政权体系。而根据地建设初期，是建设两面政权。随着日军的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1941年境内三片根据地即开始建立起民主政权。狗背岭，大小黄岩等地民众，公开地与日伪断绝关系。而五指山区，由于中共冀东党、政、军机关长期隐蔽，便采取继续由伪甲牌长出面与日伪应付，以麻痹敌人的灵活策略。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和认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伪甲、牌长和社会上层人士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为维护这片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夏季，第九区区长程新民等30多人在黑河上游活动。见草沟村的伪甲长周旺却向日伪呈送“我见草沟一带没有匪情”的情报。每逢日军来部落巡视，甲、牌长便及时通知返回深山的农民暂到部落集中，应付过去以后，农民们仍回到深山区。冀东党、政、军集中这里活动，需要大量的粮食，各区村认真贯彻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一些富裕户主动献粮献物。如前甲长伊俊峰（1942年加入共产党，成为一面村村长）几年来献粮2500多公斤。民主人士张忠政献粮1500多公斤、毛驴一头。瀔河川上的50个部落，有一半以上向根据地贡献粮物。1942年6月，组建十一团时，500多指战员在极其隐蔽的三仙（今天桥峪）村开会（沟里只有60多户，居住极为分散），五天吃的十石小米，以及许多的副食、蔬菜和锅碗瓢盆都是部落里民主政权干部支援的。当时天旱，一个小水泉都被部队用干了。为了不影响群众用水，李运昌司令员亲自挖泉掘水，群众很受感动。这片根据地里的政治动员工作很出色，“九一八”纪念大会、伪满军投诚欢迎会、军民联欢会、新年文娱会等等都很活跃。当地群

众喜欢看皮影，爱国影戏艺人随时创作新影词小段，深入宣传动员。如“李运昌司令员，带领二三团，回旋冀东地，来到五指山，发动边外民，开展游击战……群众缺水喝，司令给挖泉……”。

第五、根据地的武装建设

1941年冬至1943年春，根据地内各村从普遍组建武装民兵班，迅速发展为普建民兵排，行政村普建民兵中队，区建游击小队，县建游击大队。初期，在民兵缺乏武器的情况下，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递消息，警戒日军；除奸防特，维护社会治安；配合政府征粮征物，转贮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县、区游击队作战；破坏日军交通，开辟秘密交通线等。特别是长期担负保护领导机关，支援主力部队休整的五指山根据地民兵，更加紧张艰苦。1942年夏季，为了牵制关外的日军去关里围剿冀东基本区，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区长张友德率领区干部、区游击队和全区民兵统一行动，分散出击，一夜之间将澈河川黄门子至蓝旗营20公里的电线杆子全部砍倒，将电杆（木质）烧毁，将电线运走埋藏。使日军目瞪口呆。为保证隐蔽在迁遵兴联合县第八、九、十区的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指挥畅通，广大民兵开辟了四条地下交通线。一条是：西起横河腹地的立水，东至迁西的“天津”、“上海”，长达100公里；二条是：北起五指山，南至遵化洪山口北山，长达50公里；三条是：北起黑河南大台、南四道沟，南至遵化大屯南山，长达50公里；四条是：北起驴儿叫，南至遵化西北山区，长达50公里。同年10月，冀热边炸弹厂由关里转移到中原村。广大民兵日夜收集废铁和接收唐山运来的耐火砖，建炉15天，便造出大批手榴弹、地雷、子弹。受到军分区和部队首长的奖励和表扬。同年秋冬，为供应领导机关和部队，第八区副区长王佐民率100多名民兵去关里背布和去黄土坡运粮，牺牲警卫员1人、民兵5人。1943年2月，驻北甸的沙鼎讨伐队突然奔袭中原村，赵

文晋、高桥、杨雨民（黄云）等负责干部及部队战士被围。最熟悉地形的中原村民兵中队长前锋为部队当向导，出敌不意地从峭壁密林中引着部队安全突围转移，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

大、小黄岩根据地，是日伪军 1939 年以后不断围剿的重点地区之一。境内大面积集家并村也是先从这里开始的。1942 年 4 月，日伪便在小黄岩川纵火烧了 20 公里，烧掉 20 多个自然村。同年冬季，日伪军以重兵围攻大小黄岩，杀害群众 140 多人，仅小孩被挑死 48 人。大、小黄岩的民众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与日伪展开游击战争才能生存。因而群众在生活上实现了战斗化，每人一个背篓，篓里装着锅碗瓢盆、菜刀菜板，转到哪里都是家。大小黄岩川 35 公里长山脉，所有高山头上都站了岗，男的不够女的上岗。只要驻在六道河的日军一出据点，岗哨就喊："羊出来了！——"。不过 10 分钟就喊出 20 公里。日军发觉后就用枪打，民兵们便把喊话改为立"消息树"，日军一来树就倒，成了无声的电话杆。每逢抓住战机，民兵们就歼灭敌人。1943 年春，设在小黄岩腹地黄土山据点的伪军换防，栅子沟的党员干部徐荣臣、荣山得到情报后连夜通知后深峪。后深峪民兵立即在伪军必经之路埋了地雷，一次炸死 10 多名警察。日军只得撤了黄土山据点。

狗背岭根据地，这里的民兵多神枪手，多攀山英雄，善于利用"八卦图"似的复杂山形伏击，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一两个民兵也能独立作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一次，伪军"扫荡"小西天，民兵张正修（共产党员）、刘万存，在十几丈高的棒槌山顶上往下滚大石头，将围剿的 40 多名警察砸得抱头鼠窜，还缴获一支步枪。

四、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

伪热河省日本宪兵本部认为在"冀热察国境地区"，"治本为头等紧要之事，是无论如何首先做到民匪隔离"。"在灭共对策上，最奏效

之点，概皆本于此。”日军策划的“民匪隔离”，就是通过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使中共和八路军与群众“完全隔绝”，以“切断”八路军的“生命线”，对抗日进行“致命打击”，达到“灭共”的目的。

日军在兴隆境内制造“无人区”，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小集家阶段

1939年，日伪军多次去长城沿线讨伐，烧毁狗背岭、四座楼、坡头、大树洼、鱼子山、大河局子等地民房。同年冬季，日伪便在五指山区腹地实行小集家。把黑河上游居民集中到成功、天明、解放、孟大地四个村庄；把蓝旗营北山榆树沟里的居民搬到杨树台；把横河北部山区的沟门子、羊羔峪、岭根下、东台子、水泉子、石墙地、马架沟、杨树沟、老侯家、分水岭、西北峪、窟窿石、天桥峪、赵大地、草木庵、厂沟、西沟、红石沟等20多个村庄的居民般到鞍子岭、双炉台。正在群众搬迁过程中，日军和半壁山警察署以及警察讨伐队四、五百人，将厂沟、西沟、红石沟、羊鼻子、水泉子、东树沟、天桥峪、大黄木沟、小黄木沟、窟窿石、西北峪、马架沟、杨树等14条沟5500多间房子全部烧光，大部分粮食被烧毁，牲畜被抢走，500多户群众被驱赶进部落。

第二，试行阶段

1940年秋，兴隆县日伪当局接到伪满热河省总务厅的密令，试行“西南国境治安肃正政策”（即大讨伐、大扫荡、大检举，推行“三光”政策，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同年冬，日伪在黑峪沟、冷咀头、龙洞峪、八仙桌子、花市、大黄岩口、小黄岩口、曹家路等长城沿线各地及横河、黑河上游等深山腹地一带，推行更大范围的小集家。羊羔峪以北的村庄都集中到羊羔峪北大地，建羊羔峪部落。在部落里设警察分驻所，常驻警察20多人，还驻有一名日军头目松山。围墙上写着“明朗羊羔峪”标语，架设羊羔峪——半壁山警察署的电

话。1941年春，羊羔峪部落里闹瘟疫，死了400多人，占部落总人口的30%。松山也患了病，披着被子骑着毛驴被警察送走。不久，那些半病的警察也都撤回去。群众推倒围墙，搬回深山家中。

从1940年到1941年，日伪进行多次集家并村的尝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日军在锦洲成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拟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同时，将在“东满”推行“治安肃正”反动汉奸姜全我和日军岸谷隆一郎、皆山、户仓胜人等调到热河充任伪省长、副省长、警务厅长、协和会副会长等要职。又向兴隆及周边各县调配军警头目，调集大量的伪满军和警察讨伐队等。

1942年1月下旬（即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以后），日军为了“明朗”“部落”地带，在兴隆境内各大川各村进行第一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几天内，逮捕群众2000多人，除就地屠杀400多人（其中在兴隆街南土门集体屠杀200多人）外，其余均运往东北各地充当劳工，很少有人生还。同年农历正月廿四，茅山、果园、东峪、老营盘四村被捕300多人，就地致死伤十几人，死在外地60人。茅山东坡成了“寡妇庄”。

第三，大集家阶段

1942年4月，兴隆县日伪当局接到其上司关于实行大规模集家并村的命令，即组成一个“社会调查队”，由副县长西山（日本人）、协和会事务长水科（日本人）、宪兵队长田中（日本人）带队，30多名伪职员参加，并由协和会的“后勤队”、“奉公队”配合，到各村调查每户居民的人口、牲畜、家具、房屋等等，调查一个多月。随后在兴隆县街召开了日伪军、警、宪、政、协负责人和19个村村长秘密会议，策划集家并村，划分“无住禁作地带”及“集团部落”地址等等，并将日伪军警宪特武装力量进行配备布置。会后各伪村长进行秘密准备。同时，日军集中25个讨伐队9000余人，对各根据地连续进

行“大扫荡”。

夏季，西山和大汉奸史焕章到双庙、半壁山一带游说，欺骗群众劝说深山里的亲友下山就范。夏秋之交，日伪在六道河以下建立大部落，在靠近小黄岩川周围实行大集家。入冬，日伪当局又组成一个20多人的“宣抚班”，由西山、水科带队，并由日军、讨伐队配合到各村进行宣传，欺骗老百姓下山搬到指定地点居住。一个月以后，日伪军、讨伐队万余人，在全县疯狂地“大讨伐”、“大扫荡”。

1943年2月5日至9日（旧历正月初一至初五），日伪在兴隆县各大川进行第二次“大检举”。5天逮捕男人5000余人，仅半壁山警察署所辖各村抓走2000多人，其中大帽峪村67户，被杀和抓走69人，成了“寡妇村”。楸木林村55户，被杀死和抓走41人，也成了“寡妇村”。县被捕的无辜百姓有很多人是被用铁丝穿透锁子骨，一排一排地串起来，押送兴隆留置场（拘留所）。2月10日，惨杀400多人，其余部分入狱，大部分送往东北充当劳工，生还者甚少。

同年3月至6月，日伪军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统一行动，在全县范围疯狂推行大集家。除所有军警宪特2万余人分赴各地大搞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外，所有日伪职员停止其他活动，组成19个工作班分赴19个村，强迫群众搬迁。同时，伪兴隆县协和会组织5个“青年武装行动队”250余人，分赴5个警察署辖区搞集家并村。山火连四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闹黄鬼！全县累计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3万多头，割毁青苗无法计算。将11182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1%），赶进199个部落。制造“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119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3%。

此间，冀东十三团一部、十一团一部、第三区队一部和迁遵兴、平密兴、承滦兴等联合县大队均与日军展开艰苦顽强的激战，击溃伪协和会“青年训练队”，攻克马兰峪、陡子峪、六道河等据点，击毙

日伪军177人，俘日伪军45人，缴获迫击炮两门、轻机枪两挺、长短枪100多支。但因冀东部队主力不在兴隆，敌众我寡，不能组织反集家战役行动。至6月10日以后冀东军分区开展恢复兴隆山区战役时，虽然在东河北取得歼灭伪军整个连的局部胜利，而日军大搞集家并村的策划已经接近全部完成，一时仍难以扭转日军得势的大局。

部落里的居民、人畜挤在一起，白天不准远出，夜间不许关门。吃的是牛马食，穿的是乞丐衣，许多妇女没有裤子，来人时围破被或蹲在炕里。松柴照明，艾绒取火。一年的苛捐杂税达26项之多。警察、特务随便罗织罪名，任意关押。酷刑就有12种："断肠空腹"（饿死）、"倒栽莲花"（埋死）、"军犬舞蹈"（咬死）、"滚绣球"（钉笼里滚死）、"电磨粉身"（用特制的电磨将人磨成肉酱）、"枪戳沙袋"（刺死）、"虾公见龙王"（头脚绑在一起投河淹死）、"开膛取心"（双庙据点日兵中川吃了50多个人心）、"钢针锈骨"（用大铁丝扎手指、扎头顶，扎死）、"熏烧活人"（烧死）、"辣水涨肚"（灌死）、"皮鞭沾水"（抽死）。

1943年，部落里普遍发生瘟疫，死亡6000多人。大水泉部落死亡200多人，占部落总人口的20%；厂沟部落两年死亡265人，占部落总人口的38%。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今天埋别人，明天被人埋。有的尸身臭在家里，全家人死绝。

五、坚持"无人区"斗争

日伪实现全县规模大集家之后，日伪的矛头针对三片根据地。但是境内仍有7910户26230人，坚持在高山老林之中。全县各大山多有隐蔽斗争的小群体或个别户。其中三片根据地有2.3万余人，占坚持山地人数的90%。毁灭与反毁灭的决战，空前残酷地展开。

第一，根据地民兵的战斗

由于根据地民兵经常配合八路军作战，向正规军学习战略战术，

得到正规军、游击队的武装支援，都有一定的作战能力。特别是把守根据地大门的都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民兵队。

1943年5月，六道河据点伪军引着日本“山下队”中的十几名日兵进了花石沟，到三岔口交界埋设“从此以里是无住禁作地带”的牌子。警察把牌子埋完，日兵来到狗背岭根据地北大门朱家沟外的水潭里狂浴起来。正在朱家沟门北山头站岗的民兵王举起仅有三粒子弹的老套皮，第一枪打中一个日兵的腿上，第二枪击中另一个日兵的胳膊。一群日兵光着屁股倒拖枪，丑态百出地向沟外逃去，跑到三岔口时竟慌不择路地将刚立的牌子也撞倒了。跑到三里外的马家台时，这才光着屁股向沟里乱扫了一阵机枪。山头上种地的人们看着日兵的狼狈象，不禁捧腹大笑。第二天，立刻传出这样几句顺口溜：

“鬼子爬，牌子倒，
王八兔子来赛跑。
一二三——四！
三人五足缺只脚，
吊儿郎当露着。
光腚放炮假装凶，
武士道门哪去了？”

同年秋，日军为报复，不断地令讨伐队去朱家沟一带割秋。村长发动朱家沟的民兵、群众献计献策，如何把住北大门？神枪手史永献出一个好方案。他打柴时在沟门的几十丈高的峭壁上发现一个五尺（约1.6米）见方、一丈（3米）深的山洞，洞口被色树和珠珠蔓遮挡着。民兵中队长便把全队民兵编成三人小班，每班配一名共产党员，各班依次轮流上密洞站岗一昼夜（带干粮带水，民兵们在洞口垒起防弹墙，还在洞外楞上垒个小厕所）。农历八月的一天，他们打死两个伪警察、一头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又打死十来个伪警察。

农历十一月二十三，300多人的讨伐队引日军“山下队”前来报复。在洞里值班的民兵李秀峰（共产党员）、王玉祥、杨长起三人三枪勇猛地射击。先拦住日军抢走的一群羊，又打中一群押着几十妇女乡亲的警察。日军架机枪向洞口还击。三民兵打死两名日兵机枪手，日军被阻在西南沟里。几十名妇女乡亲乘机跑进北沟脱险。一会儿，一日兵爬到洞口西侧，向洞里连续扔进八颗手榴弹。民兵将八颗手榴弹全部抛出来，反而炸了洞下的日兵。又一会儿，一个大长胡子的日兵暗暗爬到洞口下，一手把住色树，突然一露头用“王八盒子”向洞内连续射击。射出的子弹打在石壁上反弹得满洞乱迸。杨长起中三弹，李秀峰中两弹，王玉祥中一弹。此刻，李秀峰不顾右臂受伤，满脸流血，趁日兵来不及再上子弹的一刹那，猛地扑出去向日兵胸前狠狠踹了一脚。腾地一声色树折了，日兵“啊”了一声从峭壁上掉下去，摔得脑浆迸裂。悬崖下的日军搭起人梯，又上来两名日兵向洞里射击，民兵们虽然伤上加伤，又把一块桌子大的石头翻下去，砸的两名日兵迎石而碎，搭人梯的日兵一节节地脱落，摔成一摊摊肉泥血酱。疯狂的日军又从西山扫射，又从南山炮击，然而均不能奏效。天黑了，日伪军在山下、山头严密包围一夜。第二天拂晓，日军又向洞口扫射、炮击了一个小时，待日军再次进洞时竟惊得连连嚎叫，洞里除了铺着一层迸下的子弹头以外，竟空无一人！日军哪里知道，正值午夜，从陡峭的壁腰上攀来六名民兵，先将李秀峰、王玉祥救走。待民兵们再救伤势最重的杨长起时，著名的攀山手杨长起却非常顽强地独自攀回。据日伪内线情报，这一伏击打死、摔死日军18人，还打死若干警察，日军运回的尸体整整装一汽车。而三民兵，在八路军医院的治疗下，几个月后均康复。

同年冬，小西天民兵从长城上扛回两台明朝制造的小铜炮，炮身二尺（约70厘米）多长，重32公斤，铸明每次装炸药1.5至2公

斤。喷射小铁球、铁块，射程近千米。民兵们如获至宝，多次用小铜炮打击日军。炮响如雷，开始日军以为是巨型火枪，不以为然。恰巧一次炮击与予埋的一颗九斤重的铁皮地雷同时爆炸，炸死炸伤十来名日军、翻译和特务。日军大惊，以为民兵有了重炮！

1944 年春节，朱家沟党员干部曹宗德领着 5 名枪法好的民兵，占据有利地形，将前来围剿的讨伐队阻在东峡谷并击毙部分日军，逼得伪军爬上东山狂射。此刻天已昏黑，另一路伪军从西山奔来。六民兵又猛烈地打击西路部分日军，挑起西路伪军大为恼火，不顾天黑暗暗地扑上高地。六民兵隐蔽地从沟中迅速撤走。对峙的两座山头上的伪军互认为敌，火拼起来。待伪军发觉上当后，已经两队俱伤，连夜将死伤的伪军安排到五道河部落每户居民的炕上。据部落内地下党员统计，这次伪军死伤 50 多人。

同年冬，六道河据点日军山下队趁大雪来狗背岭“扫荡”。有两名日兵沿着雪迹将藏在大溜石窟里的民兵符运贵逼了出来。日军用刺刀逼问土八路都藏在哪里？符运贵看看近前就两名日兵，便故意向敌后一指。两名日兵扭头一看，符运贵趁机抓住一名日兵的枪背革，猛地向外一推，那日兵从溜石上向后一仰，正与后边的日兵撞个满怀，两名日兵一块翻滚下去。日兵晕头转向地爬起来后，符运贵已经提着他们的一支步枪如履平地在巨石缝里向下跑去。一名日兵放了几枪，眼看着对手无影无踪了。因而这一带根据地有“鬼见愁”之称。1944 年春，中共冀热边特委第一区委在平谷县刘家河召开西部地区的民兵英模大会。朱家沟中心村（包括狗背岭、小西天、响水湖、大椴洼等地）村长王长平代表中心村民兵中队在大会上作了介绍经验的发言。第一区委奖给朱家沟中心村民兵一面“民兵模范”的红旗。还奖给到会的朱家沟民兵英雄曹宗德、史永仓每人一支三八步枪。

大、小黄岩的民兵有 70 至 80 支步枪。他们的特点是不断进行外

线作战，在出击中巩固根据地。1943年6月，乘日伪忙于搞大集家时机，区委负责人鲁克、区民兵大队长张爱国率区小队和民兵30多人，与十三团的侦察员合作，夜袭伪周家庄石棉矿，俘伪军20多人，缴枪20多支。1944年，群众没有吃的，副区长张治峰率领区小队和民兵夜间到六道河据点附近的深塘峪背回粮食，分给群众。区民兵大队长张爱国领着民兵到二道梁子、三道梁子截获日伪的运粮车，弄回很多大米、白面，供应部队和群众中的病号。由于强有力的民兵保卫，营西峪设着十三团的卫生所，大石湖设着十三团的供给处。十三团打仗回来常在这里休整。蓟宝三联合县敌情紧张时，有20多名干部转移到这里。一次，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民兵工作给予表扬，并奖给民兵1万个雷管。民兵们将1万个雷管制成大量的地雷、石雷，从四面八方封锁了日军。既使日军攻进来，民兵个别行动埋雷也能人自为战。

1943年冬季，伪兴隆县警务科特务头子生驹（日本人）带着特务来中石洞村侦察。日军把一位老大娘抓住，在逼问游击队去处和藏粮地点时，村武装班长马文喜领着三名民兵突然拼杀出来，击毙生驹和另一名日兵，还打死两名特务，救了老大娘。当夜，被日伪军围剿。四民兵奋战到底，英勇牺牲。承兴密联合县委、县政府赠给四烈士一面奖旗并发出通知进行表彰。据区委负责人鲁克统计，当年日伪对大、小黄岩根据地“扫荡”近百次。据承兴密联合县武装部统计，1944年日伪对承兴密联合县“扫荡”438次，其中“大扫荡”50次，出动日伪军37860人次。

五指山根据地的民兵，为了掩护地、县领导机关和在腹地休整的主力部队，他们注意保密、隐蔽、机动、顾全大局。扼守根据地大门的各村民兵善于摆地雷阵，严密封锁日军。上庄村刘文奇爆破组，炸死邢长（胜）讨伐队的副大队长、日本大尉和7名日兵。中田村王

良、王彬、姜福爆破组，用手榴弹改装地雷，一次炸死一名伪营长、三名日兵和两匹马。西首（榆树沟）村杨海、张连余、蔡长德、温永芝爆破组，第一次炸死炸伤8名警察，第二次炸死大尉吉森、上尉田野等11名日兵。迁遵兴联合县委机关（天明村南四道沟）、县政府机关（天明村南大台）的以西5公里处，便是五指山根据地的西大门——成功村（另一化名叫“驱敌”）。成功村位于五风楼山（海拔1475.5米）的南脚下，全村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10公里，有名的山沟40多条，有几万亩森林。其20公里外的东北面是车河堡警察署、日本守备队、朱胜林讨伐队，高杖子伪满军营部；其15公里外正北面是三岔口李国讨伐队，车河梁警察自卫团；其15公里外的西面是万人求伪满军连部、双庙伪警察署、摩根日本守备队、北甸伪村公所。成功村的民兵中，有著名的“五虎爆破组”。“五虎”并不仅是五个人，而是化名带“虎”字的民兵集体的总称。实际有虎山（村党支书）、虎林（村农会主任）、虎地（民兵中队长）、虎春（青年保国会主任）、虎义（村财粮委员）、虎文（民兵干部）、虎明（民兵指导员）、虎平（民兵）等等。他们化名带“虎”字，是为了长自己的士气，灭日军的威风。他们说：“日本鬼子是羊（东洋），老虎专能吃羊（洋）”。此外还有雷永顺、白喜山、傅德山爆破组，傅发、傅桐爆破组等。这些爆破组多次与日伪军战斗。开始搞“予埋待炸”。日军挨炸后搞扫雷探雷。民兵便进行“飞行爆炸”（看准日军行进方向，迅速绕到敌前的必经之地临时速埋）。日军挨炸后又烧山爆雷，走山坡。民兵便“暗中投雷”、甩“张手雷”（手使地雷）。他们不仅善于运用地雷，还进一步发展打骚扰战、夜袭战、麻雀战、截击战、追击战、攻心战等等。他们背着6.5公斤重的大地雷，夜袭15公里炸破车河梁炮楼。他们3人去邻村西大山出击，造成3个班的声势，吓退100多警察、伪自卫团员，还俘虏1名警察，解救7名群众。他们夜出

15公里深入敌据点，征粮1100公斤……。几年来成功村人民群众为保卫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也付出沉痛的代价。这个仅有398人的小村，牺牲91人。其中1944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即被日军率领的李国，朱盛两个讨伐队雪地围剿惨杀31人。有的被剥光衣服，剜心挖眼而死，有的被剜去生殖器，再一刀一刀地刺死，李存生之妻被活活破腹剥去胎儿，贾成富被洋狗一口一口地咬死！其情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然而，成功村人民不仅没有被灭绝人性的惨状吓倒，反而更加视死如归地与日军血搏。他们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兵50多人，打死打伤60多人，争取和俘虏7人。

第二，一大批地、县、区领导干部战斗在“无人区”

1943年春节之夜，正是中华民族习惯团聚的时刻，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书记宋诚（丁印林）告别遵化的家乡，冒着风雪，穿过“无人区”封锁线，来到层峦迭嶂的五指山区与日军展开周旋。6月，他在大马架沟黄砬墙下的七铺炕召开全县干部会议。群众尽量照顾他们，使他们在会议期间能喝上半个月玉米糊糊粥熬倭瓜。唯一改善一顿是吃上小米水饭、莴苣菜、大葱蘸盐水。一次，第一地委书记李子光来小黄岩指导工作，吃饭时桌子上没有菜，人们很抱歉。子光对几位区干部说：“来，今天我请你们吃好的！”他风趣地在破饭桌上画了一火锅涮羊肉，还画了几盘菜。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子光说：“这叫精神会餐嘛！”。

1943年春节，正是日军“大扫荡”的紧张时刻，迁遵兴联合县县长田赛在他的办公室——南大台林间草铺的柴扉上仍然贴了一幅对联。上联写：“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下联写：“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横批是“烧了再盖”。平密兴联合县委组织部长兼承滦兴联合县工委书记李越之、承滦兴联合县工委书记、承兴密联合县委组织部长李守善都曾在最残酷的时刻，来到小黄岩和雾灵山坚持工作。

1943年4月，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十区副区长吴云清率区游击队夜袭蘑菇峪据点，次日晨被数路日军围攻，经英勇抗击率部突围。吴云清负伤，区干部民生和两名游击队战士牺牲。残忍的日军将三位烈士的心脏取出。8月12日下午大河西（高板河）村干部曹连成秘密投敌，将在该村隐蔽养病的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此时已改为承青遵联合县第四区）抗联会委员金钟（李子林）、见习民政助理李广治，押送往双庙敌据点“报功”的途中，金钟趁黑天钻了高粱地，李广治跳入陡崖下的横河。两名干部用尽极为病弱的体力，爬了几十里，爬过几座大山，终于遍体鳞伤的回到区政府。由此可见抗日干部如何执着地坚守“无人区”战斗岗位的自觉性。同年10月，八路军击溃伪满军一个连，毙其日本教官以下30余人，俘其连长高某以下60余人，缴轻机枪三挺，步枪百支，给根据地人民极大鼓舞。当八路军胜利归来时，成功、天明等村群众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还是杀猪慰劳子弟兵。

坚持在承青遵联合县第四、五、六区（即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八、九、十、十一区）和蓟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即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的干部工作环境极其艰苦，往往是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窝铺里，衣服、鞋袜都不脱，满身虱子。有时一夜换几个地方，有时连玉米面粥也喝不上，一连几顿饿着。没有菜，每人身上带着一块盐，不敢多吃，只放到粥碗里沾一沾。即或这样，他们也充满信心地抢时间，创局面，顽强地执行任务。各区干部风雪无阻地坚持每月一次例会。承青遵联合县第四区（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干部，10月中旬，在窟窿石开会；11月18日，在厂沟开会。12月4日，日伪集中重兵对五指山根据地开始为期两周的“大扫荡”。15日夜，区干部分组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区长王佐民、区委支部教员高敬波、财粮助理赵锡廷和两名通讯员，于15日夜至中原村正北岭西侧的群众窝铺。16日，

奔走几十里，经正北岭登黑河天明村东黄砬，夜间经西黄砬至冰沟唯一的一处未烧过的独户家屋。17日凌晨，登上五凤楼山，住在山林中。18日，日军撤走后，立即奔走15公里回成功村。19日，奔走20公里回马架沟区政府。20日，全区干部到各村慰问168名受害群众的家属，安排群众生活，分发上级从冀东拨来救济群众的棉衣。25日夜，趁日军刚刚收兵的麻痹之际，县大队的一排战士和民兵智取车河川大坡部落（车河川唯一不向抗日政府交公粮公款的部落），圆满地完成征粮征款任务。

1943年冬，日军集中多处兵力围剿蓟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区干部被迫退到驴儿叫（地名）的几座大山上，情势十分险恶。此时，接到县委组织部长的特急信，指示区干部安排群众隐蔽后，率领青壮年民兵暂时撤出“无人区”。老党员、老村干部持重而至诚地说：“组织部长的指示坚决执行，请区委带全体区干部撤离，这里由我们坚持。山大沟深，日军不可能把我们杀净。等“大扫荡”过以后，请区委回来再领导我们。”听到这些话，正在患病的区委书记丁春生（刘冠军）心里非常难过，他挣扎着坐起来问警卫员，“你怕死不！”警卫员回答：“不怕死，要死我先去死！”丁春生对区长李建民说：“请你带队下山，我留在这里。”区长又问他的警卫员，“你怕死不?”高山回答：“不怕死，至死也保护区长！”最后决定安排其他区干部转移。区委书记、区长坚持和群众在一起战斗。群众都十分高兴，老大娘把不知什么时候攒下的生姜、红糖拿出来给区委书记治病。三名村干部解下三条腰带拴在一起，一头系在区委书记的腰上，一个人拉着，一个人头前扫雪开路，一个人在后边推着区委书记上了大山。区长领着群众刚刚爬到山顶，天已蒙蒙亮，夜里开过会的房子（窝铺）已经被日军燃起熊熊大火（已被日军烧了22次）。日军骚扰到中午便匆匆退走。时间不长，曹致福率第六区队

（500多名战士）匆匆赶来。此时此刻群众多么盼望部队，而连续回旋的部队也多么需要根据地。大家喜出望外，非常亲热。群众给战士们烧水烫脚、洗衣服，还特意宰了几只羊，做小米干饭炖羊肉。战士们帮助群众把烧毁的窝铺又重新搭好。

第三，进行战略转移，巩固根据地

1943年，日伪对根据地"扫荡"近百次。据抗日政府统计，从1942年1月至1943年12月，被日伪"扫荡"死亡的达1.5万余人，共产党员牺牲400多人，干部牺牲100多人。而日军为了根除心腹之患，从1941年春开始，在伪热河省讨伐队总指挥黑烟的部署下，集中两万名日伪军对兴隆"无人区"进行无限期的彻底"大扫荡"。日军以1万多兵力对五指山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围剿。日军吃在山上，住在山上，扬言"要把山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翻过来"。1943年11月，日伪对中田村（羊羔峪）一连围攻11昼夜，被杀群众274人。全县"无人区"内被屠杀群众3000多人。然而，各根据地人民仍在非常顽强地与日军殊死决斗。上级党委为保存实力，迷惑日军，以利发展，指示五指山根据地人民向关里作一次战略转移。各区、村干部，经过周密部署，留下精干民兵隐蔽，妥善地安排了老弱妇幼病残，撤消所有山头树哨变为秘密岗哨，于1944年4月27、28日夜，由承兴联合县办事处干部、区干部带队，县、区游击队护送，组织千余人分别由羊羔峪、黄花川两路隐蔽南行，越过长城转移到遵化县北山侯家寨一带。日军在五指山区，再也看不到树哨、人影，再也听不见枪声、爆炸声，以为真正实现了"无人区"，多次进山都是一走而过。

一个月之后，这支浩荡的队伍又隐蔽地返回五指山各自的家乡，抢种土地，恢复家园，进一步建设更为巩固的根据地。

第四，充分发动山区广大群众

1. 加强各村党支部建设

通过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了广大群众。五指山区腹地迁遵青联合县第四区（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有12个非常坚强的村党支部。1943年底，日军“大扫荡”过后，便抓紧时机进行火线整党。1944年1月4日，孟希同（县委宣传部干事）、高敬波（区委支部教员兼区游击队党支书）来到西首（榆树沟）村办第一期党员训练班。整顿5天，改选了西首村村政委员会。第二期，由区委书记张克、孟希同、高敬波在三仙（天桥峪）村整党。春节后，张克、程文（区委宣传委员）、高敬波在黑河岸办四期党员训练班，每期5天。整顿了天明、成功、觉悟、山口村党支部。2月下旬，继续整顿中原、中田村党支部。全区8个党支部、70多名党员参加学习。主要教材是县委宣传部遵照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课本编写的讲稿。还学习上级发的《反法西斯教育课本》。通过对党支部的不断整顿，许多党员在浴血奋战中起了极为鼓舞群众的模范作用。成功村党支部组织委员、18岁的青年傅春，在日军两次“大扫荡”中，冒生命危险抢救了60多名被围群众脱险。在最后的一次日军“大扫荡”中，傅春为了掩埋公粮被日军包围。当群敌抓捕时，他用最后一颗手榴弹毅然炸开自己的胸膛，凛凛献出宝贵的青春。区委为这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召开了沉痛的追悼会。1944年秋，承兴密联合县政府在小黄岩的黄土山、石门山存放6000公斤公粮。获悉日军即来抢粮，县委书记马力派当地共产党员夏级第组织群众火速将这批粮食转移。10月17日晨，粮食刚刚转移完毕，最后撤离的夏级第被大批日伪军围在山头。南、西、北面是日军，东面是悬崖峭壁。如果被日军抓住，搜出记着藏粮地点的小本子，公粮就全部损失；如果立即把小本子烧掉，日后谁能向党组织汇报得清那么多的藏粮地址？急切间，夏级第一纵身向悬崖下跳去。不知过了多久，冷风把他从昏迷中吹醒，他慢慢地恢复记忆，艰难地摸摸身上的小本子还在，已经知觉自己是

躺在深涧之底。想爬起来快走，可是怎么也站不起来，原来肋骨摔断多根，脊椎骨也被折伤。他忍着剧痛，一点一点地向前爬，从清晨爬到黑夜，从黑夜爬天明，才爬出三里远。侥幸，一个本家叔叔发现了，他才得救。公粮全部保住，上级表扬了夏级第的献身精神。

2. 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

1944年1月，冀热边行署发布《一九四四年一二三月工作纲要》，对民主建设村政权作了进一步部署："在'无人区'，原则上要把伪甲长、牌长等残余制度完全摧毁，普建单一的抗日政权；在巩固区，一般都要建村政委员会，已建的要进行再次改造。"同年春，遵照行署指示，五指山区对已建的村政委员会进行了逐村的再次改造。承兴密联合县则进一步进行民主建设村政权。春节后，县长江卓来到小黄岩根据地，搞民主建政试点。区干部集中到清水湖村，每天清晨由江卓给区干部上课。在清水湖村工作10多天，利用"豆选"（或用玉米粒）的方式，由群众直接选举了村长、副村长、委员。然后在全区铺开，各村都选举了村政委员会。区委书记鲁克在黄土山村工作，选出全区第一个女副村长王臣。由于普遍加强了村政权建设，进一步提高了群众保卫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同年1月，承兴密联合县民兵全员出动，展开"大破交"运动。仅狗背岭、朱家沟、响水湖3个自然村就出动68人，破坏日军公路48公里，烧毁桥梁19座，砍倒电杆798根，收缴电线800公斤。在民主建设村政权的工作中，根据地各区政府均注意总结了已往的经验教训。迁遵青联合县第六区，区委书记郭羽、区长王一民、民政助理李志兴、财粮助理赵锡廷等，总结了本区前几届负责人执行政策过"左"的偏向，从而注意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个区全宝河梁顶上的独户人家王洪喜是个耕种100多亩土地的富户。由于受到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很有爱国之心。

冀东十二团战士和地方干部一到他家，就给杀猪宰羊，有时整连的在他家吃饭，还多次献粮。最后粮食没了，他把正在生长的青玉米掰下来供应工作人员吃饭。后来日军几次强迫他搬进部落。可是他却逃出来，躲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艰苦度日。即使这样，抗日干部去了，他还是热情地安排食宿，对抗日工作给予全力地支援。

3. 实行减租减息，增加雇农工资

1943年夏秋季以后，根据地在执行合理负担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农工资政策，从而把抗日斗争与广大基本群众目前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基本群众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积极性。这也是日军不能摧毁根据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减租，各地情况不同，有减二成的，有减三成的，还有减更多的。总之，依具体情况经过协商达到双方满意。中田村雇农王起，租种傅昆的土地，原租三石五斗，减租后交粮二石五斗，减28.6%；解放村雇农陈广兴，租种陈百和5亩山地，原交租三石。因租地偏僻，离敌据点较近，不仅耕种需冒很大危险并且日伪常来割秋，双方商定减租后交一石五斗；响水湖村雇农孔庆芳，租种王绍基的一天半地，原租粮十五石。1943年，王绍基搬进五道河部落，自己不敢去耕种。而孔庆芳在“无人区”租种，则危险性更大，日伪割秋的威胁更为严重，减租后交粮六石；张相沟雇农李文彩，租种关里镇罗营王凤元的土地（地在朱家沟村的张相沟），原租粮三石五斗。亦因上述原故，减租后交粮一石五斗。上述二例虽是两个村，情况相同，减租的比例也大体相近。

给雇农增加工资，各村也是结合本地情况商定。解放村雇农宋振荣，给杨明杠活，原年工资20元，增资后，年工资24元，增20%。

同年，各根据地在执行合理负担中有所改进。如出战勤工，一般作法是，15岁至60岁的男整半劳动力出一半工，耕地所有者出一半

工。上庄财主吴老振，常年雇长工十多人，为了不使政策过“左”，又便于算帐，同意他每年抽出两个长工出战勤工。同时允许富裕户雇人出战勤工。有的富户顾虑日军割秋，不愿多种无把握的土地，允许富裕户将不愿耕种的土地转给贫雇农耕种，由耕种者负担战勤工。总之，通过协商，使出工的负担趋向合理，达到双方满意。

4. 开展大生产运动，救济灾民

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有的地方男穿兽皮，女穿碎衣，儿童光腚，住山洞，吃糠菜，犹如原始人的生活。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各级抗日政府非常重视发动大生产运动。每当春耕、夏锄、秋收时，各级干部和部队指战员都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承兴密联合县第四区干部在小黄岩大石湖开荒种田。迁遵青联合县第四区政府，为保障生产的需要，在上庄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铁工合作社（有 5 名工人），由抗日政府供应生产原料和工人的生活必需品，专门为全区民众生产锄镰锹镐等生产工具，其产品由区政府统一调拨。同时，王佐民区长和还组织专业人员从事经济价值较高的商品生产，通过高云甫等商人把商品运到敌占区出售，再买回大量的布匹等人民紧缺的生活必需品。该区所有区干部，都有结合工作秘密进入部落经商的任务。有时用布匹换回粮食，有时用粮食换回布匹。中共冀热边特委、行署、军分区领导机关，对兴隆“无人区”里根据地人民的物质支援是经常的大量的，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及冀东广大群众，对坚持“无人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各根据地人民都得过从关里基本区运来的救济衣和其他救济品，使山区人民感戴至深。1943 年冬，残酷的斗争中也出个笑话：迁遵青联合县第四区的大批群众都穿着发来的土红色棉军装在山上活动。日军用望远镜一看，大吃一惊，吓得望风而逃。

1943 年，根据地基本上没有荒地。1944 年，虽然日军几次地割青苗，抢粮食，根据地平均亩产粮食仍达 50 多斤。

5. 举办夜校，开展文化教育

根据地人民虽然长期经受浴血战争和艰辛生活的磨难，但是在中共组织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充实而高尚的。异常残酷的战争环境，使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根据地、热爱集体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团结、统一、纪律、学习的集体主义观念急剧升华。各村都举办夜校、识字班，进行文化教育。甚至劳动歇歇时，在山头、地头，用石灰石、青石板、树枝也坚持学习。并以夜校、识字班为中心开展歌咏、文艺演出、妇女剪发放足等新文化活动。狗背岭根据地的小西天村，非常分散，很多独户窝铺，出门就爬山，近邻隔坡岭、五户是“城镇”，十户成“首都”，隐居在难以寻觅的山旮旯。就是这样“云深不知处”的山缝缝，每自然片也都有一所以民兵为骨干坚持常年的小小夜校。没门沟一所，七、八人学习；小西天一所，五、六人学习；狗背岭一所，六人学习；西叫坑一所，七、八人学习；崔家台一所，八、九人学习；赵家台一所，七、八人学习。计六所常有 42 人学习。可贵的是这些小小夜校，在区干部石光的组织和辅导下，从 1942 年冬季办起，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每一所小夜校都发一本抗日新内容的识字课本，战斗时民兵们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民兵王自臣、崔子香，通过夜校三年的学习，能读报纸上的一般文章。青年民兵崔福荣，在夜校学习三年，识字 1000 多。建国后，任大队党支书几十年。范山林，在夜校学习二年多，担任村财粮委员。建国后，担任乡、社党委副书记 20 多年。

每晚上夜校时，总是先教民众唱一段抗战歌曲。每名党员都会唱几十首歌。崔福荣已经 70 多岁，仍然能谙练地欢唱这首《开会歌》：

领导者呀，众人提，
召集开会要速集，
一组一组要到齐呀，

不把会场离。
有儿童和妇女，
青年壮年排得齐，
老头站得也不离呀，
个个守秩序。
开会时，有规矩，
说话不要乱叽叽，
都听主席把话提呀，
不要你调皮。
封建人哪，不怎么着，
吭吭哧哧话不发，
他说讨论是白搭呀，
应该改脑瓜
破坏话，不要说，
群众反映了不得，
要罚小米一石多呀，
看你怎么着。

6. 树立民族气节，全民共同抗日

根据地各村的妇救会、老人队、儿童团，也担负着艰巨的任务，涌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小河西（槐木林子）村的霍大娘，本来住在村里，为支援八路军，日伪集家时，毅然搬到"无人区"石烟筒沟里。这里吃水要到五、六里地以外去背，霍振成大伯成了八路军的背水员；霍大娘成了八路军的炊事员，有时一天做十几次饭。同时精心照顾伤员、冒险掩护区长，战士们称赞她是"子弟兵的妈妈"。各村妇救会员支前慰军，更是情满深山，万户一家。许多村的妇女干部、青壮妇女直接参战。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女同胞也同样表现了她

们的顽强和坚决。有时与日军遭遇，拿起石头木棒当武器和日军拼命；有时日军搜索时，小儿哇地哭起来，为防止被日军闻声发觉，亲生的母亲竟肯牺牲自己不懂事的孩子，很快地将他掐死，以保护民众的安全。承（德）兴（隆）联合县第四、五、六区，就有11个小孩死在这种情况之下。

蓟遵兴联合县第六区黄土坡村孙连举之妻和20多群众藏在山中，她的4岁的儿子被石尖擦破了皮，哭叫不止。日伪正来搜查，她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一狠心将自己的儿子掐死。1942年冬，驴儿叫村民兵吴殿起之妻吴白氏，被日本守备队抓去。惨绝人性的日军为了逼问八路军的地址，将她的衣服扒光，吊在房梁上，百般拷打后，竟施以火烧阴户的极为残暴的兽行，下身均被烧烂！她痛骂日军，至死不屈，表现了中华妇女的烈节。1941年1月，成功村的妇救会员张秀荣，临近分娩，她的弟媳赵秀荣扶着她躲进大北沟。在荒山野林里生一个女孩，为了不忘这个时刻，妯娌俩给孩子起名叫“二女儿”。日伪军、讨伐队“围剿”时，抓到年轻的妇女即“配给”士兵“结婚”。根据地女同胞宁可战斗而死，也决不屈辱偷生，三片根据地守节而死的青年妇女不下千人。

根据地老年人是抗日斗争的参谋和主心骨，往往在关键时刻，都是他（她）们挺身而出，舍已救人，化险为夷；或山穷水复，另辟蹊径。蓟遵兴联合县第六区郭家庄梁前的大麦场山上，有管德、邢友、张宝山、李玉刚四家农户和傅兴、米仓两名助理员坚持在那里，保护藏在地窖里的军用粮食、布匹、鞋袜。1943年冬季，王汇讨伐队来围，将管德、张宝山两位老人抓捕，严刑拷打，逼问两名助理和物资藏处。两名助理就隐蔽在附近，两位老人硬是守口如瓶，均惨遭杀害。日军“扫荡”五指山最严重的时刻，张海城，张海振两位老兄弟，带领两家人隐进五指山腹最难攀上的九级石湖（地名）。这里本

是“无人区”中的“无人区”。两位老人领着两家人在这里开荒种地，经营山果山菜，开辟个“世外桃源”，成为八路军和附近乡亲的一处绝密隐蔽。长时间的隔绝，他们家的儿子学语都随了鸟音。刘杖子村四道沟里的陈广起老夫妇，搬进“无人区”鸡冠砬后的密洞。进洞要攀登峭壁，再攀登一溜十几步远的只能容半个脚的极险的砬坎。日军来时，老夫妻进洞。敌走后，他（她）们出洞种田。成了附近群众又一处绝密隐蔽处，营救了许多乡亲。他（她）们一直坚持到日军投降才下山。洞中千日，发蓄三尺，成了兴隆县的老年白毛女。

第五，反“下山自首”的斗争

1944年春季，日军在疯狂进行“大扫荡”的同时，又利用春节期间在全县部落中进行第三次“大检举”。并施出毒辣的另一手：策划“下山自首”运动。

“下山自首”阴谋，主要由伪协和会施行。协和会人员在部落里，不打人，不骂人，脸上露着同情农民的笑容，嘴里说着安慰农民的话语，手里拿着向农民施舍的药品、冰糖、衣服……，与老弱妇孺密切接触。伪装成农民的代言人，救苦救难的观士音。骨子里却在着意搜寻日伪军警特务难以搜到的情报。

当年上半年，伪协和会组织22个“青年行动队”约350余人(其中有200名特务)，在部落里了解抗日干部、山地农民的社会关系。威胁抗日干部、山地农民的直系亲属，限期将抗日干部、山地农民拉到部落“自首”。否则，逾期不“自首”的，不仅抓住杀头，亲属也连座同罪。

日军“扫荡”时，将中田（今羊羔峪）村民政委员（民主人士）张忠政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抓去。将孩子扣在部落作人质，让张忠政妻子和住在部落里的张福庭的姐姐（张福庭是中田村财粮委员、共产党员）一起进山，劝张忠政、张福庭“下山自首”。条件是，如果

"下山自首"，把孩子放还，还给官做。张忠政气愤地回答："宁可不要孩子，宁死不投降！"张福庭誓与姐姐断绝手足之情。区政府干部想出个斗智的办法：将张忠政妻子留下继续坚持山地，让张福庭的姐姐归部落回话，说他们已经转移，没有找到，张忠政妻子去别处继续找呢。到夏季，全县"下山"的仅仅约600人左右。日伪当局恼羞成怒，便在全县部落内实行了"投匪家族大检举"。凡是八路军、干属，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抓捕，共逮捕500余人。在兴隆刑讯后，全部送往东北充当劳工，生还者甚少。但是，由于特殊情况，也有少数人经不住威胁、利诱被迫进了部落。

第六，积极扩大根据地，向部落内开展工作

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反法西斯第二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大势已去，不断从关东军、华北驻屯军中抽走兵力。冀东基本区的失地不断恢复，形势开始好转。而日军为了继续强化"无人区"封锁线，以最后"确保满洲"，将冀东划为"西南国境第二防线"。大批伪满军和伪热河省直属警察讨伐大队于5月间调入遵化地区。驻兴隆马兰峪的日军下岛队（180余人），驻六道河的山下队（200余人）等日军均撤到冀东。到7月中旬，迁（安）遵（化）青（龙）联合县境内数十公里长城沿线上的伪治安军换防为日军、伪满军和伪警察讨伐大队，相对减轻了日军对兴隆境内三片根据地的军事压力。特别是6月，冀东十三团与二区队一部和许多民兵在平谷北土门、熊儿寨重创刘其、程斌、石振、孙德讨伐队。从此兴隆境内的警察讨伐大队气焰大挫。10月1日，冀东军分区舒行团长率十三团300多名战士，一夜攻克兴隆前苇塘据点，将刘文选讨伐大队打垮。击毙其副大队长增田茂义（日本人），俘伪中队长李连仲等官兵100余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百余支。为了策应冀东基本区的反围剿斗争，三片根据地部队、游击队和广大民兵积极

进行外线作战，主动地向敌据点进攻。地方干部深入地向许多部落开展工作，恢复失地，扩大根据地范围。

1. 蓟遵兴联合县第六区、十二区部落内的抗日活动开展得好，六区的21个部落中12个部落里，有中共地下党支部或有地下党员抗日的村干部继续活动。经过区委讨论同意，中共地下党员在部落内“反共自卫团”里当兵。区干部可以进入这些部落内工作。如草场部落仅距八卦岭据点1公里，而担任草场部落甲长的正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万全。万全经历了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和倒流水警察署的多次考验。日本守备队曾伪装李运昌的队伍几次去草场部落开门，都被万全识破，让群众用石头把他们砸得狼狈而逃。八路军侦察员在草场附近打死伪军，万全将敌尸抬进深山，洒上猪血制造假现场，再主动去警察署报告等等。因而日军和警察署对万全不仅深信不疑反而认为“有功”。区委同意万全被日伪破格“提拔”为驻八卦岭警察据点的警尉。冀东军分区第六区队长、中共蓟遵兴联合县委代理书记曹致福的爱人郑淑云，在离八卦岭警察据点1.5公里远的三道川部落里做了二年内线工作，由地下党支部的掩护，直到1944年冬才安全转移。

1944年后，蓟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区委书记丁春生、区长李建明，率民兵与地下党员、干部配合攻克最顽固的楚榆沟部落，俘虏警察30多人，抓了两名汉奸，缴步枪60多支。随后丁春生、李建明与第六区队二连指导员侯建华率领的一排战士配合，通过部落里的村干部与伪满士兵合作，攻克大营盘部落伪军炮楼，解除伪满军一个排的武装，缴长短枪31支。同年秋，蓟遵兴联合县委为解决枪支弹药问题，派县大队长刘继抗与六区民众合作，通过地下党支部配合，攻克三道河部落警察据点，缴获长短枪61支和许多子弹。

2.1944年3月7日，迁遵青联合县第六区（前迁遵兴第十一区）区委书记郭羽牺牲，不久区长王一民被捕就义。其他干部与区游击队

奉命撤出，只剩个别村干部在山上躲避。同年秋，随着整个抗日形势的好转，承兴联合县第四区（即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此时五指山地区由承兴工委和办事处领导，故称承兴四区）区委派区干部虎山（前成功村党支部书记，“五虎”爆破组组长）与刚玉（共产党员，柳河前梆子沟村干部，该村已被敌侵占）去柳河恢复地区。两名党员在敌占区内昼伏夜出，冒生命危险艰苦工作一冬，部落里出来20余人，又在深山建立一小块秘密根据地。收留了在山上流浪的孤儿，又找到25公里以外的跑山户。为了使这个小小根据地的几十口人过冬，从区政府（相距百华里）给他（她）们背来棉衣、鞋袜、食盐。又去大复兴深山给那跑山户送去越冬的物品。在这块小小根据地站住脚之后，两名党员干部又与大南沟部落、郑家庄部落里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向部落里开展工作。又与东河北、朝梁子、范家大地、下坎子4个部落建立了单线联系。为争取部落居民出入自由和上山户户口在部落里半合法化，虎山、刚玉又进一步争取6个部落的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人称三大头）。而朝梁子部落甲长李振江（汉奸），带着警察、伪自卫团百余人包围胡家沟密室，杀害站岗的民兵。同时，范家大地部落甲长也把几户八路军家属报告给日军，准备把他们迁往东北做劳工。于是区委请侯建华指导员率领冀东第十七团第二连来配合行动。1945年4月下旬的一天夜里，虎山、刚玉引着化了装的二连战士，扮成日本宪兵队进了范家大地部落召开居民群众大会，宣布该部落姚甲长的罪行，当场将其处决。二连战士步伐整齐、雄纠纠地在部落街上巡行一圈。居民们看到八路军部队不仅有充足的步枪，手榴弹，还有机枪、钢炮，给群众撑腰，壮了胆，扩大了抗日影响。随后，二连又进了离下台子警察据点仅一里路的朝梁子部落，除掉伪甲长李振江。这一行动震动很大，根据地不仅与周围十几个部落建立了秘密联系，而且还在部落内发展了单线党员，许多部落里的警察主动

与抗日干部联系。

3.中共党、政、军、群工作人员，也同样深入大、小黄岩、狗背岭根据地，开展部落内的工作。1944年，承兴密联合县行政村分类情况是：全县7个区191个行政村，其中：抗日的“一面村”97个，抗日占优势的“两面村”53个，敌我力量均不稳定的“两面村”35个，亲日的“两面村”4个，敌一面村只剩2个。日伪资料显示，同年底，境内的199个部落中，20%的由日军绝对控制的部落转变为抗日两面村；60%的部落可以秘密地进行抗日活动。

第七、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随着全国整个抗战形势的好转，1944年下半年开始，境内三片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从被动转向主动。6月，冀东十四地委组织一支以王泽民、郭子忠、高原等为领导的“北进武装工作队”（50余人），就是以雾灵山为基础，以大、小黄岩根据地为依托，向前承滦兴联合县范围及其以北发展。他们与大、小黄岩根据地相连接，在雾灵山森林里开荒种田、植菜、艰苦卓绝地向敌占区回旋，建立许多“两面政权”，到日军投降前，这支队伍发展到500多人。是年冬，承兴密联合县第一区民兵大队长丁连介率领狗背岭、小西天、朱家沟20多名民兵与关里民兵配合向敌占区出击。封锁瓦窑子、孝女台两个日军炮楼。只要日军从炮楼一露头，日夜守在山头上的民兵就开枪。日军只得龟缩在炮楼里不敢出来。

1945年1月，承（德）兴（隆）联合县办事处改建为联合县。2月至4月，第十五地委将前在迁遵兴工作过的干部全部调回承兴联合县。由于“两面政权”范围的扩大，承兴联合县又恢复到5个区。其新序号是一区（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六区，恢复）、二区（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巩固扩大）、三区（前迁遵兴联合县第九、十区，巩固恢复）、四区（前迁遵兴联合县第十一区，恢复）、五区（前迁遵兴联

合县第十二区，划人蓟遵兴后又划回承兴，包括前蓟遵兴联合县第六区)。各区都充实、加强了领导干部和健全区干部，并新建和扩建了区游击队。

是年春，境内三片根据地各级中共组织遵照冀热辽区党委《对春季政治攻势的指示》，发动群众对伪满军展开政治攻势。除冀东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给伪西南防区司令黄方刚去信加强争取工作外，为加强政治攻势，县、区、村都认真地总结过去经验。其中之一是1943年7月16日夜，正是日军实行大集家的疯狂时刻，在六区队副队长曹致福的争取下，驻前苇塘的刘文选讨伐队的机枪分队长崔林等9名伪官兵仍能起义。在八路军配合下，击毙日本副队长增原，携机枪一挺、长短枪14支、子弹手榴弹8箱向八路军投诚。茅山据点3名日兵、18名伪军投诚。兴隆街、半壁山、梨树沟等许多地方连续出现伪满军与讨伐队摩擦事件。敌占区里人心浮动，日趋混乱。其中之二是1945年5月9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后，日军纷纷笼络伪职员，伪兴隆县协和会部员、“青年行动队”队长本谷义雄暗中向伪职员赠名片留通讯地址。而根据地军民士气大振，配合正规军攻入城郊的黄酒馆、红石砬等据点。6月，热辽战役开始，冀热辽军区派出的三支挺北支队，其中两支是通过承兴密和承兴根据地休整继续北进的。7月上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晋率十一团从宁城、平泉回到承兴第二区根据地休整。根据地群众特别高兴地慰劳子弟兵，广大妇女日夜为亲人们缝补军装。此时半壁山、靳杖子一带日军还在垂死挣扎，强迫部落居民进根据地割庄稼。日伪怕遭到游击队和民兵袭击，逼着部落居民在前，其大队日伪军在后押进。承兴联合县办事处主任王佐民、二区区长李文与赵文晋研究了作战方案，为了不使部落居民损伤，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二十一团和游击队、民兵们绕到瀓河川，一气攻克鸠儿峪、青杏沟、古儿石、佟家沟、白旗营（今东风

村）5个武装部落，其中警察全部被俘，使进山之敌马上撤回，根据地的大部分庄稼保住。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伪兴隆县当局电话通知全县基层组织，摘掉所有伪满的牌子、帽徽，烧掉全部档案。一律换上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伪满军、讨伐队，一律挂上国民党“先遣军”的招牌。潜伏在兴隆县城的地下国民党员张郁文（张化行）、焦营（伪协和会部员、特务）、张久清（兴隆街小学校校长）等即刻密谋，派国民党员刘云田、卢仪卿（财政局长）与伪西南防区司令黄方刚、伪兴隆县长于佩山联系，约其集聚军队，维持秩序，等待国民党当局派人接收。张久清负责兴隆县接待事务，张郁文、焦营，化妆后火速赶往北京与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督导员陈思修联系，呈报国民党当局速派军队接收兴隆。8月28、29日，舒行与黄方刚、于佩山在前苇塘谈判。经冀热辽军区批准，8月31日，黄方刚向所属发布命令，宣布率所辖两万多人起义。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来兴隆领导了接收工作。接受各种炮100多门、轻重机枪1200多挺、长短枪5万多支，其他物资无法计算。同时，承兴密联合县、承兴联合县地方干部立即与舒行配合接收兴隆县伪满机关。

在及时接收兴隆伪军、伪政权的过程中，境内三片根据地的军、干、群做了大量工作。黄方刚宣布起义前夕，承兴联合县第二、四区便组织了接收工作组，接收了柳河一带的伪机关。同时并与承兴密联合县接收工作组合作，接收了聚集几千名伪军警的鹰手营子。承兴联合县第二、四区干部虎山、周福臣、李志彬等不畏艰险，接收了白河川的新杖子（承德境内）。在新杖子教育、争取了从兴隆逃走的伪满军一连，轻机枪两挺、小钢炮3门、三八步枪110支、短枪8支、子弹4000余发。

日军投降前夕，兴隆境内的抗日根据地在三片根据地的基础上已

经扩大到全县总面积的70%。党员发展到696名，民兵发展到1.5万余人。兴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在日军大肆制造“无人区”的三年中，日军“扫荡”屠杀无辜群众1.54万人，“检举”抓走1.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死在外地。1941年，全县总人口16万余人，到1945年，全县总人口还不足10万人。

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人民用热血谱写了一代非凡的历史，让后人永远从中记取血的教训，让那闪烁着大义光辉的传统和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永垂不朽。

（转载自《十万骸骨的碑记》）

六 永远不要忘记人民

西 沟 轶 事

佟靖功

兴隆县有个西沟村（小自然村，属安子岭乡上庄村境内）。它既小又偏远，夹在大山缝缝里，又藏在重山迭岭之中，无论从哪边走，都得攀越五十里大山，所以西沟村的人很少知道外边的新鲜事。

1938年7月的一天下午，西沟村的山梁上忽然过来一支穿着草绿色衣服，顶着柳条子的大兵队伍。自古称“兵匪一家”，西沟村的人都怕见当兵的，又听说这些兵就是“红军”、“八路”，吓得许多人家一窝蜂地跑到北山蕨菜洼藏了起来。为啥西沟村的人对红军这么害怕？原来自日伪统治这里以后，伪警察们便在西沟村散布，“红军是杀人放火的红胡子、马猴子”，“红军不死，大乱不止”等等。他们这样一宣传，西沟村的人哪有不害怕的。好在这支队伍只是路过，在这里休息了一会儿就开走了。藏进北山蕨菜洼里的人又都陆陆续续地回村了。谁知人们一进村都大眼瞪小眼的呆住了。咋回事？只见各家各户门口都被扫得干干净净，圈里的猪，院里的鸡一个也没少，熟透了掉在地上的杏都被一堆堆地堆在一起。村东头刘老大的孙女因为爷爷有病没有走藏在她们家的地窖里。她告诉人们，队伍里的一个女兵不仅给她爷爷看了病，还留下几包药，又给了5元钱买去她们家几捆柴禾在街上埋锅做饭，人们一听都纷纷议论开了。

“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兵?！要知道这样，咱们也不跑呀。”

"原来警察狗子们骗咱们哩，咱们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

正在这时，一个16岁的刘福山嚷了起来："哎？我挂在栅子上的布鞋怎么换了双破帮烂底的草鞋壳啦？"他边嚷嚷边摘下草鞋生气地往地上扔，却见一只草鞋里掉出一个小纸包来，打开一看，小纸包里是4元钱，一个包里是一封信。刘福山念过两年私塾，就举起那信念起来：

中国的同胞兄弟台鉴：

我是陕北红军的一名新兵，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来这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有紧急任务，可是我的草鞋不能穿了，不得已，我违反了红军的纪律，将你的布鞋穿走。实在对不起，留下几元钱，请你再买双鞋吧！

千万原谅。

敬礼

红军八路军一战士

刘福山这下不但没了气，倒觉得有些不自在了。要知道，4元钱能买两双新布鞋呢，可人家只穿走了他的一双旧布鞋。人们这下更相信红军是个好队伍了。

就在这天夜里入静以后，小村里几只狗东扯西蹿的不是好叫唤，外面一片唰唰唰地走路声。人们的心又砰砰地堵上嗓子眼，都悄悄地站在炕上从破窗棂缝里往外看。夜黑天，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是什么军队，只是不断线地穿村而过向西开，却没有一个兵喊门进院。直到鸡叫了，才又静下来。刚蒙蒙亮，刘福山的爸爸刘旺出了院到房山旁草垛抱干草喂牲口，掀开一捆往里一伸手，冷丁地又缩回来。吓的他冒了一身冷汗，原来草里软囊囊的躺着一个人！刘旺定定神，走上前来划着两根火柴仔细一看，里边的那个人脸色纸白，双眼紧闭，穿着打扮与白天过路的大兵一样，左胳膊上挂个镶着蓝边的小白牌，牌里

有两个蓝色的字："八路"，绿军装上满是血污。刘旺这下明白了，他就是不吃我们一个杏的好人。一种同情感立刻涌上心头。开始他以为这个兵已经死了，伸手一试，他的鼻孔还有一丝丝温气，刘旺急速把弟弟刘稳、儿子刘福山叫来，三个人把那伤员轻轻地抬进东房的西屋。刘旺又到西三间屋，悄悄地将叔父、婶娘和叔伯兄弟媳妇李氏叫过来。他们全家人围着伤员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心里都紧张地搅活起来。他还活着呢，如果被日本鬼子看见就会用刺刀把他挑死。可是离这20里的双庙就有警察分驻所，那个赖歹掏的警长刘贵才常来这里疯咬："谁敢反满抗日，谁敢窝藏赤匪就立即枪毙，三亲六故都连座同罪！"这可怎么办呢？

刘旺的叔父刘文举老汉是个经常跑外的，不仅会使牲口，还会给人相面。这老汉端详着伤员，感叹地说："这个人鼻梁正，准头圆，饱满抱团不露孔。他的上辈子是个积德的，他这辈子是个有福的，不应该遭恶报呀！"老汉一面说着，一面瞟着老伴儿。这一家子主事拿断的是刘旺的婶娘，这位婶大娘虽说是个小脚老太太，可却是个有主见的女人。婶大娘一看老头子拿眼瞅她，说："赶到这个份儿上，我们不要乱了分寸。人家抛下爹娘，为了打鬼子，救中国，才来到我们这一方。我不管是什么军，敢打鬼子就是好军。对好人见死不救就是缺八辈子德！"老太太说完指使刘旺，刘稳先把伤员抬到后院的小棚子里，让老汉和侄儿们在前院支应着，她一勺一勺地给伤员灌了碗米汤，又给伤员洗了手脸。用两张老羊皮铺垫好，慢慢地给伤员脱下衣裳。只见这个兵胳膊腿上多少处青紫红肿的伤口都流着浓，伤口里咕攮咕攮的。婶大娘的眼睛已经昏花，伤口里有什么还看不透，便把正在屋里翻箱倒柜给伤员找铺盖的李氏叫来。这位李氏才24岁，是婶大娘唯一的儿媳。李氏是个能干的媳妇，不仅手脚勤快而且心细，已成为婆婆当家处事最好的助手。别看她年纪轻轻，村里的人都知道她

遇事主意正又乐于助人，因而不论长幼都称呼她“二嫂子”。二嫂子过来看了一眼伤员的伤口，急说：“妈呀，他的伤口里都是乱麻瓤子似的小蛆，这个罪可怎么受啊！我看咱们家的那个偏方不顶用，您得亲自去一趟，到南岔我大娘那，把她那个最有效的药讨来。我在这先麻溜地给他往外剜蛆吧！”婶大娘答应一声立即出了门。这时屋里只剩下二嫂子独自面对个陌生的赤条条青年男人，她忽然有些难为情起来。她发现他的裤衩里也时断时续的往外流脓。她犹豫着，脸不由的红了。突然，她咬着嘴唇儿轻轻地将那粘在伤员身上的裤衩脱了下来。先用盐水给伤员洗了全身，又找出一根大针用火烤了，然后便一针一针地从伤员的伤口处往外剜那白线似的小蛆。

两袋烟功夫，婶大娘鼻洼沁着汗珠返回来。她从刘大娘那里讨来用多年老缸碴子磨成的粉面，回家又掏来倭瓜瓤子，合在一起捣成泥状，糊在伤员的各个伤口上。经过一天的精心护理，夜间那个伤员睁开眼睛，能缓缓地说话了。伤员很年轻，却非常顽强，在豆油灯下，他的眼里闪着泪花，几次向围着他的一家人点头，说了好几句估计是万分感激的话，因为口音太侉，一句也听不懂。幸亏刘旺父子都识几个字，拿出一张包东西的纸，找来个铅笔头，他们互相在纸上写着问答，再加上对语言的揣测，终于得知，这名伤员姓王，叫王普连，22岁，陕北人，以前是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战士。为了抗日，从陕北打到山西大同，以后又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他是三十三大队一营一连的班长。第四纵队奉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今年6月向雾灵山挺进，来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攻打兴隆县边境的长城墙子路口的时候，排长受伤，王普连代理排长。接着攻打长城曹家路口时，王普连又负伤，一支胳膊被打断，腿多处受伤。开始战友们抬着他转战。过雾灵山时，因为太高太陡，战友们把他抬在驴背上。夜里，毛驴掉进山涧，战友们又用绳子把他系上来。为了给他解痛，山上的老乡献出

了大烟，敌人追击时，一位抬着他的老乡又受伤。他虽然经过医疗，但因为紧张地转战和连续的阴雨，他的伤口生了蛆，伤势越来越重。昨天夜里有两个老乡抬着他跟着队伍从双庙出发，一到山梁上就不省人事了。估计是战友们以为他已经死了，路过这里时不肯骚扰老乡，又是急行军，只得先把他的尸体藏在路旁的一个草垛里。结果他又缓过气来，这才被刘旺发现。

王普连在刘旺家的小棚子里已经养了8天，每天都是二嫂子给喂饭喂水，婶大娘给接屎接尿。天天夜里二嫂子再给洗一次伤，剜一次蛆，换一次药，包扎一次。因为蛆不断繁殖，怎么剜也剜不净，二嫂子又让老公爹和刘旺哥赶着两个骡子出山70里，绕过日军的关卡，从豁口子越过长城，去遵化城卖一趟木材，除了换些日用品还专门买了四两香油。二嫂子又夜夜往伤员的伤口里滴香油。

又过了七昼夜，蛆被除净了，二嫂子那双闪亮的眼睛也熬红了。

正在王普连的伤势日渐好转的时候，一天突然来了3个穿着黑制服的警察还带着个农民闯进文举老汉的家. 为首的正是双庙伪警察分驻所的警长刘贵才。这个人30来岁，一张黄葫芦脸上陷着一双滴溜乱转的三角眼，撇着傲慢的薄嘴唇，满脸横肉，脑后见腮。因为他是伪兴隆县警务科长神内兼一（日本人）的亲信，欺男霸女，无恶不做，群众恨之入骨。人们说：“宁可刀砍火烧，不愿刘贵才来一遭。”“刘贵才脑后见腮，不得好死一定遭灾！”

刘贵才一进屋劈头就问：“老刘头，头些天八路匪从这过去的时候，将一个伤匪藏在你们村的一个草垛里。现在这个人藏在你们谁家啦?”

真似头顶响个炸雷，刘文举老汉吓的脸似姜黄，心头一震立刻噎住一口气。亏得婶大娘来得快，端着一把壶和几个粗磁碗，立刻接过话茬：“刘警长，我们这个老蔫病了好几天，今儿个才起炕。外边的

事，屋里的人怎么知道？你们若是没事串门，我请还请不到呢。若是有公事，那就找保长甲长去！”

那两个警士瞪着眼，其中的一个开了腔：“嗬！这个糟老奶子还挺厉害！”刘贵才冷笑一声，轻蔑地说：“老太婆，早就知道你是个茬儿！你们西沟人都是戴铁丝帽子的，保长死了两年了，接着派谁谁都不干，上哪儿找保长去？你们西沟都姓刘，都是亲近门枝的一家子。你们老头子是长辈岁数最大的，不找你们找谁呀？”

婶大娘一听，他们好像不是奔后院小棚子来的，便顺水推舟地说：“啊，警长还没忘了这个‘刘’字呀，是冲这个‘刘’字来的。那好，警长也姓刘，这几位也都往炕里坐吧。”老太太这才给斟了几碗水。

刘文举老汉也镇定下来，他深信这沟里绝不会有人告密陷害他。便说：“我压根也没听说有这么一桩子事！刘警长，方才你说一个什么匪藏在谁家的草垛里啦？”

刘贵才的一双毒蛇眼像两根刺似的盯着老汉，老汉拧了一锅子旱烟递过来。刘贵才从兜里掏出一盒“若樱”牌烟卷，抽出3支。老汉赶紧开柜拿出一盒火柴给3个警察点着烟。刘贵才一边喷着烟一边说：“老刘头，你别跟我耍弯弯绕！你们西沟出了件这么大的事，你能不知道吗？”

老汉一合双手，念了声弥陀佛，说：“刘警长，我是个胆小的人。你别再吓唬我了，我们这到底出了啥事啦？”

刘贵才的脸呱嗒一沉，喊了声：“老刘头！我们为什么奔你们家来？”屋里的空气又要爆炸，堂屋的婶大娘急了，一指菜刀，暗示侄孙们作拼命的准备。沉了会儿，屋里刘贵才的口气又缓和下来，他接着说：“老文举，你知道不？你和那帮穷小子们不一样，你是西沟能养活起两头骡子的头等户。共军若真的在这里站住脚，头一个得共你

的产！哪头炕凉，哪头炕热？西沟藏着个共军，别人给隐瞒，你怎么也不报告呢？”

刘文举老汉跟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善于揣测对方，听话音知道刘贵才还是不知底细，打了以后又在拉他，便绕着弯的发誓：“你们几位长官看看，我这北墙上供着一溜神仙。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我要知道我们西沟藏着坏人，让我不得好死，今年就遭五雷轰顶！刘警长，这到底是怎个事？就是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呀？”

刘贵才看刘老汉的脸都急红了，这才转脸瞪着跟来的那个农民，没好气地说：“张三儿，到底是怎个事？你向老刘头直捅了吧！”

那个叫张三的农民，40多岁，喉头旁还长个肉包大瘿袋，有些傻里傻气的。他忐忐忑忑地说：“头些天的，那个夜里隔，保长让我给八路抬担子往濡河扯。第二天返回来，一道上听黄土梁子那边的两个抬担子地说，八路托他们俩还得绕回西沟来埋一个他俩经手搁在草垛里的死八路。他俩是奔西沟回来的，我是奔石庙子、大水泉回来的。昨儿个，刘警长他们把我抓到双庙去，把我吊在大柁上，问我都干了什么坏事，都知道什么事。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就是听那俩个人说西沟的草垛里搁着个死了的八路。我说给他们了还不行，今儿个又把我带到这儿来找。我是听人家唠的，搁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呀。”

听他这么一说，站在过堂屋的刘旺、刘稳和躲在西屋的二嫂子心里都有了底。婶大娘也长出了一口气，为了麻痹警察，她又端进一笸毛桃、晚杏撂在他们面前，趁机说：“刘警长，这个事不难办，我们西沟就这么几户，总计就十几座草垛。你们把每个草垛都翻腾一遍，真若藏着死人早就臭了，还闻不出味儿吗？”

刘贵才一边吃着一边说：“那要让谁给埋了呢？”

婶大娘说：“警长，眼下是苗长草满的时令，在哪儿埋人都得刨草动土留新茬吧。你们把这里的沟沟岔岔都转到了，看看有没有动新

土的地方?"

婶大娘的话还真奏效。刘贵才让文举老汉和刘旺跟着，把十几座草垛验看一遍，又把几条沟巡视一番，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3个警察累得满头大汗，来到南岔紧沟里的刘家已经晌午大歪了。警察们都撂了摆，不顾人家的少妇大女，便解衣敞怀、四腿拉叉地躺在人家炕上打起呼噜来。文举老汉悄悄地与本家侄子们张罗给几个警察做了带豆的小米干饭，供他们大吃了一顿辣子水豆腐。吃完饭趁那两个警察去茅房的机会，文举老汉往刘贵才手里揣了10元钱，悄声说："咱们这个西沟实凿没有发现这件事，里里外外警长都看过了。这叫西沟的地方多了，梁南有，梁东还有。谁让咱们这一个'刘'字没掰开呢，警长回去把这码事给好好圆场圆场吧!"

刘贵才先把那10元钱揣在兜里，脸色阴沉地说："既然你说了没发现这件事，我给你个面子。可是你得给我立个保，如果以后出了事，我可拿你是问!"老汉当场让刘旺以刘文举的名义给写了"没有发现隐藏的共军"的保条交给了刘贵才，3个警察这才登西山而去。

这天的半夜，文举老汉和刘旺，刘稳用门板抬着王普连悄悄来到2里以外的西岔的密林深处。原来这里在一片草封树闭的荆棘丛中藏着一座空着的小炭窑。窑的门洞有4尺（1.2米）高，3（1米）尺宽，里边是三角形的，能卧一个人。爷儿仨先在洞里铺上一层厚厚的干草，再铺上两张老羊皮，才把伤员撂在羊皮上。告诉伤员，耳朵尖着点，只要外边有动静千万别吭声。然后，把小木门关严用大石头挡上，又拔来一些青草掩盖好。这以后，每天刘旺都来西岔耪地薅草，悄悄地给伤员送饭送水。每天的半夜还是婶大娘、二嫂子娘儿俩来炭窑，先用被子把小木门遮严，再点上小油灯，用一罐子紫地丁熬的水给王普连洗伤，换药和接屎接尿。

不出所料，5天后，刘贵才领着那3个警察又来了。而且在西沟

住下，连着几天挨门挨户搜查，还到各个沟岔里反复转悠。见着人就问：“看见受伤的共匪没有?”多数的乡亲们根本不知道，少数的乡亲们已经知道刘旺家藏着一个八路军，可是都说“不知道”、“没瞧见”。白天，刘旺不敢到西岔来了，只好等到后半夜，探知4个警察全睡了的时候，由刘旺、刘稳哥俩给伤员送饭换药。谁知，又出现了新问题。8月初，正是山区的雨季，从警察住下的第四天起，开始下大雨了。这可把刘旺一家人难住了，白天不敢来人，夜里也不敢来人，只要一来人就会留下脚印。

这样一来，躺在小炭窑里的伤员可受了罪。雨水从小炭窑顶上流下来，黑色的泥汤滴嗒滴嗒地落在他的身上、脸上。受伤的腿也泡在积成的水洼里，几处伤口都被脏水浸透，火辣辣的疼痛难忍。已经两天没人给送饭了。渴极了他就滚着身子喝身边的黑水。白天闷的气短难挨，夜里蚊子成群，叮的满身冒血，再加上饥肠辘辘，这个铁汉子又昏晕过去。他再次苏醒时，似乎有很多很多的蛆在嘴上、脸上、身上蠕动。他用极大的力气睁开了眼睛，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有人一勺一勺的往他的嘴里灌着什么。还有人在给他洗着身子。他疑惑不解，定睛看去，啊，是二嫂子和婶大娘，文举大伯、刘旺哥、刘稳哥，刘福山也都围在他的身旁。婶大娘这才告诉他，警察在这里一直搜查了六天，把各户的草垛、地窖、小棚子都翻过来了。因为没查出任何蛛丝马迹，又怕连雨天发水截在这里，刘贵才这才带着那几个伪警察回双庙了。

从此，王普连一直住在文举老汉家养伤。山民们都知道老文举家确实藏着一个说话很侉的八路军，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向警察告密。每有个风吹草动的，人们都来给文举老汉报信。一晃，秋天了，山村罩上了满沟红叶，王普连能够慢慢地走动了。二嫂子给他换上丈夫的一身土布夹袄夹裤，让他天天在后山的林子里活动筋骨。不料，有一天

被一个赶着驴驮子的商人从后山过来碰上了。那个商人笑嘻嘻地凑过来问路。王普连一声没吭，扭过头一瘸一拐地向林子里走去。那个商人又跟着追过来，眼看他挨近一伸手的时刻，突然林子里闯出几个光着膀子背着满篓大萝卜的汉子把商人迎住了。

“嘿！掌柜的，你是找啥的？还是卖啥的？”

“啊！啊，是卖白花小布的。”

“一匹多少尺的？”

“28尺的。”

“拿出来，瞧瞧。若仔密的话，咱们搭沽搭沽呀？”

“啊，啊，我今儿不零卖了，这是白马川那边的主顾定的货，是专给人家送的。你们要买，过两天我再驮一驮子来。”

“掌柜的，你没从这儿走过吧？去白马川得先从那条小路进再往西拐。你往这边的林子里钻，桲椤树不会买布呀！”“是，是啊，方才我转向了，正在找个人问路。多谢，多谢！”

那个商人牵着毛驴穿村而过，大步流星地向西梁奔去。几个山民都觉着这个卖布的不像好人。这时，正好有个双庙的老乡来这里的亲戚家帮助收秋。那个老乡认识这个人，赶紧告诉人们，这个卖布的是新来双庙警察所的一个便衣特务。山民们又将方才的经过赶紧告诉刘旺，刘旺回家一拍大腿，说：“坏了，王普连让双庙警察、特务发现了！”

这天夜里，刘旺一家人悄悄从后门送王普连出来。刘文举老汉和刘稳扶着王普连骑上骡子，婶大娘递给刘旺一个包袱，二嫂子又将一个小包揣在王普连的怀里，刘旺牵着骡子向北奔去。半夜的时候，他们来到20里以外的更为隐蔽偏远的红石沟南岔的农民王富田家。这王家是刘家的至亲，刘旺将王普连托咐在王家继续养伤。从此王普连装成王富田老汉的儿子，还装成哑巴。为了少见人和锻炼身体，他钻

进深山给王家放牛。时间长了，这里的老乡也知道了这个放牛的是八路军伤员，仍然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告密。一直到1938年12月，王普连伤情痊愈，身体康复，在群众的帮助下，与八路军第四纵队留在这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包森支队的赖帮游击队取得联系。王普连终于重返游击队。

当这个重伤员再次穿上八路军军装，背上大枪的时候，头一件事，便是悄悄地回到西沟，给文举大伯和婶大娘磕了头，给二嫂子、刘旺哥、刘稳行了礼，与众乡亲洒泪告别。

这位小八路一走30年，后来改名王荣。解放后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69年的一天，王普连从北京又专程来到西沟，探望文举大伯一家和乡亲们。遗憾的是魂萦梦绕的文举大伯，婶大娘和刘旺哥已经病逝！王普连心潮起伏地拜见了仍然健在的二嫂子和刘稳哥，千言万语凝成六行泪。

当西沟的乡亲们再次送别老红军的时刻，拄着拐杖的老二嫂拉住王普连多时不舍，颤颤微微地叮嘱："兄弟，共产党员们是好样的，进了过去皇上住的京城，龙楼凤阁几十年，还没忘了咱们粗手笨脚的山沟子人。兄弟呀，咱们这辈子再见面不易了，这一家的骨肉情，只有让儿子、孙子一代代地传下去吧！"

如今，那位可歌可泣的老二嫂也已经病逝。当她离开人间的弥留之际，还再次叮嘱儿孙："我们……西沟人要，要世世代代……不忘共产党……不忘毛主席……不忘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哪！"

（转载自《塞外烽火》）

冰儿诞生记

佟靖功

1943年1月21日，刚刚吃完早饭的时候，沿着兴隆县五指山南麓的盘山道急奔上来一位骑着红马的灰衣战士，像天马行空一样绕过一座白雪皑皑的峰峦，驰向一洼柞林深处的达峪村。到村中在一座草房院门前滚鞍下马，把缰绳抛给站岗的战士，大步奔上房屋门前，喊了声“报告!”掀帘进了东屋。向一个坐在桌前看地图的灰衣人行了个军礼递过一封信，说：“第八区副区长王佐民派人送来的紧急报告。”

那个接信的人30多岁，身材魁伟，面色红润，浓眉凤眼，虽然穿着普通灰色棉军装，都掩盖不住一身平易而威严的将军气质。他，便是深入敌后，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

李司令员让送信的这位侦察班的于班长留下，立刻召集徐参谋、刘连长、王连长开会，共议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

一位军分区司令员，身边怎么只有这三名营连级干部？原来，活动在热南五指山区的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已下令将冀东主力部队第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撤回长城以南，开展恢复冀东基本区战役。军分区直属机关大部分已于几天前按东、西、中三路集结。李司令员准备向晋察冀军区发完最后一封电报然后再向地方干部部署一番工作，再追赶中路队伍一起进关。现在电报已经发完，地方干部会议也结束，正准备启程，却接到了这封紧急报告。报告称：我内线获悉，昨天日

军发现五指山上有我军电台活动，得知李运昌司令员在五指山上。日军八八一部队长松吉中佐与伪副县长日人西山，紧急调遣日伪军和警察讨伐队 7000 多人，连夜包围五指山区。南部日军前哨抵沟门子(今安子岭)，东部日军前哨出关门，请李司令员火速向西北突围。

情况十分火急，司令员必须马上转移。这时，李司令员身边只有两个警卫连和部分工作人员，计 296 人。黑大汉刘连长霍地站起，瓮声瓮气地说："我带一连在这里阻击，司令员带领着二连立即向山后转移。"平时爱讲《水浒》、人称神枪手的王连长摆摆手说："这一带地形我熟，还是我领着二连在这儿设伏，司令员领着一连赶紧过山。"这时屋外已经纷纷扬扬地下起鹅毛大雪，20 多岁，格外精明干练的徐参谋皱皱眉头，说："司令员快作决定，迟了，满山积雪，会暴露我们的去向。"李司令员出外仰天一看，雪花漫天，低头看看怀表指针说："敌人再快，也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这儿，徐参谋你立即派人通知上三村和这里的群众带着干粮马上向西山森林中转移。刘连长、王连长你们集合部队先把这里的群众送到西山梁上去。于班长你带着机要人员把那三个箱子交给民兵连长妥善隐蔽起来，同时把几匹马也交给民兵牵走。一个小时后，我们在村北头集合。立即行动！"看到司令员胸有成竹，几人分头而去。半小时后，村里的群众全部转移，大雪已将群众的脚印盖平。

1 小时 40 分的时候，东山上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已到水帘洞，离我们还有 4 里。"这时，李司令员命令队伍向西北出发，从小指峰右侧过山，直奔后背的小五指山沟，于班长气呼呼地回了一句："司令员，敌人到了跟前，我们才走，我们的脚印不都暴露了吗？"

"对，就是让敌人跟着我们的脚印走！"李司令员沉着而坚毅地看着一个个披着白布单的战士，严肃地说："同志们，老乡们都 在西山上隐蔽，只有我们把敌人引走，才能保障乡亲们的安全。我们要把敌

人牵走，这场大雪不正好帮忙吗？同志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出发！”

三百来名战士，飞步奔向半隐半露的茫茫雪峰。这座五指山，海拔 1384 米，方圆各 40 多里，主峰像如来佛的五个巨大的手指直撑苍穹。峭壁悬崖，杳无人迹。每年 10 月开始积雪，到第二年 5 月底才全部融化。伪满军警历来不肯深入山腹。李司令员率队刚刚攀进山涧，敌军便长驱直入达峪村。敌军前哨是曾经在东北“围剿”杨靖宇将军的最凶恶的伪警刘其昌率领的 300 多人的警察讨伐大队，还有所谓“日军精锐”的“山田队”。这山田队虽然仅有 300 多人，却装备着 4 挺重机枪，24 挺轻机枪，22 具掷弹筒。山田上尉骑着一匹黑马，后面紧跟着的是个大白脸、三角眼，人称“白天常”的松吉中佐。敌人进了达峪村，不见一人一畜，摸摸各家的土炕还很热，知道山民们和八路军刚刚出村，便将所有草房一一点着，接着沿着雪地上的脚印向龙潭涧急追。敌人不知，这龙潭涧上有九级石湖冰坎，下有九曲深潭溜冰。老人们传说，这是秃尾巴老李的洞天水府。几名日伪指挥官只得弃马徒步，可是警察和日兵都穿着钉子钉底的皮靴，在冰上，走一步，滑一步，不一会，就跌成一群泥猴儿，行进极为缓慢。

到午后 3 点钟，李司令员的队伍从一面面雪坡上溜下来，插入五指山背后的山沟。这山后，是所谓“无住禁作地带”。日伪首先在这里实行了集家并村，强迫居民都迁到沟外大川的部落里居住。这里的村庄已被日伪军焚毁，坚持游击战争的民众都长期隐蔽在高山老林之中。李司令员率队来到山沟时，沟里只剩下村财粮委员赵庆和几位有经验的老人在这守护一座地下粮窖。这粮食是第八区财粮助理赵锡廷给部队储存的军粮。赵庆和老人们拆开一道梯田的坝墙，从地窖里拿出锅与小米给部队做饭，烧开水，安排大家在一带砬棚下的干草铺上

休息。一个小时后，派出去的3个侦察员返回报告：黑河川有大量敌人封锁，上自见草沟下至二道岭子，30里内的村庄都有敌人驻守联防。再有一个小时，尾追的敌人将要赶到，我们从哪里突围呢？人们各抒己见，李司令员沉思一会，说："敌人外搞'铁壁合围'，中搞'梳篦清剿'，如果我们以弱攻强，强行突围，就会被人一口一口地吞掉。我们必须在出其不意上做文章。选择敌人想不到的突围路线。"闷了一会儿，看粮窖的那位白胡须老人说："司令员，要出其不意，有一条路可试试。人们都知道大石憋砬（山沟名）是一条憋死猫的石口袋。可我听朱老二说，这石口袋也有一条缝能上大南山，往西几十里都是老林子，钻过老森林向北一拐就是五凤楼根据地了，只是这条路只有小南沟的朱老二走过。我看你们赶紧奔小南沟找朱老二去吧！"

背着三八步枪的赵庆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补充说："司令员，朱老二的真名叫朱殿昆，共产党员，是我们这一站的交通员。他是个活地图。走，我领你们找他去。"说话时，一个侦察员又来报告：尾追的敌人已经到了沟脑，离这儿还有5里。

赵庆领着队伍靠着阴坡绕过西山弯，向南走了3里，在一片茸茸挂雪的树林子里缩着一个山洞，来到洞旁才发现，大雪覆盖的草棵棵里陷着个地上一半地下一半的草窝铺，赵庆叫了声："二哥，快出来有急事！"

应声从几棵树后闪出一个短粗身材的人来。头上满围着一只少见的白狐狸皮，上身穿着件掩襟白茬老羊皮大褂儿，下身内衬抗日政府救济的土灰色棉裤，外罩羊皮衩裤，脚脖子上系着灰毛腿带，登着一双黄花老牛皮缝合的纳着薄胶皮底的登山靴。可是，往脸上一看，却是个细眉秀眼，朱唇玉面的俊巴子。王连长见了这人的身段，赞叹："虎背熊腰，身似'武松'，脸面俊俏，活像'一丈青'。好个朱老二果然与众不同啊！"

刘连长扯下身上的白布单，抢先上前握住那人的手说："朱殿昆同志，军情紧急，李运昌司令员特意来找你。"

"哎呀！原来是李司令员到了！"

那人语言清脆，竟是一位女子声音。

"我这荒山野窝的叫司令员怎么进屋呀？"

赵庆赶紧向司令员介绍："这是朱殿昆的老婆子张翠屏，我们都叫她'麻利嫂'。老二呢？快把他喊来，大群的鬼子追来了，急等他领着司令员从大石憋砬上大南山哩！"

雪还在飘着，麻利嫂甩着皮袖筒，一边给司令员掸身上的雪，一边说："昨夜里，有人送来一封鸡毛信，他连夜绕大南山去五凤楼送信去了。哪知他啥时候才摸回来呀？"

人们一听大失所望，特别是认错人的刘连长急得直跺脚。这时，一位老人急急奔来送信，沟里下来了敌人，正在粮窖那边搜查呢！



1943年1月21日，李运昌司令员与张翠屏（麻利嫂）见面的地方一小五指山沟麻利嫂家的窝铺旧址

徐参谋急切地建议："司令员，现有只有立即从赵大地向北突围。不然，我们将腹背受敌。"

李司令员仍然在静静地向南观察，"实在无路，只好上东南山向东兜个圈子绕上中指峰，再图下步。""不行！"麻利嫂说话了："程斌那个赖歹掏的带着好几百警察狗子在那堵着呢。司令员，你们想让老

二领的那条路我也知道，我给你们带路。”

“嫂子，看你那腰，行吗?”赵庆愣怔怔地盯着她。

“怕把你当哑巴卖了!”麻利嫂白瞪赵庆一眼，“司令员身系千军，在这坎儿上你还多嘴?”赵庆果然不再吭声了。

“大嫂，你这身子不行啊！……”司令员也看出麻利嫂是个双身子，怎么能连累一位孕妇大嫂去蒙受不可予知的大苦大难呢!?”

麻利嫂看出司令员为难的意思，便干脆说：“我还不到时候呢，我们山里转儿硬棒，您别婆婆妈妈的啦。我没念过书，可看过驴皮影唱的花木兰、穆挂英，娘儿们能上阵杀敌，我就不能带路?”她回身从窝铺里拎出两大捆绳子递给两个战士，“你们哥俩背着，紧贴着我。赵庆你领着三大伯去钻大洼。司令员，咱们快些走!”

李司令员又叮问一句：“大嫂，你有把握吗？这可是险事啊?!”

“司令员，你放心，快跟着我走!”说着她拉着刘连长往前奔去了。李司令员只好下令，让部队跟上去。

冬季白天短，雪天更昏沉，眼前已经擦黑。部队随麻利嫂踏进满是河卵石的山沟在蒿草丛里拐来拐去。李司令员望着她那步履沉重的背影，心头一抖告诉徐参谋、于班长跟在麻利嫂左右，等到了危险路段让她指路，不要让她在头前冒险。这时背后响起枪声，流星般的子弹掠过头顶。王连长向司令员请示：要不要阻击？麻利嫂插过话：“这条沟，有进路，没退路，你们把心搁在肚子里，那些狗日的上不来!”说着，她竟领着人们硬往黑洞洞的盘树搭棚的猕猴桃架里钻。人们担心，猕猴桃架到底能有多大？能藏300人吗？谁知那大片大片的猕猴桃架没边没沿，盘根错节，互相勾结，像一张罩山的天网，无限纵深。徐参谋担心地问：“大嫂，我们总往这里钻、敌人赶来集中往这里射击怎么办?”麻利嫂嘿嘿地笑着说：“小兄弟，这洋桃架随着山沟已经绕了四道弯了，小鬼子的子弹能够隔山穿吗？你听，狗日的

子弹不是越来越远了吗?”战士们迷迷糊糊地钻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钻到头，抬头一看，头顶又悬着一围黑压压、阴森森的大砬棚，像口黑锅扣在头顶。于班长问：“大嫂，你看从哪儿能上？给我们指个路，让侦察员们先摸上去。”徐参谋阻拦着，“大嫂，这回可不能再让你领头了。”

“小兄弟，”麻利嫂喘了几口粗气，说，“这上边哪来的路？若说有路，那是黄羊跳踏的路。”

李司令员让几个最好的侦察员过来，安排他们紧围着大嫂一起上，万一大嫂有失，立刻救援。

麻利嫂说：“司令员，这可不是陪着的活儿，有的地方人登的砬坎只有半脚宽、抠的砬缝不过三指空儿，只能一个人上去，怎么陪呀?”她说：“你们先等会儿，我方便方便去。”其实她乘人不备，把两捆绳子挎套肩膀上，在黑暗中消失了。等了好长一会儿，终于听到她在空中喊：“司令员，接我的绳子!”随着话音，空中扑通扑通地下来一溜撞击声。原来绳子带下的一溜石头在不远处砰砰落地。这时敌人的三颗曳光弹腾空而起，一阵贼亮过后，



1943年1月21日，张翠屏（麻利嫂）带领李运昌司令员及300名指战员，就是从这个山豁口突围的

又听脚下一声巨响，深谷里闪出一片火舌。此时听麻利嫂在空中喊叫：“快！拽住这两条绳子往上爬。”同志们大喜，于班长和另一个侦

察员分别拉住绳子像猿猴似地攀上去，接着又系上去两条粗大的绳子。300来名指战员分成两路，一个接一个地攀登而上。

在沟谷追击的刘其昌“立功请赏”心切，闪着手电一看八路军的脚印都伸进猕猴桃架里，便瞪圆眼，命令警察们沿着脚印往架里快钻。松吉、山田赶到，向沟里发射曳光弹以后，又命令日军发射燃烧弹，焚毁猕猴桃架。在不远处发现20多具被烧焦的尸体，松吉、山田嘎嘎狂笑，命令查看有没有李运昌。讨伐大队副过来哭丧着脸向他们报告，被烧死的都是迷失在猕猴桃架里的警察。不知几百名八路从哪里不翼而飞了！松吉听了，气得嗷嗷怪叫。令警察们一起向峭壁上攀爬。没爬到三丈高，所有警察都纷纷跌落，又死伤20多个。700多日军无可奈何，瘸瘸拐拐地狼狈卷回。

半夜时分，雪停云开，麻利嫂引着部队通过了大南山上南大台森林区。这里杨桦参天、椴栎密集。有时一步陷入半人深的积叶里，泛起浓浓的陈腐气味。一会儿，队伍钻进了一片巨大的乱石窟。一列列房脊般的巨石纵横交错形成许多石胡同。麻利嫂告诉大家：“脚下踩着的这条坨叫乌龙脊，老人们讲，‘骑着乌龙别下鞍，摇头摆尾去西川’。咱们都仔细点，无论怎么拐，谁也别离开这条乌龙脊。”

下了乌龙脊，进入大椴洼，伏在雪上的多是叫做顺坡溜的草铺铺，觉着好走多了，人们的心情随着密林的疏散也开朗起来。李司令员称赞地问：“大嫂，你这身了不起的攀山功夫怎么练出来的?”夜黑中，麻利嫂哏儿哏儿地笑着说：“司令员，看您说的，有念书的，有练武的，哪有专门练爬砬子的?”隔一会，她低沉的说：“这都是穷的没路逼迫出来的。我17岁过门到老二家，就租人家的地边种。一进腊月，换个白花小布就断了粮，讨帐的踢破门槛子。送信儿的腊八，要命的糖瓜儿，躲过年去只得爬大砬子，去掏寒号虫的屎。送到药铺，瞧病先生把它叫五灵脂。掏一斗寒号虫屎能换二斗棒子。我从

18岁起就跟着老二一边种地，一边常年地掏寒号虫屎。有多少伙伴都摔死了！可不掏也得饿死，只得豁出命去掏，一掏就是十多年。刀切似的砬子，扬上几把土，只要砬面上挂住土，就能抠着上去。抠得我俩的指头比谁的都粗……”。王连长说：“大嫂，你这身硬本领，比梁山泊的顾大嫂还能耐呢！”一句话引得大嫂和人们都大笑起来。

三星偏西的时候，麻利嫂领着部队下了大南山，百倍警惕地盘下十几里长沟，来到黑河谷底。当踏上一溜冰川时，她却突然呻吟一声，倒在地上，不走了。徐参谋和几名战士一齐去扶，麻利嫂竟拨开兄弟们的手，仰在冰雪地上说：“男的都离我远些，让我好好歇歇。”当于班长再次来扶时，麻利嫂身下发出呱呱的婴儿啼哭声！同志们都惊呆啦，一时不知所措。还是李司令员应变过人，急速令战士们围成厚厚的一圈人墙为大嫂挡风，立即打亮一支手电筒。麻利嫂乘机转身一口咬断婴儿的脐带。一名战士急忙用两件大衣将婴儿裹严抱在怀里。很多战士纷纷解开背包，用三条被子将大嫂裹紧，抬上担架继续向北沟急行。

拂晓，部队到达五凤楼山脚的一个小村庄，急忙把她们母子送进老乡家。战士们慢慢地将大衣掀开一看，一个小小子还在甜甜地熟睡，满屋的人都笑了。妇女乡亲们端进两个炭火盆，烤得屋里热热乎乎。几位老大嫂端来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和煮鸡蛋，让麻利嫂吃得通身冒汗。一会儿，李司令员提着两包红糖、白面和一小筐鸡蛋轻轻地走进来。看到她们母子平安，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才如释重负，展开浓眉，小心翼翼地托起婴儿亲了又亲。他负疚地说：“大嫂，都怨我一时疏忽，没能看出大嫂已经临近产期，叫你蒙受了这么大的苦难，我这里向大嫂道歉！”说着司令员深深地鞠了一躬。躺在炕上的麻利嫂陡然坐起，说：“司令员，你这可折煞我了！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哪儿还有我呀？要说谢承，我得谢承共产党、八路军哪！”

李司令员向大嫂告别，告诉她部队就要上五凤楼去了，让她在这儿安心休养，村干部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一提离别，麻利嫂眼圈红了，噎了会儿才说：“你们这一去，谁知道驴年马月再碰头啊。司令员，给这个没冻死的‘讨帐鬼儿’起个名字，留个念信吧！”

李司令员想了想，深有感触地说：“为了让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记住日军制造的这场浩劫，也为了让我们子弟兵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无私支援的鱼水深情，我看这个孩子就叫‘冰儿’吧。”

麻利嫂连连说好。在场的群众也个个面露喜色。

李司令员拱起双手：“麻利嫂和孩子，就有劳各位乡亲照顾了。”说完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在金色的朝阳下，李司令员又率领部队出发了。

（转载自《河北抗日斗争故事》(二))

附　记

1949年3月，时任热河省委书记、热河省政府主席、热河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李运昌，在“热河省无人区代表会议”期间，找到时任兴隆县委书记的王佐民，拜托他在五指山周边寻找一位根据地的女儿。至于这位根据地的女儿姓啥叫啥住在哪儿，老将军都记不清了，只说：“她救了我，救了我们冀东军分区300余名指战员免遭厄运，她对抗战、对革命有大功。特别是，她在领我们突围的路上早产了，是我给孩子起个名叫‘冰儿’。”

王佐民受命查找一年，因工作调动又嘱托继任寻找，断断续续多少年仍然没有音信。

“文化大革命”中，李运昌将军受到残酷迫害，被囚禁8年，流放3年。1979年复出后任国家司法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1982年开始，74岁的老将军担任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1984年，老将军连着委托承德地区行署副专员赵锡廷（当年运昌司令员开辟地区时的财粮助理）和承德地区党史办主任李景珍继续寻找“冰儿”。1985年春节刚过，李景珍便来到兴隆，将寻找“冰儿”的任务委托给兴隆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

佟靖功去北京向老将军请教。老将军说：“我抓紧找‘冰儿’娘儿俩，不单是个人的关系、个人的感情，这反映着一个时代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是在追寻共产党人生命力的源泉。这种力量源泉不仅是我们党‘万死中觅取一生’时创业所需，也更是掌握政权后防止奢侈腐败之所需。着眼点，是在于把共产党人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传承到明天。”

老将军的寄望便成了佟靖功寻找“冰儿”的极大的动力，结合征

集孙永勤将军的史料，结合调查无人区里抗日根据地的史料，连续3年行程1000多公里，踏遍黑河川、黄河川和横河川，采访1万多户、7万多人，终于1987年9月18日，与赵锡廷副专员一起在平安堡铁厂，找到了当工人的“冰儿”。“冰儿”名叫朱海清，已经45岁，家里的事情都是听他母亲1982年病逝前告诉他的……

那次，麻利嫂给李司令员带路突围之后，因为有特务告密，日伪军不断地到五指山一带搜查给李运昌带路的人。麻利嫂把“冰儿”这个名字珍藏在心底，给孩子另起个名字：胡林子。不幸的是，1945年4月19日，她的丈夫朱殿昆（共产党员、五指山沟地下交通员），在给八路军送信途中，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不久，麻利嫂给部队转移大量的子弹累得大吐血，从此再也干不了重活儿！

解放后，麻利嫂领着孩子跌跌爬爬地种了点山地，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1960年，娘儿俩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便搬到距老家100多公里鹰手营子附近的荒地沟。搬家时，连一副囫囵的碗筷都没有。虽然困苦到了极限，麻利嫂却从不向任何人提给李运昌司令员带路的事，也从不跟任何人讲丈夫为革命牺牲的事（直到麻利嫂去世两年后的1984年，朱殿昆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翠屏（麻利嫂）20世纪60年代中期留影

1982年初，麻利嫂病重，为了教育下一代，她才将朱殿昆送信时被敌人围住，立即把信吞了，被日军挑了胸腹的事；自己32岁那年给李运昌司令员带道突围，以后又给部队转移10筒子弹吐了血的事告诉了儿子、儿媳，但仍然没讲儿子叫“冰儿”这个最功烈的情节。她嘱咐说：“让你们知道你爸你妈都做过什么事，是让你们还要接着这样做，不是让你们去摆功。抗战时为革命牺牲些什么，是我们应该献给国家的，回头后辈子人再向政府讨要什么，不值！李司令员是为国家办大事的人，你们发誓，不能给李司令员和政府添一星星麻烦。人哪，应该清清白白地活下去！”看到儿子、媳妇流着泪点着头答应，麻利嫂才闭上眼睛。

乡亲们帮助朱海清办理丧事时，偶然在柜底发现个黑木匣子，没缝没吊儿没锁，谁也不知道怎么开。人们七嘴八舌，这么奥密地保管，准是老太太精心地为儿子留一份传家财产。可是朱海清对此一无所知，最后，在众人面前用斧子将它撬开……

人人都惊呆了，匣子里有三层，一层搁的是麻利嫂的老花镜；二层是陈黄纸包着的一个包，里边满是破破碎碎的画儿；三层是一张牛皮纸的包，里边是一捆大小不等颜色不一的旧纸条。请来文化人把碎画儿凑起来细看，正是朱殿昆的地下交通图，其中有麻利嫂帮李司令员突围时的路线标记；另一包里是近百张欠条，都是三、四十年前八路军、游击队、县区人员在朱家吃饭时给写下的欠据，粗略合计，约欠粮7000多斤！

在场的人，一片唏嘘……

建国初期，各级政府曾多次发出公告，凡有此类欠条的乡亲均可兑现小米。麻利嫂这7000多斤欠条足可换回7000多斤小米。那是怎样一笔丰厚的收入啊！在五指山沟，它可以使饥寒交迫的娘俩顷刻间变成首富，它可以使家徒四壁的茅屋一夜间流光溢彩。然而，那副老

花镜在诉说，在麻利嫂的眼里，那每一张欠条上都浮着一群子弟兵的音容笑貌，都活跃着一则英勇杀敌的故事。麻利嫂正是用无限深厚、纯朴的革命感情，锁住了“期望”，锁住了“回报”，锁住了“物欲”。对党、对政府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那颗赤诚而炽热的心。

这就是抗战时期的兴隆老百姓。人们感叹：“麻利嫂是隐在深山里的中华女杰、农村大贤、熠熠发光的雾灵明珠!”

找到“冰儿”不久，已经80岁的李运昌亲自来到承德。1988年4月17日上午9时，老将军与阔别45年的“冰儿”终于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

四　嫂　子

朱呈云

在兴隆县小黄岩村的北山坳里，有个独门独户的穷苦人家。房前树木成荫，屋后松柏成林，从山上到山下只有一条蚰蜒小路，不到跟前看不到房舍，这里就是四嫂子的家。

四嫂子，真名崔云，是个办事泼辣，处事公正，待人和气的女人。因为她爱人老庄排行老四，村里人不管辈数大辈数小的人，都习惯地称呼她“四嫂子”，没有人叫她实名。解放战争时期，作家海默曾来这里写过散文《四嫂子》，刊载于中国青年出版社辑印的《红旗飘飘》上。建国以后，又有省、地许多文艺工作者来到此地，以四嫂子为素材，著书立说，撰写四嫂拥军事迹。因此，四嫂子的故事广为传颂。

1938年夏天，邓（华）宋（时轮）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奉毛泽东主席关于“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深入敌后小黄岩深山区，组织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从此四嫂子家里成为抗日军民的落脚之地。不管白天黑夜，经常有抗日人员来这里开会，商讨抗日大计，还经常有八路军伤病员住在这里，休养生息。尽管四嫂当时已经38岁，但她把抗日人员看做是自己的亲人，不畏艰苦，不怕疲劳，经常为大家烧水做饭，为伤病员煎汤熬药，精心护理，从未嫌弃。同时，她还动员爱人老庄和孩子参加了抗日队伍。因此，人们又称她是热爱子弟兵的庄大娘，拥军模范四嫂子。

1940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小黄岩，枪声震天，硝烟四起。此时，八路军主力部队转入长城以内作战，留下十几名伤员住在四嫂子家里。四嫂子听到外边枪声急，就知日军已经进山，于是她就毅然决定把伤员背进密林中的山洞里隐蔽。可当四嫂子要背伤病员时，伤病员一个个都直摇头，说：“我们年轻人怎能忍心让您背着去隐蔽！”说着，伤病员们忍痛挣扎着自己要走路。四嫂子一见可着了急，敦促着说：“你们咋能要短呢！眼下情况紧急，你们有伤行动慢，快用我这个两条腿当担架吧！”伤病员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个叫四嫂子背进密林山洞里隐蔽。累得四嫂子浑身淌出了汗水。可是，当只剩下一个姓杨的伤员未转移出去的时候，敌人已经爬上了山，距离四嫂子房屋不足50步远了。四嫂子一看，急中生智，跑到小杨跟前悄声说：“敌人快到房前了，咱们转移不出去了，你快躲藏到木柜里隐蔽，我掩护你！”小杨听后不同意，掏出手榴弹一边往外闯，一边说：“四嫂子你快走，我跟敌人拚命去！”四嫂子闻听猛地一把扯住小杨，严厉地制止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许你蛮干，眼下得听我的！”说罢，打开柜盖，把小杨藏在木柜里。

顿时，有四个敌人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凶狠狠地闯进四嫂子院内，滴溜溜地转着贼眼，看完东屋奔西屋。见四嫂子一个人呆在房里，于是恶狠狠地问道：“你知道八路军的跑向哪里?”四嫂子听到问话，装着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咱这穷门穷院，茅屋陋舍，八路军哪能呆在这儿。咱们可不知他们的行踪呀！”这时，一名日兵猛步上前揪住四嫂子前胸的衣襟，瞪圆贼眼威吓道：“说实话，不然死了死了的！”四嫂子面不改色心不乱，镇静自若地回答说：“你们不是搜查过了吗？还问我一个妇道人家做甚！”敌人见四嫂子衣服褴褛，说话没有露出破绽，离开四嫂子家门，向山下溜去。敌人走后，小杨从木柜跳出来，急急地握住四嫂子的双手，钦佩地说：“您面对凶敌心不惧，

我从心眼里佩服您呀！”

1941年夏季，四嫂子分娩刚出满月，正在给婴儿吃奶。突然来人报告说；“不好了，山下来了伪军，已经朝山上走来哩！”四嫂子闻听猛吃一惊，急忙丢下婴儿，组织十多名伤员转移。四嫂子生产不久，又加上营养不足，身体虚弱，四肢无力，轻伤员可以互相搀扶着进洞，重伤员还得靠人背，转移十分吃力。当她最后背起一名伤员进入密林时，只见家里房屋起了火，浓烟弥漫，把山遮得漆黑。可她顾不了这些，只是背着伤员汗一把水一把的朝密林山洞里走去。到了山洞还没来得急喘息，突然又听到山野里响起急促的枪声。四嫂子担心地想，情况不好，可能有人在山里未转移出去，叫敌人发觉了……，她在山洞里站不安立不稳，心里不能平静。于是又飞步走到洞口，钻进密林丛中，观察动静。等了两个多钟头，敌人开始撤退。这时四嫂子再也呆不住了，疾步朝山野响枪附近跑去。走着走着突然在山路草丛里发现有血迹。她沿着血迹向前察寻，当她走出十几步远的地方，猛然发现在一个草丛里躺着一个人。到跟前仔细一看，是八路军的张排长。颈部挂花（负伤），晕倒在地。四嫂子用手摸了摸胸口还在跳动，于是她撕下自己的衣襟，给张排长擦血，包扎起来，然后把张排长从草丛里轻轻扶起。正在这时，张排长苏醒过来，闭着双眼突然喊了声：“水！”四嫂子闻听张排长喊出了音，心里格外高兴。可是这山野是枯水区，素常人们用水还要下山到清水河去担；这个紧要时刻怎样解决水的问题呢？四嫂子想了想，心中一亮，毅然决然地解开了自己的前衣扣，叫张排长吸起自己的乳汁来。时间不大有两个轻伤员对四嫂子久不归洞放心不下，走下山来。他们在草丛里发现四嫂子用乳汁抢救伤员，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之后，四嫂子和轻伤员一起，把张排长背回家里。可是到家一看，房子被敌人烧为灰烬，婴儿被敌人抛下山崖断了呼吸，伤员们见此情景，无比悲痛。张排长醒来知此情

景，感动得热泪盈眶，说道："您舍己救人，真比我的亲娘还亲哩!"

1942年深秋的一天，四嫂子正在新搭的窝棚前做军鞋，区里老李来到这里，告知她有亲人在一次突围战中英勇献身。四嫂子闻听此讯，悲痛万分，更增添了他对敌人的仇恨。就在这时，六道河据点的伪军"扫荡"小黄岩村来了，挨门挨户清查可疑的人。老李为了送信，穿林走壑，已经一天多粮米未进了。四嫂子还没来得及给他做点吃的，就听说伪军进山了。四嫂子走出窝棚，朝山下一看，只见有两名伪军闯上来了。老李焦急地说："四嫂子，我要冲出去，以免连累着您!"四嫂子断然不允，阻拦说："不行，我们不要忘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快躺在炕上'装病'，敌人要问我就说你是我的'男人'，伪军不动手便罢，要动手咱俩共同对付他们!"老李听从四嫂子的话，假装有"病"，四嫂子守护在老李身旁，侍候"病人"。不多一时，两个伪军手持户口簿闯进了窝棚，见四嫂子守在"病人"身旁，泪水直淌，哭红了双眼，厉声问道："老太婆，病的什么人?"四嫂子哭出声音，有气无力地回答："我的男人。"伪军又问："多大岁数?"四嫂子说："比我大1岁，43了。"伪军翻了翻户口，没见漏洞，离开窝棚。敌人走后，老李怀着钦佩的目光，赞扬四嫂子临危不惧。可是四嫂子却总是认为自己为抗日出力不够，谦逊地说："我对抗日事业贡献小，比起你们还欠火候呢!"

1943年春季以后，日军在兴隆屡遭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损兵折将，于是来了个狗急跳墙，对深山抗日根据地实行"集家并村"，划"无人区"，推行"三光"政策。四嫂子搭的窝棚又被敌人烧光了，粮食、财物被敌人抢光了。可是四嫂子面对凶敌，斗争更加坚决。她没有窝棚住山洞，没有粮米采树叶，野果充饥，始终跟着八路军围山转，坚决不进日伪统治下的部落里去。四嫂子宁可自己饿肚皮，也要把采集到的山蘑菇野果留给伤员们吃；宁可自己受冷受冻，赤裸裸的

露着肉，也要把仅存的衣服破被留给战士们用。1944 年深秋，四嫂子在山洞接待了七八个伤员，足足住有两个多月。她象久经磨练的老医生一样，白天上山采药，晚上煎熬完毕喂给伤员。每当日伪进犯时，四嫂子就把伤员们隐蔽在山洞里，敌人走后，四嫂子就让伤员出洞晒太阳。有些伤员痊愈后重返前线，四嫂子总是笑呵呵地嘱咐说："你到部队要多杀敌，多立功，打了胜仗要给我捎个喜信来啊！"

四嫂子在抗日战争中，热爱子弟兵，护理伤病员，几年如一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荣获兴隆县政府拥军模范光荣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 年 9 月，中共中央邀请四嫂子去北京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呢。

四嫂子唯一的儿子庄自义，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与儿媳和一个孙女在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苦。后来庄连和与她儿媳成亲，她又有了四个孙子和一个孙女。1976 年，四嫂子病逝。

一个"金蛋"

栾福忠

1982年9月2日，金风送爽，硕果累累。在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时节，1930年在井岗山参加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原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舒行将军，从江西吉安来到抗战时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兴隆县雾灵山。

40年过去了，旧地重游，千峰竞秀，万壑争流，层林尽染的雾灵山秋色使他陶醉。回忆起往事，他热血沸腾，思绪万千。舒行将军举目眺望着这京东第一座高山——雾灵山，无限感慨地对人们说："这里的秋色美，这里的土豆更是比密甜，40多年前的土豆的甜味还在我心里飘香。"

1945年1月，抗战进行到全面反攻阶段，舒行同志升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分区司令员，率部战斗在长城内外，驰骋在雾灵山区。同年7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和冀热辽军区的命令，为打通"国际路线"，准备迎接苏联红军对日作战，配合东北抗日联军解放全东北，从十四分区所属十三团、十六团和三个县大队中抽调400名优秀指战员，组成"挺进支队"，向长城外热北、辽宁边境、外蒙方面挺进。

当时，环境异常残酷。日军阴谋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伪满洲国西南"国境"沿线，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大搞"无人区"，在兴隆县境内修筑199座"集团部落"，无辜的群众被强迫进入部落，兴隆县三分之二的地区被划为"无人区"和"无住禁作"地带。日军、讨伐队、满洲国兵、警察

队约有一万余人驻扎在兴隆县城及各据点内，经常扫荡山区，封锁八路军，妄图阻止八路军进军东北。

此时此刻，驻兴隆之敌对八路军新组建的“挺进支队”，造成很大威胁。为使“挺进支队”顺利向前挺进，舒行司令员当机立断率十四军分区所属主力部队十三团、十六团和部分县大队，主动突袭兴隆境内之敌，吸引敌人主力于兴隆境内。尔后，“挺进支队”寻机从新城子（属密云县境）出发，经滦平，隆化、围场县进入内蒙古。

1945年7月27日，舒行司令员率军分区主力部队从平北的曹家路（属密云县境）出发，过长城口，到滦平县的小门旗，又折回进入兴隆县境。他们的目标大了，日伪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企图合击他们。舒行司令员和指战员见此情形非常高兴，敌人想“包饺子”吃掉我们，正中我们的计了，被我们牵住牛鼻了。为了不让敌人咬住，而且又能把敌人吸住，舒行司令员召集了营连干部紧急会议，向部队讲明此次作战任务就是吸住敌人主力部队，为“挺进支队”扫除障碍。为达到吸得住，甩得开，就得打得狠，跑得快，边打边跑，不打消耗战，用一条线牵住敌人的鼻子。舒行司令员率队从滦平县李家庄到兴隆县鹰手营子北部一线边打边跑，三天三夜后，趁黑夜甩开了敌人。又经一天的急行军，于7月31日晚才由兴隆的荒地沟到雾灵山的前山。部队稍加休整后，准备沿着雾灵山深入，翻越山岭开进杨树沟（属上石洞乡境内）一带。

这时由于长途奔袭，过度疲劳饥饿，舒行司令员两腿已经迈不动步了，额头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只能艰难地讲话。他想如果有东西吃，就能坚持迈步。可是他和战士们身上的干粮袋也早已瘪得倒不出一粒粮食。战斗在“无人区”，又处在雾灵山高峰的深处，去那里弄东西吃呢？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前进。于是他命令部队继续向前开进，他和警卫班在后边慢慢走。部队指战员怕司令员在后边有危险坚决不

走。大家望着一条条又黑又阴森的山沟，你瞧瞧我，我看看你。突然，通讯员小张前来报告，一位老乡要见司令员。舒行司令员点头让他过来。话音刚落，一位中等身材，满脸胡子的老乡，身背猎枪急匆匆地走到舒行司令员面前。舒行司令员急忙问他从那里来，是干什么的？这位老乡低声地告诉司令员，他叫吴大山，家住吴沟村。雾灵山前一带老百姓房子全烧光了，他全家也被日军拆散了，他逃到深山老林，靠种点土豆，打点野兽为生。吴大山深情地问舒行司令员："长官，你们是毛主席、共产党的队伍吧，日本鬼子长不了吧？"舒行司令员点点头。吴大山从腰里掏出一个足有半斤重的土豆递给司令员，并说："我老汉只有这个土豆慰劳你们了，盼你们早日把鬼子赶出去。"说完就走了。舒行司令员望着老乡离去的背影，想起了当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我军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今天你借给我一个山药蛋，将来我要还给你一个金蛋蛋。"他顿时感到手中这个土豆的份量越来越重，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支援子弟兵，老乡们为的是什么？"说到这里，舒行司令员环视一下战士。指战员们好象忘记了饥饿和疲劳，都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不平常的礼物。舒行司令员接着说："这虽是一块普通的土豆，它不是黄金蛋，但胜似黄金蛋，它凝集着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寄托着亲人们对子弟兵的殷切希望。它充满着人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我们要以胜利来回答人民对我们的关怀。"说完舒行司令员让把土豆赶快烧熟分给最困难的战士吃。大家传来传去，谁也不肯吃。非让司令员吃下不可。舒司令员无奈只好吃下了这个土豆。吃完土豆身上来了劲，带领部队连夜走出了雾灵山的深山密林，来到杨树沟。8月2日，"挺进支队"也传来了胜利到达预定地点的喜讯。此时此刻，舒行司令员从心里迸发出一句话："一块土豆半斤重，军民情谊重千斤。"

如今，40 多年过去了，但这件小事一直铭记在舒行司令员的心里，使他终生难忘。小小“金蛋”，联系着司令员的生命，部队的安危，东北的解放，抗战的最后胜利。

雾灵山的秋色美，雾灵山人民的心更美。

敌人营垒中的“万警尉”

刘 玉

抗日战争时期，兴隆县倒流水伪警察署有个遐迩闻名的“万警尉”，他就是中共党组织打入日伪内部、八卦岭乡草场村的中共党员万全。时至今日，人们每提起“万警尉”，无不赞叹和敬慕。

1938年6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丰润县田家湾子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发动冀东武装起义。7月初，在中共的领导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东起山海关，西至潮白河畔，南起渤海边，北到长城外，到处燃起了抗日武装起义的烽火。与此同时，八路军第四纵队攻占了兴隆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日伪政权，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日伪统治时期，兴隆县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长城内是汪精卫的治安军。由于伪满洲军和治安军矛盾重重，两股敌伪军互不得越过长城。抗日武装小股部队就利用日伪这一矛盾，频繁活动于长城内外，而草场村也就成了小块游击根据地。从此，开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日军为严密控制所谓的“国境线”，在距草场村一公里的西山上修筑了碉堡，设立了八卦岭警察所。兴隆至马兰峪的公路沿草场村边通过，村东仅3公里的小水泉村驻扎着日本守备队。日军、伪军、特务不分昼夜，经常来草场村骚扰，把不足百户的小村搅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1940年，在草场村秘密建立抗日政权，组织青年报国会、妇救等群众组织，群众抗战激情越来越高。日军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加紧对长城沿线的控制。1942年5月，草场村和其它各村一样，

实行“集家并村”，拆毁民房，修筑部落，强迫群众住进部落。日军为强化治安，在部落里设置了部落长、甲长、牌长、自卫团长等一系列伪村政权组织，组织青年，建立“灭共义勇队”，并配备了枪支。警察和特务随时在部落里出出进进，监视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上级组织指示在部落里，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日军、汉奸、顽固派，搞“两面”政权，把伪村政权和武装牢牢地掌握在中共组织手里，向日伪进行秘密的和公开合法的斗争。

伪甲长和办事员　两面政权一肩担

草场部落的伪甲长，就是中共党员、八路军办事员（村长）万全。他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向日伪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全，1898 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七八岁开始放羊，十几岁就和父亲一起种田，做小买卖，从而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万全，高个子，黑红脸堂，四方脸，浓眉大眼，身材魁伟，性情豪爽，好说好笑，善于联系人，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他为人正直，办事爽快，只要是他认准的，多大困难也要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有惊人的胆量，遇事沉着，善于应付，粗中有细。由于多年闯荡，见识广，思想开通。

1943 年至 1944 年间，冀东出现抗日义勇军，震动了长城内外。尤其是 1938 年冀东 20 多万人的大暴动，使万全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心灵深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从那时起，他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宣传，开始千方百计接近八路军，并偷偷地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940 年，八路军到草场村秘密建立村政权。万全痛恨日军、汉奸、警察、特务，但恨在心里，笑在脸上，常和他们交“朋友”，

用以应付敌人。中共在该村建立村政权时，他当上了村办事员。1942年，他加入了中共党组织，作为单线领导的中共党员。

1942年5月，集家并村入部落后，村里推举万全任伪甲长。他知道，当伪甲长，既担风险又挨骂，但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不使老百姓遭殃，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他担任了伪甲长。从此，他白天应付日伪，夜里参加抗日活动。他不顾家庭生活困难，常常变卖财产，尽量不向村里摊派，增加群众负担，深受群众拥护。

日伪为镇压抗日活动，曾派一支最凶恶的伪军讨伐大队——刘其队，驻扎草场部落。群众中流传着："杀人放火刘其队"。万全面对残暴的日伪军不去硬碰，常常夜间拿着酒肉向日伪岗哨走去，嘻嘻哈哈打招呼说："弟兄们，辛苦了，穿穿里皮袄（喝酒，暖身体之意）。"对伪军的下级军官也以"交朋友"的形式，拢络他们。伪军们把他看做朋友，称他是好甲长，得到信任，掩护了抗日工作的开展。他利用这些"朋友"了解日伪军的许多情况。有时大白天把情报送出去，把抗日军、政人员所需要的东西送出去。有时抗日人员夜间从部落围墙的水沟眼进来和万全联系，从未被日伪发现过。由于万全的多方掩护，这个村的抗日工作从未停止过，也未曾有过任何损失。就这样，草场部落成了抗日堡垒村，万全成了抗日堡垒户，日伪称万全是好甲长，草场是倾向"皇军"的部落。

制造杀敌假现场　避免一场大灾难

194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驻扎在小水泉据点的日本守备队两名日军小头目带一名特务（小水泉人），到八卦岭、草场等村调查八路军家属及八路军活动等情况。因为这一带早已集家并村，以为这里是他们的天下，有恃无恐，即大摇大摆地进了草场村，突然闯进了八路军家属吴增、杨安、吴连海家。他们扑空了，这三家早已转移了，三

个人气极败坏地把乡长、甲长们训了顿，便要回小水泉据点去，刚走到部落外东北面一个破房框子墙外边，就遭到了冀东军区六区队侦察员张振江、郝卫民等五人的袭击，他们正在草场侦察敌情，得知三名敌人进村，料定必回小水泉据点，就设了埋伏。当三名敌人走进包围圈时，一齐开火，一日兵和特务当场毙命，另一日兵躲到墙根下，听到墙上有枪声往上一看，见张振江在墙头上向外打枪，因有墙帽子互相看不太清楚，当张振江再次伸出手射击时，蹲在墙根下的日兵用“王八盒子”打了一枪，正打在张右手食指上，张忍疼拉响了一颗手榴弹，顺墙扔了下去，日兵被炸死，侦察员们迅速打扫了战场，带上日伪的三枝手枪、弹药等战利品转移了。这次伏击，村里谁都不知道，事情发生后，急坏了万全，他明白这意味着全村有被血洗的危险，马上找到村支部书记杨顺、吴金等抗日骨干研究对策。万全想起小水泉日本守备队有他一个日本“朋友”过去和他说过：“如果皇军被八路军打死在距某个村3里之内，就要血洗这个村。”万全等当即决定制造假现场，把尸体弄到3里以外之处。支部书记杨顺立即动手把三具尸体捆好，吴金、刘海、吴旺发每人扛一个，万全先到3里外找好地方，在离村3里的黑土抗日坎子下面，路旁有段旧房残墙，进行了细致的伪装。然后把杨山家一头小猪弄到现场，捅了两刀，把猪血洒在日军尸体的枪伤处和地上。为彻底摆脱干系，万全又想出嫁祸于敌的办法，把特务的尸体扛到离村较远的南山沟里埋好。这时天色已晚，万全急忙跑到八卦岭警察所报告，回来一看，村里人都跑光了，党员、干部们也都跑了，他也想一跑了之。但他想如果不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报告，全村可能被洗劫；去，又有被杀的危险。经反复考虑，为了抗日大局和全村的安危，只好独自一人连夜到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去报告。万全向日本守备队“小滨”报告说：“两名皇军和一名特务在回来的路上，被好几个特务勾结的八路军打了埋伏，两名皇

军被杀，那个特务投八路军去了。”“小滨”和其它日军头目听了暴跳如雷，大骂这个特务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万全甲长“大大的好”，“对皇军大大的忠诚”。狡猾的日军当时没有出动。次日，日本守备队大队人马查看了现场，深信不疑，抬起两具尸体，就回了小水泉据点。以后，日本守备队和各据点伪军在草场附近山上扫荡了好几天，未查出任何破绽，就罢休了。一场难免的灾难化险为夷了。事后，人们说：“只有万全的胆量才敢去，别人谁敢去呀。”

将计就计斗日兵　彻底粉碎敌阴谋

由于日伪在草场一带吃过亏，察觉到这一带有八路活动，也怀疑到万全等村政人员，只因没有证据，不好治罪。狡猾的日伪多方试探，反复盘察，但由于万全机警过人，日军的阴谋没能得逞。

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长“小滨”（外号坏鼻子），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诡计多端，阴险奸诈，为向其主子请功，决心在草场搞出破绽来。1943年夏季的一个夜晚，趁夜深人静，率日军守备队悄悄地包围了草场部落，窥视里面的动静。过了好长时间，不见有动静，就命翻译官喊话说：“我们是八路军，李运昌的队伍，快开门。”此时，部落围墙上站岗的“灭共义勇队”早发现外面有部队在活动，但看不清楚是什么队伍。万全和村干部闻讯起来后，一听喊话，就明白是日军的阴谋。如果是自己的队伍到来，总是有交通员、侦察员先联系，抗日人员都是从围墙的几个水沟眼进出，而且都是秘密来往，一般群众都不知道。况且草场村是连接关里关外的重要通道，根本不可能在村外大喊大叫，日军没想到这样恰恰弄巧成拙，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万全决定将计就计，教训教训日军，随即命人敲锣打钟，并且大喊：“八路军来了，大家快出来打八路，保卫部落”。顿时，全部落青

壮年纷纷爬上围墙，一边呐喊，一边用石头、土块、木棒向墙外日军猛砸狠打，墙外的日兵被砸得鬼哭狼嚎，叫苦连天。“小滨”立刻让翻译官喊话说：“别砸了，我们不是八路，是小水泉的皇军。”这时，万全觉得目的达到，便叫人开了部落大门，迎接日军进部落。“坏鼻子”队长召集群众讲话说：“草场部落大大的好，大大的良民，万甲长大大的好。”说完话，脸上露出得意的奸笑，集合队伍，溜回了小水泉的据点。

党的需要我就去　抗战不能怕委屈

1943年秋，中共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六区区委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对敌我力量对比和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认为：草场一带是抗日政府沟通关里关外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日伪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消灭抗日政权的重点地区。所以，这一带是敌我必争之地。草场村虽是抗日堡垒村，但它周围几个村据点里的日伪却很猖狂，其内部情况很难掌握。打入日伪内部，掌握敌人动向，瓦解敌人，保护人民，内外配合打击敌人，成为对敌斗争中极为艰巨又迫切的任务。

万全经中共组织多次考验，忠实可靠，对敌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又是一名单线领导的共产党员，党内外都没有目标，尤其是对几件事情的巧妙处理，取得了日军的信任，是理想的人选。如能打入日伪内部，对抗日极为有利。于是，区委决定做好万全的思想工作，叫他打入日伪内部。负责人和万全谈了这一决定后，万全很有顾虑。打入日伪内部，行动上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言语上装得不象，就会暴露自己，若装得很象，不仅万人唾骂，良心上也过不去。就连做伪甲长，不明真象的人背后还骂他汉奸、走狗、亡国奴呢。区委领导反复说明，这是党的工作需要，况且你已具备打入日伪内部的许多有利条

件，虽有危险、有委屈，但这是党的事业，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就是要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组织的鼓励下，万全向组织表示："只要是党需要我就去，为了抗战就不能怕委屈！"

为了进一步取得日伪对万全的信任，区委决定将政府在草场保存的一枝"七九"步枪，由万全交给日伪。经过周密的研究部署，天黑后，由中共党员杨士林、杨田、吴金等人（均是"灭共义勇队"员，手里有日军发的枪），到部落外的山上打了阵子枪，然后用烧红的火筷子把万全的头皮连同礼帽烫了眼。随后万全拿上那枝"七九"步枪，连夜跑到八卦岭警察所报告说："八路军要进部落，让我们义勇队打跑了，还夺了一枝枪，我差一点被八路军打死。"说完让伪所长和警察们看头皮和礼帽烫的那个眼。同时，杨士林等人在村里向群众宣传："'义勇队'和八路军开火了……"。第二天，八卦岭警察所和倒流水警察署的警察都来到了草场村，了解事件经过。找义勇队了解情况时，杨士林、杨田、吴金等人主动介绍如何和八路军开的火，万全如何夺了八路的枪等等。说的活灵活现的，和万全介绍的情况一样。找老百姓了解情况，群众说："只知道昨晚打了好一阵子枪，说是'义勇队'和八路接火了，还夺了八路的枪，把八路打跑了，老百姓吓得不敢出门，详细情况不清楚。"随后，县警务科又来人调查，也没查出任何破绽，就深信不疑，夸万全能干，了不起。

万全和八卦岭警察所韩所长平时素有些"交情"，韩认为他夺了八路的枪有功，应给个一官半职的，便推荐他到倒流水警察署。万全当然"求之不得"，向署长常大伦说："我夺了八路的枪，八路早晚得找我的茬，不如让我到警察署来，给我点事干，保险点。"但常大伦未能答应。

不久的一天夜里，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坏鼻子"队长突然把万全抓去，劈头便说："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万全摸不清头脑，冷静

地听着，思索着，最终他明白了。这是日军的敲诈，因为他没能提出任何具体事实，只是毫无根据的乱骂。于是万全便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了效忠皇军，抢了八路的枪，险些丧命，怎能对皇军不忠呢？只要放我回去，一定更加孝敬您"。"坏鼻子"没再说什么，就放他回来了。万全回家后，变卖家产给"坏鼻子"队长送了礼才算罢休。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日伪再施伎俩，尽快打入敌人内部，万全又送礼给常大伦，说："不知哪天，我非被八路活埋不可，不如让我到警察署，真刀真枪和八路干，保险些。"由于万全原来就是敌方出了名的模范甲长，又屡建"功劳"，加之礼物开路、韩所长保举，终于在1943年秋后，到倒流水警察署当上了"警尉"。以后又任八卦岭警察所长，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向日伪展开了斗争。从此，中共组织上通过万全，掌握了日伪的内部许多情况。

在万全任警察所长期间，中共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六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丁春生，经常到八卦岭据点，吃住在这位"万警尉"家里。丁说："既方便、又安全，又便于开展工作"。其它县区干部在敌情紧张时，也常去躲避，这对万全很危险，可他满不在乎，总是设法保护好抗日工作人员。在修建挂兰峪伪警察署时，民工挨打受骂，万全去监工时，不许警察打骂民工，他说："民工们怕挨打都不敢来，活谁干？"保护了民工，受到了民工的称赞。

舍身斗志诱顽敌　七十三人脱虎口

万全当上伪"警尉"后，在警察面前装扮得耀武扬威，神气十足，警察特务对他几分恭敬，几分惧怕，怕他时常找茬训斥他们。他每到各部落检查时，都要组织学生列队欢迎，还要照本宣科地向学生"训导"几句话，常遭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白眼、唾骂。他为取得日伪信任，掩护自己的身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忍辱负重，默

默地工作，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出来讲话，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保护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的利益。

1944年农历六月三十日夜间，三道河部落伪警察分驻所，被蓟遵兴联合县大队和部落“灭共义勇队”内外配合袭击，缴获步枪40枝，手枪1支，有13名“灭共义勇队”员携20枝步枪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个部落共产党支部是个坚强的集体，“灭共义勇队”的枪枝和实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大枪队队长张德江是共产党员，副队长李建国（真名张显武）是党支部宣传委员。这次袭击的基本方案就是由区委书记丁春生主持，在李建国家里召开的支委会上具体研究制定的。这次事件震惊了日军，农历七月初二，日军调集倒流水、挂兰峪、八卦岭、小水泉等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三道河部落，把全部落的男女老少集中一起，按户口薄点名，参加游击队的13名“灭共义勇队”员家属，当成了八路军家属，除对部落进行了大搜查外，把13户74名八路家属抓起来，进行毒打，逼他们交出人和枪。由于当场没有逼出任何情况，就把这74口人带到倒流水警察署关押起来，日夜刑讯逼供。74人中，有从会说话的孩子，到步履蹒跚的老人，无不惨遭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压杠子、狼狗撕咬、吊打等残酷折磨。但最终没能从他们嘴里掏出需要的东西。相反，日伪军越凶残，人们越宁死不屈。无奈，常大伦只得向兴隆警务科请示，要当众杀害这74口人，借以镇压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农历七月初五下午，这74口无辜百姓被押回三道河部落。将全村男女老少，强行集中到村南头井沿空场开会，会场周围用重兵把守，会场内的一张桌子上架一挺机关枪，冷森森的枪口对准了这些八路军家属。常大伦首先进行一番反共宣传后，宣布：“谁把自己家参加八路军的人找回来，把带走的枪交出来，就给他自由，谁抗拒不交，立即枪毙。”无论他怎样嚎叫，人群依然悄然无声，大家以愤怒的目光鄙视敌人。日伪军

终于恼羞成怒，他们先把“灭共义勇队”队长张德江妻子拉出来问：“你男人哪儿去了？大枪哪去了？”而得到的还是以前那句话：“我啥也不知道。”鬼子军官吼叫一声，立刻有几个日伪兵拥上来，把他拖到南门外枪杀了。就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为了保守秘密，为了抗战的胜利，英勇就义了。在伪警察中有个王所长，平素对老百姓不错，有人说他是八路军派进去的，大家都来央求他，有的给他下跪，有的给他磕头，求他讲讲情。他为难地说：“你们别求我了，我也求不了情，他们不信我”。当时，气氛非常紧张，人们无可奈何，只得等死。

日伪军杀张德江妻子之后，马上又拉出大枪队副队长李建国的妻子逼问，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红了眼的日军又要将他枪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万全跑得大汗淋漓地赶到了。日军这一举动，开始他并不知道，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即赶赴现场。他见此情景，马上凑过来问李建国的妻子：“你有几个孩子，是男是女？”“就一个女儿”（其实万全很清楚），万全马上过来对日本军官说：“他只一个女孩又不传宗接代，不杀他，他家也等于绝户了。”由于日本人也有这种“女孩不能传宗接代”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很欣赏这位万警尉，便点了点头。使李建国妻子幸免遇难。紧接着万全又对日军说：“留着这些人也许还有用处”。那个日军头目一听，贼眼一转，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然后与常大伦等商议，将这些八路军家属统统运往东北。万全知道，运往东北无非是有劳动能力的下煤窑挖煤，青壮年妇女配给敌兵，老弱病幼用作细菌战的试验品。万全心急如焚，再继续和日军讲价钱，又恐日军翻脸，不然，这些人等于还未出火坑。再看看这些人，都用目光望着他，看他是唯一的救星。一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不容他考虑个人安危，拼命也要保护这些抗日家属。他首先对常大伦说：“我想如果把八路军逼急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八路军大

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对咱们非常不利，不如放长线钓大鱼，把他们撵到‘国外’去（长城以里为满洲国外，三道河村离长城5公里）。虽然那里是满洲国外，可也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布置好，八路军必去探望他们的家属，这样便可一网打尽。”这番话还真的打动了常大伦，随后由万全帮腔，二人去说服日军头目。由于当时日本人很信任他俩，就同意了他俩的意见。常大伦对这些家属们说：“皇军饶你们不死，把你们通通撵到国外”。又送了一顿“人情”，说了一通“中日亲善”一类的鬼话。而后，万全暗示这些人说：“你们要感谢皇军不杀之恩，马上到关里去，越快越好。否则，皇军饶不了你们。”其实，人们恨不能一步迈到关里去。当夜就收拾好东西，到关里投亲靠友去了。就这样，在万全的舍身救助下，73名八路军家属得救了。人们深深感激这位“万警尉”，万全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底。时至今日，万全舍身救命73人的事，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赤胆忠心为革命　忍辱含冤无怨言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9月，兴隆县全境解放。在人们欢庆革命胜利声中，万全终于脱掉了一直使他感到耻辱的伪警尉制服，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草场村。他想，这回可以回到村里，公开地为党工作了。但由于中共组织尚未公开，群众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对他过去的身世不很了解，只作为没有民愤的伪军人员看待，不处理，就算照顾了，当然更谈不上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了。

解放初期，农村党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村政权，清剿残余的敌特分子，发动群众向那些汉奸、恶霸、伪军政头目、特务、地主进行复仇清算。口号是：“欠债的还债，欠命的还命”。这种复仇清算可以打破区、村界限，很快形成了群众运动。除清算本村对象外，各村互相清算，受压迫的群众要伸冤报仇，缺衣少食的广大群众可以得到现实利

益，所以群众情绪高涨，势不可当。

1946年春，挂兰峪区七拨子村四五十名群众来到草场村找万全清算。群众说："万全当警尉时吃过我们的猪和羊，都没给钱，要他赔偿15石（每石50公斤）玉米。"万全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双方僵持不下。当时草场村党支部书记、农会主任杨顺，他相信万全不会干这种事情。可对这种群众运动又不抵制，经双方协商，由草场村农会拿出四石玉米才算了结。此时，各村农会运动正值风起云涌之际，村干部和群众怕别的村群众再找万全清算，要求把他保护起来。杨顺提出："把万全保护性的关押起来。"于是把万全和本村已经在押的富农净珍、吴迁贵关押在一起了。在一天夜间，负责看押的民兵和万全都睡着了，醒来一看，净珍上吊自杀了，吴迁贵逃跑了。万全一着急，想去厕所，到院里摔了一跤。他想，干脆趁跌倒的机会装病装哑巴，免得给自己找麻烦。从此，人们都知道万全哑巴了，再也没有人找他清算了。人们见了他，只是同情地微笑或点头。万全装哑，除他爱人外别人都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运动搞完了，形势稳定了，他也就不再装哑了。

因为万全青年时代做小买卖、赶过驮子，使用过骡子等大牲畜，懂得一些牲畜病理和医疗知识，经常给附近各村的牲畜治病，政府在挂兰峪建了个兽医站，他被调去当了兽医。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被以日伪汉奸走狗等罪名揪斗，忍受着种种屈辱和批斗。1973年8月，含冤去世。

编 后 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兴隆县政协根据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征集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千里“无人区”的兴隆史料，即《兴隆文史资料》第五辑的征编工作。

编写千里“无人区”史料专辑，不仅得到了承德市第十届政协主席刘志兵的关怀，同时得到了县领导充分重视。刘志兵为本书题词是**“学习老区精神，发展老区经济”**；县委书记吴海汇的题词是：**“前辈甘洒热血创基业，后人铸就辉煌谱新篇”**；县长丁伟的题词是：**“不能忘记的历史，激人奋进的篇章”**。政协主席刘丽珍为本书作序，县政府专门拨出印刷经费。为能使此书顺利出版，成立了以政协主席刘丽珍为主任的千里“无人区”编写委员会，确定王庆生为本书主编，统稿全书。编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强调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速编写进度。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一次民族自卫战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特别是近代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因而，多角度地总结抗日战争的丰富经验，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这部史料集，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反映出冀热边人民特别是兴隆人民觉悟和团结程度的高峰

1945年4月，毛泽东主席指出：“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日军实行的“无人区化”

策略，在我国东北三省屡屡得逞。然而，在冀察热辽长城脚下再搞千里“无人区”时，敌人未能如意。在千里“无人区”里仍然有5万多民众战斗在高山老林之中，其中仅兴隆县就有3万民众野食穴居，凭借大山天险与敌人展开了持久的游击战，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工作的巨大优势，显示了兴隆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达到抗日战争中一个侧面的高峰。

二、是坚持“无人区”斗争中敌我重要史实的集大成

这部书将11位抗战先驱浴血奋战、殊死斗争的回忆录再次发表。这些回忆录曾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我县内部出版的《万壑星火》一书和《兴隆党史资料》上，已经大部分散失，现在集中流传下来是一功绩。

部落，是日本国封建时代“贱民”聚居的地方。日军侵占中国后，又冠以“集团”二字，是组织起来加以控制的意思。民众愤怒的称部落为“人圈”，意思是猪有猪圈，羊有羊圈，日本人统治下的中国人也被圈了起来，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所以当地老百姓称部落为“人圈”。

部落，是日军制造这场千古奇劫的癌细胞。我们请戎马一生的郑福堂同志回忆了少年时期出入大水泉部落的斗争生活；请青年诗人王久侠同志通过采访介绍了他家乡一个部落的情况。

大检举，是日军在兴隆境内实施的暴行之一。王庆生同志和栾福忠同志合作撰写了日军在兴隆境内199个部落里进行的四次大检举；摘载了日本著名教育家仁木富美子女士对兴隆县20个部落疫病肆虐的调查。值的特别关注的是仁木富美子女士揭露了二道河、五道河、六道河、大水泉、白马川、双庙、柳河口、高杖子、车河堡等部落的瘟疫，是日军投放各种细菌进行实验的阴谋。

大屠杀，是日军制造“无人区”惨绝人寰的主要暴行。史识丰富

的朱呈云同志正是为了揭示日伪的这个要害，于其生前写了兴隆县重点惨案实录。佟靖功同志到1990年离休时，已经从事9年党史工作。可贵的是他离休以后，又自动地从事了15年党史的征编研。他续写了18起惨案，使兴隆的重点惨案（一次被屠杀10人以上的）增到53起。

在治史理论的指导下，佟靖功同志征集党史资料不仅精心核实事件的真实性，而且十分注意征集真实的细节和情节，尽量再现重点事物的时间和空间。他几十次地深入五指山、黄花川，剖析了死亡2000人的蘑菇峪部落；剖析了杀人狂黑岩（日军官）和姜大祥讨伐队。他在上百名被日伪“配给”的女同胞中，以独特的视角，“挖掘”了张赵氏这个典型。从张赵氏被“配给”后受到的非人的凌辱和她悲惨的命运，来反映日伪军如何灭绝人性地迫害一名善良的妇女以及遗害了她的一生（见《滦河的长恨》）。他在无数女同胞的抗战斗争中，“挖掘”了转角楼上的二姑娘和小西天上的三姑娘两个典型，来反映在党的政治动员工作和先进文化的教育下，两名农村妇女思想觉悟的升华、面临死亡时的精神境界。典型的细节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非常的细节能够触动心灵的弦。这样的典型人物，会流传于世的。

为了防腐倡廉，书里设了一个“永远不要忘记人民”的专题，选载了5篇熠熠发光的史料。“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鱼水深情，血肉相连，是我们兴隆根据地战胜日军的根。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只要不离开大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这5篇史料，深刻地警示着今天的共产党人，不要忘了大地母亲，这种血肉关系要永远地延续下去。

三、总结出冀热边区和兴隆根据地抗战取得彻底胜利的宝贵经验

本集刊载的《千里“无人区”概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专题学

术文章。《千里“无人区”概述》一文，是佟靖功同志在广泛考察研究东北三省军民艰苦卓绝地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了冀察热辽地区战胜日军“无人区”化策略的珍贵经验。为今后再次粉碎军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营养和战略真谛，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项空白。

四、为善待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的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红色资源正逐渐地受到人们的青睐，红色旅游在持续升温和火爆。我们期望这部书为我县生态旅游中能闪现出一处处具有无限吸引力的红色旅游胜地大有帮助。

出版这部书，我们虽然怀着极好的愿望，但因为我们工作能力有限，经验不足，书中会出现我们意识不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教。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这里，我们向辛勤撰稿和赐予照片的诸同志致以衷心感谢。同时，向为本书设计封面、制图、排版、校对、印刷等诸同志一并致以谢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兴 隆 县 委 员 会
2005年6月30日

封面设计：王庆生

文稿校对：吴长江 顾桂平 邢连义 高 忠

蔡永宝 刘立强 徐铁仁

